前上海市委
書記徐景賢
文革回憶錄
首次披露
十年一夢
上海人民公社
徐景賢　著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

徐景賢，上海市人，一九三三年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裏。上海解放前，曾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小學，接觸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一九五一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歷任文藝處幹事、市委文藝幹事、副科長。

一九六四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書記，在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帶領寫作班全體成員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一九六七年初，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先後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等職。親身經歷並目睹了許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結束後被捕，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關押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一九九二年保外就醫，一九九五年刑滿釋放，一九九九年恢復政治權利。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二年，作者用了十年時間，寫成了這部回憶錄。

上海人民公社

HK$98.00 NT$400.00

十年一夢

——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

徐景賢 著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Ten Years A Dream

A Shanghai Ex-mayor's Memoiri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Xu Jingxian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03

九思實録書系

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録

著　　者：徐景賢

出 版 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干諾道中200號信德中心西翼3204室

電子郵箱：zeus-culture@sohu.com

承　　印：新華彩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定　　價：HK$ 98.00　NT$ 400.00

ISBN: 988-97608-1-9

我所寫下的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或是親見、親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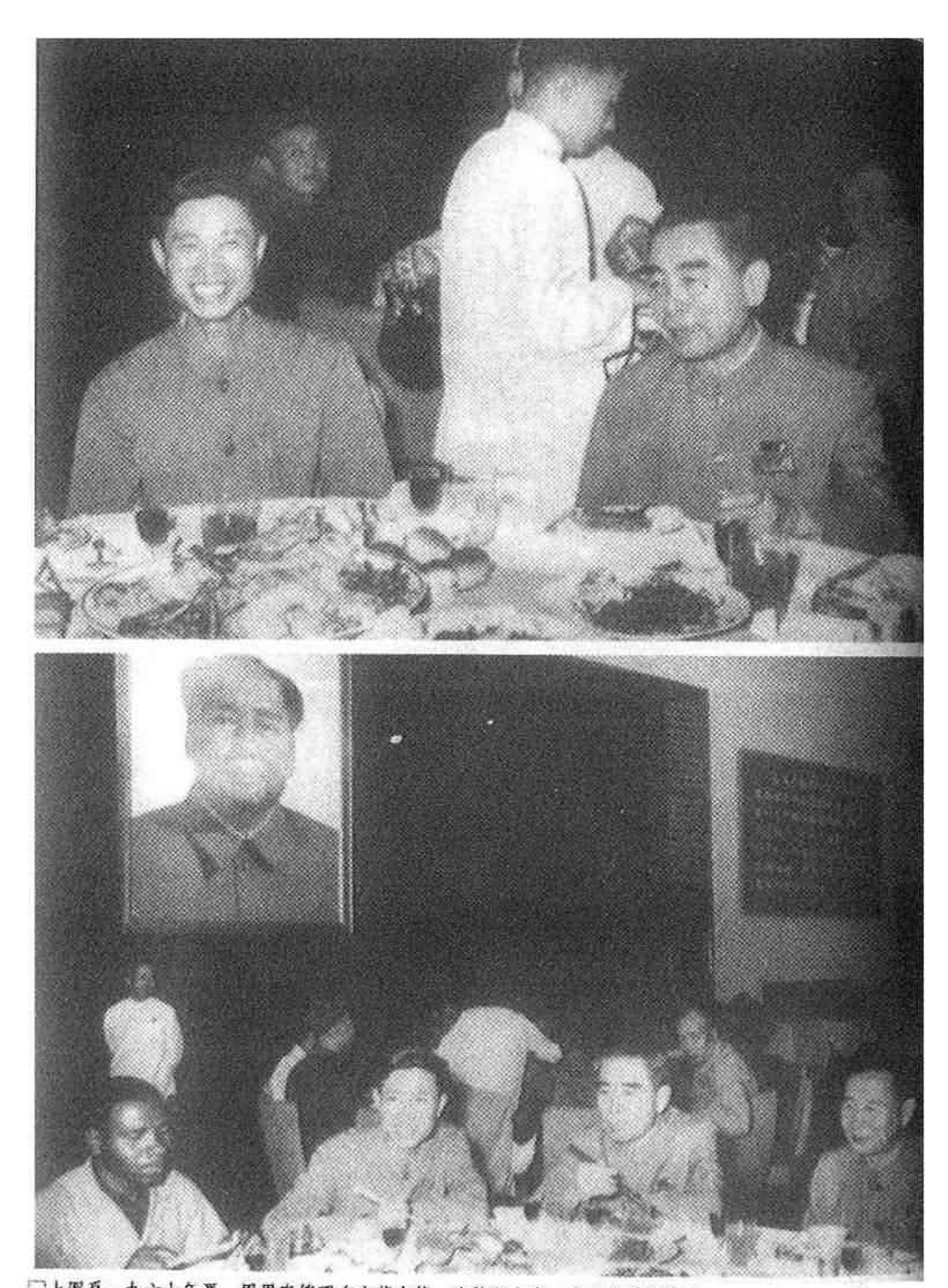
忠實於事實，對歷史負責，是我寫作回憶録的基本信條。

徐景賢

二〇〇三年秋

□上圖爲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會場內，毛澤東和徐景賢握手。

□下圖爲一九六九年四月，徐景賢在中共"九大"上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



□上圖爲一九六七年夏，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第一次訪問上海，會見徐景賢等人。

□下圖爲一九六七年夏，周恩來總理在上海接待外賓，周左爲外交部副部長徐以新，周右爲徐景賢。

□上圖爲一九七二年四月，徐景賢率中國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朝鮮。在北京時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與周恩來握手者爲喜兒飾演者茅惠芳。

□下圖爲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徐景賢在上海會見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主要演員松山樹子。

□上圖爲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偕夫人抵達上海，與徐景賢握手。

□下圖爲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晚，美國總統尼克松偕夫人到上海展覽館宴會廳赴宴，徐景賢等歡迎。

上圖爲一九七二年五月，徐景賢在訪朝期間受到金日成主席接見。
下圖爲一九七三年九月，徐景賢陪同周恩來總理參觀上海工藝美術展覽館。

□上圖爲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生前最后一次上海之行，由馬天水（左）、徐景賢（中）陪同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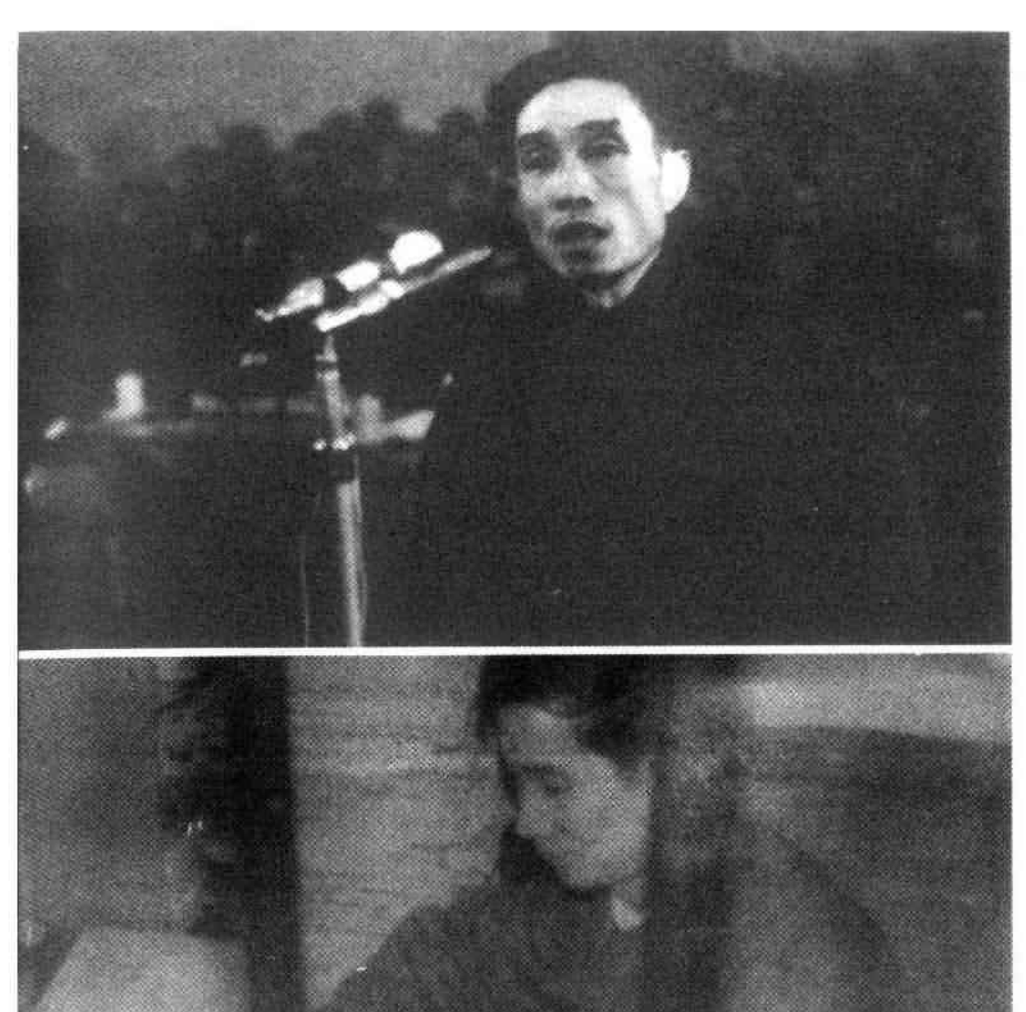
□下圖爲一九七三年九月，與周恩來總理一起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登上上海大廈遠眺，周左爲王洪文，右徐景賢及外交部長姬鵬飛。

□上圖爲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徐景賢陪同鄧穎超參觀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

□下圖爲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徐景賢陪同鄧穎超在上海虹口公園謁魯迅墓。

□上圖爲一九七五年九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偕夫人柯玉珠首次訪華，徐景賢等在虹橋機場歡迎。

□下圖爲李光耀一行在徐景賢等陪同下訪問上海市少年宮，李光耀的女兒和少年選手打乒乓球。



上圖爲一九八〇年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
下圖爲一九八五年，徐景賢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牢房內讀書。

□上圖爲二〇〇三年三月，徐景賢攝於海南省三亞"天涯海角"。
□右下圖爲徐景賢和妻子葛蘊芳二〇〇〇年攝於杭州汪莊毛澤東住地。

目　録

目　録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歲末，嚴寒的冬天悄無聲息地來到了人間。

然而，我却仿佛没有感覺到冬天的降臨。刺骨的風，寒徹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熾烈的熱情面前消散了，融化了。因爲，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正式發表"造反聲明"；我在造反大會上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作了題爲《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這就是當時上海的各家造反報紙所報道的："市委心臟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曹家，指當時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從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之中。

我公開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動：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共産黨的機關紀律嚴明，規定任何情况不得外泄，更不用説是知情人起來造反了；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個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機關工作，當時還只有十七周歲。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個年頭裏市委先后换了三届第一書記：陳毅、柯慶施和陳丕顯，我都没有離開過市委。我在市委機關裏有不少熟人，他們都叫我"小徐"。在宣傳部文藝處，我當過干事、副科長，以后又擔任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并被任命爲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市委常委會。我了解機關的内情，也受到領導的重用，所以，當我起來"反戈一擊"的時候，有些領導大爲失色，各部、委、辦的造反派起而呼應，也有些人表示不滿和反對，整個市委機關都亂了套。

我的經歷

我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爲一個黨的干部，是中國共産黨長期培養的結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裏。父親徐宗駿，是上海郊區奉賢縣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一九二六年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化學系，同年回到奉賢。一九二七年秋和共産黨人李主一、劉

曉等創辦了一所曙光中學，他任校長；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學校被國民黨查封，父親逃往上海，從此脱黨，他先在中學教書，以后在交通大學化學系任教，從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我的母親戴秋楠，原來是小學教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擔任過奉賢縣國民黨縣黨部委員，以后成爲家庭婦女，養育了我們姐弟三人。我在家裏排行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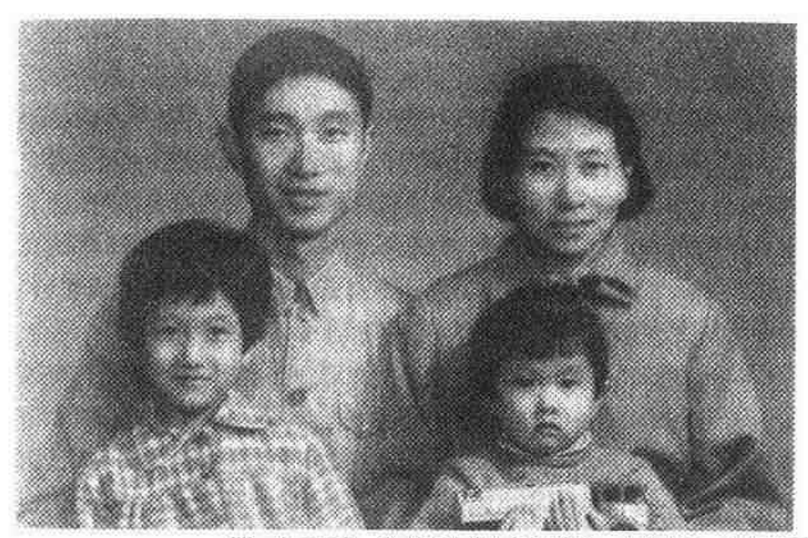
我的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的一條石庫門弄堂裏度過的。我就讀于學費昂貴的南洋模範中小學，因爲父親在中學部兼課，可以減免我的一半學費，如果成績優秀的話，還可以減免另一半學費，所以我讀書時經常名列前茅 。從小學到中學，我經歷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爲日軍進駐交通大學改爲同文書院，父親憤而辭職，家境日見窘困，我也排隊買過户口米，吃過六穀粉，培養了仇恨帝國主義侵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戰争勝利以后，父親復員回到了交通大學教書，我在交大學生的影響下，和中學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些反美反蔣的學生運動，擔任過平民夜校的教師，接受了進步思想。在中學裏我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擔任學藝部長。

上海的解放給我帶來了參與各項政治活動的廣闊天地，我在學校裏第一批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又成爲南模通訊組的組長，向報紙雜誌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違背了父親希望我成爲化學家的意願，撕掉了大學入學報名單，報名參加了上海市政建設干部訓練班。組織部門在選拔時，了解到我愛好寫作，寫過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傳部工作。以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够被選送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對我來説，實在是莫大的殊榮。從此，我開始了在市委機關工作的漫長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經丁景唐和徐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時，結識了同事葛緼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師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后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我們于一九五六年結婚，婚后有兩個女兒，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開始時分工聯系群衆文藝，以后又聯系文學界。我在工作崗位上繼續自己的學業，參加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函授學習，同時，繼續從事業余寫作，在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雜文、



□一九六四年，徐景賢虞與妻子葛蘊芳、女兒徐遥、徐蕴攝於上海。

散文、影評、書評等。我寫過以解放前夕上海學生運動爲題材的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電影劇本《曙光在前》（與人合作），出版過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我參與創作的話劇《年青的一代》，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創作奬，并被搬上了銀幕。一九五九年，我成爲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〇年，我兩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爲青年作家的代表，訪問戰火紛飛的越南，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見。

我的這些經歷，爲我被調到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并受到重用，創造了條件。

上海市委寫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加强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争，決定從各方面調集人員，成立一個專門的寫作班子，負責撰寫各個領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寫作班剛建立時，由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分管，把我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調去，擔任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

市委寫作班的地點設在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傳説是李鴻章爲他的

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園。寫作班下設文學組，主要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由我負責；歷史組的主要筆名是“羅思鼎”，寓“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之意，開始時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金沖及負責，金沖及隨石西民調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負責；此外，還有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等。寫作班的成員都是從社會科學各部門、各單位，各大專院校，各文藝協會、院團以及市委黨校等處調集的，都是較强的“筆杆子”，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誰要是進了市委寫作班，那就是一名受黨信用的“左派”，在當時是十分光榮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調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寫作班改由市委書記張春橋分管。張春橋是我的老上級，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和市委宣傳部，都當過我的領導。一九六六年張春橋調到中央文革小組任副組長以后，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由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負責。無論是石西民、張春橋或是楊西光，他們對寫作班都抓得很緊，向我們傳達中央的有關指示，部署一個又一個的戰役，審查一個又一個的選題計劃，直至審改一篇又一篇的重點文章。在他們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在各條戰綫上主動出擊，展開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學方面，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在歷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影片《清宫秘史》的歷史觀；

在文學方面，批判了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綫”，批判了“國防文學”口號和“中間人物”論；

在電影方面，批判了《中國電影發展史》和瞿白音的《“創新”獨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舖子》、《舞臺姐妹》……

在戲劇方面，批判了“有鬼無害”論，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漢的《謝瑶環》……

總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還没有揭開，在思想戰綫上早已是炮火連天、硝烟瀰漫了。當然，關鍵性的戰役就是對吴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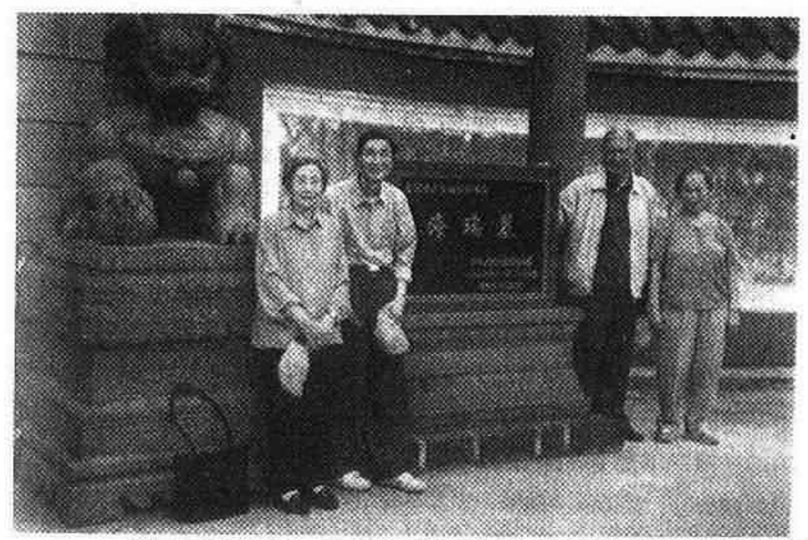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在上海通過張春橋找到了姚文元，下達了撰寫批判吴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的任務。江

青强調寫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們市委寫作班來。當時寫作班已經搬到武康路二號，張春橋親自向我們宣布了保密紀律，由朱永嘉任組長的“羅思鼎”小組爲張春橋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資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就結識了姚文元。此后，我們之間有着較多的交往，所以對于他的來到寫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號的二樓闢了一間專門的寫作室。

《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爲題，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于上海《文匯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來受到過江青的公開表揚。

一九六六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先后被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組員。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組成員，替市委到處“救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以后，我不想再爲市委效勞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去“摸氣候”，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了他，要他帶口信給我，告訴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執行了錯誤路綫，要



□二〇〇三年三月，徐景賢夫婦和曾經參加過《海瑞罷官》批判的原上海市委寫作班朱永嘉及其夫人，同游海南島，在海口市憑吊海瑞墓。

我帶領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到群衆中去，和群衆站在一起。過了幾天，姚文元又和我通電話，問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綫”？意思很清楚：張、姚讓我放下工作上“前綫”，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劃清界綫，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

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住在西郊，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應付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炮轟”，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衆作的“檢查”，還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使我了解了許多内情。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當衆作了揭發，并勒令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會聽取批判。我們的口號是：“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我們的行動，開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政機關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帶頭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機關内部的造反派紛紛殺將出來，我們又成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簡稱）以及各個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繼續向已經基本上陷于癱瘓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進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連自已的三十三歲生日都忘記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騎着自行車，以市委聯絡站負責人的名義，往來奔忙于上海各個造反大會的會場之間。每到一處地方，我就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着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説，然后匆忙地趕往下一站。在我看來，這真是一個火熱的冬天啊！

姚文元打來電話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們昨天剛剛吃過爲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祝壽的長壽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號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進一步揭發批判市委的問題。忽然，文學組的一個青年從樓裏奔出來叫我：“老徐，北京有長途電話！”我趕緊跑到辦公室，拿起電話聽筒，裏面響起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夾雜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話：

“徐景賢嗎？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傳達一下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簽字同意"工總司"提出的五條，中坐簽字者爲張春橋，后中站立者爲徐景賢。

哦，原來是文元。自從他調到北京去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員以后，幾個月來，總是我有事打電話找他，他從來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特別是在市委寫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頻頻向北京打電話，尋求他和張春橋的支持，很想傾聽他的意見。但是，電話相當難打，連通過紅色保密機也難以找到他，真是"衆裏尋他千百度"。當時，我心裏曾經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來了！"今天，他忽然主動打電話給我，而且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趕緊掏出小本子准備記録。

姚文元在電話裏一反平常冷静的語調，用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語氣說道：

"昨天晚上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都到毛主席那裏去了，祝賀主席生日，給主席敬酒。主席很高興，他平時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們干杯了。主席對上海的形勢很關心，他從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主席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我問主席：上海市委强調'内外有别'怎么辦？主席說：'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

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邊聽，一邊嗯嗯，把姚文元電話傳達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心裏激動得熱血沸騰。

姚文元接著說:"主席很欣賞你們的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他說'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好！"

姚文元最后說道:"主席在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 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志將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社論，你們要很好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問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可不可以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範圍內開會傳達？"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說:"不要開大會，你們先在小範圍裏吹吹風吧！"

我放下電話，興奮萬狀，奔到寫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說:"剛才文元同志來電話了！文元同志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 我宣布造反的時候，雖然有張春橋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裏還是不很踏實的，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爲我們撑腰了，我還怕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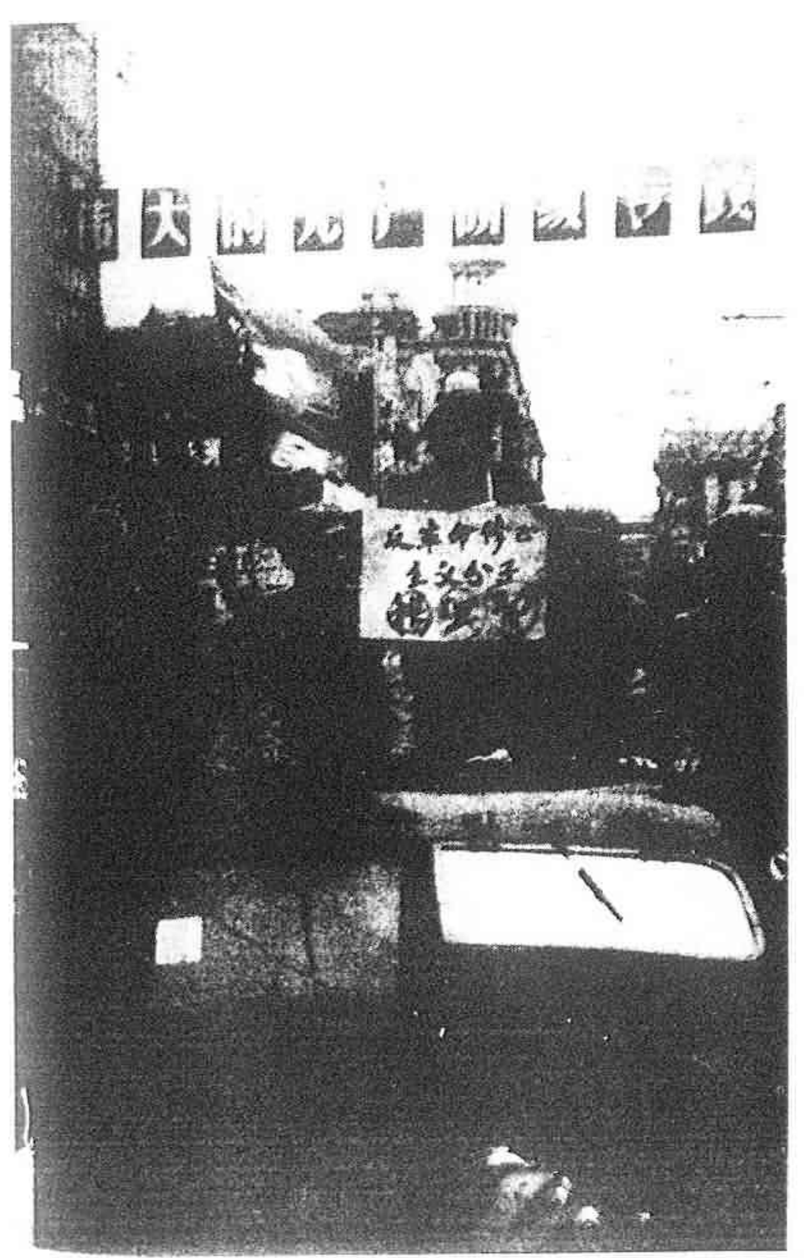
晚上，在武康路二號寫作班二樓的玻璃棚陽臺上，由我主持開了一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骨幹會議。會上先由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緊接着哲學組、歷史組、文學組以及市委辦公廳《支部生活》編輯部的人員紛紛争着發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莊嚴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誠、肅穆。

在討論中，我提醒與會者思考"毛主席說的全國全面內戰開始了，究竟有什么樣的深刻含義？我們該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說"我們市委聯絡站比其他造反組織條件優越得多，我們要利用這些條件繼續開大會批市委。"

從復旦大學哲學系調到市委寫作班哲學組來的郭仁杰，操着山東口音說"毛主席不是說'內外有別'可以打破嗎？我們把市委檔案室裏的檔案翻出來，把有關內容摘録下來，作爲批判市委執行反動路綫的炮彈。"

我覺得這些主意不錯，表態說:"可以，由我寫條子給市委書記馬天水批，過幾天組織幾個黨員進市委檔案室查檔案。這次批判市委的大



□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在南京路被批鬥游街。

上海紅衛兵在批鬥市委常委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常溪萍。

會要以《紅旗》雜志的元旦社論爲口徑，由我們負責寫出發言稿，大會要和‘工總司’、‘農司（籌）’、‘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等組織聯合召開，聲勢要大一點。大會由黨校來的

程綺華負責籌備，籌備處就設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

一切商量定當以后，夜已深了，我們對着毛主席的畫像，輕聲唱起了《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支歌。我邊唱歌，邊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動得顫抖起來：這場全國全面内戰的結果是什么，我還不能預計，但是，我預感到自己將成爲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在即將到來的全國全面内戰當中，我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邊……

唱着、唱着，我驀然想起了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給我的一副對聯：

革命方覺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親。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這個"親"字，我把這個"親"字真正地溶入到這首歌曲裏去了。

我們唱得很輕、很輕，歌聲只在室内回蕩，因爲就在市委寫作班隔壁的一幢樓裏，還住着一個市委書記和一個部長。時過中夜，他們家裏黑洞洞的，人們早已進入了夢鄉。我們不想驚動他們。當然，在沉睡中的他們，也萬萬不會想到：就從近在咫尺的市委寫作班裏，一場席卷全國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即將猛烈地刮起來了！

上海大亂

正當我們沉浸在接獲"最高指示"的勝利喜悦中的時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緊急報告，説是上海工人赤衛隊有幾萬人包圍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這個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爲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時候，是公開反對張春橋支持的"工總司"的，對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態度，所以被罵爲"保皇派"，現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瞭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市長到會，提出了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八項要求，讓曹荻秋市長簽字。曹開始時加以拒絕，赤衛隊就批鬥個没完没了，一直糾纏到次日凌晨三點鐘，硬要曹市長承認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曹市長又急又躁，曾經昏厥過去，最后只得簽字。第二天，上海市委開會時，陳丕顯第一書記批評曹市長不應該簽這個字，要曹給赤衛隊做做工作，妥善解决這個問題。赤衛隊的工作還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總司"又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大會，勒令曹市長到場，迫使他當衆宣布：給赤衛隊簽過字的八條作廢；赤衛隊是"保皇組織"。

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這樣一來，矛盾激化了，赤衛隊被激怒了，把怒氣出到上海市委頭上。赤衛隊總部一方面給黨中央發電報，要求派專人來上海解决問題；另一方面，從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調大批隊伍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賬。陳丕顯、曹荻秋没有接見他們，赤衛隊就繼續調兵遣將。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經有兩萬多名赤衛隊員涌進了市委大院，還有很多人擁塞在大院外的馬路上。

在這種急劇變化的局勢面前，我决定親自到現場去走一趟，觀察形勢，再商量對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機關工作證，擠過

層層包圍圈，進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裏到處走動，實地觀察：天氣很冷，我戴上了一個大口罩，防止被人認出來。我走進市委書記處的辦公樓，只見到處擠滿了人：每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裏，至少擠進幾十個人，連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厠所裏，也擠着四、五個人。樓梯頭、走廊邊、草坪上、樹蔭下，滿坑滿谷，全是戴着"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

原來住在康平路大院裏的市委領導人，已經撤走了；連一向聲稱自己不害怕群衆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也帶着家屬轉移了。整個大院裏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家屬以及張春橋的一家。赤衛隊的頭頭們進入康平路大院之后，到過張春橋的家裏，要求張的妻子李文静爲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反映赤衛隊的要求，隨后就退了出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屬，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裏的張春橋的家，從后面的那座水泥樓梯悄悄地繞道走上去，走到張家的后門口，從玻璃門朝裏張望，客廳裏不見人影；我試着敲敲后窗，輕輕喊了幾聲，也没有人答應，估計李文静和孩子們因爲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裏，觀察動静，只見赤衛隊員們因爲總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見不到陳丕顯和曹荻秋，情緒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筆在墻上寫大標語："曹老頭决没有好下場！""赤衛隊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發泄自己的不滿。在現場看不到有人在作宣傳鼓動，加上隊員們通宵集合包圍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現在許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臉上顯露出十分疲憊的神色。有幾個工廠的食堂，用黄魚車給本廠的工人送飯菜來；吃剩的飯菜，連同寫着各個工廠廠名的搪瓷盆碗，到處亂扔，滿地狼藉；還有的單位送來幾百箱餅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這些情景，我的心裏暗暗高興，我想：市委這下子徹底被動和孤立了，因爲把兩派群衆都得罪了。我覺得現在正是從政治上瓦解工人赤衛隊的最好時機。

正當我興沖沖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時候，忽然看見有許多打着紅旗的隊伍，從徐家匯、宛平路、余慶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來，紅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隊"。他們迅

速把康平路大院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來。我上前一問，回說隊伍是“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有的人還說什么“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我們是來保衛中央文革的”！這時，在康平路大院門口，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着，互不相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我馬上回到市委寫作班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我說：“‘工總司’這種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現在是一座空城，讓赤衛隊呆在那裏，没有幾天就會潰散的。現在二兵團調了大批隊伍去包圍，反而刺激了赤衛隊的情緒，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歷史組的朱永嘉說“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准備召開全市的批判大會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讓康平路去唱‘空城計’，不要睬它。”

哲學組的郭仁杰說：“趕快想辦法找找‘工總司’和二兵團的頭頭王洪文、潘國平和耿金章，要他們把隊伍撤走。”

於是，我要市委寫作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找王洪文他們，可是到處找不到。我說：“這樣對峙下去，雙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動了。我們還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頭對准市委，從政治上瓦解赤衛隊。”

我馬上通知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在康平路大院邊緣上的一百八十一號樓裏，設立一個聯絡點；要黨刊《支部生活》編輯部造反隊負責，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樓上，安裝起幾只高音喇叭。我布置歷史組、文學組的幾支筆杆子，立刻起草傳單；我自己也親自撰寫了一份《赤衛隊爲什么要大鬧龍宮？》，呼吁赤衛隊員們反戈一擊，殺回工廠去，向市委的反動路綫猛烈開火。傳單寫好后立刻被打印出來，還抄成大字報，在康平路大院周圍散發和張貼，并且通過高音喇叭連續向大院内廣播。經過政治攻勢之后，有一批赤衛隊員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從人縫裏溜走了，留在大院裏堅持不走、被包圍着的還剩一萬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一些憤怒的赤衛隊員把怒火傾瀉到市委頭上，在康平路大院裏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標語。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從康平路連夜給正在北京的張春橋通了電話。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寫作班的紅色保密電話機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是李文靜打來的，她說：“昨天半夜裏我和春橋通了電話，講了康平路大院裏的情况，春橋

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要告訴徐景賢轉告上海各個造反組織注意，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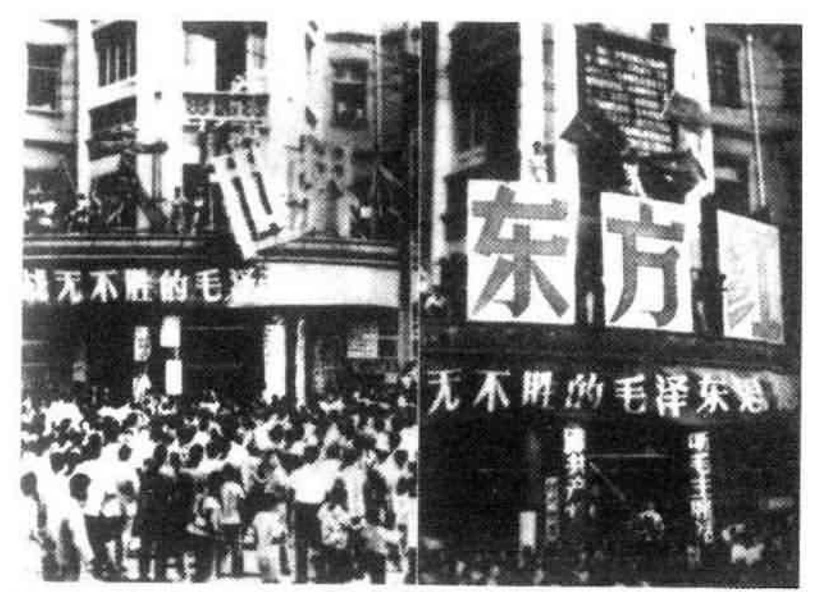
接到張春橋的電話以后，我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員作了傳達，并且和幾個領導核心商量如何落實張春橋的指示。我說："春橋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們造的反，讓赤衛隊摘了果子，豈不前功盡棄？我們召開大會的口號看來要升級了，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會一過年就開，口徑要統一，按春橋同志的電話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

當天晚上，在緊挨着康平路大院的榮昌路六十號臨時指揮部裏，我派出的王承龍、朱維錚和"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發生了一場激烈的争論。耿金章在知道了張春橋的來電以后，不願用"文攻"，繼續增調大批工人造反隊，急于指揮他們打進去。半夜過后，耿金章不聽勸阻，一聲令下，工人造反隊發起了衝鋒，蜂擁進入市委大院，邊衝邊打，把疲勞過度、毫無鬥志的赤衛隊員們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還被從二樓陽臺上推下樓去，摔成重傷。赤衛隊員們被俘虜以后，排成長長的單列縱隊，魚貫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門。所有的人都被當場剥去赤衛隊的袖章，高舉雙手作出投降的姿勢，每個人的手裏還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來"撈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馬路上集中，聽取訓話后才被釋放回家。

耿金章他們打勝以后便揚長而去，留下的傷員只好由市委大院裏的后勤工作人員集中處理，清點下來受傷的共計九十一人，其中最嚴重的被打斷腿骨，於是當即叫來救護車把傷員分别送往華山醫院、瑞金醫院和華東醫院救治。

等到清點處理完傷員，已經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半了，我終于松了一口氣："唉，總算沒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動，怎么向春橋同志交代呢？"

這場萬人大武鬥，在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武鬥結束以后不到半小時，張春橋從北京親自打電話給我，向我詳細詢問了武鬥的情況，我一一作了匯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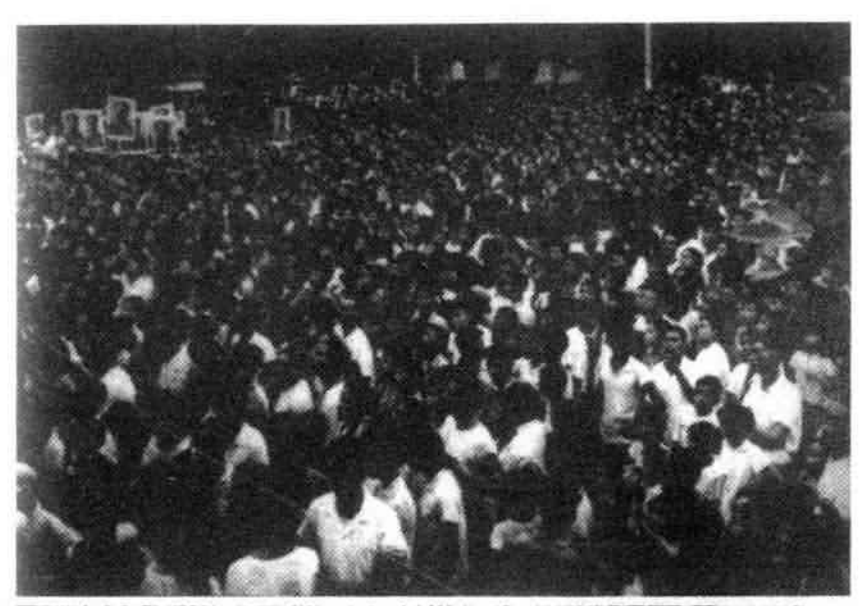


□上圖：紅衛兵和造反派把上海著名的娛樂場所"大世界"改名爲"東方紅"。

□下圖：造反派和紅衛兵在上海市委辦公大樓內張貼標語和大字報。

□上圖、造反派在南京路上游行。

□左圖、馬路上參與辯論的人群。



□上圖：在上海市委門前觀看和參與辯論的人群。

□下圖：造反派在街頭張貼大字報。

造反派在外灘散發傳單。

張春橋聽完匯報，用他那由于抽烟過度而顯得有些沙啞的嗓音，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一定要始終把矛頭對准上海市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指明這場武鬥完全是市委挑動群衆鬥群衆引起的，他們才是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臨了，他又說："再也不要提'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了！"

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幾天，我們准備集中全力，召開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牢牢把握鬥爭的大方向。"

周總理下令抓赤衛隊頭目

工人赤衛隊挨了一頓打，當然是不肯善罷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衛隊的一些頭頭鼓動了一批隊員，衝進了上海北火車站，准備仿照王洪文、潘國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車上北京請願、告狀去。提起"安亭事件"，人們記憶猶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聯合各廠的工人造反隊，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宣布"工總司"正式成立。因爲上海市委采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王洪文、潘國平等會后就率兩千多人到市委請願，市委負責人拒不接見，他們就到北站搭火車北上請願。火車開到嘉定縣安亭車站時，被阻在支綫上不能前進，工人造反隊索性在滬寧綫上靜坐，造成鐵路交通中斷三十小時又三十四分鐘。這件事震動了中央文革，先是陳伯達發來電報，接着張春橋又受命從北京飛來談判，最后同意了"工總司"的要求，滬寧綫才恢復交通。現在，赤衛隊就提出："工總司"可以乘火車上北京請願去，我們爲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對赤衛隊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們去鬧吧，反正上海市委自食其果，他們總會向中央報告的；而我已經有幾天幾夜没有好好睡覺了，趁着過除夕夜的機會，我回到常熟路瑞華公寓自己家裏，早早地上了床。

當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時候，床邊的電話鈴急驟地響起來。我抓起聽筒，傳來的是長途臺女接綫員的聲音："是徐景賢同志嗎？北京張春橋同志要找您……"

我打開床燈，看了一下手表：零點十分。哦，已經是元旦了，"全面內戰"的一九六七年來臨了！

張春橋在電話的那頭着急地說"上海的赤衛隊鬧着要乘火車到北京來告狀，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有一個赤衛隊的頭頭，名字叫王玉璽，他利用職權同意調車，我們知道了都很生氣。剛才中央開會研究了，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鐵路分局去對王玉璽采取措施。同時，還告訴陳丕顯，讓他召集各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開一個會，討論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穩定下來。赤衛隊幾千人上北京的話怎么辦呀，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嘛！不過，現在陳丕顯說話可能不靈了，造反派的頭頭們不肯聽他的，所以我打電話給你，你可以在會上說一說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聽完電話，趕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過年也過不安穩。"我說："可能這幾天回不了家嘍！"幾分鐘以后，市委辦公廳就派小車把我送到了東湖路市委招待所。

不一會兒，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絡繹不絕地來到了東湖招待所的餐廳。北京和外地的幾個著名的紅衛兵組織駐滬聯絡站的負責人，幾乎都到齊了，有北大"捍衛團"，有清華"井岡山"，有北航"紅旗"，有北京地質學院、體育學院、電影學院，此外，還有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的駐滬紅衛兵代表。上海的紅衛兵組織有"紅革會"、"紅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等。"工總司"的王洪文來得比較遲，他穿着一身較舊的黄綠色棉軍裝，戴着雷鋒式的棉軍帽，滿臉病容，他瓮聲瓮氣地對我說："我這幾天感冒了，正在發燒。今天開什么會呀？"我便把自已知道的情况告訴了他。

最后一個來到會場的是"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他雖然打着"工總司"的旗號，但根本不聽王洪文和潘國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軍大衣，足蹬一雙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個子顯得神氣起來。他一陣風似地卷進室內，擺出一副剛從前綫歸來的指揮官的架勢，咋咋呼呼地說："我剛剛從昆山回來。被我們從康平路打走的赤衛隊又集中起來了，他們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車，幾千人轉移到昆山，准備從那兒上火車。我已經把我們二兵團的隊伍調去了，把赤衛隊堵住在昆山城

裏……"

耿金章小時候生活很苦，被抓壯丁參加了國民黨部隊，后來又成了"解放"戰士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復員到上海才當上了工人。他打過仗，所以現在又用部隊的那一套辦法去對付赤衛隊。大家聽到他從昆山帶來的消息，馬上議論紛紛，對如何處理目前這種混亂的局面，各抒己見。

正當與會者在七嘴八舌的時候，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來了。當時他還兼着上海警備區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軍裝，一進門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訴大家："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總理要我同各個群衆組織的負責人協商，一起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接到電話以后，我趕到上海鐵路分局了解情況去了，那個調度所的負責人王玉璽，擅自簽字同意發車，破壞交通，我已經按照總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來……"

陳丕顯邊說着邊脫下軍大衣，然后在白布鋪成的長條桌子前面坐下，繼續向大家介紹上海當前的嚴重局勢：

> ……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昆山一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八十多個工作人員中，有七十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綫的鐵路交通，已經完全中斷。從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現在的二十六個小時中，已經停開客車二十六列，有五萬多旅客不能上車，還有五萬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的貨車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還有二十二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嚴重的，就是整個上海市只剩一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來扭轉這個局面？

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們聽說了這么嚴重的情況，你一言我一語地嚷開了，有的指責市委挑動群衆鬥群衆，有的要陳丕顯自己到昆山去處理問題，還有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乘機要陳丕顯批條子給他們配備幾輛摩托車做聯絡用。

我一看這個混亂的局面，覺得離開張春橋的電話要求太遠了。但是，在這樣的時刻假如由我出面幫陳丕顯說話，難免有當"保皇派"的嫌疑。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走到會場正中，站在陳丕顯的對面，大聲說：

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裏去，使滬寧綫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應該對這個局面負責呢？"就是你，陳丕顯！你這個市委第一書記長期躲在幕后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臺，你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植了一支赤衛隊，然后又想把赤衛隊甩掉。你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禍首，這筆賬我們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傳達了剛才張春橋打給我的電話。大家一聽，覺得我的來頭不小，便安靜下來，"炮司"的幾個紅衛兵還一字一句地記下張春橋的"中央文革特急來電"，馬上出去印發傳單了。我順勢出主意說："現在我們這些造反組織，要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群衆把矛頭對准以陳丕顯、曹荻秋爲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反戈一擊，回到上海的各個崗位上來，抓革命、促生產。我們還要勒令市委的各級領導干部堅守崗位，聽從革命造反派的指揮，維護上海的革命秩序，這個聲明寫好以后，讓陳丕顯簽字馬上送到市委印刷廠去，大量印發。……至於昆山那一邊，剛才我已經和'工總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過了，我們立刻趕到那裏去，做做赤衛隊的工作，動員他們回上海。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堅決和各兄弟組織的戰友們站在一起，并肩戰鬥！"

大家同意我的建議，我又逼住陳丕顯問道："陳丕顯，你同意不同意？"

在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后，我們當場進行了分工，中央音樂學院駐滬的紅衛兵舒澤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楊小兵願意執筆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陪在旁邊等着簽字付印；至於

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帶了其他幾個群衆組織的負責人，立即奔赴昆山。

一切商量完畢，已經晨曦初露，東方微白，東湖招待所的食堂裏端出幾籠白饅頭，我們吃了幾個，便跳上"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一輛敞篷卡車，向昆山進發……

張春橋、姚文元飛抵上海

我和幾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在昆山活動了一整天，又趕往蘇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廟裏，集中了上千名潰散的赤衛隊員。我們和鐵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調來一列客車；大家蜂擁上車，抵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來《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仔細讀了幾遍。接着，我到市委機關聯絡站檢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准備工作。這次大會的全部發言稿，由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吴瑞武負責撰寫；大會的一、二、三號通令，由哲學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協會的幾個人負責撰寫；大會的組織工作，由市委黨校的程綺華抓總。我強調：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只曉得衝衝殺殺，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連一篇發言稿都拿不出來，只能由我們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開會的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人以及宣讀向毛主席致敬電和全部通令的人員，要由各個造反組織的頭頭來擔任，因爲只有他們能够拉出工人和學生的隊伍來。這次大會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爲首的上海市委"，必須有一個大聯合的聲勢，如果光靠我們這些機關造反派，那是孤掌難鳴的。於是，我們在市委黨校召開了幾次各群衆組織的協商會，經過爭吵和辯論，最后確定大會在一月六日召開。

正當我們爲大會的籌備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一月三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從北京打電話給我，他問道："武康路二號寫作班的地方，現在干什么用？"我回答："現在成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的內部辦公地點，我們對外聯絡，都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姚文元說："春橋和

我想要用武康路二號這個地方，你看行不行？”我一時不太明白：他們要用，怎么用？但我連連回答：“行的，可以的！”我乘機向他匯報了一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籌備情況，他不表態，只是說：“這件事我需要和春橋商量一下。”便把電話挂了。

聽完電話，我馬上找郭仁傑一起分析。郭仁杰原來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教師，總支副書記，調來寫作班哲學組以后，仍和復旦的紅衛兵保持着密切的聯系，他在推動市委寫作班造反的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現在又成了市委機關聯絡站的領導核心。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他聽說姚文元的電話以后，和我一樣，感到突然和興奮，我們研究后一致認爲：張春橋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來了！所以他們要用武康路二號……，但是他們究竟什么時候來，要來多久，來干什么……都還是個謎。

一月四日的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號起草大會的程序，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拎起聽筒，姚文元的大嗓門仿佛就在近旁：“徐景賢嗎？春橋和我已經到上海了！”呵，想不到有這么快，他們一來，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幾個寫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號，我們想來聽聽情況；關于那個大會怎么開，也一起談一下。關于我們來上海的事，暫時要保密。”

電話通了以后不久，張春橋留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就帶了市委警衛處的人員來檢查會場了。我安排出寫作班樓下東廳，作爲他們接見的地點。下午兩點多鐘，穿着軍裝、披着軍大衣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兩個人當時没有擔任任何軍職，但自從毛澤東穿着軍裝接見紅衛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員都穿起軍裝來了。

張春橋、姚文元熱情地和我、郭仁傑、程綺華、朱永嘉、吳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大家圍着長桌子坐下，張春橋首先開了腔：

> 寫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國的影響都比較大，推動了全國省、市一級的黨政機關幹部起來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黨政機關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條，裏面也吸收了你們的經驗。毛主席在接見中央文革的成員時，肯定了你們的造反，文元已經給你

們傳達過了。所以，今天我們想先見見你們……

張春橋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一下，脱下軍帽放在桌上，用手撫了一下他那稍帶卷曲的頭髮，慢悠悠地點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說：

> 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聯絡站就作爲我們的工作機構。我們到上海來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后向中央報告；所以我們不想介入上海的具體活動，同時，我們到上海來的消息，暫時也不想公開。你們的工作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不必等我們。

這時，姚文元插話說："你們講一講最近有些什么動向，那個大會打算什么時候開？"

我當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勢，作了一個概要的匯報，特别提到自從張春橋打來電話，指出赤衛隊已經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提醒我們不要讓别人把勝利果實奪走了之后，聯絡站就集中全力，准備召開"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現在已經准備就緒。接着，我就把大會的名稱、發起單位、八個發言的題目和發言人的姓名、三個通令的内容等，統統作了匯報。當我談到有一個重點發言准備讓"工總司"王洪文來講，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圍攻張春橋的情况時，張春橋馬上表示出很大的興趣，他從黄色玳瑁眼鏡后面向我投來好奇的目光，問道："這個情况你們怎么知道的？"

我回答："我們翻閲了市委檔案室裏的檔案，這些情况是從當時市委常委會的原始記録中摘出來的。"

張春橋恍然大悟，說："大會發言稿給我看一下。"

我馬上答應："草稿已經送到報社排印去了，等清樣出來以后就送給您審查。"

張春橋點點頭。

我又說："開大會的准備工作經過幾個發起單位的討論，大都取得一致了，我們提出一月六日上午開會，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和市委常委

們都要到場接受批鬥，根據氣象預報，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們建議大會放在文化廣場室內開，‘工總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廣場露天去開，我們怕效果不好，所以還沒有最后定下來。今天你們兩位來了，關于開會的時間、地點，要向你們請示，請你們决定。”

張春橋沉吟了一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見，然后說：“關于大會的開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見，就照你們的安排開。至于會場究竟放在文化廣場還是放在人民廣場，我們打算明天找‘工總司’的人見見面，到時候聽聽他們的意見再定吧！”

談話結束以后，張春橋先走了，姚文元單獨留了下來。因爲我聽說他回到上海后還没有見過家屬，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盧灣區任街道黨委書記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號來見面。在這等候的間隙中，我們兩人獨處，他向我詳細詢問了市委寫作班人員在造反過程中的表現，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認識姚文元已經有十多年了，自從他從盧灣區調到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以后又調到《解放》雜誌和《解放日報》，我們的交往日益密切。六十年代初期，我寫了一篇雜文《不做“冷酷的觀衆”》，發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 姚文元知道以后馬上挺身而出，寫了一篇雜文《并非“挨批”》，爲我作了辯護，我很感激他。以后，他生了肝炎，我當時在市委宣傳部工作，就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寫了報告，經過市委批准，讓他住院治療，等他的病基本痊愈以后，再由市衛生局安排，轉到青島去進行療養。爲了答謝我的關心，他送給我一本著作《在前進的道路上》，并在扉頁上題句：

蠅死魔走戰士在，黯黯夜色聽鷄鳴。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樸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藍卡其中山裝，脚上是一雙圓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緑色的背包，背包裏除了書以外，時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來的面包等點心。有一次，還揀出過半塊油炸粢飯糕。他就以這身裝束，到處走動，曾經步行到上海錦江飯店去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在大門口就被“擋駕”了：不讓進。爲此，我爲他憤憤不平，因爲我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我曾想：我們這些小人物，

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學上搞出些名堂來，讓那些瞧不起我們的"龐然大物"瞧瞧、爭一口氣。

此刻，我和剛從北京回來的姚文元兩人對坐在武康路二號的東客廳裏，聽他分析當前階級鬥爭的形勢。他對這裏非常熟悉，就在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裏，他吃在這裏、睡在這裏，至今在二樓仍保留着他的寫作室。他告訴我：這次回上海張春橋和他都住在興國路招待所。我知道過去這裏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才有資格住的地方。他讓我今后通過紅色保密電話機和他們直接聯系，但是電話號碼只能我一個人知道，不要外傳。

我把他説的一切都記在小本子上，又抬頭凝視着面前的這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他是過去的姚文元，又不像過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軍裝，使我難以和他過去穿的藍卡其中山裝聯系起來。他的談話一如既往，但又略帶一點矜持，并且顯得頗爲小心謹慎。我覺得：在他的身上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但是我又想：不管怎么樣，姚文元現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人了，我應該接受他的領導……

我參加了一月奪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張春橋和姚文元決定在武康路二號接見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由我發出通知。下午兩點不到，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等十來個人，擁進了市委寫作班東廳。這前頭五個有名有姓的人，是"工總司"的老常委；而所謂"工總司"的"司令"，通常是指"王司令"——王洪文和"潘司令"——潘國平。開始的階段，"潘司令"的影響比"王司令"要大得多。"工總司"成立以后，帶頭在"安亭事件"中靜坐鐵軌，中斷鐵路交通的，就是潘國平；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趕到安亭，出面和張春橋談判的，也是潘國平；最后大批造反隊員返回上海，我陪了張春橋到文化廣場去接見他們，張春橋簽字同意"工總司"提出的五項條件，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衆組織，代表"工總司"一方簽字的，又是潘國平。后來，我曾經當面問過王洪文："'安亭事件'的時候，爲什么總是小潘出頭露面？你到哪裏去了？爲什么談判、簽字的時候都見不到你？"王洪文無可奈何地說："我那個時候生病了，火車開到安亭被阻，他們在外面大辯論，跟中央文革代表談判，我在車廂裏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來……"

等到"安亭事件"一結束，"工總司"的組織得到張春橋的承認，大家要排座次的時候，王洪文却活躍起來了。據王洪文自己告訴我，他們十幾個造反有影響的人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推選"工總司"的常委，再推舉負責人。王洪文在會上提議說："我們每個人都來擺一擺自己的條件，看誰根正苗紅條件好，就選誰當負責人。"接着，他先擺起自己的條件來："我，雇農出身，從小在吉林長春郊區農村裏放過豬，牧過牛；后來當了兵，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打過仗；轉業后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現在是十七廠的保衛科干事，共產黨員。我們廠是上海最早起來造反的'老造反'廠！"

王洪文一下子擺出了六條：工、農、兵、干部、黨員，再加"老造反"。這下子潘國平被大大地"將"了一軍，這個在上海玻璃機械廠剛剛轉正的徒工，資歷很淺，又沒有什么共產黨員等的政治身份，至于他

參加過滬東工人文化宮舞蹈隊跳舞蹈的經歷，更幫不了他的忙。於是，這個最初出頭露面最多的"潘司令"，在排席位的時候只能屈居第二了。這種自報家門的辦法倒是便宜了陳阿大，他一口氣報出自己在良工閥門廠的造反史，宣稱自己是有多年工齡的翻砂工和鉗工——正宗產業工人，又在福建前綫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這樣，不學無術的陳阿大也撈到了"常委"的席位。這次"自報家門"的評議結果，王洪文略施小技，就壓倒了潘國平，坐上了"工總司"司令的交椅。

張春橋說："我們不要做陳獨秀！"

現在，這批人都坐在武康路二號的東廳，還不知道是開什么會，更不知道是誰要接見他們；他們問我，我只是神秘地笑笑，我恪守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規定：事先不要告訴他們。等到張春橋、姚文元兩人走進會場的時候，王洪文驚奇地叫了起來："咦，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還見到你們……"原來王洪文到了昆山，又飛到北京去告過狀。

張春橋掃視了一下到會的人，微笑着說"是呀，你們跑到北京來，我們又不好告訴你們：我和文元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見了你們一面，要你們趕快回上海。現在，我們不是又見面了嗎？"

張春橋坐下以后，王洪文一一介紹了與會人員。何秘書遞上一叠白紙，幾支削得很尖的鉛筆，放在張春橋面前：這是張春橋的老習慣了：一邊聽報告，一邊隨手記下幾個字。會議開始，張春橋一下子轉入正題："現在赤衛隊垮了，你們這支隊伍的步調是不是一致，關係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的工人階級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别是外地學生的操縱。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見你們的原因。"張春橋點上了一支烟，接着說，"現在對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制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你們看要注意一些什么問題？"

張春橋開了一個頭，"工總司"的與會者紛紛匯報起情況來。這時，報社印刷廠送來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發言稿和通令的小

樣，我馬上整理出一式兩份，分別送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面前。他們兩人立刻翻閱起來。張春橋抽出其中的一份發言稿，拿起鉛筆，一邊聽取匯報，一邊就在稿樣上修改起來。

張春橋改着稿子，要我把大會的籌備情況以及開法、打算向大家講一講，還有什么問題需要商量，也一併提出來。我作了概要介紹以后，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大會的主持人，我提議由"工總司"負責人擔任，請他們考慮；另一個是大會預定在一月六日上午開，天氣預報有雨雪，會場究竟放在人民廣場還是文化廣場，急需定下來，馬上要進行布置，我傾向于放在文化廣場。

我的話音未落，會場裏就像開了鍋一樣地沸騰起來。一個圓圓面孔、胖墩墩身材的漢子站起來，用一口地道的紹興話開了腔："不行，不行！文化廣場太小，非放在人民廣場開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在那裏開！這次大會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會的人要多，氣魄要大！"

我說："是陳阿大同志吧！"我這是第一次和陳阿大打交道，看着他抓下頭上的那頂羅宋帽，用勁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我禁不住笑起來，"人民廣場開會，要幾十萬人參加，這么多人，有把握調來嗎？再說，調來以后，會場內外的音響不好，會影響大會發言的效果。"

陳阿大朝我瞪了一眼，解開上衣的前排紐扣，左手插在腰眼裏，右手用力地又拍了兩下胸部："調隊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調個十萬、二十萬，小意思，我想調它一百萬人。過去赤衛隊號稱有八十萬，現在我們就調一百萬造反派來，顯顯威風。假使人民廣場進不去，隊伍可以站在廣場四周的馬路上。我馬上通知市內電話局，連夜在全市的主要馬路上拉綫，裝上高音喇叭，讓大家直接聽大會的實況廣播。"

陳阿大的一番話，說得到會的人都動心了，大家嚷着要到人民廣場開會。張春橋這時也下了決心，說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見要開得大一點，那就放在人民廣場開吧！會場的秩序一定要維持好，保證不出問題。"接著，又議論了一下大會的主持人，因爲王洪文要在會上作重點發言，大家就推潘國平主持打倒上海市委大會。

我看大局已定，站起來說："時間緊迫，我馬上去落實會場！"

陳阿大用手掌摩挲着他的平頂頭，笑着朝我打招呼："老徐，我們是不打不成相識呀！"

我走出會議室，趕緊找來《支部生活》編輯部派到市委機關聯絡站工作的王承龍，要他馬上組織市委和市人委（市人民委員會的簡稱，即市政府）辦公廳造反兵團的力量，布置人民廣場的主席臺。因爲光是拉一條大會名稱的會標，就有幾十米長，要横貫廣場主席臺的上空，還要寫字、剪貼、安裝擴音設備等，够他們忙一個晚上了。

王承龍聽説大會放在人民廣場開，勁頭十足，向我提議説："明天我們把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等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和所有的常委，統統押到會場，接受批鬥。人民廣場的臺很大，還要把各部、委、辦和市委、市人委系統的主要局級干部，統統帶到會場陪鬥！"

我問："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龍説："没有問題，現在市委警衛處也成立造反組織了，名稱叫'紅色警衛員'，所有的市委書記和常委，都可以由警衛處的這個'紅警'造反隊負責帶去。其他各部、委、辦的陪鬥對象，由我們辦公廳造反兵團負責，今天晚上就把他們集中到東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車送去會場。"我覺得他的主意不錯，表示同意，并説等一下我再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報告一下。

正當我忙於部署大會的各項事宜的時候，忽然接到報告，説是《文匯報》的"星火燎原造反總部"宣布奪了報紙的權，并且公開出版了奪權后的第一張報紙。過了片刻，這張奪權后出版的《文匯報》送到了我的手裏，只見上面還赫然刊登着各群衆組織在東湖路共同商定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

我覺得此事關系重大，拿了《文匯報》急匆匆走進東廳，這時接見已近尾聲，張春橋、姚文元講了幾句結束語，就散會了。"工總司"的人走后，我把報紙遞給張春橋、姚文元，匯報了《文匯報》奪權的情况。他們感到這件事情來得比較突然，没有馬上表態。張春橋邊翻報紙邊説："這件事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呀！"我説："我也没有聽説，連發表各個群衆組織聯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也没有先打一個招呼。"姚文元向張春橋建議："這件事需要向中央報告一下。"張春橋點

源表示同意。

談到這裏，張春橋交給我一份經他修改過的大會發言稿 我接過一看，原來就是我們代王洪文起草的重點發言：《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對准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張春橋在稿樣上用鉛筆改了多處，有的地方還加了幾段。

張春橋頗爲得意地說 "你們找到的市委常委會圍攻我的那次會議記録，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當時，他們一個勁反對我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條，特别是承認'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動這一條，責問我爲什么事先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簽字同意了。曹荻秋還指責我這樣做使市委陷于被動，說什么春橋到了中央文革工作，還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嘛！ 言下之意，要我和他們站在一起。我當場在常委會上就頂了他們，我說 工人運動起來了，我們不要做陳獨秀！ 陳獨秀當年就是壓制工人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后來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保護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說：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嘛。……剛才，我已經把這些情況補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們再看看吧！ "

我高興地說："我們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清樣來。……另外幾份發言稿和通令，你們兩位還有什么意見？" 姚文元說："我們帶回去再看看，有意見告訴你。" 這時，我又向他們匯報了大會上的主鬥對象和陪鬥對象的安排，并且乘機發出了邀請 "明天是否可以請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參加大會，和群衆見見面。"

張春橋揮揮手說："不去嘍，不去嘍！ 明天你們開吧，我們在家裏看電視轉播。"

有了張春橋的這句話，我馬上通知了電視臺，開創了全國用電視實況轉播批鬥大會的先例。

"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召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早晨，天色陰霾。

昨晚下了雪，屋脊上、樹梢上都積着殘雪，可是地上的雪大部分已

經融化了，被人們踩過以后，變成了隨處可見的濕漉漉、滑溜溜的泥漿。清晨七點鐘，一個戴着眼鏡的青年闖進武康路二號指名找我，自己介紹說是上海市環境衛生局的造反派，他們預定今天上午召開全局範圍的批鬥會，誰知道局長昨天晚上就被市裏集中起來了。今天凌晨，他趕到市委東湖路招待所去討局長，被辦公廳造反兵團的王承龍頂了回來，答復說今天全市所有的局以上干部，都要到人民廣場去陪鬥市委書記，要放人除非徐景賢批准。這樣，那個造反派就乘着局裏的小轎車趕來找我，苦着臉央求我放局長回去，支持他們開成局裏的批鬥會。我心裏想："這個王承龍倒真厲害，把環衛局這樣的小局局長都集中起來了。"經過那個造反派的一再要求，我終于說："這樣吧，我和你一起到人民廣場去，看看情況，如果可以的話，就把人給你。"於是，我坐上了他的車，直往廣場開去。

一路上，直見一列列打着"造反隊"紅旗的隊伍，都朝着市中心人民廣場的方向行進。還有許多卡車，滿載着人，向人民廣場駛去。我們的車從淮海中路折向南京西路，只見沿途幾條主要的街道上全部新裝起了高音喇叭，裏面放送着從人民廣場直播出來的震耳的歌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不禁暗暗佩服起那個"不打不成相識"的陳阿大來了：別看他像個"草包"，調動起隊伍來倒真是有兩手。

我們通過幾重糾察綫，從人民公園轉到廣場大廈的后門，從那裏走上三層樓，進入主席臺的入口處。當我登上主席臺朝廣場望去的時候，真有點心花怒放、喜不自勝的感覺，只見廣場上旗似海，人如潮，萬頭攢動，水泄不通。這個廣場常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游行時，可以容納十五萬到十八萬人，但是今天是融雪天氣，地下稀濕，無法坐下休息，人們都像插蠟燭似地站在那裏；而且，大家都想觀看臺上批鬥市委領導人的情況，爭着往前擠，所以整個廣場上人挨着人，密密麻麻，擠得滿坑滿谷，少說也有二十多萬人。那些遲來的隊伍沒有機會再擠進會場，就分別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勝路、黃陂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廣場爲中心，向四周輻射，延伸出去，人頭上飄動着各單位的旗幟，一眼望不到邊，場外的人數比場內要多得多。"看來

真的有近百萬人呢！”我高興地估量着，“再加上拉綫收聽廣播和電視轉播，大會的影響就大了……”（會后，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向中央寫報告時，對參加大會的人數只報了十萬人。）

一會兒，只見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的人員，指揮着市委和市人委各部、委、辦以及各局以上的領導干部，總共有一百多人，魚貫而入，走到了主席臺的后部。有一個辦公廳的女造反派，命令那些幹部一一站在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下面，低頭陪鬥。她看見了我，急匆匆地走過來說：“這些當權派昨天晚上就到東湖路招待所報到了，一夜没有睡，剛才我們用兩部大客車把他們裝來的。”我掃了幾眼，只見隊伍中有幾個是張春橋、姚文元的老同事，有幾個是我的老領導。在我內心深處，他們未必見得都是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我看到他們以后，却故意掉過頭去，自己對自己咕噥着：“群衆運動嘛，讓他們燒一燒也好。”

我轉過身來，看見和我同來的環衛局造反派還跟在我的后邊，就告訴辦公廳造反兵團，同意把他們的局長“還”給他，他千謝萬謝，帶着局長走了。我又把上海電視臺的負責人找來，檢查電視轉播的落實情况，他對我說：“我們上海電視臺的造反派，今天一定全力以赴，現場轉播好大會的實况，請你把大會的順序告訴我們。”我向他作了介紹，心裏想：“今天張春橋和姚文元都坐在電視機前，這場轉播非同小可呀！”但是，我不能把張、姚看電視的情况向那個電視臺的頭頭披露，我换了一種方式叮囑他“今天是第一次用電視向全市人民轉播批鬥大會的實况，你們再認真檢查一遍，只准播好，不能出紕漏。今天在上海的外國領事館人員和外輪上的船員，很可能看電視，我們已經關照有關的人在大會上對批鬥對象不搞噴氣式，不搞武鬥，但是假如還有些場面不太合適播出的話，你們要把鏡頭避開一些，免得給外國人提供口實。”他連連點頭答應，馬上去進行布置了。

時間快接近上午九點了，預定准點開會，我把大會發言人都集中起來，排了一排次序。今天發言的人很多，共有八個，此外，還要領讀毛主席語録，呼口號，發布三項通令，宣讀大會向毛主席的致敬電等，加上《解放日報》的造反派臨時趕來，說他們也奪了報社的大權，要求在

全市大會上宣布一下，看來，這個大會没有三個鐘頭結束不了。我急着催促准時開會，誰知道找來找去，昨天確定的大會主持人"工總司"的潘國平却杳無踪影。問問"工總司"的頭頭，他們都搖頭，其中只有一個人昨天深夜聽潘國平講過："要找一個地方'打游擊'睡上一覺。"至于他究竟睡在哪裏，誰也不知道。我很生氣，直接去問在一旁看發言稿的王洪文，王洪文罵了潘國平幾句，又躊躇着覺得難以從其他常委裏挑，挑誰主持大會都會擺不平、鬧矛盾，他想了想説："這樣吧，叫范佐棟主持，他是我們'工總司'負責宣傳工作的，主编《工人造反報》，又參加過大會的籌備工作，普通話説得還可以……"選這樣一個人主持，大家都没有話講，范佐棟就上場了。

念過語録，范佐棟宣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爲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正式開始，他一聲高喊："把陳丕顯、曹荻秋押上來！"只見市委警衛處"紅色警衛員造反隊"的幾個人，把華東局和市委的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馬天水、王一平、楊西光、王少庸、梁國斌等，從后臺帶出來。每個批鬥對象，交給兩名工人造反隊員看管，雖然説是不搞噴氣式，不搞武鬥，但仍然在他們的頭頸上挂上了大紙牌子，懸在胸前，牌子上顛三倒四地寫着他們的姓名，還用紅筆在名字上打了幾個大"×"。主席臺上搭了幾張乒乓桌，陳丕顯書記和曹荻秋市長被帶上桌子，低頭彎腰，面向着廣場上的群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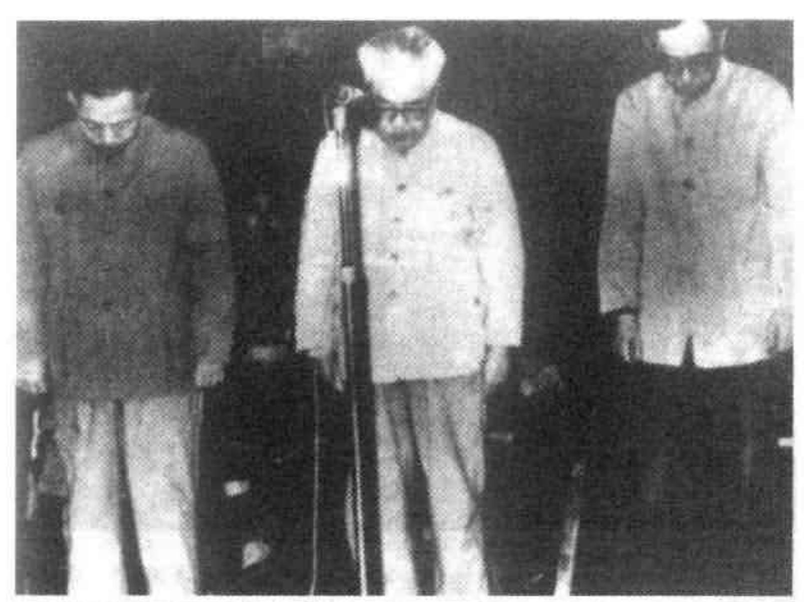
由于大會籌備組事先通知陳丕顯不准穿軍裝，所以他今天改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襖 曹荻秋市長仍然穿着他日常穿的藍卡其上裝，滿頭白髮已經很久没有理了，被强勁的寒風吹得亂蓬蓬的。其他的市委書記、候補書記和常委們，都分列在乒乓桌的兩旁，發言中叫到誰的名字、問到誰的事情，就讓他上乒乓桌去"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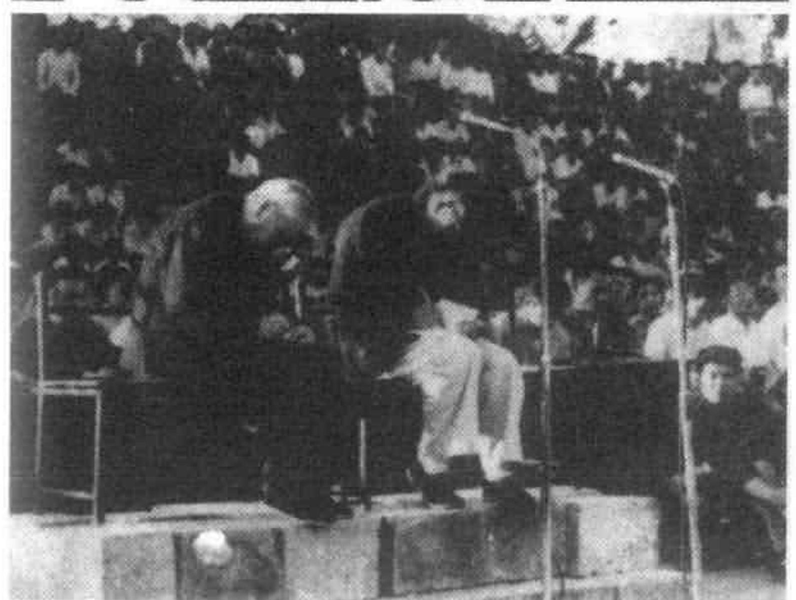
在大會發言揭發批判的時候，每當發言人要陳丕顯回答問題，陳丕顯總是頂得很厲害，曹荻秋則用滿口四川話一再説："前一個時期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應該負責！"這時候，主席臺上領呼口號的一男一女就大聲呼喊："陳丕顯必須老實交代！""曹荻秋必須低頭認罪！""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

□上圖：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在人民廣場的萬人大會上被造反派批鬥。

□左圖：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現荻秋（左）被造反法批鬥時的情景。

□下圖：上海市市長曹荻秋（臺上中間站立者）被迫向紅衛兵、造反派講話。





□上圖：正在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的上海市領導干部（左起：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

□下圖：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在大會上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時的情景。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人民廣場的大會上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時的情景。

當工交系統的造反派在發言中點到馬天水的時候，他跑上乒乓桌，傴僂着腰，抓住前面那個放得很低的話筒，主動地說："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請罪，我要交代！"接着他抓緊時機作起自我檢查來。我聽了覺得今天還不是馬天水"亮相"的時候，就示意范佐棟停止了他的"檢查"，讓下一個揭發人發言。

會議開了許久，潘國平忽然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大家面前。我和王洪文不約而同地問他："你到哪裏去了？"潘國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眯起了他那雙小眼睛"我……我一個人睡在武康路二號三樓的小房間裏，睡過了頭，也沒有人來叫我……"我埋怨說："誰知道你躲在小樓上，不然今天一早我就來喊醒你了。"潘國平在主席臺上轉悠了一圈，看看主持人的位置已經落到了別人手裏，只好自討没趣，搭訕了幾句走了。

大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融雪天氣很冷，會場上人們的情緒有點松散，我趕緊删去了兩個發言，讓王洪文的壓軸戲上場。王洪文穿着一身褪色的黄軍棉襖，戴着一頂圓形的翻毛帽子，向臺下行了一個軍禮，就念起經過張春橋修改的那份發言稿來。他事先雖然看過稿子，但没有反復准備，所以有幾個地方念得不够順暢，有一處他忽然停住了，原來是"幡然悔悟"的"幡"字念不出來，他還算機敏，索性把它跳了過去，我在旁邊爲他急出了一身汗。所幸的是他的帶一點東北口音的普通話比較標准，責問曹荻秋市長的問題也頗具火力，所以他的發言收到了比較理想的效果。

最后，北京體育學院駐滬聯絡站的一個女紅衛兵上場了，她是一名高高大大的排球運動員，念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她代表各群衆組織宣讀了大會的三項通令：

一、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干部堅守崗位。

真是史無前例！一次大會，一紙通令，一個經過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市的黨政最高領導，就這樣地被打倒了；上海

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就這樣地被撤消了職務。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這一天起，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實際上就已經落到了張春橋、姚文元和我們這幾個造反組織負責人的手裏。

一場即將席卷全國的"一月奪權風暴"，在它的策源地上海、猛烈地刮起來了。

毛澤東說："不要燒焦了！"

"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結束以后，一月七日，我趕到興國路招待所去見張春橋和姚文元，一方面急于聽到他們對大會的反映，另一方面也確實要向他們請示大會的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如何發表的問題。

興國路招待所位于上海西南部安靜的一角，是過去法租界裏面外國大老板的別墅區，一個廣袤的大花園裏錯落有致地矗立着十幾座歐洲風格的建築物，裏面有非常現代的設備。整個院子周圍圍着高墻，墻上還安裝着鐵絲網。這裏屬于市委招待處管理，專供中央來的要員居住，環境幽靜，戒備森嚴。

我來到門口，只見兩扇大鐵門緊閉着，從旁邊的小門進去，新來的警衛戰士都不認識我，他們從傳達室打電話進去通報。過了一會兒，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出來接我。我們走上平坦的柏油馬路，穿過好幾幢獨立的洋樓，繞過茂密的樹叢，向院子的深處走去。我看到在好幾棵大樹的后面，影影綽綽地有站崗的戰士在注視着我們。一直走到大路盡頭轉彎處，有一幢三層樓的花崗石建築，這便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住的五號樓。

走進會客室，我看到張春橋和姚文元正坐在沙發上談話 在靠墻的一條長桌上，安放着一臺電視機。我這時邀功心切，招呼了他們一聲以后，脫口就問："看了大會的電視實况轉播沒有？"

張春橋一邊示意我在旁邊的沙發上坐下，一邊回答："看了，我們昨天從頭到尾都看了。大會開得很成功，特別是下面群衆的情緒很好，一直堅持到底。你們把陳丕顯、曹荻秋揪上臺批鬥、摘臭，很好。就是開會的時間長了點。"從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張春橋對這次大會是很滿意

的，他平時很少說贊揚的話，剛才那幾句評價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了。

和張春橋比起來，姚文元今天顯得更加喜形于色，一反他平時說話穩重的樣子。他講話時的習慣，是用右手食指頻頻地戳點着面前的桌子，說到興奮處略爲有些口吃，同時喜歡重復使用詞語："上海的工人階級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濕的，站在那裏幾個小時，一動也不動，真有紀律，真有紀律，了不起！"

張春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朝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裏彈了一下灰，徐缓地說："幾個人當中，陳丕顯態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比較起來，還是馬天水的態度好一點，這和過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們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會議以后，和他打了招呼有關係……"

姚文元側過身來問我"你們把魏文伯拉到會上去幹什么？他不是已經調到華東局去了么？"

我說："魏文伯過去長期擔任市委書記處書記，機關幹部對他意見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時的那些賬，應該清算。"

張春橋淡淡一笑，眼睛從鏡框后面看着墻壁："這個人看來民憤比較大。"

接着，我向他們匯報了市委黨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會的全部發言稿、通令、致敬電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發表，出版一個專輯，印它一百萬份，向全市、全國發行。這樣既能擴大大會的影響，又能在實際上把市委黨刊的權奪到手了。我支持他們的設想，但涉及到點名批判，所以需要請示一下。

張春橋沉思了一下，說"在中央没有批准在報紙上公開點名以前，我想，批判發言稿在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報》、《紅衛戰報》上登登，還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文元，你看怎么樣？"

姚文元從沙發的靠背上挺挺身子："同意。只要《解放日報》、《文匯報》暫時不點名，就可以。關于在大報上公開點名的問題，我們以后要向中央寫一個請示報告。"

正說着的時候，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回來了，她這幾天也住到興國路招待所，和姚文元在一起。金英是盧灣區五里橋街道的黨委書記，她

說：今天全區的街道黨委書記被集體批鬥了一次，她也上了臺，挂了牌子，造反派考慮到她是姚文元的家屬，對她算是客氣的。說罷，姚文元和她一起上樓去了。

張春橋的兒子毛弟，年齡只有十歲左右，從花園裏跳跳蹦蹦地跑進來，拖他爸爸到客廳外邊的陽臺上去玩。張春橋答應着，招呼我一起過去。陽臺上用白瓷磚鋪地，放着一張圓的籐桌和幾把籐椅；陽臺前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長窗，晴天可以讓陽光灑滿整個屋子，陰雨天又可以遮風蔽雨。打開玻璃門，跨下幾級臺階，有一條水泥鋪成的小路，横亘在天鵝絨草地上，曲徑通幽，一直伸展到遠處的香樟樹林裏。

張春橋和我在籐椅上坐下，毛弟靠在他的膝頭，張春橋跟他的兒子開玩笑，指着我說："毛弟，你不是說要看看'工總司'的王司令嗎？喏，這裏也有一個司令，他是機關裏造反的'徐司令'。"毛弟不相信："不，徐叔叔不是'司令'，他不戴袖章。"

我看着張春橋和兒子親昵的樣子，覺得我看到了一個我所不熟悉的張春橋，原來他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充滿人情味和流露出强烈的父愛的。然而我過去看到的張春橋，總是那樣的嚴肅，那樣的一本正經。我和張春橋的接觸，已經有不短的歷史了：上海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張春橋是《解放日報》社的社長，我聽過他的幾次報告，沒有稿子，侃侃而談，條理清晰，思路敏捷，不像有的領導那樣哼哼哈哈，拖拖沓沓，給我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五年，我調到文藝工作部，張春橋是文藝工作部的部長，成了我的主管領導；以后，張春橋調任市委專職常委，兼任《解放》雜誌的主編，他把姚文元調去《解放》雜誌，姚文元曾約我爲《解放》雜誌寫過評論文章。張春橋一九五八年在《解放》雜誌發表的《堅决破除'資産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從此張春橋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信用，被提拔爲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和書記。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抓京劇革命和《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張春橋就全力以赴；據張春橋對我說，光是江青抓的京劇《智取威虎山》這個戲，他就看過五十多遍。張春橋給江青起了一個代號叫"客人"，他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多次開會傳達"客人"的指示，并且說："在創作和表演上，我們不能搞'群言堂'，只能

是‘一言堂’——就是‘客人’一個人說了算！”姚文元在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的過程中，爲了保密，一直躲在我們市委寫作班。初稿寫好后，姚文元和我一起到康平路張春橋的辦公室去，一進門，姚文元就大聲嚷着："怎么樣？春橋。"張春橋便把姚文元引見給江青，然后由江青把經過反復修改的文章送給毛澤東。

在我的觀念中，已經把我自己的命運和他們聯結在一條强有力的綫上了，簡單明確地描畫出來，那就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和我——姚文元——張春橋——江青——毛澤東。而現在，當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展開以后，特别是當張春橋和姚文元從北京返回上海直接領導奪權以后，我感到非常慶幸，因爲這條聯結我們命運的綫，變得更加清晰、更加牢固了。此刻，我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的陽臺上，呷着清茶，看着坐在我面前藤椅上談笑風生的張春橋的時候，我暗自思忖：十多年來，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可是，我們之間的關係，還從來没有像今天這樣密切過呢！

張春橋和他的兒子戲謔了一陣子以后，把毛弟打發走了。他點着了一支烟，忽然問我："你們的那些大會發言稿，還有通令，有没有報送中央？"

"没有呀，"我囁嚅着說，"我以爲……你和文元同志已經……報告中央了……"

張春橋的臉色馬上變得嚴肅起來："我們匯報是我們的事。你們開了大會，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們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認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可是，你們又不向中央正式報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們的大會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開過大會就算了，大會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們兩人包辦，你們要直接報送中央……"

"那好，我馬上回到康平路去辦。"我緊張得腦門上都沁出了汗珠，"你看……用什么名義報？"

"就用你們幾個發起開大會的革命群衆組織的名義報，"張春橋說得非常輕脆，而且具體地傳授了上報文件的方法："一式印十五份，直接通過機要交通送中央辦公廳，這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可以看到了！"

我急忙趕回市委寫作班，布置重新印刷了大會的全部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等，整理出一式十五套，由我親自裝進大信封，貼上了“絕密件”的簽條，寫上了“送中央辦公廳收啓”的字樣，然后打電話叫來了兩個機要交通員，當面布置他們明天一早就乘飛機到北京去，把文件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完了這件事，我又打電話給張春橋作了匯報，才算舒了一口氣。我心裏不斷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沒有想到要向中央報告呢？這次虧得張春橋的提醒，才補報了……

過了幾天，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一日，經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三十二個革命群衆組織發來了賀電，肯定了我們打倒了上海市委以后發布的《緊急通告》，祝賀上海的群衆組織實行了大聯合，成爲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即向全國廣播了中央賀電的全文。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黨中央和毛主席第一次用文件形式正式表態支持群衆組織的聯合奪權。我們收到賀電后欣喜若狂，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會后舉行游行。張春橋和姚文元主動提出：這一次他們兩個要參加大會并講話，和上海的廣大群衆公開見面。

這天晚上，我到興國路招待所去向張春橋請示慶祝大會的開法。他坐在辦公桌前，把左手支在額角上，正在起草他自己在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稿。聽了我的匯報，他同意我們對大會各項工作的安排，接着，他對我說：“我已經找陳丕顯談過話了。”

我覺得有些意外，問道：“是在哪裏談的？”

張春橋說：“把他找到興國路來談的……”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稍作停頓后又說，“去年十二月，主席生日的時候，提到你們寫作班造反時的口號‘火燒陳丕顯’，主席很風趣，他當時還說：‘燒一下可以，不過不要燒焦了！’”

聽到這裏，我不由得愣了一下，我想：去年姚文元打電話給我，傳達毛主席指示的時候，沒有講這句話嘛。

張春橋繼續他的話題：“這次我們來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見，是希

望陳丕顯還能出來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談話的時候，對他說：我們在和群衆見面之前，先找你談談。我把中央的意見也告訴了他。陳丕顯聽了以后表示：在現在這種情况下，他出來工作有困難。"

張春橋長長地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說："我看，他現在也確實難以出來工作。"

我没有接口，我只是坐在那裏默默地想：主席說"不要燒焦了"，可是現在經過你們同意，大會也開過了，通令也發布了、人也打倒了，不是已經"燒焦"了嗎？一切都已成爲事實，不可改變了。反正，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發來的賀電，也是經過毛主席親自批准的，所以，管他"燒焦"不"燒焦"，我們還是照開慶祝大會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同樣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上，身穿軍裝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和小組成員姚文元，出現在幾天前陳丕顯第一書記和曹荻秋市長被打倒的那個主席臺上，對着廣場上的人潮和電視機前的觀衆，發表了他們返回上海以后的第一次公開演說。

“你方唱罷我登場”

中央賀電的慶祝大會開過以后，上海市委的垮臺已成定局，但是今后究竟由哪些人來掌管上海的大權，又通過什么樣的機構來領導上海的黨、政、財、文等各個方面的工作呢？這成了萬衆矚目的大事。

中央對人事問題没有下達新的任命。上海的各種政治力量和各個造反組織的代表，都想擠進這個世界著名的大城市的權力機構，都渴望占有一個或幾個重要的席位，都企圖嘗一嘗這塊“禁臠”的美味。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這個動蕩不安的月份裏，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馬燈似的奪權鬧劇。

“走馬燈”奪權

一月中旬，不知從什么地方冒出來一個“工八司”（“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簡稱），拉攏了幾個小組織，裝了幾卡車人，直接開進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們把除了檔案室和機要室以外的地方，統統占領起來，貼出大布告宣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我到張春橋、姚文元那裏匯報以后，他們大爲惱火，要我打電話通知“工八司”等馬上撤出。我把電話打進康平路總機室，只聽得電話那頭傳來一片亂哄哄的聲音，原來是那些奪權者還要接管電話總機，正在和接綫員發生激烈的争吵。正好，我找到“工八司”的頭頭，在電話裏嚴肅地告訴他們：“你們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組織協商，是没有資格接管市委的，要馬上撤出來！”

那個頭頭提出抗議：“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我警告説：“這不是我的意見，是中央文革首長張春橋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見，你們如果不執行的話，一切后果由你們自己負責！”説完我就把電話挂上了。

那批奪權者一聽張春橋和姚文元都不支持他們，只好自討没趣，貼了幾張大標語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過了幾天，即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上海最大的一個紅衛兵組織

“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又采取了一次突然行動:“紅革會”總部的領導經過嚴密的策劃,組織了十幾支紅衛兵隊伍,乘着吉普車、摩托車等,在一個晚上同時出動,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十個區的區委和區人委等共二十三個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他們把這幾十顆鋼制的、木制的圖章,鼓鼓囊囊地裝在背包裏,送到“紅革會”總部,發出通告,宣布自己這個組織已經把上海的大權統統奪到手了。接着,“紅革會”的負責人占領了上海展覽館内的一幢房屋,作爲他們的指揮部,并通知上海警備區派解放軍保護他們這些“左派”。其他的許多造反組織,聽說“紅革會”撇開大伙單獨行動奪了印,都很生氣,摩拳擦掌,批評指責,眼看一場“内戰”即將發生。

“紅革會”的奪印使張春橋、姚文元感到很傷腦筋,因爲“紅革會”當時是上海最大的最有影響的一個學生組織,它曾經搞過幾次重大的活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紅革會”爲了堅持要把自己編的《紅衛戰報》與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行,曾經進駐與封閉了解放日報社,給上海市委施加壓力,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紅革會”一直與“工總司”并肩戰鬥,而且又支持過我們市委寫作班起來造反。這個組織在上海有了點名氣以后,它的某些頭頭也自恃造反有功,驕氣很盛,聽不得不同意見。它的領導核心,主要是由復旦大學的學生組成的。對於這樣一個組織,張春橋和姚文元覺得不能用像對待“工人司”那樣,以簡單化、下命令的辦法,來處理他們的“奪印”事件。

當天晚上,和我相熟的“紅革會”總部負責人、復旦大學的小馬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已經奪了全市的大印,“紅革會”願意和上海最具影響的組織“工總司”、“農司(籌)”以及市委機關聯絡站一起聯合奪權和掌權,希望我能够馬上前去會商,共同簽署聯合奪權聲明。我聽了以后,覺得“紅革會”一派奪印以后,深感輿論對他們不利,于是想搞一個以“紅革會”爲核心的四個組織的聯合政權——由工人、農民、紅衛兵和機關幹部四派掌權。

我到張春橋、姚文元那裏去作了緊急請示,他們向我面授了機宜。這時已經時近深夜,我就“單刀赴會”,直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内的

"紅革會"臨時指揮部而去。到達那裏的時候，果然看到如張春橋、姚文元所告訴過我的那樣，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備區增派了許多解放軍巡邏哨。張春橋說過，在"紅革會"提出派軍隊保護的要求之后，警備區作戰處曾向他們作過報告，他們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護那些"左派"，而且要保護那些落在他們手裏的華東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國護照上蓋上了鋼印，完全可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國外去，這才是張、姚擔心之所在。所以，再多派些軍隊保護那批印章，張、姚也會同意的。

我走進"紅革會"總部的臨時指揮部，只見滿滿的一屋子人，他們的頭頭幾乎都在場，有復旦大學的小馬、小趙，上海師範學院的小繆、小李，還有"紅革會"二處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小勞等人。"工總司"的潘國平和"農司（籌）"的夏桂伯早已被他們請來了，夏桂伯是浦東農村的一個大隊長，因爲打出造反旗幟比較早，所以成了農民造反組織籌備組的負責人。師範學院的小李是"紅革會"常委中的一員女將，長於辯才，說起話來像開機關槍一樣，此時她正和潘國平等人侃侃而談，看到我進門，就請我在桌邊坐下。

我環顧這間房間，只見正中用幾張寫字臺拼成了一個長條形會議桌，桌上雜亂無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還有吃剩下的麵包；會議桌旁邊，圍着一圈長板凳；在房間的墻壁旁邊，挨個排列着兩排雙人叠床。有些床上還躺着和衣而睡的穿軍裝的紅衛兵，大概是白天行動太累了，現在正在睡夢裏發出有節奏的鼾聲，會議桌邊的大聲講話對他們毫無影響。當然，我也留意觀察了一下，不見那批被他們搶到手的圖章的踪影。

"紅革會"的一把手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小馬，山東人，他還是我們市委寫作班哲學組郭仁杰的學生，平時和我打過多次交道，現在走過來對我說："我們奪大印事先没有和你們打招呼，因爲怕知道這次行動的人多了可能會走漏風聲，所以我們單獨采取了這個革命行動。但是，我們'紅革會'不想一家掌權，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發布一個奪權聲明。我們這四個組織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響的，只要我們四家的步調一致，那么，上海的黨、政、財、文大權，就由我們

掌定了!"

我聽了這一番話，覺得他們掌權心切,如果我拒絶簽署奪權聲明的話，很可能一上來就會把關係搞僵，所以只能慢慢來，采取迂回戰術，和他們"蘑菇"說理，也許倒可以找到轉機。於是，我對他們講："紅革會"想搞聯合奪權的想法是可取的，奪權以后當然要掌大印，可是奪印并不就等於奪權，關鍵在於掌權者說的話有沒有人聽，發號施令有沒有人執行。這就涉及到聯合奪權究竟是"小聯合"好還是"大聯合"好的問題。我們上海的造反組織，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幾個，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賀電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駐滬紅衛兵組織，平時經常在一起聯合開會采取共同行動的，總共已經有三十二個組織，至於其他各種名義的組織，還有好幾百個。如果我們四個組織奪了權，把别的組織都撇在一邊，就有可能出現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嚴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紅革會"總部的常委們要慎重考慮奪權的方式，我的具體建議是：由四個組織出面，召開全市各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共商奪權大計。其實我的這個主意，是剛才來"紅革會"總部以前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潘國平在我之前本來已經鬆口，表示可以考慮"紅革會"的設想，聽我這么一說，他就緘口不言、不再表態了。"紅革會"的小李、小勞等又提出另外一個方案，主張先由四個組織出一個聲明，肯定這次奪印是一次革命行動，這些印章由"紅革會"負責保管，直至聯合奪權達成協定以后，再移交給上海各造反派的聯合掌權組織。這一來潘國平又不同意了，他主張大印應該交給"工總司"保管，因爲工人階級應當掌握主要的領導權。而我則以這些印章長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嚴重后果作爲理由，向他們提出警告，我問他們：如果有人鑽空子利用這些印章跑到國外去，誰能擔當得起這樣的政治責任呢？他們聽了都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這場"蘑菇"談判，從半夜十二點鐘一直談到凌晨三點左右，大家都談得精疲力盡，還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但是，"紅革會"頭頭們的那股銳氣，都被我磨掉了。"農司（籌）"的夏桂伯，本來就是作爲農民的造反代表被拉來做做點綴的，此刻他坐在長板凳上摇晃着身子，直打瞌睡。潘國平越談越没有勁，索性爬到他身后的一張雙人叠床的上

去呼呼大睡起來。

我趁這個冷場的機會，走到隔壁一間辦公室，給姚文元打電話，匯報了談判的情況和各方的態度。姚文元還沒有睡覺，就等着我們的消息，他聽了説還要和張春橋再商量一下，讓我們再等一等。過了十多分鐘，姚文元直接打電話來，先要潘國平聽電話。睡眼朦朧的潘國平被叫醒了，聽到姚文元在電話中明確告訴他："工總司"決不能在四方奪權的聲明上簽字，一定要説服"紅革會"跟其他造反組織一起搞大聯合奪權，并説這是春橋和他兩個人的意見，希望小潘照辦。潘國平在電話裏允諾下來。

接着，姚文元又要"紅革會"的一把手小馬聽電話，姚文元説：上海的很多造反組織對"紅革會"的這次奪印有意見，准備要造輿論"炮轟紅革會"。春橋和他認爲，在上海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戰"，現在春橋和他已經説服了那些組織，停止"炮轟"；同時希望"紅革會"也要顧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聯合奪權。姚文元在電話中也替"紅革會"搭了臺階，使他們有體面下臺的機會，他説：張春橋和他准備親自召集各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商討上海各造反組織如何聯合奪權，還要討論新的政權機構的形式和組成等問題，他們在會上將要專門講一講"紅革會"奪權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動表示願意和其他組織聯合奪權和共同掌權，"紅革會"的風格值得肯定。姚文元還告訴他：爲了不影響上海市和十個區的日常工作，希望"紅革會"今天（天已經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給上海警備區，由部隊出面交回各單位。最后，姚文元又讓我聽電話，把這些底都交給了我。

聽完電話，四方會談繼續，潘國平明確表態要搞大聯合奪權，不簽四方聲明，我則馬上對"工總司"的態度表示支持，"農司（籌）"的夏桂伯在一旁隨聲附和，"紅革會"的頭頭們這時感到大勢已去，一個個都像泄了氣的皮球，小馬嘟囔着説："算了，就照春橋、文元的意見辦吧！"會議就此結束，警備區的負責人隨后就來取圖章了。

我走到街上，曙色已經初露，頭班公交車上已經搭乘着上早班的人們。我突然感到又累又冷，肚子餓得咕咕叫，趕緊快步走進剛剛開門的供應豆漿、油條的小舖子……

提名張春橋、姚文元當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

在"工八司"、"紅革會"等組織奪權的同時，另一個學生造反組織"上三司"也先后奪了兩次權。

"上三司"的全稱是"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它的負責人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趙全國。這個趙全國真有點"立足上海、面向全國"的氣派。一九六六年底，他曾經把華東六省一市的省、市委書記揪到上海，准備以"上三司"爲主在虹口體育場召開一次整個華東地區的批鬥大會。這件事驚動了在北京的周總理。周總理在電話裏嚴肅地批評了趙全國，并表示不能同意召開這樣的大會，趙全國才被迫偃旗息鼓。可是，他心有未甘，總想干出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第一次奪上海市的權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三點半，趙全國和"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結合起來，調動了一批工人和學生隊伍進駐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等十一個組織的支持。這次奪權以后他們想出了高明的一招：用"工總司"二兵團和"上三司"等組織的名義，向毛主席和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匯報他們已經奪了上海市委的權，要求中央承認。同時還在電報中提名由張春橋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提名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請求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

"上三司"這次奪權拉了"工總司"二兵團參加，對于張春橋、姚文元來說又是一件麻煩事。"工總司"從安亭攔截火車以后，回來時一路上成立了"北上返滬"的三個兵團，其中實力最强的是由耿金章率領的第二兵團。耿金章是共產黨員，從部隊復員后到上海紙漿廠當工人，年紀四十多歲，矮個子，黑臉膛，滿臉胡子茬，一口山東話。造反以后，他自恃打過仗，會帶部隊，在"安亭事件"以后就單獨拉起一個山頭，雖然在二兵團的前頭還挂着"工總司"的招牌，但他根本不把王洪文和潘國平等人放在眼裏，處處鬧獨立性，在"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都單獨調動大批工人隊伍擅自行動。他又善于抓權，把上海民航局以及造紙公司、食品公司的造反隊，都歸到二兵團的名下，誰要坐飛機或

是辦小報，甚至開大會准備食品等，都要有求于他。

耿金章的山頭主義，一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各群衆組織在簽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的時候，"工總司"已經署名了，但是耿金章堅持要單獨寫上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以示突出，不然他就揚言要砸掉刊登這些文件的報社。最爲奇怪的是，耿金章什么都要壟斷，最后甚至把上海市的一些市一級的重要批鬥對象也壟斷了起來。

我就親自碰到過這樣一件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失踪"了，據説落在耿金章手裏。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上海各群衆組織准備在人民廣場召開第二次全市性的鬥批大會。臨到開會前夕，忽然傳説主要的鬥批對象陳丕顯找不到了。參加大會籌備工作的王洪文到處打聽，才知道前兩天某系統剛開完鬥批會，耿金章就派人把陳丕顯搶走了，而且藏在什么地方對外保密。王洪文以全市要開大會爲理由，向耿金章要人，耿金章不買賬，讓王洪文碰了釘子。開會的當天中午，群衆隊伍已經開始向人民廣場集中，但是大會的鬥批主要對象陳丕顯還是杳無踪影，連市委警衛處出動去找也遍找不着。這下子我也着急起來，只好坐了轎車親自登門去找耿金章。

"工總司"二兵團的總部設在僻静的徐匯區永福路上一座有紅色磚墻的花園洋房裏，原來的住户被趕走以后，耿金章把自己的"司令部"搬了進去。我把車停在門口，馬上有幾個彪形大漢擋住了我的去路。我通報了姓名，他們才把我從后門讓入屋內。在通向裏屋的二道門門口，又坐着四、五個保鏢，這些人都屬于耿金章貼身的"尖刀班"。他們看見我是單身一人前來，就按響了通入內室的電鈴。

過了片刻，長得又高又大的耿金章的"隨身警衛"孫玉爲走了出來，他是上鋼一廠的工人，滿是疤點的長臉上嵌了一對小眼睛，他和我比較熟悉，看到我親自上門，就滿臉堆着笑把我請到裏間。在一張狠長的西餐桌旁邊，帶着翻毛皮帽子、叼着香烟的耿金章站起來迎接我。房間裏很幽暗，我環顧四周，房間的墻壁是由橡木鑲成的，內墻下有一個火爐架，兩側安着精致的壁橱，看得出原來是一個相當考究的客廳。只見現在原房主人的家具陳設已經大部分撤走了，房間中央只留下幾把大

安樂椅、整個房間顯得空蕩蕩的，再加上耿金章那副黑漆漆、矮端端的模樣，使我很快聯想起了《智取威虎山》那出戲裏山洞中的"座山雕"的形象。

耿金章對我倒是顯得很熱情，不像他對王洪文、潘國平那樣，他掏出烟盒來向我敬烟，我說我不會抽。他又大聲叫嚷起來："小李——，給我們弄飯！"

"好的，耿司令。"隨着這清脆的回答聲，從壁櫥后面轉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白净的瓜子臉，腦后打着兩個小辮子，笑盈盈地給我們放碗、筷。這就是耿金章自己從基層單位物色來的"女秘書"小李。

我趕緊說："不吃了，時間來不及了！"我直截了當地對耿金章說明了來意：現在有幾十萬人參加的批鬥大會馬上要在人民廣場召開了，請他趕快把陳丕顯交給我帶走。

耿金章顯得面有難色。我說："老耿啊！批鬥陳丕顯可是一件全上海的大事呀，你我都耽誤不起；再說，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可能要看電視的實況轉播……"

耿金章用手抹了一下上唇的黑鬍髭，終于下了决心，說："好吧，就看在你老徐面上，我親自陪你跑一次。不過路很遠，而且批鬥完了還得把人交給我！"我只好答應了。

我們的兩輛轎車向上海市西北郊疾馳而去，一直開到嘉定縣黄渡公社，耿金章又帶着我七繞八彎地尋找，最后在一個養鴨場裏找到了陳丕顯：咳，原來他把批鬥對象關在鴨棚裏了！

等到我們載着陳丕顯一起返回市區人民廣場的時候，大會早已開始，爲此，王洪文和耿金章當場在主席臺上狠狠地吵了一架。散會以后，我把找陳丕顯的過程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擔心把陳丕顯等人交給耿金章可能會出事，就下命令給市委警衛處，立刻把陳丕顯送到康平路上的一座空房子裏，派專人"保護"起來。

就是這個自作主張的耿金章，這次又没有跟各個組織商量，也没有向張春橋、姚文元打招呼，就伙同"上三司"一起宣佈奪了市委的權，還向毛主席、黨中央發了電報。這件事處理起來就更增加了復雜性，不知道張春橋和姚文元有什么打算。我正在發愁的時候，忽然接到何秘書

的電話，通知我晚上到興國路招待所去。

當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張春橋、姚文元住的興國路五號樓，張春橋在客廳裏，見了我就説："今天就找你和耿金章兩個人來，要和你們談一些事。"過了片刻，耿金章來了，一前一后開來兩輛小轎車，前面一輛坐滿了給"耿司令"開道的保鏢，后面一輛是他自已和隨身警衛員孫玉喜。耿金章肩上披着一件海軍穿的藍色長大衣，脚上還是蹬着那雙高統皮鞋，走起路來格登、格登地響，顯得特别有氣派。他下了車，往裏直衝，那批保鏢就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后。何秘書趕緊把保鏢們引到旁邊的耳房裏休息，只讓耿金章一個人進入客廳。

張春橋和姚文元就坐在面向門口的沙發上，我和耿金章坐在他們的對面。

張春橋問道"老耿呀，你們二兵團這次調了多少人進康平路呢？"

耿金章回答："裏面的幾百人都是我調去的，他們'上三司'根本没有幾個人，其他參加奪權的組織更是擺擺樣子的！"

張春橋又問："這么説，二兵團是這次奪權的主力了？"

這時，服務員端茶上來，耿金章呷了一口，把順帶喝進去的一片茶葉吐在地毯上，抹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説"是呀，没有我們'二兵團'，他們誰也奪不成！"

姚文元插嘴問道"你們奪權以后給毛主席、黨中央發了一個電報，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説："知道。電報我没有看過，但是'二兵團'的聯絡員給我説過這件事。"

張春橋這時才轉入正題："今天找你來，就是要談這個問題。你們和'上三司'等奪權，只是少數幾個組織干的，别的組織都没有參加，要是承認你們的話，會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時期，别的組織的奪權，我們都没有承認。最近，我和文元准備召開上海各個造反組織的聯席會議，你們也可以參加，大家共同來討論上海奪權以后政權機構的形式問題。所以，希望二兵團能够從康平路退出來。"

耿金章聽到這裏，顯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點起一支烟，抽了幾口，默不作聲。

張春橋接下去說："但是，有一件事應當告訴你們，就是你們發到中央去的電報，提名張春橋擔任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毛主席已經看到了。毛主席還有指示。"

耿金章和我一聽毛主席有指示，馬上瞪大了眼睛，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靜聽。

張春橋緩慢地一字一句地傳達："毛主席說，他贊成由群衆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領導人的這種方式。毛主席還要我來負責提出市委委員的名單。"

張春橋說到這裏，微微仰起頭，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夾着一支中華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高高突起的額角上泛着紅光，他的眼神在淡黄色邊框的玳瑁眼鏡后面凝住了，仿佛在思索將來的事情。他繼續平靜地說道："因爲這是毛主席看了你們的電報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慮不好對你們封鎖，所以决定找你們來傳達一下，讓你們知道。但是，因爲毛主席没有對你們幾個組織的奪權表態，所以不便把'上三司'等其他組織統統找來，就找你耿金章作爲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員的問題，現在看來時機還没有成熟，需要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接着，張春橋談起耿金章的身世來，還提到耿金章從小是他姐姐領大的，因爲父母去世得早，所以他對窮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等。耿金章感到很奇怪。

張春橋笑笑說："你的檔案材料我都看過。你們'工總司'幾個人的材料我全看過。過去市委不是說你們'工總司'的頭頭都是一些'社會渣滓'嗎？我對你們這些'社會渣滓'，總應該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嘿嘿地笑起來。客廳裏的氣氛變得非常融洽。我的内心感到異常興奮和激動，因爲張春橋和姚文元如此信任我，在召見耿金章的時候特意讓我到場，向我們傳達了重大的信息：毛主席同意張春橋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同意姚文元當第二書記兼副市長，還要張春橋提出市委委員的名單。這説明張春橋對我信任有加，我頗有點受寵若驚了。

耿金章肯定也領會到了這一點，他聽罷毛主席指示的傳達，當場就爽快地表態說："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團的隊伍撤出康平路，還要

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於什么時候開聯席會議，我就等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談話結束，夜已深了，張春橋特地關照何秘書准備夜宵，厨師做了滿滿的一大鍋肉絲湯麪，似乎是對耿金章和他的保鏢們的犒賞。他們把一鍋面稀裏呼嚕地吃了個精光，然后乘了轎車風風火火地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二兵團的隊伍就撤離了康平路，耿金章還把張春橋傳達給他的信息，告知了紅衛兵組織‘上三司’的頭頭趙全國。這下子，趙全國不服氣了：你張春橋和姚文元當市委書記還是我主張向中央打電報提名的哩，可是現在居然把我撇開了。但是，二兵團一旦撤出市委機關，“上三司”就孤立了，趙全國策劃的第一次奪權只好流産。

趙全國很生氣，組織了一個五人代表團飛北京告狀。到了北京，聽說《人民日報》將要發表支持奪權的社論，就認爲“上三司”在上海奪權的大方向没有錯，北京既然没有人理睬他們，就又飛回上海，聯絡了一些造反組織，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午，第二次進駐康平路市委機關，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趙全國第二次進駐康平路之日，正值張春橋、姚文元忙着和各個群衆組織的負責人討論上海聯合奪權后的組織形式之時。這天晚上，趙全國從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直接打電話給我，發出“最后通牒”，要我轉告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到康平路去接見群衆。張春橋和姚文元没有理會他。

當天晚上，各個造反組織在余慶路招待所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成立“聯絡總站”的問題。大家提出希望來一個大聯合奪權，不希望關係破裂，要我再次打電話給趙全國，邀請他來參加會議。誰知道趙全國一口回絶，反過來通知大家集中到康平路他那裏去開會，説是市委的權是他們“上三司”爲主奪下來的。大家一聽趙全國的態度就火了，“工總司”的潘國平正在主持會議，他氣得跳了起來，站到椅子上指揮大家：“趙全國這小子破壞上海的聯合奪權，去年他要召開華東六省一市的造反大會，還僞造周總理的指示……走，我們一起去把他抓起來。”潘國平一聲號令，幾十個造反組織的頭頭一擁而上，分乘兩輛大客車，從余慶路直開康平路，衝進“上三司”設在市委大院内的指揮部。潘國平找到趙全

國，争執了幾句，不由分説，一把抓住了他，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擁，當場把趙全國扭送到公安局去了。反正市公安局的造反組織"公革會"也有負責人在場，要關一個人還不容易？

"上三司"的又一次奪權就此結束。而第二天，在上海的一些主要馬路上，出現了"工總司"二兵團的大標語：

堅決擁護張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
堅決擁護姚文元同志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副市長！

毛澤東肯定上海“一月革命”

“工總司”二兵團的標語刷出以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復旦大學最早造反的學生組織之一“孫悟空”刷出了相反的標語：

“堅決反對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的新市委！
“堅決反對張春橋當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當市委第二書記！

“孫悟空”一派的負責人小胡和小周，還到市委黨校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辦公地點，找我展開辯論。

我問他們：“爲什么要刷這樣的標語？”

小胡回答：“我們造反的目標是打倒上海市委，張春橋原來是市委書記處的書記，上海市委是資産階級黑司令部，其他書記都有嚴重問題，難道張春橋就没有問題嗎？我們認爲現在市委内部的階級陣綫還不清楚，所以我們反對現在成立新市委，更反對張春橋等人當新市委的領導！”

至于全市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的頭頭們更是想不通：他們搶在前面奪了全市的大印，張春橋和姚文元却不支持；現在“二兵團”等提名張春橋、姚文元擔任上海市的領導，又搶了頭功。眼看自己已經到手的權力重又失去了，他們就把滿腔的怒火都傾瀉到張春橋、姚文元身上。加上他們得到情報，其他的學生組織“炮司”（“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的簡稱）、“孫悟空”等正在收集材料，醞釀“炮打”張、姚，他們更加坐不住了。“紅革會”總部舉行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在上海搞一次秘密行動：綁架徐景賢，從徐的身上打開缺口，收集炮打張、姚的材料；同時通過這次“火力偵察”，看看張、姚有什么反應。

我被“紅革會”綁架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點多鐘，復旦大學“紅革會”的

十多名紅衛兵，來到淮海中路市委黨校的三樓會議室，强行對我進行綁架。我掙扎着提出抗議，他們十幾個人架着我，從樓梯上往下拖。市委寫作班的王知常聞訊趕來，想要搶救我，把我攔腰抱住。那些人就把我和王知常一層層樓梯往下推，從三樓一直推到底樓。市委聯絡站的程綺華、郭仁杰等堵住黨校的前門想要攔阻，他們却突然把我轉移到黨校后門，那裏早已停着一輛事先准備好的吉普車。我不肯上車，他們就打我的腦袋，硬把我和緊抱着我的王知常一起塞進了車厢。吉普車疾馳而去……

到了復旦大學，他們把王知常拉走了，把我秘密帶到了一間有人看守的大會議室關押起來。我乘人不備，撕掉了我身上的記録本和電話簿。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復旦大學“紅革會”的十多個頭頭闖進了大會議室，他們坐在十多把折椅上，把我團團圍在中間，一場半夜審訊開始了。這些平時稔熟得可以隨時拍肩膀開玩笑的紅衛兵戰友們，此刻却個個緊綳着臉。穿草緑色軍大衣的小馬，首先用濃重的山東話開了腔：

“徐景賢！我們紅革會總部今天對你采取了革命行動，現在，你要老實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冷冷一笑：“你們憑什么？”

瘦瘦的長着一副長臉的小勞跳了起來：“你是當權派，我們紅衛兵就是有權審訊你！”

“我算什么當權派！”

“你是市委寫作班的支部書記，你要管歷史組、哲學組、文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這么多筆桿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組的成員，你這個丁學雷怎么不是當權派？”嘴唇上長着一層茸毛的小勞，不愧是“紅革會”二處專搞情報的頭子，他得意地笑着，抛出了他早已掌握的關於我的材料。

“你爲什么不提我現在是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負責人呢？就在幾天以前，你們還口口聲聲稱我爲戰友……”

“你們是全民造反！”“市委寫作班是假造反！”“你們市委機關於

部造反，我們信不過！”好像四五挺機關槍一樣，劈劈啪啪一齊響起來。

“那好，我們市委寫作班開造反大會，你們‘紅革會’爲什么要把文化廣場的會場讓給我們？在這次大會上，你們爲什么要到會祝賀！大會開過以后，你們的《紅衛戰報》爲什么要和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合編《大會專刊》？還有，你們說我們是假造反，那末爲什么上個星期你們還要拉我們和‘工總司’一起聯合奪權？”我也不甘示弱，一連串“迫擊炮”轟了回去。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義，陳丕顯、曹荻秋被打倒了，張春橋也當過市委書記處書記，抓過思想文化工作，難道就沒有問題嗎？爲什么就不能‘炮打’？我們認爲：上海的階級陣綫還不清楚，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張春橋、姚文元現在不能當市委書記和市長，他們都領導過市委寫作班，他們和你都應當接受造反派的審查！”山東口音的小馬終于把他們的意圖亮了出來。

復旦“紅革會”勤務組的小謝，方方的臉盤，脚上還上着石膏，腋下正拄着拐杖，他指着我說：“你徐景賢在市委工作了十幾年，你最了解張春橋和姚文元，你是張、姚的‘材料袋’。現在在上海，張春橋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賢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應當站出來揭發張春橋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趕快老實交代！”“‘徐老三’應當馬上反戈一擊！”一陣喧嘩，從此他們就直接喊我“徐老三”了。

明白了他們的意圖，我索性以攻爲守起來：“你們綁架了我，把我當成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材料袋’，想要從我身上打開缺口，‘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可是打錯了算盤！不錯，我了解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也知道他們的不少情況：他們組織和寫作了《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揭開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們又通過《評“三家村”》這篇文章，端出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委。你們都知道，這些鬥爭都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他們這次來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來的。難道中央文革也可以‘炮打’嗎？你們自稱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紅衛兵，可是你們却干出了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勸你們趕快懸崖勒馬！”

他們聽了我的話，面面相覷，其中有一個紅衛兵又提出了新的質疑："張春橋和姚文元如果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人，爲什么要鎮壓革命的學生運動？"

我驚訝地問："你這話從何説起？"

那個人回答："剛才張春橋和姚文元派了軍隊要到我們學校裏來搜査，我們已經在市委黨校和上海警備師的政委展開了大辯論。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决没有好下場！張春橋、姚文元派出持槍的解放軍，槍上還上了刺刀，把槍口對准紅衛兵小將，强行要進入我們學校，這不是鎮壓學生運動是什么？"

我這才明白過來："哦，你們這是什么邏輯？我們都學習過毛主席親自批准發布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假如你們不太健忘的話，就在幾天以前，'紅革會'總部奪了全市的大印，你們不是也請求上海警備區派軍隊保護過你們的嗎？今天，你們突然襲擊，綁架了上海一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而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派出戰士來尋找我，完全合理合法，這能叫做'鎮壓學生運動'嗎？"

"'徐老三'你别囂張！""你這個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張嘴！"這些紅衛兵氣得嗷嗷叫，其中有一個人霍地站起來，把面前的折椅踢翻在地。

我一聽解放軍都在找我了，膽子更壯起來，我索性向他們提出要求："我既然來了，願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强烈抗議，抗議'紅革會'總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無故綁架一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你們要當面向我道歉！第二，剛才在市委黨校，你們綁架我的時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車以前還毆打我的頭部，我到現在還覺得頭暈頭痛，我强烈要求去醫院驗傷，并且要你們交出打人凶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訴！"

他們果真被我的氣勢鎮懾住了，交頭接耳一陣以后，爲首的小馬宣布説："我們不跟他多嚕唆，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討論，大家到總部去！"説罷，他們呼嘯而去。

清晨，看守我的學生從食堂裏給我打來了一碗稀飯和一碟醬菜，我剛坐在乒乓桌旁喝着稀飯，"紅革會"的頭頭帶了三名人民解放軍走了

進來。其中一名是軍官模樣的，腰裏佩着手槍；另外兩名是戰士，手裏都持着上了刺刀的衝鋒槍。"紅革會"的頭頭指着我說："喏，這不是徐景賢嗎？他好端端地受到我們的保護哩。"那個軍官模樣的人朝我注視片刻，認定了我確實是徐景賢，而且看來處境是安全的，便不再說話，帶着戰士回身走了。

我估計他們便是張春橋、姚文元派出的解放軍，前來打聽我的下落的。我跟到門口，看守的學生把我擋住了；我從敞開着的門户裏朝外望去，只見有人正在校園的圍墻上刷大字標語：

張春橋、姚文元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
誰鎮壓學生運動決没有好下場！

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救了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對我來說，實在是十分漫長的一天。

自從清晨那幾個解放軍戰士來看望我以后，看守我的學生也换了班，新來的人板着臉不和我講話。挨到中午以后，還是没有人來找我。我透過窗外的鐵栅欄，看到、聽到小鳥在樹梢頭上跳着、叫着，更反襯出了"囚室"的安静。我知道上海正刮起了一場政治風暴，對立的雙方都圍繞着我的被抓争鬥着、較量着，而我却好像處在一個"颱風眼"裏，感到异常的平静。想着、想着，我感到困倦起來，索性倒在乒乓桌上，一頭栽入夢鄉……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復旦"紅革會"勤務組拄着拐杖的小謝，一蹺一蹺地來通知我立即轉移。他們帶着我轉移到學生食堂前面第三幢宿舍的二樓，把我藏在一間窗户上裝着栅欄的學生宿舍裏。

我剛安頓好，忽然看見"紅革會"的人帶着我們市委寫作班哲學組的郭仁杰進了門。他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教師，和復旦的紅衛兵都很熟悉；那天"紅革會"的人到市委黨校來，借口要和我討論上海的形勢，就是郭仁杰把我引見給他們的。誰知道"紅革會"使出了綁架的一手，

郭仁傑覺得很内疚。此刻他見了我，皺着眉頭，唉聲嘆氣，把手裏拿的毛巾和漱口杯等往我的上舖上一放，瓮聲瓮氣地說："老徐，我對不起你，我來陪你一塊兒關禁閉！"

"你怎么會到這裏來的？"我問。

"一月二十七號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馬上報告了興國路；今天打聽到你的下落，我就趕來了。"

"市委機關聯絡站現在正需要人，你怎么能離開？"

"我和復旦的人比較熟悉，所以我對市委聯絡站的程綺華他們商量過了，我留在這裏，假如有人要對你下手的話，我也奉陪到底。"

冬天的天色暗得特別早，從窗栅欄望出去，夜幕已經籠罩大地。乘看守的學生大部分去吃飯的機會，郭仁傑悄悄地告訴我：張春橋、姚文元接獲他的報告以后，因爲我的去向不明，他們很著急，立即通知上海警備區，派出了警備師的四個摩托排到處尋找我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親眼看到我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隊撤回。"紅革會"立刻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指責張春橋、姚文元派軍隊鎮壓學生運動。整整一個下半夜，"紅革會"的一些人在市委黨校，圍住上海警備師的政委徐海濤，和他展開大辯論，要他交出幕后指揮者。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約見"紅革會"的負責人談話，在上海展覽館談了六個小時，"紅革會"堅決不肯讓步，圍攻張春橋和姚文元，看來他們還有更大的動作。現在"紅革會"已經通知各大專院校的基層組織，上街刷"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大字報，滿街已經貼滿了"炮打"的標語。"工總司"和其他的造反組織，反對"紅革會"的做法，准備組織反擊；王洪文和耿金章本來在"工總司"各拉自己的一派勢力，調動了隊伍，打算在南市區一帶打"内戰"，搞武鬥，聽説了"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停止"内戰"，各自把隊伍撤回來，决定聯合起來對付"紅革會"……張春橋、姚文元看到這種情况，已經要市委寫作班和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電報……

我聽了以后，不禁憂心忡忡，因爲目前的局勢確實比較嚴重，不知道還會發生什么重大的變故。

一月二十九日晚飯以后，整幢學生宿舍裏面的人忽然都離去了，只

留下一名看守，看來又有什么活動正在醞釀着。那名看守正好是郭仁杰的學生，姓韓。我和郭仁傑交換了一下眼色，郭仁傑走過去悄悄問他："小韓，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那個姓韓的學生推了推眼鏡說："晚上全校開誓師大會，你們可以聽拉綫廣播。"

果然，過不多久，挂在電綫杆上的高音喇叭響起來了，從復旦大禮堂裏傳來主持人的聲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現在開始！"接着，各派紅衛兵的代表争先恐后地上臺發言。

復旦"紅革會"大隊部的代表首先介紹了對徐景賢采取"革命行動"的經過以及張春橋、姚文元"鎮壓學生運動"的情况，聲稱這次"火力偵察"取得了成功，達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復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會上分析形勢說：上海的階級陣綫還不清楚，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抓"徐老三"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要把炮口對准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提議：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一個有十萬紅衛兵參加的"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把"徐老三"拉到大會上去鬥；開完大會，全市紅衛兵舉行"炮打"大游行，到張春橋、姚文元住的地方去示威！

聽完他們的倡議，會場裏吶喊起來：

"對，給徐景賢挂上牌子鬥！"

"讓'徐老三'也嘗嘗戴高帽子的滋味！"

"張春橋、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

"張春橋、姚文元鎮壓學生運動罪該萬死！"

聽到這裏，我心急如焚，再也聽不下去了，猛然從床上站起來，對郭仁杰說："老郭，無論如何要制止事態的發展。明天我個人安危事小，群衆衝突事大。開完大會紅衛兵要游行到春橋同志、文元同志的住處去，王洪文和耿金章他們肯定要調動'工總司'的隊伍來保衛，這樣，勢必發生工人和學生的大武鬥、大流血，我們怎么向中央交代？"

郭仁傑用門牙緊緊地咬着下嘴唇，他的臉龐也因爲緊張而扭曲了。那個看守我們的姓韓的學生，正好坐在我們的對面，聽到我們的話，露

出了驚愕的神色。

我們在宿舍裏焦躁地來回走動，嘴裏不住地說："一定要想辦法把信息帶出去！一定要制止這場大流血！"

郭仁傑跨前一步，走到那個學生面前，聲音略帶顫抖地說："小韓，我們都是哲學系的，彼此的了解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現在只有你能幫助我們……"

那位小韓露出了遲疑不決的神色。我也懇切地說："小韓，我們過去不認識，你對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個真正的紅衛兵，決不會對一場流血慘案袖手旁觀的。希望你能帶我們出去打一個電話……"

小韓用手推了一推眼鏡，終于下了決心，站起來說："走！"

我們三個人找到一處公用電話，我趕快撥通了興國路招待所的號碼，我要何秘書請領導聽電話。過了片刻，我聽到了張春橋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我急促地告訴他：復旦正在開"炮打"誓師大會，我在一位看守我的學生的幫助下，偷着出來打的電話；明天他們准備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的大會，把我拉去批鬥，會后還打算到興國路一帶示威游行，很可能會和工人隊伍發生衝突……

我一口氣匯報了這些情況，張春橋緊張地聽着，嘴裏嗯嗯地答應着。最后，我向他請示："我已經跑出來了，下一步該怎么行動？"

"你現在還回得去嗎？"張春橋問。

"回得去。他們還在開大會，沒有其他人發覺我們。"

張春橋沉吟了一下，終于作出決定："你還是返回原處，免得他們節外生枝。不管發生什么情況，你都要頂住。"

"那好，我現在就回去了，再見！"我的鼻子有些發酸。

"要堅信中央一定會正確處理這個事件的！"張春橋說完就把電話挂上了。

我們回到關押我們的宿舍，大會還在繼續，但是我的心裏踏實多了：因爲信息已經送出，張春橋和姚文元肯定會向中央報告的。明天我可能要挨鬥，反正睡不着覺了，看見桌上鋪着白報紙，放着墨汁瓶，我和郭仁傑商量，合寫一張大字報，談談我們的觀點。郭仁傑拿起了筆，

我在旁邊念着，他提筆疾書：

> 一、爲什么在打倒上海市委的關鍵時刻，有人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的領導？這樣的大方向難道是正確的嗎？
>
> 二、爲什么在上海各個造反組織聯合奪權的重要關頭，有人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這不是搞亂我們自己的陣綫嗎？
>
> 三、……

寫完以后，加上標題《六問》，我和郭仁杰在大字報后面簽上名，并寫上"我們現在住在第×宿舍×樓×室，歡迎大家前來交換意見。"然后把大字報交給小韓，請他下班以后，幫我們把大字報貼到校園裏去。

一會兒，大會散了，"紅革會"的頭頭們和看守的紅衛兵們都擁了進來，瞧我們没有什么動静，就放心了。他們根本不理睬我們，在一邊寫起大標語來。

我也開始閉目養神，我想："明天還有一場惡戰哪！"我解下圍巾蒙住眼睛，遮住刺眼的燈光，側身向壁，朦朦朧朧地進入了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寢室裏一片静謐，紅衛兵們也已上床就寢。忽然，從復旦校門口的方向，傳來一陣陣高音喇叭發出的廣播聲，把大家都驚醒了：

> 我們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和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駐滬聯絡站的聯合廣播車，現在開始廣播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現在開始廣播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

我馬上抽身坐起，心臟激烈地跳動着，我意識到這個特急電報肯定是和"炮打"事件以及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校園裏很安静，女廣播員的聲音一字一句，十分清晰，我們都屏息静聽：

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們并轉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一) 復旦紅衛兵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 復旦的某些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并向他們道歉。

(三) 人民解放軍采取保護革命群衆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扣押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 各群衆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采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綁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 希望復旦和上海的同學們,幫助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應當由制造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縱者負責。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請你們立即印成傳單,出動廣播車,廣爲宣傳。)

廣播剛完,寢室房門"砰"的一下給外面的人踢開了,有人高喊着:"緊急集合!快,緊急集合!"雙人鋪上的紅衛兵們一陣風似地奔出去,消失得無影無踪。房間裏只剩下我和郭仁杰兩個人。那些没有寫完的大字標語,飛滿了一地。

我看看手表,現在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的清晨五點鐘。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來得正及時,把我從厄運中救了出來!

毛澤東説:"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職務	姓名	備註
組長	陳伯達	一九七〇年十月被隔離審查；一九七三年被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判刑十八年。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去世。
顧問	陶鑄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逝世。
	康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病死。
副組長	江青	
	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
	劉志堅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
	張春橋	
組員	謝鏜忠	一九六七年一月受排擠迫害，脫離中央文革。
	尹達	一九六七年一月受排擠迫害，脫離中央文革。
	王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被隔離審查，撤銷一切職務，同月入獄，一九八二年一月獲釋。
	关鋒	一九六七年八月被隔離審查、撤銷一切職務。
	戚本禹	一九六七年八月被隔離審查，撤銷一切職務。
	穆欣	一九六七年一月受排擠迫害，脫離中央文革。
	姚文元	
（華北局）	郭影秋	
（东北局）	鄭季翘	
（西北局）	楊植霖	
（西南局）	劉文正	

陳伯達　陶鑄　康生　江青　張春橋

穆欣　姚文元　王力　关鋒　戚本禹

"紅革會"總部"炮打"失敗，終于垮掉了，這樣一來，上海再也沒有從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個造反組織加快了聯合奪權的步伐。

至于新的政權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大家議論紛紛，提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張春橋和姚文元曾經多次稱贊過"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火綫指揮部"以及"上海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這樣的機構，認爲它們實際上履行了政府經濟部門的職能。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張、姚還沒有來上海的時候，各個工廠企業的造反隊此起彼伏，互相鬥爭，大家搶旗幟，各自鬥當權派。但是，自發的工人運動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往往滑向經濟主義和福利主義的軌道。當時，有些干部怕批鬥，凡是群衆提出要求他們就簽字，助長了這股經濟主義的歪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廠企業的職工要求增加工資、補發津貼，某些領導不堅持原則照樣簽字，結果銀行被提款數千萬元。上海港的幾個裝卸區，有一批工人鬧着要發"串連費"，結果拿了"串連費"擅自離開生產崗位，到外地"串連"去了，致使一批外國輪船停靠在碼頭上沒有人卸貨，有些外輪的船長提出了抗議；還有從船上卸下來的貨物堆放在露天沒有人運進倉，整個港務局系統積壓的貨物總數達四十萬噸之多。

鑒於這樣嚴重的局勢，而市政府的各職能部門又陷於癱瘓狀況，就由"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鐵路局、海港和銀行等方面的造反組織，一起成立了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火綫指揮部"，后來又成立了"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市委寫作班的朱永嘉等人也參與了這些機構的領導，在較短的時間內制止了經濟主義的歪風。

張春橋和姚文元來到上海以后，對"火綫指揮部"等的工作大加贊賞，對朱永嘉作爲一個研究明史的專家，能够主動到風口浪尖上去處理實際的經濟事務，尤爲稱頌。他們推而廣之，曾經想建立上海各群衆組織的聯絡總站，來作爲新的上海政權機構的組織形式。但后來傳來毛澤東的指示，奪權后建立的領導機構，要有軍隊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衆組織的代表三者參加，這才否定了聯絡總站的形式。

時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聯合奪權的步伐加快了，幾個主要的組織在市委黨校成立了奪權宣言的起草小組。執筆者們根據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寫進上海的奪權宣

言，主張“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公社委員由群衆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工資收入不得超過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來以后，命名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我把這些設想向張春橋、姚文元作了匯報，他們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組的設想，并且要我把奪權宣言的初稿統改以后，交給他們兩個定稿。我向起草小組的成員作了傳達，大家都歡欣鼓舞，我說：毛主席在聽到《文匯報》奪權以后，曾經指出這是一個歷史的創舉，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根據毛主席的教導，一九六七年一月發生在上海的這一場革命，更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俄國的十月革命，解决了無產階級領導廣大人民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在歷史上是一次創舉；而我們的一月風暴，又解决了當無產階級的政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以后，如何再把它重新奪回來的問題，從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這又是一次歷史的創舉，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我們的“一月革命”，可以説是“十月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我建議：我們奪權宣言的題目可以定名爲《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題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這樣既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又有恢宏雄偉的氣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奪權宣言的草稿就這樣草成并付排了。

正當我們在起草宣言的時候，一些群衆組織的頭頭却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大家在余慶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權的籌備工作，有幾個負責人當場起哄，說是既然“紅革會”等都不參加籌備了，那末新政權機構的建立應當越快越好，只争朝夕嘛！他們擅自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員會，而且連夜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報喜，主張在二月三日就要舉行全市的成立大會。這一下，連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號召開各群衆組織主要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張春橋一到場，就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把你們緊急請來，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們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急着馬上就開成立大會，這種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們當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個新的政權機構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在這個權力機構裏，光有你們這些群衆組織的代表還不行，還

應當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級的干部都還沒有'解放'，那末，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們的機構裏還要有軍隊的代表，駐滬的陸、海、空三軍究竟派誰來參加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呢？他們三軍的領導機關總還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說："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這樣的大事，我們還要向毛主席和黨中央作報告呢！再說，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成立大會，有許多准備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張春橋說："是呀，我們還應當發表一個像樣的宣言，現在宣言的初稿已經寫出來了，可是我和文元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們想要仔細推敲修改一下，請你們也要認真看過，我們再在全體委員會上討論通過，向全國發布。還有，成立大會上各方面的代表要發言，我們也要講講話，這些都需要時間准備。所以，我建議成立大會是不是推遲幾天。"

這時，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來說："上海人民公社開成立大會的事，我們已經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見大會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衆的情緒會受到影響。"其他的人也都主張趁熱打鐵，盡量早開，最后張春橋拍板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

王洪文帶了一批人，開進南京路市體委大樓，具體籌備大會的組織工作 我和起草小組一起，爭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負責審改各界代表的發言。二月四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把經過他們修改的宣言退回給我，題目改爲《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副題仍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們還通知我要在宣言后面署上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個群衆組織的名稱，送給《文匯報》排印，以便晚上開籌備會議。誰知道在這份奪權宣言的署名問題上，發生了一場軒然大波。

當時在上海有一批公認的比較有影響的市一級造反組織，包括北京和外地大專院校的駐滬聯絡站，它們經常在各種場合共商大事，共同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上署名，一起參加張春橋和姚文元召集的會議等等，算起來一共有三十二個組織。于是，我征得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同意，把這三十二個組織的名稱，署在奪權宣言的后面，作爲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然后把宣言的全文送到《文匯報》社去排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晚上，徐景賢和紅衛兵們在上海文匯報社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定稿。

文稿一到報社，消息馬上傳了出去，三十二個組織裏有幾個"山頭主義"特别嚴重的，對排名的次序不滿意，首先鬧將起來，要求把自己這個組織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風聲傳到社會上，全市其他的造反組織聽説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權了，都想擠進來搶占一個座位。一夜之間，平白冒出來許多過去從來没有聽説過的組織，紛紛派出負責人到市委大樓的大會籌備組吵鬧，其中有所謂的"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援新疆知識青年返滬造反司令部"等，還有一個最奇特的叫做"上海住房困難户革命造反司令部"，都要求擠進末班車，弄個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員當當。對于這些"經濟主義"的組織，當然斷然不能同意它們參加進來。在這些鬧事的組織中，有一個"紅衛軍"組織人數

最多，勢力最大，它專門跨行業、跨系統吸收全市的復員、轉業軍人參加造反。當時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成立這一類組織，還發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它解散，但這些人拒不執行，仍繼續發展成員，宣稱自己擁有多少萬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應該和"工總司"平起平坐。這次，他們聽說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自稱對打倒上海市委有功，揚言上海人民公社非讓"紅衛軍"參加不可。"紅衛軍"派出了一批人員進駐《文匯報》社，守候在排字房裏，他們說如果不讓"紅衛軍"組織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報社，還要帶領隊伍衝擊籌備會的會場。《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老朱，打電話給我反映了這個緊急情況。

我覺得問題十分棘手，當即向張春橋和姚文元作了匯報。他們商量后又向中央請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點鐘，他們突然通知我：馬上把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集中轉送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開籌備會議，對外不要宣布開會的地點。我立刻告訴了在市體委大樓的王洪文、王承龍等人，由他們分批把各組織的頭頭送上大客車，轉移了幾個地方，最后秘密送到上海展覽館。我還單獨通知了上海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

深夜十一點鐘，我陪着張春橋、姚文元趕到上海展覽館的咖啡廳，只見全場被水銀燈照得雪亮，新華社上海分社、上海電視臺等的記者都出動了。張春橋還通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陸、海、空三軍的首長，他們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臺座位上。

張春橋主持會議，唱罷《東方紅》，他讓工作人員給到會的人員每人發一份宣言，然后讓北京體育學院的一個女紅衛兵全文朗讀《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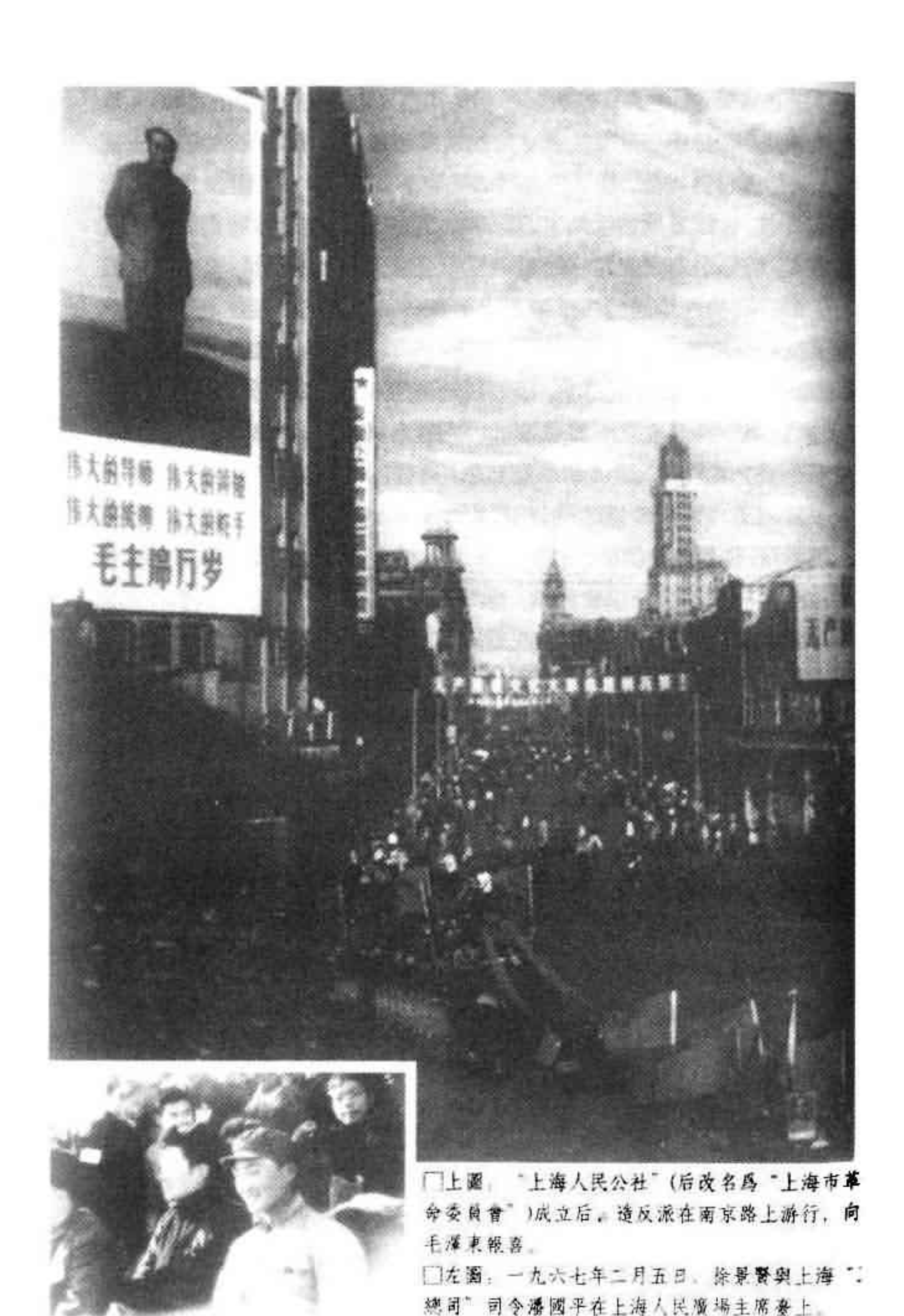
讀罷宣言，張春橋讓我介紹宣言的起草經過。到會的人聽我說宣言是經過張春橋、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擁護。但是，當討論到宣言后面的署名問題時，會場上頓時哄鬧起來，《文匯報》的造反派負責人老朱伸直脖子用沙啞的喉嚨喊道："這樣寫不來事的，'紅衛軍'在我們報社裏守了一天一夜了，他們說要是不讓'紅衛軍'在宣言上署名，就把報社砸掉！"王洪文惱怒地站起來說"他們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調隊伍去砸掉他們在華山路的總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響應。

正在這時，上海展覽館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兩個入口處的警衛人員進來報告：有好幾個沒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組織的負責人，聽說這裏在開會，正在入口處吵鬧，說他們爲什么不能參加會議，一定要擠進來在宣言上簽名。會場裏更加混亂了，有的組織主張堅決抵制臨時要來參加會議的人，但是也有幾個組織的頭頭爲守候在大門外的說情，要求把他們放進來。顯然，給別的組織的人通風報信、泄漏了今天晚上開會地點的，就是會場裏的某些人，他們之間本來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看到這種混亂的情景，一把抓過放在桌子上的話筒，生氣地說："大家別鬧！我們成立上海奪權以后的權力機構，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又不是擠公共汽車，誰擠進來就算數，這像話嗎？再說，這幾天全市一下子冒出了六百多個組織，都涌到大會籌備組來，宣稱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級組織，你們能承認他們嗎？如果現在讓大門口的這些人進來參加會議，那末，其他組織都會大鬧，誰來負責？"

大家聽我一說，覺得倒也在理，但又想不出新的辦法來，只能乾着急，低聲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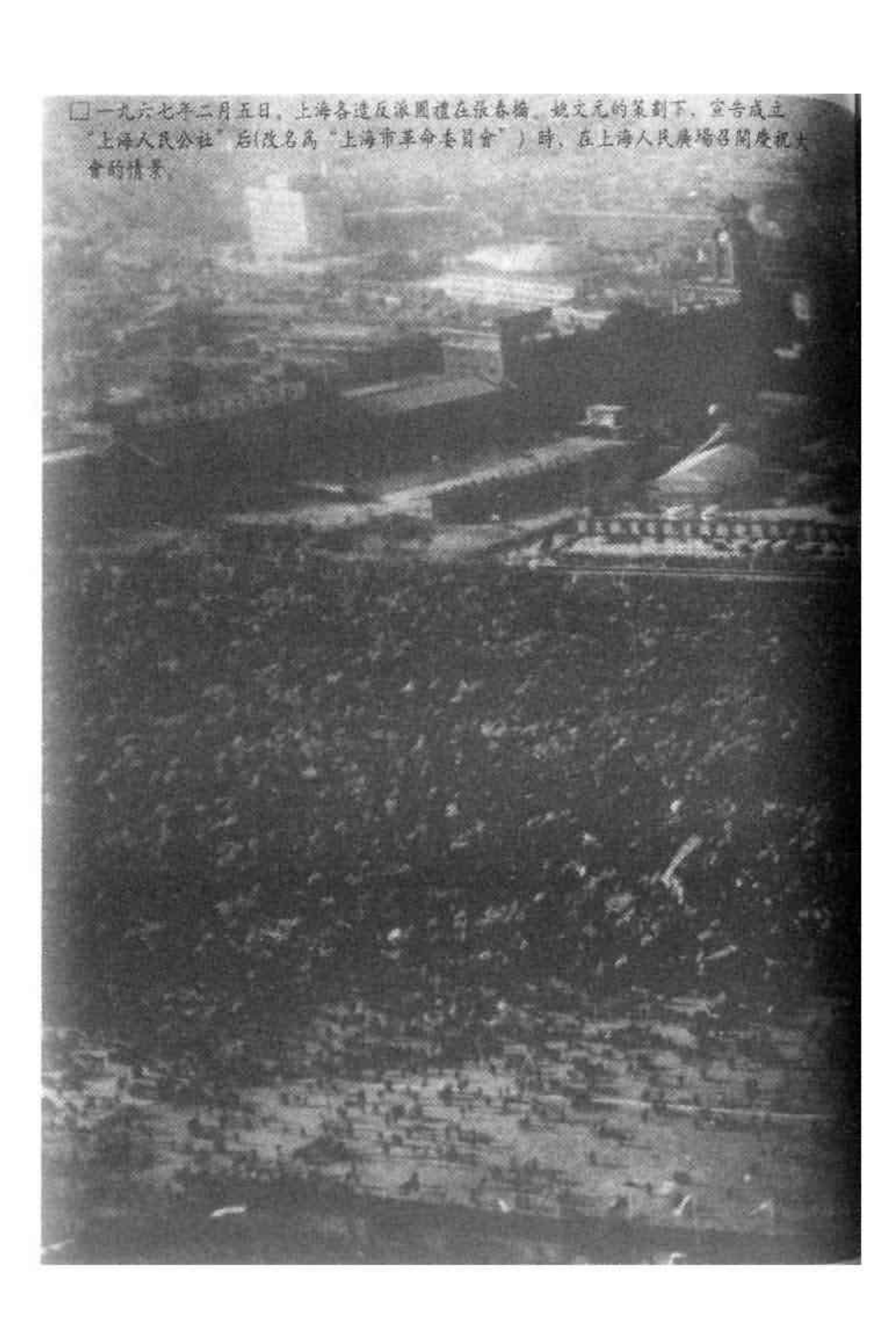
張春橋却并不發火，他在話筒前慢悠悠地開了腔："同志們哪，現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內戰的時候啊！今天在座的這三十二個組織的負責人，確實在上海的奪權鬥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們是即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當之無愧的成員，我們要共同來掌管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可是，大家應當考慮到：上海有一千萬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以外，都應該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員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們這三十幾個組織組成，那末勢必要把很多群衆都排除在外，這樣，有相當的一批人會不高興，也會影響到我們新的權力機構的權威性。告訴大家一件事，就在我們來開會以前，'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已經找了另外的三十幾個組織，在其他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准備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這樣我們上海的群衆隊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剛剛跟耿金章他們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讓他們參加到上海人民公社裏面來，他們才答應不再另外成立第二個政權機構。所以，我們的團結面一定要越廣泛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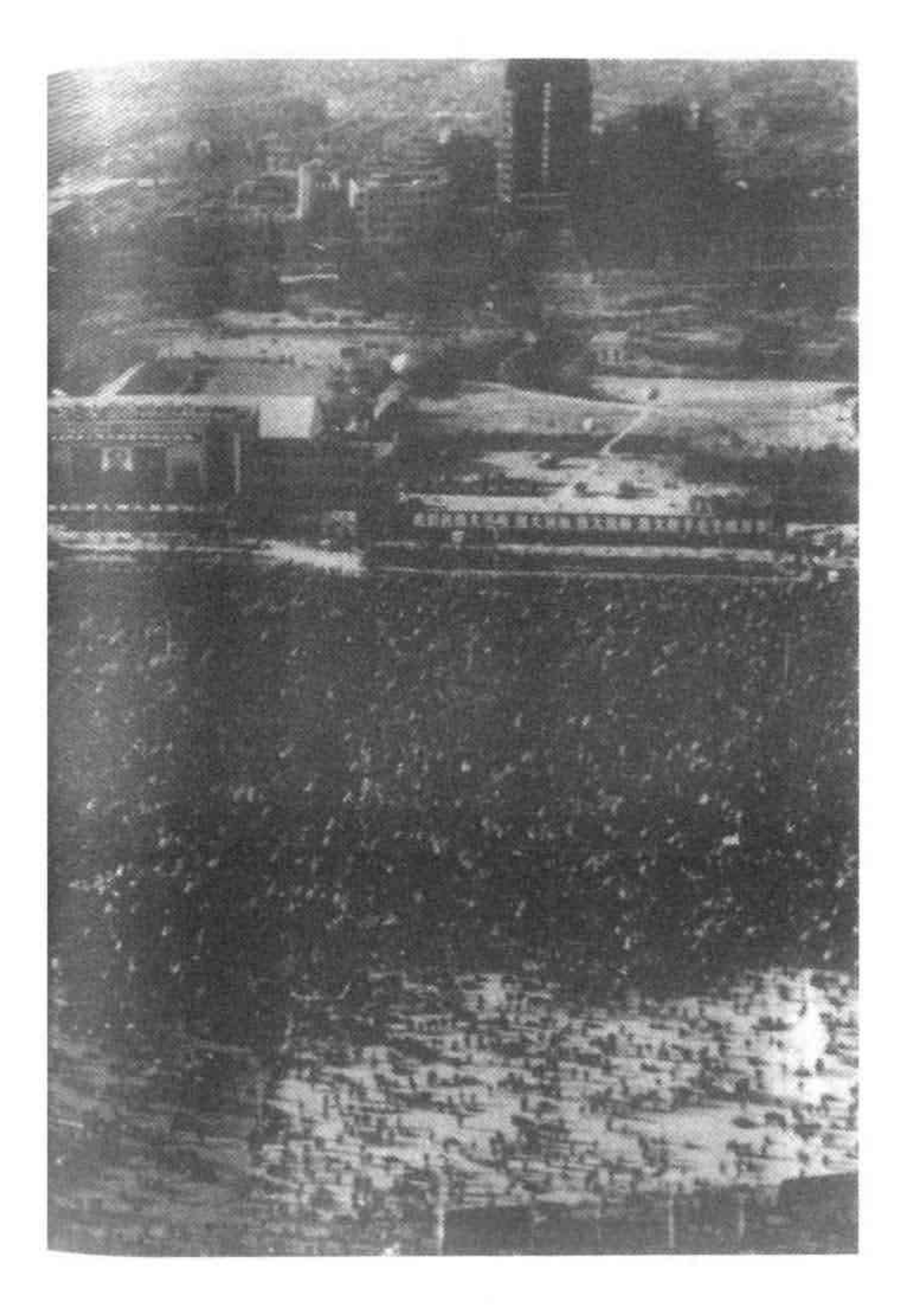
□上圖："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后，造反派在南京路上游行，向毛澤東報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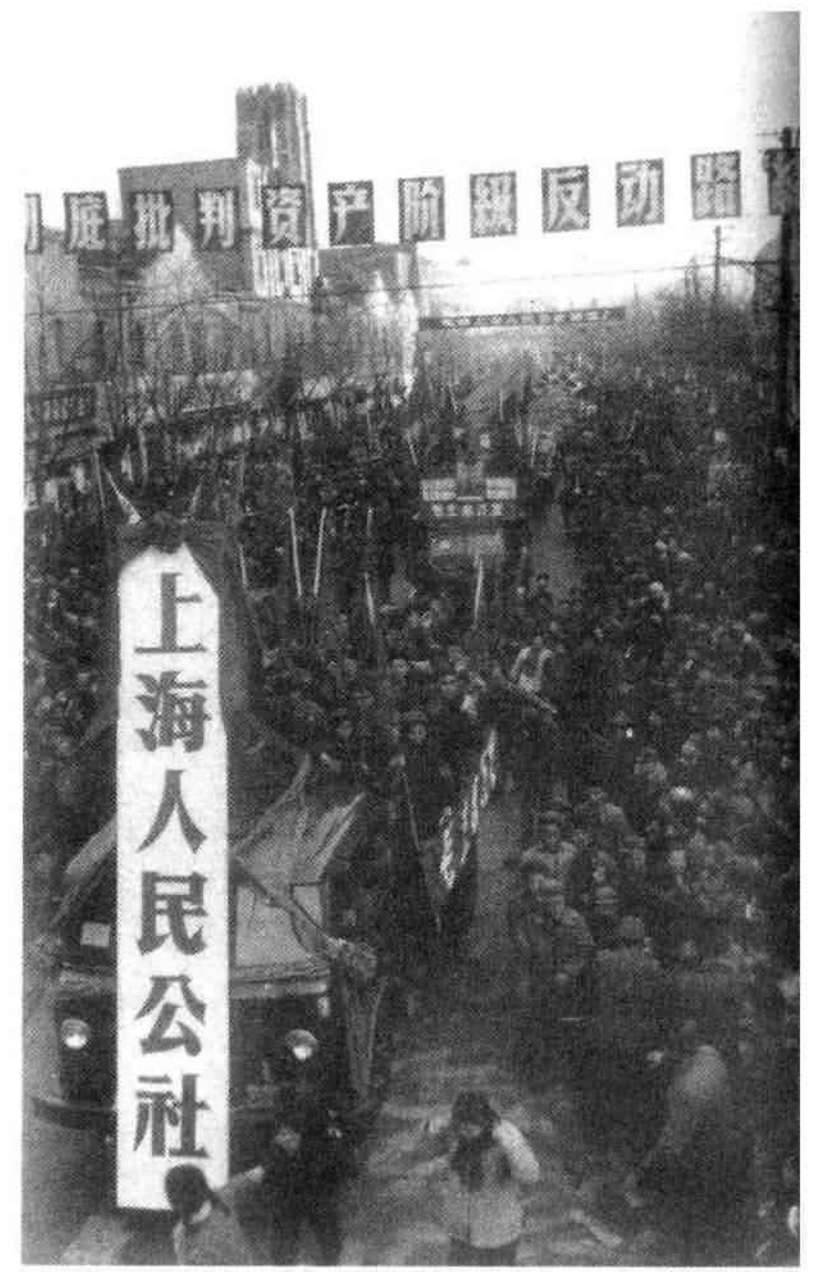
□左圖：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徐景賢與上海"工總司"司令潘國平在上海人民廣場主席臺上。

□上圖　北京紅衛后在上海街頭劄出擁護“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標語。
□下圖：上海造反派的支持者張春橋（右一）、姚文元（前排右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各造反派團體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時，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慶祝大會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造反派組織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造反派組織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在外灘挂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張春橋說到這裏，稍稍地停頓了一下，點起一支烟，徐緩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說"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們提出了一個方案，請大家考慮行不行？……"

大家聽說張春橋、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諦聽：

我們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作爲我們奪權以后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座的三十二個群衆組織，都是上海人民公社臨委會的當然委員，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各組織可以自己推選代表參加臨委會，也有權力撤换和罷免自己的代表。當然，這個權力機構應當是"三結合"的，除了群衆組織的代表，還要有軍隊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參加，我們已經向中央作了報告：駐滬三軍的負責人作爲軍隊的代表，我和文元作爲革命干部的代表，參加上海的三結合權力機構，已經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會場裏熱烈地鼓起掌來，特別是到會的各組織負責人聽說自己是屬于"當然委員"之列，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格外興高采烈。張春橋看看火候已到，就把話鋒一轉，繼續講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爲這樣，我們建議：今天到會的三十二個組織，不作爲上海人民公社的組成單位，而是作爲發起單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個組織的名稱統統寫上去了，只消署上一個統一的權力機構的名稱——"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這樣，既代表了軍隊、革命干部和我們這些發起單位的群衆組織，又避免了因爲署名引起的許多麻煩。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組織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話，都可以提出申請，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臨委會統一審查批准。這樣的處理方式，如果大家贊成的話，今天晚上散會以后，請大家到外面去宣傳，凡是想要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組織和單位，歡迎他們明天都到人民廣場去參加成立大會，這樣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組織安定下來。大家看這個辦法是否可行？

徐景賢和妻子葛嶷芳攝于一九五七年。

我心裏想：張春橋真不愧是處理復雜問題的能手，這一來可以把許多問題都擺平了，所以我帶頭叫喊起來："讚成！"其他的人也都紛紛嚷道"我們同意！""讚成！"緊接着，全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場內的水銀燈照得雪亮，攝影機嚓嚓地響，到會人員一齊舉手通過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項議程是確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由張春橋和姚文元作主要講話，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駐滬三軍、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農民、徐景賢代表機關干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陳敢峰代表紅衛兵，在成立大會上發言。

籌備會議到此圓滿結束，姚文元興奮地站起來，用手指連連敲擊着桌面，大聲地說："明天……哦，不對……"他低頭看看手表，"現在已經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點鐘了，應該說是今天……今天下午兩點，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上圖為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徐景賢代表上海市機關干部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發言。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萬人爭先恐后地來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各個組織都打出自己的旗號表示擁護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張春橋、姚文元、駐滬三軍的領導人和三十二個群衆組織的負責人登上主席臺，天空中出動兩架飛機撒下了五彩繽紛的傳單……

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致詞："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

的人民革命。……這場勝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裏。”

姚文元在會上發表演說“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

大會宣讀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

會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游行。游行隊伍到了外灘，我們正式進入了原來是匯豐銀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大厦門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木牌被摘了下來，用重磅鐵錘砸碎，丢在火堆裏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奪權以后的新的權力機構正式開始運行。

第二天，我們這些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員們就進入外灘大厦辦公。可是，左等右等，一連等了三、四天，不見新華總社發佈電訊，也不見《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報道，只有上海的地方報紙《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天天在大肆宣傳。于是，社會上的流言多起來了：“因爲上海没有實行‘三結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張春橋、姚文元當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導人，所以不發消息。”……我心裏當然明白不是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發，我也搞不清楚。我對張春橋、姚文元說：“黑龍江省奪權以后，成立了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很快發了消息，還配了祝賀的社論，新華總社又轉發給全國報紙刊登，爲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們没有發？”張春橋、姚文元不回答我。

又過了幾天，上海街頭出現了《一問上海人民公社》、《二問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報，張春橋、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張春橋把我單獨找到興國路招待所去，告訴我說：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匯報關于上海奪權和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的事。張春橋再三叮囑：這個行動只讓你一個人知道，千萬不要外傳，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測；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隨時打電話到北京告訴我們。

第二天，他們就飛北京了。我小心謹慎，守口如瓶，關于他們的行踪連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都諱莫如深。我每天晚上都往興國路招待所跑，來到張春橋住的五號樓二樓，通過加保密機（在普通保密電話機下面，再安裝一只扁扁的加保密箱，互按按鈕以后，可以加倍保密，連長途電話

接綫員都無法竊聽)，向張春橋匯報各條戰綫的動向；然后，我又在第二天向大家傳達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們兩個人仍在上海似的。

這出"空城計"唱了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忽然打電話給我，從電話裏聽，他的情緒很高漲，話也比平日多了，他說："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問題都解決了，你先組織幾個人起草一份關于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决議，我們回來以后開全體委員會議要用……"

我趕緊照辦，决議草稿剛起草好，張、姚就回來了，當天就把我找去興國路招待所。張春橋說："這次我們到北京的當天，毛主席就接見了我們，主席說：一月革命勝利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對上海非常關心，對奪權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對我們奪權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件事有意見，他說，你們把名稱改成上海人民公社，原來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區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話，我們的國號就要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還要設社長。那就涉及到國家體制改變的復雜問題，改變國號，牽涉到外國對我們國家要重新承認；外國大使都作廢了，要重新換大使。"

我是積極主張叫上海人民公社的，現在一聽問題這么復雜，便着急起來："現在怎么辦呢？當時我們根本没有想到這些問題！"

姚文元主動把責任攬了過去："這件事不能怪群衆、怪你們，主要是我和春橋考慮欠周到、欠妥當。"

張春橋微微一笑，往下說："二月十二號那天，我們已經向主席當面作了檢討。主席考慮得真細致，連改什么名稱都代我們想好了，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主席還說，一時改不過來，可以過一段時間，你們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慮，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體的改名活動怎么進行，我不是要你組織起草一個關于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决議嗎？"

我說："已經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帶來了。"

張春橋說："那好，這個决議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署名，在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通過一下，同時由我在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說明，這樣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動。我們設想的這個方案也向主席作了報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關於改名的問題新華總社和《人民日報》發不發消息？"我

“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時，紅衛兵和造反派舉行慶祝。

還是擔心全國的報刊不登上海成立權力機構的事。

張春橋仰天大笑，似乎在笑我的擔心是多於的："我們已經和新華總社打過招呼了，開過大會、通過决議以后，由上海分社寫一則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舉行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一致通過《關于當前上海形勢和任務的决議》'，由新華總社轉發全國，根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這不等于向全國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并且開始行使職權了嗎？"

"對！對！這樣好。"我恍然大悟，擊節贊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們在文化廣場召開了萬人大會，大會由姚文元主持，張春橋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由我宣讀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决議，與會者一致舉手通過。會后，一輛彩車駛到外灘，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進了博物館。

《人民日報》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會的報道，報道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其他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新華總社還向全國發了電訊。

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傳達了毛澤東總結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經驗："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社論還宣稱："這個大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衆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卷全國。"

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我們終于坐穩了上海的交椅，而且在上海的帶頭下，全國範圍的奪權鬥爭爭先恐后地開展起來了。

張春橋姚文元錦江被"綁架"

一九六七年初，張春橋、姚文元分別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和組員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揮奪權。他們到了上海没有幾天，就被關進錦江飯店的電梯裏，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關了二十八分鐘。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錦江飯店"電梯事件"。因爲錦江飯店是涉外單位，當時内部又强調保密，所以對這次"電梯事件"的内幕詳情，外界鮮有人知。

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以后，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今興國賓館）。爲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般不在住所見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進行活動。他們先到武康路二號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接見了我和聯絡站的成員，并且宣布市委聯絡站就是他們的工作機構，日常的會議都在這裏召開；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動，他們安排在茂名南路錦江飯店進行。在他們看來，錦江飯店是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當然是靠得住的。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都穿着軍裝，戴着領章帽徽，在警衛人員的簇擁下來到錦江飯店，進入北樓八樓的套房内找人談話。

誰知道，錦江飯店早已不是安寧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職工也打出了"造反"旗號，和王洪文的"工總司"盧灣區指揮部（簡稱"盧指"）挂上了鈎，在飯店内的名稱是"革聯會"。

錦江"革聯會"的少數頭頭，在"造反"之風的煽動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就在錦江飯店裏制造過"停電事件"，影響很壞。之后，他們又挾持飯店的負責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來總理接見，承認他們的行爲是什么"革命行動"，結果當然没有達到目的。

這些人返回上海以后，開始醞釀奪權，所以急于爲自己的組織制造輿論。他們得知張春橋和姚文元此刻來到錦江飯店，正中下懷，想乘機要求張、姚接見，以便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

"革聯會"電梯"逼宫"

"革聯會"的頭頭湯某，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原來是錦江飯店門房

間的警衛，"造反"以后當上了頭頭。他見張春橋、姚文元進了八樓套間，就要樓面服務員在送茶水的時候，遞一張紙條進去交給張、姚，希望他們事后能接見"革聯會"的代表。

張、姚正忙於找人談話，看了一下紙條，因爲事先没有安排這一活動項目，也就不予置理，繼續和人交談。湯某等人見張、姚不給答復，知道正常途徑無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們答應接見。過了幾個鐘點，張、姚找人談話結束，跨出八樓套房，張春橋便對隨身警衛員大老李説："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讓張、姚進入停在八樓走廊裏的電梯，自己和另一個警衛員跟了進去。當時，錦江飯店的電梯還是老式的需要人開的拉門電梯。

電梯門關上了。電梯裏有一老一青兩個開電梯的人，張、姚并没有在意。只見那個年輕人把扳手一扳，電梯不但没有往下開，反而緩緩上升。張、姚和警衛員還没有反應過來，電梯已經停下，停在九樓，電梯門"咔啦"打開，只見門口站着一群人，爲首的就是錦江"革聯會"的頭頭湯某。

原來湯某等人見張、姚不睬他們，就讓"革聯會"一派的青年小鍾，直接進入電梯，叫開電梯的老周靠邊，由他們一派掌握開關。當張、姚一口進入，他們偏不往下開，而是往上開到九樓，企圖造成既成事實，强要張、姚同意接見。

湯某在電梯門口向張、姚發出了"邀請"：

"我們已經在九樓准備好了會議室，請首長出來接見錦江'革聯會'的代表。"

張春橋正在納悶，這一下子才明白過來。他突然沉下臉，生氣地説：

"你們怎么可以采取這種辦法對待我們？！"

"我們怕首長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訴，希望首長諒解，能够接見我們。"湯某回答。

"我們今天回去還有事。再説，你們要求接見也得等我們的安排。"張春橋忍住怒氣，想早點脱身，所以使出緩兵之計。

"我們的事情很急，已經到北京上訪過了，周總理説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張春橋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見，只争朝夕嘛！"湯某等人不

肯讓步。

“你們這種做法簡直是搞突然襲擊！我們不能見……”張春橋看軟的一套不行，態度變得强硬起來。

“中央文革首長不要怕群衆嘛！出來談談有什么關係呢？”湯某旁邊的“革聯會”其他成員開始冷嘲熱諷了。

“你們這樣做算什么‘造反派’？我們不願意接見你們，這總可以吧，我們走！”張春橋向警衛員大老李示意。

“不接見就別想走！”這時，“革聯會”一派開電梯的小鍾，猛然把插在電梯扳手旁邊的鑰匙上鎖后拔了下來，扔進了在電梯走廊裏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裏。

“噹……”鑰匙掉進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電梯内外的氣氛緊張起來。

“你們這是搞綁架還是干什么？！”張春橋氣得臉孔漲得通紅，大冷天額頭上都沁出了汗珠。

“没有什么惡意。我們就是要求首長接見，見了就讓首長回去。”湯某見事已至此，只好堅持到底。

“不見！”張春橋斬釘截鐵地回答。

這時，站在電梯裏一直没有作聲的姚文元開腔了：

“你們怎么可以這樣對待春橋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領導，應當尊重他的安排。你們這樣做是完全錯誤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寫得很多，公開露面却很少，也難得到錦江飯店來，所以飯店的大多數職工都不認識他。他幫張春橋説話以后，“革聯會”中有一個青年服務員小王，正好站在電梯門口附近，見這個胖篤篤的、穿着臃腫棉軍裝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樣地批評起“造反派”來，滿腔火氣涌上心頭，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駡：

“你算老幾？你有什么資格管我們的事？”

小王的食指幾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衛員大老李趕緊把他的手擋回去，嚴厲地説：

“你想干什么？你不認識這是姚文元同志嗎？”

“噢，那我們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兩位首長一道接見。”旁邊的人跟

着起哄。

張、姚固守在電梯裏兀自不動。另一個警衛員氣得想要拔出槍來，張春橋怕吃眼前虧，便用眼光制止了。雙方僵持不下，張、姚在電梯裏足足被關了二十八分鐘。最后，還是由警衛員大老李出面打圓場，讓錦江"革聯會"的頭頭留下姓名和聯係電話，說是回去后"請首長另行安排接見"；而"革聯會"的湯某等人，見對峙下去不可能達到目的，也怕事情鬧大了於己不利，同意作出讓步，終于從瓷器大花瓶裏取出鑰匙，開動電梯送走了張、姚……

張春橋"秋后算賬"

張、姚回到興國路招待所，怒氣衝天，耿耿于懷。因爲他們剛到上海才幾天，就嘗了這么一個"下馬威"，"中央文革"要員的威風掃地，實在難以咽下這口氣。他們趕緊把我找到興國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調查組去錦江飯店，進行調查、整頓。張春橋還專門關照：

"我看背后有長胡子的人！要特別注意。"

張春橋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擔當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進一步揪出在背后進行挑動的"走資派"。

我接受這項任務以后，指派和我在市委寫作班一起"造反"的親信朱某，帶了一個市革會調查組進駐錦江飯店，作了較長時間的調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爲首的調查組在錦江飯店召開全體職工大會，當場點了"革聯會"頭頭湯某等人的名，并根據張春橋談話的"口徑"，指出當時已參加工作的錦江飯店總支副書記趙某，就是"躲在背后的長胡子的人"，也是這次"矛頭指向中央文革首長"的"電梯事件"的"后臺"。

過了一年多，張、姚仍然不能忘懷這次電梯"受辱"事件，他們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說："真是怪事，膽大妄爲，對'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張春橋說："說得不客氣一些，性質完全是綁架。背后長胡子的人還沒有查清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張春橋已經在上海實現了全面奪權，平息

了"炮打"、站穩了脚跟，他覺得時機已到，决定重新算賬，就在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公開講了錦江飯店的"電梯事件"，并且聲稱："我看錦江飯店有壞人！"下令徹底清查。

隨着張春橋的一聲令下，錦江飯店"革聯會"這個組織全面垮臺，六個頭頭全部被關進"文攻武衛"指揮部進行審查。至于那個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駡的服務員小王，還有那個開電梯、拔鑰匙的青年小鍾，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衛"打手的一頓拳打脚踢。

最倒霉的就是"電梯事件"的策劃人湯某，他足足被關押了八年左右，還害了嚴重的肺病，差點送掉性命。他終于明白了一條道理：

"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聲聲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遲了；爲此，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洪文與我争權

上海奪權的主要角色是工人造反派，當時二百萬工人的大部分參加了工人造反派，張春橋一直强調要穩定上海，特别要穩住一百二十萬産業工人，所以"工總司"的造反在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爲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機構，我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在組織工作方面也起了特殊作用。當時"工總司"的一批人對我，對我們機關幹部造反的一些人一直很不滿意。當時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張老大"、"姚老二"下面，"工總司"王洪文的小兄弟們很生氣，就給王洪文起個外號叫"王小七"。爲什么叫他"王小七"呢？因爲當時奪權后，一些中央文件來，市裏機要局有個傳閱名單，傳閱名單的順序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是"解放"出來的市委書記，名單排在前面，王洪文排在名單的第七位，所以稱他"王小七"。"工總司"講這話的時候，有點酸溜溜，對我們機關的人有意見。

上海奪權后，市裏的機關分三部分：黨的首腦機關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原是市委書記處書記們辦公的地方，裏面的工作人員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和造反派，也給王洪文一個辦公室，但他很少來，在這裏工作的主要是馬天水、王少庸、王承龍和我。張春橋、姚文元基本上在興國路招待所辦公，開會時才到康平路來。在康平路大院，王洪文除了有個辦公室、有時帶着他的秘書廖祖康來以外，他的力量很弱；第二個機關在延安西路三十三號，從華山路三七O號這個門進去。原來市委各部委都在這個大院裏辦公。機關造反后，這裏變成市委的鬥批改大樓。奪權后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合署到外灘原市政府大樓辦公，這是第三個機關辦公地點，因當時市委的黨組織生活没有恢復，所以實際上是市革命委員會在外灘辦公。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開始就是一個大雜燴，各個造反組織都往裏面派人。當時市革命委員會"改部爲組"，這是毛澤東的主意，工業交通部叫"工交組"，組織部叫"組織組"。中宣部被"砸爛"后，各省、市

委都没有宣傳部，上海在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個政宣組，負責原宣傳部的工作，政宣組裏除了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派人外，"工總司"、"新革會"（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版司"（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藝司"（上海文藝界造反司令部）、"上醫司"（上海醫務界造反司令部）、"上體司"（上海體育界造反司令部）等各組織都派人進來，非常熱鬧。"工總司"和我們算大司令部，派進來的其他組織我們都叫它小司令部，在裏面爲自己的組織爭利益：要經費、要紙張，辦小報，印東西，有的還鬧着要摩托車、運輸汽車。我們雖然把上海的黨政權力都奪下來了，但掌權靠這些人不行，所以我同意讓他們一些頭頭做各個組的核心，比如陳阿大可以做工交組的領導核心，但是下面的很多工作應該讓熟悉情況的機關幹部來做，所以各組、辦的實際工作人員都是原來機關的，他們對原來的系統非常熟悉。

大批機關幹部在各組、辦掌握日常工作后，實權到了他們手裏，操作起來很靈敏，張、姚號令一發，它就立即開動起來，張、姚對此很滿意。我當然贊成這樣做。

但是，王洪文感到非常惱火，他說："奪權以后，怎么實權都到了機關幹部手裏去了？"他的耳朵根很軟，王秀珍對他也有這樣的看法，說他平時很喜歡人家在他耳邊嘁嘁啜啜說些什么，他一聽就會相信。他的虛榮心也很强，人家叫他"王小七"，他一看你是"徐老三"，心裏總是不開心，他最高興人家叫他"王司令"，也不願意聽人家叫潘國平"潘司令"。他認爲"工總司"是第一位的，應該是老大，現在他自己排到"小七"的位置，機關幹部又掌握了實權，心裏很不平衡，就向我發難了，時間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間。

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這裏先講一講我所接觸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亂的時候認識的，具體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接觸王洪文，感覺到他是一個復員軍人的形象，他喜歡穿軍裝，那時是冬天，棉的綠軍裝已經洗得發白了，戴了一頂翻上去的海虎絨帽子，前面佩一個毛澤

東像章。他一口東北普通話，上海話説起來不靈光，偶爾能説出一兩句，但一般都説東北普通話，還帶有很重的鼻音。他説他是吉林省長春市郊區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兩歲，童年比較苦，家裏又種地、又放猪，東北的猪要放養的，要人趕，還要放馬。他小學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時候在吉林到處流浪，他説解放前有段時間在東北看到"老毛子"（東北人稱蘇聯人爲"老毛子"），看到他們到一個餃子攤上買餃子，没東西盛，就把帽子拿下來，叫人家把餃子往帽子裏裝，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歲的王洪文在東北參軍，他老是説，我跟你們，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説"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識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爲他心裏老是感到與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參軍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軍軍部裏當通訊員，所以他當時跟原二十七軍軍長、內蒙軍區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見他就喊"小王，小王"。后來，隨二十七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先當警衛員，后來又當通訊員。這個人膽子很大，他説他當通訊員的時候，到前綫去送信，炮火連天，跑得累了，就拉兩個死人墊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會兒，然后再往前趕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是有點兒資格的，但在部隊裏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國后，部隊成立軍樂隊，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問他做什么？他説吹黑管。我現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傳記，都没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説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爲覺得他對音樂没有什么特殊愛好。他説我也不懂什么樂譜，反正在裏面瞎吹吹。那時解放軍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兒郎當地把帽子扔來扔去。在軍樂隊裏，他得到一個副排級的待遇，后來就從軍樂隊吹黑管的位置上復員。他在部隊裏入黨，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養前途，所以復員到國棉十七廠當了保全工，他告訴我，當時人家都叫他們"小加油"，因爲要在各個紡車上加油。

王洪文那時住在廠裏的集體宿舍裏，我問他禮拜天是怎么過的？他説："啊喲，無聊。過禮拜天，我經常到市裏來玩。"當時住在楊樹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裏"的。"回廠的時候買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窩夾兩瓶，右面胳肢窩夾兩瓶，手裏再拿兩瓶，拿好六瓶啤酒后，從外灘

上大路有軌電車，一面乘車，一面喝啤酒，電車'哐噹'、'哐噹'開到楊樹浦，六瓶啤酒統統喝光。"他后來的酗酒與這種習慣有關係。當時一個青工住在廠裏，星期天就那么無聊地過。王洪文在廠裏的工資一直比較低，后來調到保衛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塊錢。他用錢很厲害，没積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對象很困難。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認識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廠托兒所的保育員，是臨時工，但她的家庭條件比王洪文好，她從小被一對老工人夫婦領養，養父養母在定海路橋有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覺得崔根娣條件不錯，追求了她以后就結婚了。婚后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文革開始后，王洪文在廠裏貼了四清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成爲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與他的接觸過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別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等級觀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這些東西。剛開始穿舊棉軍裝，后來一奪權，就開始排場起來，一身一身地換新軍裝，都是向部隊裏去要來的。他還向部隊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要口袋上有蓋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長大衣，頂在肩膀上面。

他對於哪一級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車，非常注意。開始說是因爲安全問題，從定海路搬出來，換了幾個地方。但后來他就開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過三個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裏，康平路大院裏有三幢四層樓的公寓，每一層樓有兩套住房，一套是辦公室，一套作爲居住用，一套裏有兩室兩廳，過去是給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進公寓后，看見前面有一排兩層樓的花園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獨立的院子，種着果樹，很考究。這些房子過去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張春橋等住的，后來馬天水、王少庯等人也住在那裏。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裏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够，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后，盡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裏不够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裏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着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連康平路院子裏的大洋房都不願意住了，回到上海，搬進東湖路七號，即現在東湖路、淮海路口轉角的一個大院子，裏面有游泳池、網球場。住下后不久，他又讓市委招待處寫了一份報告，要把東湖電影院劃進去，歸他個人看電影享用。當時我感到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一面毛主席講要限制資産階級法權，一面他又在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産階級法權。我找了一個理由，對馬天水說東湖電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長的歷史，圈進去是不是妥當？因爲我提了意見，這事情才擱下來了。

王洪文還很喜歡玩汽車，他在上海有六輛車，還不包括保衛他的用車：一輛是三排座的大紅旗高級小轎車，車裏有恒溫設備，駕駛座和后座之間有塊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輛是西德的奔馳，他日常用的；一輛是上海牌轎車，下基層時裝裝樣子的；一輛是伏爾加、一輛是北京吉普，這兩輛車是幫他拿信件或者運東西時用的，有時打獵也用北京吉普；他還搞了一輛特制的防彈轎車，玻璃是幾英寸厚的防彈玻璃，車身是防爆鋼板，非常重，他們把車開到靶場，用機槍、步槍打，用手榴彈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這輛防彈轎車鎖在車庫裏，從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歡喝酒。當時地方上比較嚴格，即使在賓館，喝酒也要自己掏錢的，怎么辦呢，他經常到部隊去，專門找部隊的軍長、師長、副司令喝，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爲上海警備區政委，到杭州去處理有關案件，變得更加趾高氣揚，整天處在各種宴請的包圍之中，貪杯嗜飲，變本加厲。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見他一天四頓酒，連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臺，有時人喝得糊裏糊塗，舌頭大大的，說話也不清楚。等他清醒的時候，就熱衷于外出打獵。當時寫作組的王知常，作爲他的隨員跟去杭州，幫他整理專案材料，跟了兩個月，眼看王洪文的這等表演，心中有氣，私底下寫了一首打油詩：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馬且飲洗塵酒。
高賓良朋歡騰座，揮拳舞觥夜作晝。

深山獵兔驅快車，大江射雁泛輕舟。
糊塗官司君休問，上車莫忘鷄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資没有增加，上海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經馬天水批准，每個季度給王洪文送幾百塊錢，那時已經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拿了幾箱白沙酒送給他，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錢，結果他想出一個辦法，到人民大會堂去買剩下的國宴酒。當時，國宴結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臺酒并在一起，重新裝瓶后内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兩次的去買那種酒，買了許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對他就很有意見："没門。他要到我們這裏來占什么便宜，没門。"

王洪文要反奪權

我覺得，追求物質享受的人，對於權力能够給他帶來很大的物質利益是深有體會的。王洪文掌權以后，房子住好的，車子也有了，對於權力的欲望就大起來了。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間，有人在他耳邊不斷吹風，説機關幹部掌握了實權，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的權力都在機關幹部手裏，我們"工總司"没權力，連你也只是"王小七"的地位，我們的人連機關都進不了。

有一天，他在市革命委員會底層大廳裏召集了一個會議，由"工總司"出面，出席的是"上體司"、"上藝司"、"上醫司"等各小司令部的司令們。會上，王洪文説："現在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權是機關造反派一派掌權，排擠我們'工總司'和其他在上海一月奪權時做出貢獻的組織，這種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我們要進行反奪權。"會后，他背着張春橋、姚文元，單獨找了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當時是警備區進駐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的，也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之一。王洪文對李講了許多機關造反派的壞話，也談了他們反奪權的打算，企圖得到軍隊的支持。

李彬山聽了王洪文這番話，很吃驚，他一聽這事情非同小可，馬上到興國路直接找張春橋、姚文元匯報。張春橋一聽，王洪文居然拉攏軍隊來進行反奪權，而且背着他們搞，非常生氣，立刻把王洪文叫來當面訓斥，說得王洪文張口結舌，非常狼狽。王洪文說機關一派掌權，實際上把矛頭對准張春橋、姚文元，因爲我們是在爲張、姚工作，所以那天張春橋發很大的火，王洪文很緊張。張春橋不但找王洪文談，而且還找潘國平及“工總司”的其他領導人，一個一個做工作，說你們的行爲完全是錯誤的。

那次談話給王洪文很大打擊，從興國路招待所出來后，情緒低落，意志消沉，不久就稱病住進華東醫院了。

張春橋把事情制止下來后，才把我找去，張春橋認爲在此事上我没有錯，他就把處理王洪文事件的前前后后告訴我，因爲事先没有發現他們的活動，我也蠻吃驚的。張春橋還給我看了“工總司”委員徐美英寫給他的一封信，信裏例舉了王洪文在“工總司”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種種言論、行動。徐美英是“工總司”的老造反，她原來是一個縫紉社的工人，也是帶頭到安亭去的。張春橋給我看了信后，對我說：“看來，王洪文這個人毛病不少。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到，要穩定上海二百多萬工人的大局，對‘工總司’的這幾個工人領袖，既要嚴格要求，又要慎重對待，這件事情看樣子到此爲止了。我已經把他們所有的頭頭都召來談過話，現在王洪文在醫院裏生病，你還是去看看他吧。”

我當然體會到這是張春橋的一片苦心，因爲“工總司”的人對張春橋是又敬又怕，敬嘛，是對他非常感激，因爲在安亭事件中，作爲中央文革的副組長支持他們，真像是他們的恩人一樣；怕嘛，有什么事情張春橋都當面嚴肅地批評，他們最怕張春橋批評他們。所以他們是又敬重又害怕。張春橋支持他們往往是在公開的場合，批評他們往往是個別找來，尖銳地批，所以他們看到張春橋真的發火了，也很緊張。我后來感覺到，直到王洪文做黨中央副主席的時候，雖然有好多地方不大服貼，但他不敢在張春橋面前太放肆。所以我們內部一直說，王洪文職務比張春橋高，但是他內心還是聽張春橋號令的，還是服從張春橋指揮的。

我接受張春橋的旨意后，就到華東醫院去看王洪文。去以前發生了

文藝系統向我反映，王洪文在華東醫院跟青年話劇團的劉貴琴吵起來了。劉貴琴是青年話劇團的演員，是老造反，當時也住在華東醫院。王洪文住在華東醫院南樓一個最高級的高干病房裏，一個人住了一大間，外面放了很多警衛。當時正在批判城市老爺衛生部，劉貴琴住在北樓的普通病房裏，她認爲自己是老造反，要反對資產階級貴族老爺，一聽王洪文住在南樓的高級病房，她就去造反了。劉貴琴在青年話劇團也是非常出名的風雲人物，天不怕，地不怕，把市裏的老干部鬥得落花流水，她和王洪文，兩個老造反，大家彼此彼此。那些警衛不准她進去，她就直衝到王洪文的房間裏，指着王洪文的鼻子，痛罵他變質、變修了，氣得王洪文叫警衛人員把她架着趕出去。

這事情傳到我這裏，我想本來張春橋就叫我去看他，我也應該了解一下他現在的境況怎么樣了。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騎了一輛鳳凰牌自行車。我想，你老是進出坐汽車，我就偏不坐汽車。由于劉貴琴這一鬧，王洪文在華東醫院布了很多崗哨，南樓從大門口、大廳、電梯口、樓梯口，一直到他樓上病房，都有他的衛隊。華東醫院原是高幹醫院，市機關正處級以上、基層局以上幹部及民主黨派負責人、高級知識分子等才能去那裏看病。照理，這種特殊病房在文革當中要改變，但他住了進去，變得更加特殊。我騎自行車一到大門口，在門口守衛的是"工總司"尖刀班的警衛員蔡大炮。這個人我認識，是王洪文尖刀班的心腹，上海錄音器材廠工人，此人長得高頭大馬、五大三粗，圓鼓鼓的一個人頭，人家說他的腦袋像山東的德州大西瓜那么大。蔡大炮對我還是蠻客氣的，他一看我推着自行車進門，很驚奇地說"景賢同志，你……"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把自行車撐腳一撑，上了鎖，對他說："老王在不在？"

他恭敬地說："在在，在。在病房裏面。"他對尖刀班的一個青年工人說："等着干什么？快去通報！"那人就飛奔而去通報王洪文。

我找到三樓的病房，王洪文并沒有什么大病，他躺在床上，大概剛剛通報過，衣服穿好了，披了一件病房裏的褂子，抽着烟。

我和他握握手，問他："身體怎么樣？"

他說："有點感冒發燒。今天剛剛退燒。"但他與我講話時候的神

情、態度顯得有點不自然。

我說："我來看看你。"他顯得有點冷淡。他肯定知道我從張春橋那裏曉得一點什么信息了。但是我裝作什么也不知道。我說："最近市革會正抓幾件工作，其中一項是有關小學教育的，你生病這一段時間，没能來參加討論。"前一時期由于大學、中學停課鬧革命，弄得小學也停課鬧革命，小學高年級學生還在學校裏鬥校長和教師，低年級學生都"放羊"，散到社會上去。我說："這事情家長們意見比較大。是不是現在小學復課，先讓小學上起課來。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在社會上'放羊'了，没人管，這些小孩子散在社會上也造成不安定因素。學校裏除五類分子和走資派外，其他的教師還是讓他們上課。爲什么要這樣搞?因爲現在小學裏的教職員工分裂成兩大派，一派是'小教司'，單獨的小學教師革命造反司令部；另一派叫'工司教'，與'工總司'挂鈎的教育界造反派。'小教司'和'工司教'這兩派現在打内戰，鬧得不可開交。教師内部打内戰，復課就復不起來了。所以我來找你，一方面看看你的病，另一方面也請你出馬，怎么把這兩派聯合起來使學校復課。"因爲"工司教"是聽他的，我又說："是不是過幾天，等你身體好一點后，開一次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的擴大會議，把小學教育系統的兩派都請來，會議由你主持，主要是促進兩派的聯合，然后發一個市革命委員會的公告，先讓小學復課鬧革命。你看怎么樣？"

張春橋對王洪文采用恩威并施的做法，先整他，批評他，然后叫我去看望他，無非是安撫他一下。我對他的態度很恭敬、尊重，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氣請他出山。他看我以這種態度邀請他出來主持市革命委員會會議，因爲以前一直是我主持會議的，現在請他主持，而且是全委擴大會議，他就趕快從床上坐起，說：

"我没事，我没事，一點小毛病，算不了什么的。老徐，什么時候開會由你定吧。通知我。"

過了幾天，這個會議就在"上體司"的體育俱樂部樓上的大廳召開，把小學教育界的兩派頭頭都請來，由他主持會議，會后我們草擬了一個通告，把這個問題解决了。以后他又重新出來工作了。王洪文第一次與我争權，被張春橋平息下去了。

大搞"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

王洪文第二次與我争權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工總司"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成立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成立半年。王洪文和"工總司"頭頭提出要開一個"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的慶祝大會，非常隆重，准備在人民廣場開。當時的口號是"重振工人造反派的軍威"。這事我總覺得和前面的反奪權好像有點聯系，因爲他講的是保守勢力又抬頭了，要重振工人造反派的軍威，有必要搞這么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嗎？但你又不好制止他，張春橋和姚文元那時正好不在上海，他們到南京軍區處理事情去了。

那天，王洪文請我去參加會議，那場面比一月奪權時還大，一些在一月奪權的時候還没有加入造反隊的工人組織，也紛紛亮出旗子。各種各樣的旗子、標語把人民廣場四面的道路擠得滿滿的。王洪文上臺的時候非常神氣，旁邊有警衛隊伍夾道保護，一路上，旁邊的警衛不停地叫："你看，你看，王司令，王司令。"會議没有實質性內容，就是發言紀念"工總司"成立半周年。

"工總司"搞半周年紀念活動，一些小組織也跟着，由于造反的時間都差不多，大都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份，于是大家紛紛搞半周年活動，有的造反早的還特地補辦。我對此堅决抵制，我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説，我們是在十二月份造反的，到六月份不搞半周年活動。我説："都等不及了，難道一周年都等不及啦，搞半周年干什么？"

我給張春橋打了一個電話，説："現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工總司'先開的頭，現在别的組織也在搞。"

張春橋在電話裏頭説"啊？他們這是什么意思嘛？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嗎？這事情本身就是山頭主義。"我聽張春橋的口氣也是不讚成的。

有一次，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我在講上海形勢的時候，説："最近上海的革命組織紛紛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爲什么半周年就要紀念呢？我們奪權，奪了以后還要長期地把權掌下去的嘛，半周年要紀念，難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們不讚成，這樣搞法造成極大的鋪張浪費，不符合節約鬧革命的精神。"我把這事情批了一通，當然連"工

總司"也一起批進去了。批了以后，《文匯報》發了一個短評，提出不應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支部生活》還整理發表了我的講話。

這一來，王洪文和"工總司"的一些人發火了，他們說："徐景賢對我們'工總司'搞半周年的活動公開批評，這是助長赤衛隊保守勢力、打擊、壓制革命造反派。"他們要和我大辯論；王洪文也不來上班了。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到康平路市委辦公室來找我，他不清楚我在哪個辦公室裏辦公，就一間間地敲打辦公室的門："徐老三，出來，和我辯論！"

接着，王洪文以及一幫小兄弟們都拒絕參加市革命委員會的活動，開會，請他們也不來，好像罷工一樣，這樣有好幾天。

我有點犯愁，因爲張春橋、姚文元不在上海，這批人拒絕到市革命委員會來一起商量問題，工作就沒辦法開展下去。馬天水非常着急，他怕我們造反派內部發生矛盾，他很難處。最后，我給張春橋打電話請示："怎么辦？他們拒絕來參加活動。"

張春橋說："那有什么辦法呢？只好你們自己出馬，到他的上棉十七廠去，請他出山。"

這樣，我只好"吃進"，請王洪文到市裏來，他不來。我就約馬天水一起去請，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夾進我們兩股力量的矛盾當中，我說："你一定要去，你是老幹部，講起來是'老中青'三結合，你和我一起去。"最后打電話通知上棉十七廠，說我們决定在那天晚上去看望王洪文。他們來個反饋，說王洪文身體不好。我們說王洪文身體不好，正好去看看他。我也曉得他這招已經用過好幾次了，前面一次反奪權，也是稱身體不好，住在華東醫院，后來是我去找他的。這次又說身體不好。那天晚上我就和馬天水到上棉十七廠去了。

在上棉十七廠會議室裏，王洪文接待了我們。我們不講"工總司"半周年活動的事，我說"我和馬老兩個人來看看你，聽說你身體不大好。"

他說："没什么。"態度非常冷淡。

我說"假如身體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陣子。最近市裏工作比較多，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們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他透露說“王秀珍到南京去了。”這時我才曉得王秀珍到南京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告狀去了。實際是告我的狀，說我在上海大會上的公開講話，殺了“工總司”的威風，助長了保守派的志氣。既然王洪文提到了這個問題，我還是談了自己的觀點：“工總司”召開半周年的紀念大會，很多小組織都跟着學樣，而且規模都很大，造成很大的浪費。我說：“我們的意見，各種組織如要搞紀念活動，至少要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會上的公開表態，會造成一些影響。”

他一聽，馬上說：“是啊，你這樣一來，原來加入赤衛隊的那些人會怎么想呢？”

我說：“我也沒指名批評‘工總司’，我只是指一些現象，”但我再三說：“我在大會上這樣說，也許會造成一些影響。”我雖然沒有道歉，但話裏的意思是我在大會上這種講法是否妥當是可以考慮的。馬天水一看我們要接觸到實質問題，馬上就說“我要到工廠裏去了，我有急事。”他就走了。

馬天水走了后，剩下我和王洪文兩個人。我就索性與他談最近一個時期的工作，談到造反派整風，談到掌權后要更加謙虛、謹慎。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車，一到馬路上，人家就對我說：“你不要‘修’掉了。”因爲當時認爲，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車，就要“修掉”了。所以我就每天騎自行車上班，結果在路上，也總要給人家攔下來好幾次，有的我不認識的人看見我，叫一聲：“哎，徐景賢同志。”我總要下來一下，他就跟我講他單位裏什么事情啦，他個人有什么要求啦。有時候，從常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辦公室，這么短的路程，就要耽誤很久。當時安全問題倒是不考慮的，自從“紅革會”綁架我以后，市委保衛科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總覺得沒有人會來謀害我的。當時只是表示自己同資產階級法權决裂，與等級觀念决裂，不坐汽車，跟平民老百姓一樣。我對王洪文說：“我現在很大的困難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耽擱很長的時間，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顧慮，想和你交換看法。”

他說：“這個問題，你不應該有這種想法，爲了有利于工作，還是應該坐車的。”

后來，我接受他的意見，開始坐吉普車。爲了表示修正主義色彩不

是很濃的，車子到瑞華公寓來接我，不停在公寓大院裏面，而是悄悄地停在后面的延慶路上，我住在五樓，從后陽臺上一看，車子來了，就下來乘車上班。省得車子在瑞華公寓裏面開進開出，讓市委原來的幹部看見，覺得你原來騎自行車上班，現在又坐車了，思想上發生變化了。

我也給王洪文提了點意見："你今后不要老是在'工總司'或者上棉十七廠，我們找你很困難，以后你基本上到康平路來，大家隨時可以商量問題。"他的這種特點，說起來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要他一整天坐在辦公室裏看文件，簡直是非常困難，他一直要往外跑。那時候外面的矛盾比較多，加上"工總司"當時有兩派，各個區有區分部，又有聯絡站，區分部一派屬于王洪文，聯絡站一派屬于潘國平，他們兩個頭抓了兩條綫，結果矛盾非常大，他們一天到晚去"救火"，也沒有時間坐下來討論一些別的問題。所以我請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於共同討論問題，他也表示答應。

這天我主動上門與他談心，又表示了我的說法有不够妥當的意思，他的態度也緩和下來。我發現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但經不起別人挑。人家在他面前一挑，他就火起來了，比如過去有人在他耳朵邊講，人家是"徐老三"，你是"王小七"，奪權后你的位置排在什么地方？或是現在機關幹部掌權，你没權了，他一聽，就馬上來火了。這一次也是這樣，我講了話以后，人家給他一傳，說我打擊"工總司"，支持保守勢力，他又要脾氣了。你給他分析道理，對他表示尊重，他就馬上回過來了。這可能也是當時工農出身的人的特點。他喝醉酒時講過，你是知識分子，我是工人。我發現他們這批人都有這種思想，他們認爲你們看不起我們，所以對他們稍微有點不尊重，反感情緒馬上就來了，於是產生矛盾。我和他們的矛盾是因爲不同的階層，我們是知識分子，是秀才，搞筆桿子的比較多；他們屬於工人，在外面跑動，解決問題比較多。所以當時把我們看成"文武"兩幫，雖然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他們少不了我們，我們也少不了他們。

張春橋回來的時候，把我找到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我就拿《支部生活》整理的我的講話記録以及他們這次是怎么鬧的，最后我與馬天水兩人怎么到他那兒做工作的經過，給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也是不贊

les王洪文這種做法的，但是他說："我們有時候討論問題，內部議論的東西，與在外面大會上公開講的，有的是很不一樣的。這點你要注意。"他最后說："不過，王秀珍他們到南京來找我，要給我告狀，我不是沒有見他們嗎？"他也不講我支持你的觀點，就講了這么一句。

總的來說，張春橋在這件事上，還是站在我這邊的，不過對我的做法不認同。我領會他的意思：我跟他不一樣，他對"工總司"是有恩之人，"工總司"的人對他五體投地。我跟"工總司"的人屬於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對自己有點估計不足，認爲他可以批評的，我也可以批評。張春橋一直希望我要注意處理這方面的關系。經過這段曲折，我就注意這個問題了，從此我與王洪文在上海的關係處得非常謹慎。

江青擇婿記

人們只知道林彪、葉群爲兒子"選妃"的故事，却不知道江青也曾爲自己的女兒擇婿的内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參與這后一件事，特把經過情形記叙如下：

毛澤東有言在先

李訥——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一九四〇年八月生于延安。隨着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幻，李訥的個人生活也是命運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變。

李訥的相貌，寬額方臉，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長得很清秀。毛澤東轉戰陝北的時候，化名李德勝，江青過去的姓名，叫李雲鶴，所以李訥也姓李，取名則采自孔子《論語》中《里仁》篇的一句話："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李訥性格，沉穩而内向，從小只愛讀書，話語不多，倒是應驗了她的名字的内涵。

解放戰爭時期，李訥只能在馬背上讀書識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機關在進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機會進入一所簡易小學。到了北京以后，李訥插班到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弟學校——育英學校讀書。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訥對中國的歷史和古典文學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聰明好學，成績優秀，但生活儉樸，毫不驕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人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一九六五年夏，李訥從北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當一名普通編輯。但時過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飈席捲大地，李訥也卷人了這個政治旋渦：她在軍報帶頭"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諧音），貼出大字報批判當時的軍報總編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不久，軍報全面改組，才二十七歲的"肖力"當上了軍報總編輯。以后，毛澤東又把她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運動情況。

未婚姑娘年輕有爲，名氣很大，正處在事業的巔峰，又屬于中國的

一個特殊家庭，當然爲衆人所矚目。李訥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別關注。江青想爲李訥物色一位理想的對象，可是因爲毛澤東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幹子弟做對象，所以江青也難以找一家"高門大户"，來一個"門當户對"。但是，找的對象總得講政治條件，總得看人品、相貌、才干、氣質和文化素養呀！當然，首先得要李訥自己滿意，同時要得到江青的認可。江青反覆物色以后，終于把目光投向了張永生。

張永生紅極一時

張永生何許人也？浙江美術學院的學生，生于一九四〇年，原籍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術學院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在奪權的過程中，又成爲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組織"省聯總"的負責人；奪權以后，當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歲年紀，出身很好，正所謂"根正苗紅"。本人是共產黨員，長得一表人材，長方形的臉龐上架着一副淺色的玳瑁眼鏡，白皙的臉孔，操着一口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頗有辯才，而且藝術修養也不錯，畫得一手好畫。總之，初次接觸下來，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幕衝衝殺殺、"造反"起家的粗魯漢子不同。

張永生他們在文革初期有一個階段的處境非常困難："省聯總"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負責人、向省委奪權的過程中，遭到了省軍區等的压制和反對，幾乎寸步難行。但是，原浙江省省長周建人老先生却偏偏支持"省聯總"的觀點，這位老科學家、魯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氣。他親自趕往北京，站在國務院大門外，説是"八十老翁無所求"，只要求面見周恩來總理，爲"省聯總"鳴不平。后來，"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兩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張永生代表"省聯總"出席會議，當着江青的面侃侃而談，陳述自己的觀點。這個青年給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態支持了張永生一派的奪權，駐浙江的野戰軍部隊和空軍部隊也都站到了"省聯總"一邊。張永生終于掌了權，成了浙江省叱咤風雲、紅極一時的人物。這個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藝術院校出身的紅衛兵領袖，和李訥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當於副省長，和李訥的軍報總編輯的地位相當。這樣，張永生就自然地進

入了江青擇婿的視野。

釣魚臺受寵若驚

一九六八年，趁張永生上北京匯報情況的機會，江青提出要在釣魚臺住所單獨接見他。這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極高規格的禮遇和殊榮，張永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運。他被接到釣魚臺江青的客廳裏邊，但是沒有馬上見到江青。原來，經過江青的精心安排，在接見之前，先讓肖力（李訥）出來很自然地和張永生見了面，兩人作了初次交談。肖力當過《解放軍報》的負責人，張永生仰慕已久；而張永生在文革風浪中翻滚兩年，能説會道，見了人"自然熟"。兩個人一見面，談得比較投機，據張永生后來對我説："見了肖力同志，覺得很談得來。我們談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 我説我是一九四〇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説她也是四〇年出生的，原來是同年。肖力同志還説，我們是同齡人，所以對事物也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和看法。"

兩個年輕人會面以后，江青再出來單獨接見張永生，垂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張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起在北京見到江青和李訥的事，感到受寵若驚。過了幾個月，在上海的張春橋接到江青親自打來的一個電話，要他把張永生召到上海當面詳談一次，把張永生的近况了解清楚，直接向她匯報。這説明江青在擇婿方面有了新的考慮，她需要進一步從多方面來深入考察和了解張永生。但是，江青又囑照張春橋，要他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出面談話，從關心浙江形勢的話題談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别垂青張永生的任何痕迹。

張春橋曲折考查

張春橋受此重托，不敢有絲毫的疏忽，急着要辦。但是他又考慮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張永生來上海，恐怕風聲很快就會傳出去，容易引起駐浙部隊負責人的誤解，也會造成另一派的波動。於是，他想

由我出面去請張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經支持過浙江的“省聯總”奪權，張永生對我比較信任。因此，張春橋要我出面把張永生請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方的猜疑。接到任務，我直接給張永生打了電話，第二天中午，張永生乘了一輛小轎車從杭州趕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貴賓室，由我先和張永生見面。我和張永生交談了一小時左右，詢問了他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當然也“順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訥接觸以后的反應。談到最后，我單獨出來把情況向張春橋作了匯報。

下午二時，在康平路小禮堂樓上的203會議室，張春橋接見了張永生。張永生意外地見到了這位“中央文革”的副組長，非常興奮，十分恭敬，一口一聲“中央首長”、“感謝關心”。張春橋對他也特別地顯得和顏悅色，只是絕口不提把張永生請來的真實意圖，只是聲稱中央很關心浙江的形勢，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況。

提到浙江的形勢，張永生的話就像打開了閘門的水一樣，滔滔不絕。原來，由於他處處“唯我獨革”，“唯我獨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關係都很緊張，他還反復埋怨解放軍部隊“支左”不力。聽着張永生絮絮叨叨地訴苦，無窮無盡地指責別人，張春橋微微蹙起了眉頭，不時在紙上用鉛筆記上幾個字。張春橋清楚地意識到：張永生恐怕連浙江的造反領袖都當不下去，還想當江青的女婿嗎？

談話東拉西扯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下午四點多鐘，張春橋結束了這次接見，絕口不提李訥或肖力。

告別的時候，張春橋并沒有留張永生在上海住幾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張永生走了以后，張春橋連夜整理了和張永生的談話材料，密報江青。

此後一段時期，浙江的形勢一直不很穩定，張永生的錯誤也暴露得越來越嚴重。當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時候，他已被排除在領導班子之外。從此張永生的飛黄騰達的政治生涯結束了，江青也不再把擇婿的目光投向張永生。張永生和李訥的那段沒有發芽的“情緣”（恐怕連當事人也蒙在鼓裏），也終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張永生被捕，判處無期徒刑。這是后話了。

井岡山墜人愛河

但是，李訥的婚姻大事仍然没有解决。一九七〇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江西省進賢縣辦起了“五七”幹校，一向對兒女要求十分嚴格的毛澤東，希望李訥到勞動中去鍛煉自己。這樣，年過三十的李訥，隨着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女大當婚，毛澤東的意向很明確，他曾經對李訥當面講過：“要在下面選擇，找個一般人。”毛澤東既不要高幹子弟，也不要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作自己的女婿。

李訥在井岡山下的幹校裏勞動的時候，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由於她的沉靜、内向的性格，使她很少同外界交往，没有可以作傾心交談的朋友，因此日子過得很寂寞，很孤獨。這時，有一個比她小幾歲的男青年小徐，闖入了她的生活。小徐是東北人，工農家庭出身，父親是山海關火車站的扳道工，本人是中央辦公廳北戴河管理處所屬的内部招待所的服務員，政治上是絶對可靠的。小徐雖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長得眉清目秀，性格開朗，待人熱情。他看李訥郁郁寡歡，就和她一起幹點農活，休息的時候，一道打球、散步、聊天。李訥按照爸爸的囑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個自己合意的人。現在遇到了小徐，兩人朝夕相處，給李訥的苦悶寂寞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歡樂。時間長了，雙方産生感情，一同墜入了愛河，并且發展到雙方互論婚娶。

毛澤東批示“同意”

李訥和小徐的婚戀轟動了幹校，人們都難以置信中國共産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女兒會愛上一個服務員。事情傳到江青那裏，江青表示堅決反對，但李訥也固執己見，雙方相持不下。一九七〇年八月，江青到江西上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還把李訥特地叫到山上來，商量這件事情。江青事后對王洪文和我説：“這幾天我的頭痛病又犯了，頭痛得像要裂開一樣。我把李訥叫到山上來，她和我鬧别扭，我們兩個都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果吵了一架，搞得兩個人都很煩惱。”在婚事問題上，李訥絲毫不肯向母親讓步。

女兒見江青那裏通不過，索性直接找毛澤東，她向爸爸寫了一份書面報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結婚。豁達大度的毛澤東，向來没有門第之見，他尊重女兒的自由選擇，提起筆來在報告上批道："同意，轉江青閱。"

毛澤東簽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無法再推翻，於是，在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裏，李訥和小徐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婚禮，一個新的家庭誕生了。毛澤東送給他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爲結婚禮物。這對青年沉浸在新婚的幸福裏，繼續在幹校共同生活。一年以后，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取名爲徐小寧，這便是毛澤東和江青的親外孫。

新矛盾導致離异

可是，小寧帶來的并不是家庭的安寧。當李訥和丈夫小徐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彼此的隔膜和矛盾逐漸加深，家庭開始出現不和。因爲兩個人的經歷、興趣、性格、思想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李訥受毛澤東的影響和熏陶，酷愛文史，在北大歷史系受的是系統的高等教育，從小愛看書，拿到一本中外名著往往手不釋卷，但她對於做賢妻良母、操持家務則絶對外行，而小徐僅僅讀過中學，那個年代在工作崗位上也没有學到多少文化知識，他生性好動，興趣愛好和李訥迥然不同。這樣，時間一長，夫妻之間的共同語言就越來越少，矛盾不斷發生，雙方感情上的裂痕越見加深，雖然經過努力也難以彌補和挽回。最后，雙方分居了一段時間，小徐被推薦到河北省某大專院校讀書，他們就正式辦了離婚手續。孩子歸李訥撫養，易姓李，叫李小寧。

李訥懷着沉重的精神創傷，帶着孩子回到北京。一九七三年，經過組織上的安排，李訥擔任了中共平谷縣委書記和北京市委書記。一九七三年八月，李訥在北京參加了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她和全體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衆的政治集會上見到了毛澤東。此后，毛澤東因病再也不參加任何群衆性的集會了。李訥自己也因爲婚姻失敗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身體一直不好，無法到任堅持工作。然而，她也因禍得福，她没有參與"四人幫"覆没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動；所以，在

"四人幫"被粉碎以后，她的處境與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大不一樣。

但是，毛澤東的去世，江青的被抓，使李訥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由于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與過解放軍報社的造反和奪權，這段歷史也受到了審查，讓她說說清楚。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條小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裏，和兒子住在一起，過起了拉板車拖白菜、運煤塊的老百姓生活；兒子在課余幫她洗衣、燒飯，頗解人意。她的身體仍然不好，幾年中也沒有安排工作。但是，長期在革命戰爭中成長的經歷，以及在毛澤東身邊受到的艱苦樸素作風的熏陶，使她能够安於這種清貧淡泊的生活。

一九八四年，有一個人闖進了李訥的生活，那就是王景清。他原來在中央警衛團工作過，衛護過少年時代的李訥；后來他調到雲南省軍區怒江軍分區工作，任參謀長。王景清爲人厚道，有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又會動手做家務。他也有過一次不如意的婚姻，當時已離异。王景清對李訥的處境深表同情。經過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和他的妻子、李訥小時候的保育員韓桂馨的介紹，李訥和王景清進行了交往，從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他們終于結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家庭。

王景清對李訥體貼入微，他很愛李訥的孩子。小寧又改名爲王效芝。當李訥和王景清一道去看望江青的時候，江青對這一次女兒的婚事表示很滿意。王景清擅長書法，江青也愛好寫毛筆字，她和女婿談得很投機。李訥的婚姻經過一波三折，終于有了一個幸福的歸宿。

婚后，他們全家在北京過着平静而安寧的生活。李訥給兒子改名爲效芝，是要讓兒子效法、仿效外公毛潤之（潤芝）。時光飛逝，不知不覺王效芝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務職業高中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飯店工作。他曾對人說：我和我外公、外婆和媽媽走的不是一條路，我不會"從政"，我要當領班，當經理，做一個企業家！

游雪濤小組解密

游雪濤小組，很多文章稱它“244小組”，用它后來的所在地永福路244號命名。有人又叫它“掃雷縱隊”。我覺得這些都不全面。因爲“掃雷縱隊”只是其一段，后來才演變成“244”的。張春橋、姚文元、我，包括王洪文、張春橋的妻子文静，稱呼起來，我們都直接叫“游雪濤小組”，在我們內部從來沒有叫過“244小組”或別的名稱。

講到游雪濤小組，先要介紹游雪濤這個人。游雪濤，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青年報》文藝組副組長，江蘇無錫人，他家庭很貧苦，母親二十幾歲就成了寡婦，靠給人家幹活，后來又到廠裏去做工，養活他們幾個兄弟姐妹。游雪濤生于一九三五年，十六歲時進上海絨布廠當工人，解放后，在廠裏學文化，也喜歡看書，寫點文章，特別喜歡寫詩，給報紙投稿，后來他被調到報社做編輯、記者，一九五六年入黨。入黨后在團市委《青年報》社工作，一直比較順利。文革以前他就不斷地跑文藝界，跟我有過多次接觸。他有時也約我給《青年報》寫文章，我寫的《黨的兒子穆漢祥》一書，某些章節單獨地在《青年報》上整版地發表過；我訪問越南回來，游雪濤也向我約稿。當時，我是作者，他是編輯，時有交往。

比較密切的接觸是在一九六五年，我到北京去參加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青年報》也派他參加會議。那次去的時候，我要市委宣傳部買火車票，結果三天之內的火車票全部售光，游雪濤得知后說他有辦法，他與鐵路局聯系以后，立刻從那裏拿來兩張硬席卧鋪票，我們兩人就同上北京參加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這樣，我就跟他比較熟悉。

在市委寫作班期間，他也經常到寫作班來了解情况。等到我起來造反后，他在《青年報》和團市委系統也造反了。他在文藝界熟悉的人很多，他的妻子吳錫敏，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生，畢業后分配在青年話劇團工作，演戲很有才能，和祝希娟他們很熟，同班的。與青年話劇團殺出來的造反派頭頭劉貴琴也很熟。游雪濤與文藝界造反派來往很

多，這些人是他家的座上客。游雪濤知道我造反與張春橋、姚文元這條綫有關，他對我更加靠攏和接近，譬如，我宣布造反后，游雪濤到武康路二號來找我，說要給中央文革送材料，很緊急，買了飛機票，但圖市委没批准報銷，要我給他在市委機關聯絡站報銷，當時我看他給中央文革送材料，就支持他。所以他從造反一開始就與我有了聯係。

"掃雷縱隊"的建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游雪濤忽然來找我，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已經來上海了，他們是一月四日來的，他說："我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材料要送張春橋、姚文元。"他拿出兩份已經打印好的《掃雷簡報》。我一看，《簡報》裏面專門反映上海一些走資派怎么樣隨便給人簽字發錢，當時正在刮經濟主義風，除了兩期簡報外，還附了些照片和其他證據，如簽字條之類，要我送給張春橋、姚文元。他清楚地知道，武康路二號是張春橋、姚文元對外聯絡的一個點，而且張春橋、姚文元住在興國路招待所每天都要派警衛員到我這裏來拿各種各樣的動態和情況，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每天也編情況動態給張春橋、姚文元看。所以我看到他送來的《掃雷簡報》，就問："這是屬于什么性質的東西？"我看署名是"掃雷縱隊"。又問："這是一個什么組織？誰搞的？"因爲我曉得當時游雪濤只不過跟北京幾個紅衛兵有來往，另外跟文藝界的人有串聯，但他自己没有組織。

他說："是我們幾個人搞起來的。"

我說："地點呢？"

"地點就在我家裏。"

我說："爲什么要起這個名稱呢？"

他說"我們的宗旨是要掃除無産階級司令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雷。"

那天，我覺得材料本身還有價值的，就把東西留下了。當時他是見不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要通過我這裏，把材料轉到他們那裏。

過了幾天，他又送來一些材料。裏面是有關對中央文革領導人進行

包打的動向，當時，上海的炮打還没有開始，可他的材料裏已經有北京紅衛兵在上海咒駡張春橋的情況了，所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期，反映北京幾個知名紅衛兵在上海音樂學院宿舍裏咒駡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情況我們都不知道，但這材料來源是什么，究竟是不是可靠，我就問游雪濤："這些材料的來源是什么？"

他説"我們掃雷縱隊有一個人，跟北京紅衛兵住在同一個宿舍裏，這些話都是他當場聽到的。"

我一聽，覺得比較可靠。實際上，他在那時就開始派人到别人身邊去摸情况，打聽、刺探各種各樣的動態了。我答應他可以轉送，我説："這次材料比較尖端，以后你要密封好了，親自送來。你一式兩份，假如我不在，你就送給留守的兩個人，一個叫王鋼，是從上海社會科學院調來的寫作班機要秘書，另外一個叫陳冀德。"當場我還把王鋼叫來，説以后游雪濤送材料來，你收一收，但是要封好的。

當時游雪濤説："好，我送一式三份來，有一份是給你的。"他表示也要給我看。

這樣，"掃雷縱隊"和張春橋、姚文元之間這條熱綫通過我這一關接上去了。過了一段時間，我被復旦大學"紅革會"抓去，那天，中央文革特急電報來了，他們把我看守的人撤掉后，我自由了，但是我回不來，還是游雪濤從"掃雷縱隊"調了一輛汽車，到復旦校園裏到處找，最后找到我，把我從復旦接回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他對我説："我們'掃雷縱隊'的人開始多起來了，而你們市委機關聯絡站已經搬到市委黨校去了，能不能把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對外接待處，在湖南路口那幢資本家的房子，讓給我？"我就和聯絡站當家的一個女同志程綺華商量，把那地方讓給了他們。

於是他把整個"掃雷縱隊"搬到湖南路口的洋房裏，有了一個正式的地點。他們當時一共有多少人，不清楚，我只知道文藝界的特别多，歌劇院、戲曲學校、戲劇學院、音樂學院、青年話劇團的都有，甚至還有醫院裏的醫生，因爲有一次我身上發風疹，發得很厲害，他説："我帶你去看病。"結果到了公費醫院，他給我介紹説，這是"掃雷縱隊"的成員。可見他的"掃雷縱隊"裏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他們還有幾輛汽車，

有駕駛員專門給他開車。他們采取搞情報的方法，《掃雷簡報》送上去以后，很快就引起張春橋、姚文元的注意。

有一次，我到興國路去，姚文元當着張春橋的面問我："我們看到了《掃雷簡報》，游雪濤這個人究竟怎么樣？"

我回答："這人過去是《青年報》記者，當過文藝組副組長，造反以后，他對無産階級司令部還是緊跟的。"

姚文元説："他的材料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很奇怪，人家説的秘密話、私房話，他都有。"

我説："我只知道，有些材料是他派人僞裝身份后，采取打進去的辦法弄來的。"

姚文元當時的口氣中有點不大讚成："這么做，恐怕值得考慮一下。"

張春橋在旁邊一直不出聲，聽到姚文元好像有點不大贊成，張春橋就説："掃雷這個組織我知道，他們寫的材料我都看了，還是提供了不少有參考價值的東西，比如北京的那幾個學生，在上海音樂學院，那么咬牙切齒地罵我們，我是看了《掃雷簡報》后才知道。當然，那些材料裏肯定是有水分的，不可全信。"

我知道張春橋對"掃雷縱隊"的看法顯然與姚文元不一樣。實際上他還是很歡迎游雪濤弄材料來的。張春橋要我告訴游雪濤小心謹慎。后來我又聽王少庸講過，張春橋也要王少庸叮囑游雪濤，要他小心慎重。張春橋對我和王少庸都講過："他們去搞人家的特務活動，人家也會搞他們的特務活動。"實際上張春橋知道游雪濤是用特務手段進行活動的。

回來后，我就把張春橋的意思給游雪濤傳達，但是姚文元對他的疑慮我没有跟他講。那天給游雪濤講的時候，他受寵若驚，他感到張春橋對他很肯定的，后來他就放手大干。

我所知道的游雪濤小組干了這樣幾件事情：

上海鍋爐廠工人叫何是、化名的，他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當時各單位在外面有大字報專欄，何是就把他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抄成大字報，登在西藏中路的一個專欄上，專欄還有一個名字，取名"東方論壇"。他還組織了一個"東方學會"，邀請一些與他意見一致的

討論文化大革命的有關理論問題，當然有褒有貶。"東方論壇"出了幾期，"掃雷縱隊"就把他注意上了，游雪濤把何是的文章摘下來加按語登在《掃雷簡報》上。接着，他告訴我，他派同情何是觀點的人進"東方學會"，摸到了這個組織的內部情況，馬上寫出關於"東方學會"的情况送給張春橋。張春橋批道："看來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需組織力量，發動群衆，揭開蓋子。"張春橋批示后，王洪文和王承龍就趕到在閔行的上海鍋爐廠，在禮堂裏召開大型座談會，連續幾天發動群衆揭蓋子，動員所謂知情人起來揭發，批鬥何是等人，最后抓了三人，隔離九人，辦學習班二十七人，這些人還全部被抄家。這樣，所謂一顆重大的暗雷就掃掉了。

還有一件就是所謂保衛江青的戰鬥，這與我有關係的。上海徐家匯有一個藏書樓，裏面保存着很多三十年代電影、戲劇的雜誌，當時北京電影學院有一批紅衛兵到上海來查資料，查到裏面有很多江青在三十年代拍電影、演話劇的動態、新聞和文章，以及有關她的桃色新聞。游雪濤就派他"掃雷縱隊"的一個成員，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一個姓朱的演員，跟電影學院的紅衛兵混在一起，掌握了他們的動向，知道他們收集了一些有關江青的材料，當時所謂收集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參加一個會議，辦公室的人走進來說，外面有緊急事情要請我出去。我走到小禮堂門口處玻璃大門旁邊一看，游雪濤正在那裏很着急的等我。游雪濤當時的特點：人是知識分子的模樣，臉色比較黑，戴一副茶色眼鏡，人家看見他的眼神，總令人覺得此人身上有點神秘兮兮的樣子。他看到我出來，趕快從口袋裏拿出一份書面材料給我，很神秘地對我講："你趕快看一看。"

小禮堂外面走廊裏有個小辦公桌，我打開台燈，材料上面寫着"絕密"字樣。材料說，北京電影學院有五個學生，帶頭的叫孔都，他們到上海后，專門到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去查閱、摘抄、復制，還用照相機來翻拍三十年代的電影資料，他們以編寫電影戰綫上兩條路綫鬥爭歷史爲名，從電影界、文藝界的"黑幫"的嘴裏掏取誣蔑江青的黑材料，還說他們要從書報、文章、劇本、照片當中來抄摘國民黨反動派、

特務攻擊誣蔑江青的材料，説他們在那裏已經活動了兩個月之久。游雪濤在報告的最后還寫上，爲了迅速查明案情，截獲他們摘抄、翻拍的黑材料，追出他們在上海的同案犯和黑后臺，要對這五個人進行隔離審查。我一看，事關重大，問他："這事情靠得住嗎？"

游雪濤説："絶對靠得住。"那天很熱，他不斷出汗，急得要命。我説："你這樣做有什么根據？"我想，這份報告要通過我送給張春橋的，假如不確實的話，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他交底了："我派海燕電影制片廠的朱某打進去的。"我在文革初期和海燕電影制片廠打過交道，還參與處理過電影學院紅衛兵在漕溪北路打死人的事件，我也接觸過這個姓朱的，長得漂漂亮亮的一個小伙子，但我不知道他是游雪濤"掃雷縱隊"的人。游雪濤説："是啊，就是這個朱某。因爲他是電影廠的，我要他和北京電影學院的人混在一起，那幾個人對他很快就很信任了，他們幾個人關在小房間裏，一面抽烟，一面看三十年代的電影畫報，翻拍上面的照片，議論攻擊江青同志，他們的烟頭把烟缸都塞得滿滿的。這朱某都是在場的。"

我説："朱某有没有參加議論呢？"我認爲，他假如參加議論，事情就不行了。

他説："你放心，這個我都做過布置的，我不喪失原則。"可見他還有一套紀律規定的。他説："我今天趕來，是因爲剛才得到消息，這幾個人馬上要回北京去了，他們所收集的材料也要帶走，不把他們抓起來，我們就没有證據了。所以要越快越好。"

這一説，我覺得事態比較嚴重，于是馬上帶着這份報告到興國路招待所請示張春橋。張春橋當時很注意聽，聽了以后，他馬上在報告上批了一句話："把他們先拘留起來，由公檢法軍管會和于會泳、游雪濤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動，不要撲空。"爲什么要公檢法軍管會和于會泳、游雪濤共同行動，因爲當時于會泳是分管文化系統的，游雪濤是"掃雷縱隊"的，出面的是公檢法軍管會。張春橋批示下達后，當時的公檢法軍管會副主任、空四軍副軍長姬應伍和游雪濤小組商量了行動計劃，决定由公檢法軍管會派人，由"掃雷縱隊"朱某帶路，把北京電影學院的人全部抓起來，不使一個漏網。后來游雪濤馬上來了報告，根據

春橋指示，没有撲空，完全落實了，說這北京電影學院的五個學生被進了少年犯管教所。當時少年犯管教所是專門隔離、審查、拘禁人的方，不是因爲他們是少年犯，市裏被打倒的人都關在那地方。北京電學院的人收集的"黑材料"也全部繳獲了。

當時這樣的行動，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不斷掃雷。后來我看到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講話，他曾經號召："繼續把矛頭指向右，指向隱藏的還没有暴露的牛鬼蛇神，進行全國大掃蕩，挖出根子，除地雷，這是全國性的掃雷戰，要掃掉埋在内部各個角落的大大小小地雷。""掃雷縱隊"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游雪濤周圍的這批人都有很大的冒險精神，而且有一種狂熱的情。這是那個年代的非常特殊的機構。除了掃上海市的雷以外，他還掃華東局機關。游雪濤在華東局搞了一個黑綫人物關係圖，把華東局十幾名老干部的名字都畫在一個圖表上，他把這份東西給了張春橋，春橋把它轉給王少庸，我在王少庸那裏看到的。那像《紅樓夢》的家一樣，從上面總根子一路分下來，這樣一畫，華東局九十幾名老干部是黑綫人物了。另外，他派上海市公費醫院的醫生到華東局干校門診當醫生，通過看病接觸各種人，從上到下收集各種材料。

時間長了，游雪濤派人打進去不斷搞情報的情况，也被人家發現，寫作班的人在外面聽說了，就問我怎么會支持游雪濤的。朱永嘉提我："老徐，你不能跟游雪濤這個人搭在一起，不然他要把你牽進去

張春橋扶植重建"244小組"

游雪濤越搞膽子越大，他不光插手上海地方，而且插手到部隊裏；光是插手到部隊，又進一步插手到外地。他派人到江蘇、浙江，搞各各樣的情報，而且他的活動都是自行其是，事先也不做任何請示。

有一天，我在康平路辦公室碰見他，他告訴我："最近我到杭州去。"

我說："你到杭州干什么？"

他說："我是借請人治病的名義，約了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組織省聯總頭頭張永生見面，我跟他談話。"當時浙江兩派非常復雜，我說："我們平時都很謹慎，你怎么可以直接去呢？浙江問題毛主席都有指示，你插手以后問題可能復雜化，會影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與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關係。"但他不覺得不妥當，反而很得意地告訴我："我和張永生兩個人在九溪十八澗一個很僻靜的場所談了幾個小時。"

我說："你到杭州去請示誰了？"

他有點尷尬："沒有。我回來以后准備寫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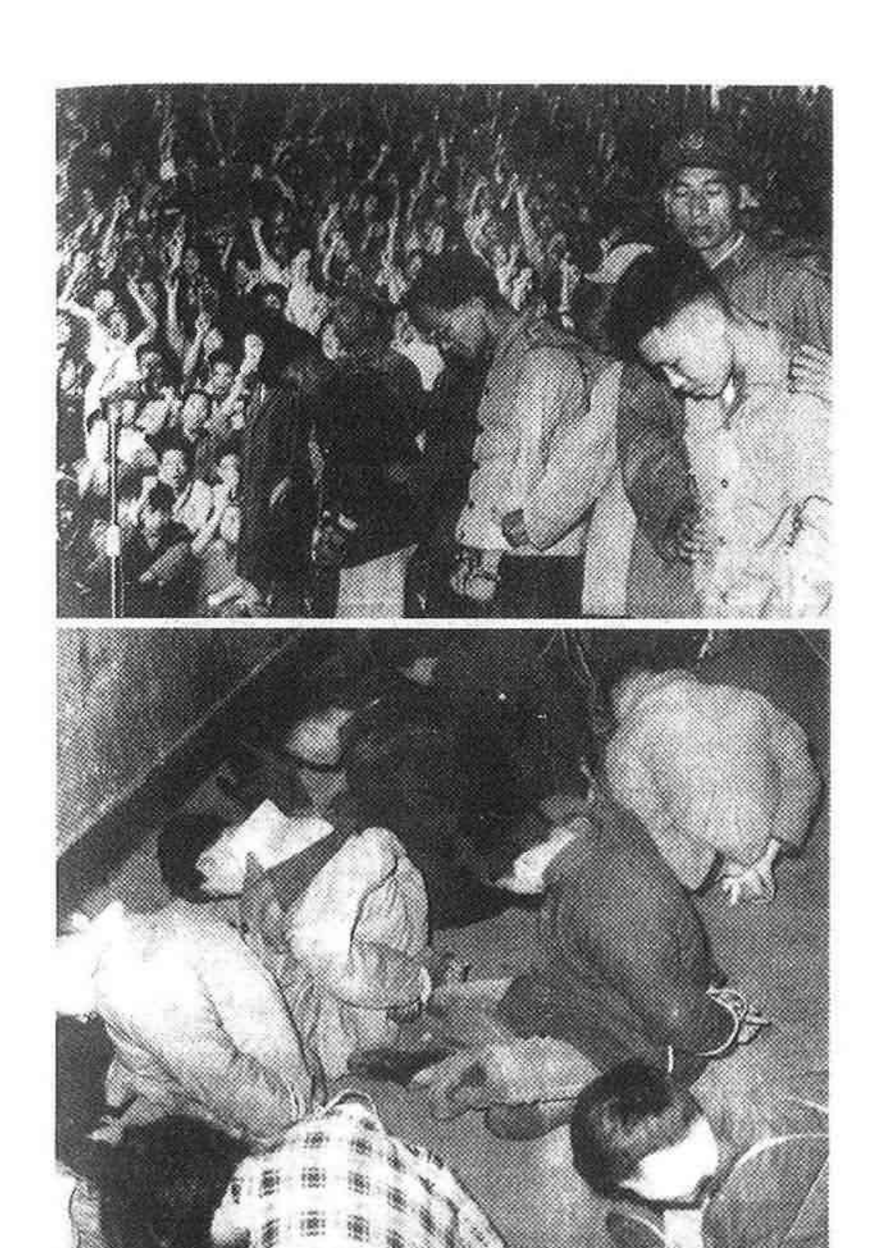
我說："上次春橋同志讓我提醒你，謹慎，小心，你這樣做太不謹慎了吧？我們都不知道，張春橋、姚文元也不知道。"那天他討了個沒趣，走了。

我感覺到此事重大，游雪濤看上去是我們領導的，但實際上是他自己在搞，假如他在外面說是我們在指揮他的話，這真要把我牽進去了。所以我就與寫作班朱永嘉、吳瑞武、王知常幾位商量：游雪濤這樣弄下去，怎么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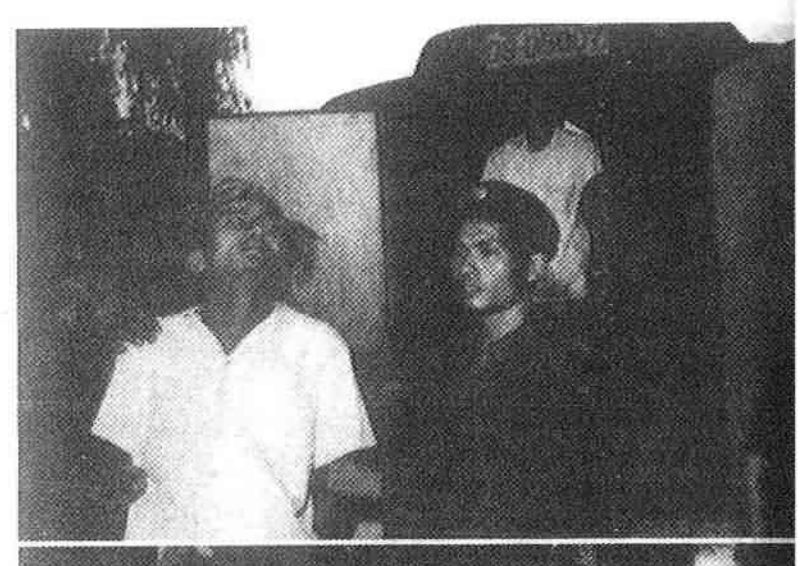
他們三人說："我們研究過歷史，歷史上搞這種活動的人，結果都沒有好下場，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離。"朱永嘉再次提醒我："像游雪濤這樣搞法是不行的，這種特務手段的方法是很危險的，不要將來把你也牽進去。"他們完全是好意，爲我着想。

我一想，還是當面向張春橋請示匯報爲好，我說："游雪濤到浙江去找過張永生。"張春橋對張永生也有看法，有一段時間，江青叫他去找女婿，找的就是這個人，后來他表現很不好，張春橋就放弃了這個人，沒想到游雪濤又跟他弄上了。我對張春橋說："'掃雷縱隊'這樣做恐怕不行。"

張春橋也對我說："上海警備區也有反映來，游雪濤派人打進去的事他們都知道。"張春橋對此也有點憂慮，我說："這個組織是不是還要繼續存在下去？"張春橋說："我早就講過了，他們還是不謹慎，"不過，他調過頭來說，"當然，還是應該肯定他們前一時期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們的搞法有點像情報系統，這只有在非常時期才能用，他們搞蘇聯克格勃那一套，這是不行的。"克格勃是蘇聯的情報組織，過去捷爾



□文化大革命中，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各種造反派和秘密組織可任意對所謂的"階級敵人"進行批鬥、拘禁、審訊，甚至綁架。



文化大革命中，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各種造反派和級[illegible]組織可任意對所謂的"階級敵人"進行批鬥、拘捕、審訊、甚至[illegible]

任斯基領導時期叫契卡，后來叫克格勃。

當時我想，張春橋講的只有非常時期才能用，大概是指一月革命奪權前后那一段，當時各種機構都癱瘓了，連公安局都不管用了，張春橋的耳目失靈了，所以用一下游雪濤的情報系統還是可以的。現在各種機構恢復正常，公檢法也軍管了，行使了正常職能。"掃雷縱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我對張春橋說："我建議，對游雪濤的工作是否做一下安排，把他的'掃雷縱隊'解散，最近市革命委員會要建立一個群運組。"當時社會上還有很多群衆組織，工交、財貿、學生、醫務界、文藝界、教育界甚至宗教界，每個系統都有群衆組織，市革命委員會准備建立群運組，由群運組專門聯絡各群衆組織。我想，群運組的工作同外界打交道比較多，對游雪濤來說比較合適。我說："是不是讓他也去擔任一個職務。"當時群運組組長，我派市委寫作班哲學組成員，原市委黨校哲學研究室謝宗範擔任。我說："游雪濤是不是做副組長？"這也已經很高了，因爲當時的組相當於部。至於他手下的人，我建議有的回原單位，有的也可以到群運組工作。張春橋同意我的意見。

我回來就找游雪濤當面攤牌，我說的比較婉轉："'掃雷縱隊'前一時期做了不少工作，得到春橋同志的肯定，你們的同志爲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做出辛勤的勞動，但是你們的搞法有點像情報系統，做法上有點像蘇聯的克格勃，再辦下去誰能來領導你們？對於你們這樣的組織是不能領導的，如果給人家抓住了把柄，說張春橋在上海搞了一個特務組織，這問題就大了。"游雪濤還想辯護，說要讓他們這批人發揮他們的作用。我說："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春橋同志的決定，正是考慮到你們前一時期的工作還是有成果的，所以現在安排你擔任市革命委員會群運組副組長，其他人可以回原單位，也可以另外安排工作或去群運組。這樣，你們的組織從現在開始停止工作。"他一聽張春橋做了這樣的決定，就沒有話了。

開始的時候，游雪濤對自己的工作安排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爲到底是市革會一個組辦的副組長，相當於副部級幹部。我也到靠近外灘的群運組辦公室去看過他，把謝宗範和他兩人的工作分了工，做了點部署。

我以爲，這么一來，作爲秘密情報組織的"掃雷縱隊"應該結束了，但事情的發展却與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游雪濤的掃雷縱隊不但没有消失，而是轉化了另一種形式重新組合起來，搞出了更多事情。其主要背景是張春橋、文静與王承龍這條綫又把它扶植起來。

這裏面的曲折過程是：

游雪濤當上市革會群運組副組長后，也要把"掃雷縱隊"的一套做法帶到群運組去，組長謝宗範不同意，兩個人發生矛盾。群運組是公開的機構，是市革會領導和各個群衆組織之間聯係的紐帶，這是我們給它規定的任務。不能用原來這種秘密工作的方式跟各群衆組織搞名堂。游雪濤從"工總司"内部物色到一個人讓他爲自己提供情報，這人叫岑麒麟，是軍工廠八二二廠的技術員，也是"工總司"最早發起人之一，經常參加"工總司"的重要會議。他摸到王洪文以及"工總司"内部的動向給游雪濤，王洪文發現后，十分惱火。一直揚言游雪濤派人打進"工總司"，他要追查。

游雪濤那種工作方式和群運組産生很大矛盾，所以與謝宗範的矛盾也激化起來。謝宗範到我這裏告狀，我進行了調解。也批評了游雪濤。幾次以后，游雪濤不找我了，我發現他經常找王承龍。王承龍當時在市革會主管辦公室，他下面有車子，有房子，又可以批錢。我發現游雪濤經常找張春橋的妻子文静，文静住在康平路大院裏，張春橋的母親、孩子當時都在，所以文静大多數時間在大院裏。文静在外灘聯絡組曾辦過一個時期的公。聯絡組是當時市革命委員會專門編輯《動態簡報》的一個機構，所以與游雪濤的關係密切起來。

原來，游雪濤准備背着我另起爐竈了。有一天，王承龍對我說："游雪濤今后不到外灘群運組去工作了，他另外成立一個小組，今后直接歸康平路辦公室領導。"我對他說，過去春橋同志對他有很多說法的。王承龍說："這不是我的决定，這次重新建立游雪濤小組，是春橋同志决定的，是文静同志直接關心的。"我無話可說。

游雪濤在張春橋的支持下，在文静直接指揮下，在王承龍全力幫助下，重新建立了游雪濤小組。在徐匯區僻静的永福路，撥給他們一幢花園洋房，這就是永福路二四四號，也即人們傳說的"244小組"。王承

龍說："這幢房子給他們，他們的任務就是專門爲領導收集動態。"從此，游雪濤小組對外常常以"康辦"的名義進行活動。

過去搞"掃雷縱隊"的時候，我確實支持過他們，比如說給他們轉遞材料，一度把市委機關聯絡站對外接待的地方做他們的工作地點，但當時我没有給游雪濤發固定經費，所以他們完全是一個自發的組織，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背景。這次他們屬於"康辦"了，由王承龍直接來抓，背后有文静支持，而且得到張春橋親自批准，他們的條件大大改變了：要房子有房子，要汽車有汽車。當時市革會康平路辦公室負責人朱玉佩，原是《支部生活》美術編輯，與王承龍一起調到市委機關聯絡站來的，她告訴我："平時游雪濤小組可以開白條子來報銷特殊經費，而且用不着説明這筆錢的用途。"

"康辦"還發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證件，可以通行無阻。我發現朱玉佩根本没有跟我打招呼，就給這個小組的一批成員發了《文匯報》記者證，這説明他們在外面的活動身份可以經常變化的，有時候用"康辦"的名義，有時候用《文匯報》記者的名義，這樣會有很多好處和方便，與我一度支持他們的情況大不一樣了。所以他更緊密地向文静和王承龍這一頭靠攏。

以后，我在康平路大院裏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游雪濤妻子吴錫敏，騎着一輛自行車，把他們那裏打印好的《動態》或者《動態增刊》親自送到康平路辦公室來。這種《動態》的分發範圍非常小，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以外，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不是都能看得到的，分送的名單由游雪濤親自擬定，比如王洪文就没有。由于我和游雪濤的私交比較好，他也看到張春橋、姚文元對我比較信任，所以他編印的《動態》、《動態增刊》大部分送給我看，但不是全部，比如華東局的那張黑圖，我是從王少庸那裏看到的。另外他還有一份手寫的材料，游雪濤認爲内容絶對機密，不打印，只手抄一份送張春橋。后來，統計這一類的《動態》、《動態增刊》，還有手寫的專題匯報，游雪濤一共編了三百多期。張春橋看了這么多他編寫的情況、匯報，各種各樣的信件等等，在上面批過的有五十四件，數量相當多，證明張春橋對他送上去的材料非常注意。

游雪濤有康平路大院的出入證，可以自由進出當時警衛森嚴的大

院，當然他的妻子吴錫敏肯定也有，但是寫作班很多人是没有大院出人證的。游雪濤的行動很神秘，他騎一輛自行車，在大院裏東拐西彎。我住在康平路大院西部的一幢公寓裏，可以看到前面那一排張春橋、馬天水、王少庸住的房子。他來了以后，往往要看看有什么人注意他，然后再拐到張春橋家裏，因爲文静大多的時間是在自己家裏。有時候游雪濤也拐到王少庸那裏去，王少庸與文静是鄰居，住的都是獨幢的花園洋房。他有時候也到我家來，當時我住在西部公寓的三樓，開始的時候王洪文住在我樓上，后來王洪文地位上升，就搬到前面去了，他從不去王洪文那兒。

有一天，我在外面開會，游雪濤到我家來找我，没找到。傍晚我回家，當時我的大女兒十歲，她對我説："爸爸，今天下午有個叔叔來找你，我聽見門鈴響，就問是什么人，没有人回答，我把門一開，只看見一個人站在門旁邊，戴一副灰色玻璃的眼鏡，把我嚇了一跳，爸爸，這是誰呀？這個人怎么像電影裏的壞人一樣。"當時，確實是這樣，游雪濤神秘兮兮的，走路悄悄的，又戴着灰色眼鏡，連小孩子都覺得他不像好人。我小女兒當時七歲，説："是啊，把我們兩人都嚇死了。"

他做的事情很令人擔心，比如他到王少庸那裏去，王少庸對他熱情接待，有時候留他吃飯，吃飯時，王少庸談起文革初前的那一段，王少庸説："上海有'工總司'，還有赤衛隊，赤衛隊還是我當時提議建立的。"他當時是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連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這個名字都是我給他們起的。"王少庸這人很耿，有時候張春橋叫他做什么事，他也要頂的，這樣一來，張春橋對他不滿意，平時跟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們也聽得出來，不像我們這些人對張春橋很馴服。這事情照理在兩人談話的時候説起也是很自然的，但游雪濤很敏感地抓住這一點，馬上給張春橋匯報了。有一天，我到張春橋那裏去，張春橋説："你知道嗎，徐景賢，原來赤衛隊是王少庸提議搞的。"我説："我不知道。"張春橋説："游雪濤告訴我，他在王少庸家裏吃飯的時候，王少庸親口告訴他的，而且連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我心裏説，這倒真是厲害，游雪濤做情報做到我們這些人頭上來了。我們這些人平時説話也要當心，一不小心，他就把你的情況匯報到張春橋那裏去了。

游雪濤很想抓幾個大案來引起張春橋的重視，所以他搞的材料經常

有一些聳人聽聞的東西。比如，他説長江以南有一個“老人串聯會”，指那批被打倒的老幹部，他就弄了個簡報：“長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種名義成立的反革命武裝，江蘇、浙江、上海、安徽、山東都有不同程度的聯係，而且有一個十人小組，叫‘老人串聯會’，來進行領導”，“而他們的后臺可能是陳丕顯。”這么多的省裏有反革命武裝來反對文化大革命，這可嚴重了，看了很驚心動魄的。游雪濤還在這份動態上標了題目：“蘇字動態一號　反革命地下武裝關系圖”。他又畫圖了，上面是一個總的方格子，下面有實綫、虛綫、直綫、横綫、斜綫，可以串起來，這種像蜘蛛網一樣的表格讓人一看，很觸目驚心。這一來，當然引起張春橋的興趣。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張春橋把游雪濤找到興國路辦公室。張春橋有事情主動來找什么人，説明對這事情他是非常重視的。

這天，張春橋在興國路五號樓辦公室接見游雪濤，張春橋提出一系列問題：“‘老人串聯會’的人現在怎么樣？是不是都抓起來了？‘老人串聯會’后面究竟是什么人？你們掌握了没有？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們住在上海的什么飯店賓館？通過什么關係住的？哪些人同陳丕顯聯系的？另外他們同上海軍隊裏的什么人聯系？”這些問題，游雪濤都記在他的筆記本裏，作爲張春橋布置的任務，向他的手下傳達，要他們執行。以后，江蘇、浙江來滬的一些老幹部就給游雪濤小組的人盯上了，游雪濤告訴我，有時天下着傾盆大雨，他們也整日整夜地守在賓館門口，跟踪，盯梢，監視這些老幹部，看他們跟上海哪些人聯系。但是，搞了半天，這個組織是没有的。他就用這種手法，開始的時候説的非常嚴重，到最后根本没有，完全是捕風捉影。

還有一個案子，華東局當時兩派，一派叫“革造會”，即華東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這派造反比較早，與我們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關係比較多。后來，他們又殺出來一派叫“打韓兵團”，專門打倒韓哲一，韓哲一當時是華東局書記。因爲前面的“革造會”没有宣佈韓哲一是叛徒，“打韓兵團”殺出來，比“革造會”要左得多。“打韓兵團”的觀點是王少庸和王承龍支持的。游雪濤在和王少庸、王承龍聊天的時候，得到這個信息以后，馬上派人摸華東局干部的情况。當時華東局干部已經

集中到奉賢干校去搞鬥批改了，游雪濤小組有個成員，延安醫院内科醫生姓趙的，派到干校做門診醫生，然后跟各種各樣的人接觸，收集華東局老幹部材料。有一天深夜，游雪濤派人翻過華東局宿舍圍墻，切斷了電話綫，衝進華東局一個"黑綫人物"的家裹將其綁架，用黑布把眼睛蒙起來，推進汽車，故意讓汽車在馬路上七彎八彎，使他不知道具體方向，然后開到郊區一個游雪濤秘密設置的空房裏，解開他的黑布，對他進行審訊。這已是搞非法的綁架活動了。

當時游雪濤有好幾輛汽車，有微型録音機，后來我知道他們還有槍。前面他畫過華東局黑綫人物關系圖九十幾個人，后來進一步插手，華東局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變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階級异己分子、假黨員，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這個案子搞得比較大。

還有一個案子是有關葉劍英元帥的，當時中央和毛澤東保他，所以葉劍英到上海來，還是中央領導，又是軍隊的領導。葉劍英很喜歡昆曲，從前就認識上海市戲曲學校昆曲班的演員，有過來往。他住在錦江飯店，因爲好久没有見到這些演員，便叫他們到錦江飯店見了一個面，剛剛有了接觸，游雪濤馬上就知道了，就派他在戲曲學校裏的小組成員去接近那幾個演員，從他們的嘴裏刺探葉劍英怎么接見他們，怎么跟他們談話，然后寫成絶密材料，報給張春橋。張春橋看了以后，馬上有反映了。張春橋告訴我："你看，葉劍英到上海以后，還是找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游雪濤把他們的情况、他們的談話都寫到我這裏來了。"

這樣一來，"老人串聯會"、華東局黑綫人物圖、葉劍英上海之行等材料弄了以后，游雪濤一時很紅，文静有一次曾對她身邊的人説："我看，游雪濤這個人可以當上海市公安局局長。"

因爲他反映的情况多了，張春橋找他的次數也多了。張春橋找他，從來不找我們一起談，經常是單獨找他去談，究竟談了些什么，怎么談，我們也不知道。有一件事讓我感到，張春橋對他講過我們領導層之間的東西。

有一天，游雪濤突然跑到我在康平路的三樓辦公室，游雪濤非常講究穿戴，夏天的時候穿一件淡灰色的翻領衫，皮鞋非常引人注目，淺藍色的羊皮皮鞋，鞋面上有小孔，當時比較時髦。好久没見了，那天他很

興奮，像是跟我講重大事情似的，他說："前天，春橋同志找我去談了一次話，聽我講了一下最近的情況，談到最后，他征求了我對市革會領導的意見。"我想，春橋征求他對市革會領導的意見也是可能的，但這時他露出一種很洋洋自得的神情，好像手裏有重大的關子，他說："春橋同志說，今后他在北京的時間比較多，在上海的時間少了，因此正在考慮誰來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見，王洪文和徐景賢兩個人，究竟誰比較適合。"

張春橋拿誰主持上海工作那樣重大的事情去征求他的意見，我當時很吃驚，不便表態。他看我好像不大相信的樣子，就有聲有色地講了當時談話的細節，他說："春橋同志先是坐在椅子上，接着站起來，把身體靠在他背后的熱水汀上面，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對張春橋辦公室很熟悉，他說的環境及對話的情況，我是相信的。游雪濤說："我當時回答，還是徐景賢比較合適。"很明顯，一是張春橋對他信任到這種程度，連上海主持工作的人都要征求他的意見，二是他來討好我，把這么重大的信息傳達給我，也顯示出他自已的身價。當天談話結束后，他主動邀請"你是不是到我的永福路去看看。"從游雪濤小組重建后，好幾個月過去了，從來没有公開過那地方，康平路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了，我的秘書也不知道，只有他的電話號碼。我是聽王承龍講起過那地點的，也知道王承龍和辦公室的朱玉佩到過永福路，王承龍和游雪濤都没有邀請我去過，這次是游雪濤自已把永福路的具體地點、門牌號碼告訴我了。

游雪濤小組的成員，有一些我是認識的，比如大學裏的紅衛兵，還有文藝界有影響的人，但裏面究竟有多少人，我也不很清楚。有一次，我在朱玉佩那裏看到他們申請領工作證的名單，這張名單上人很雜，單位有團市委、《青年報》、歌劇院、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青年話劇團、上海戲劇學院、上海戲曲學校，還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文化局機關、醫院、交通運輸管理局，甚至有一個人是浙江省歌舞團的，都要領上海的證件。我問過一下，最多的時候有三十多人，外圍力量就更多了。打"聯司"的時候，支聯站開秘密會議，游雪濤派了小組一個成員的丈夫打進去，這人很能寫東西，支聯站很重用他，讓他參加支聯站核

心會議，他把支聯站很多內部的東西傳出來。

那天游雪濤邀請了以后，我就跟他去了。從淮海中路轉到湖南路，上海高級的很幽靜的區域，樹木很多，人很少，從湖南路轉彎進去到永福路二四四號是一幢花園洋房，兩層樓，白墻紅頂，外面有個很大的花園，有扇很大的木門，院墻上面都帶着鐵絲網，當時樓外面没有門牌，爲了保密，把二四四號門牌摘掉了。游雪濤告訴我，從前這是一個北歐國家駐上海的領事館，文革后，領事館撤走了，這房子就騰出來了。

進院后，有一條柏油路，可以開汽車，旁邊是冬青樹，還有很高的大雪松。游雪濤告訴我，劉曉任上海市委書記時在那裏住過，后來柯慶施也住過。

進了洋房后，在一個大飯廳旁邊有個小房間，復旦大學"紅三司"學生，姓譚的，正坐在桌子旁邊寫東西，看見我很客氣，大家握握手，他是很能寫文章的筆桿子，一度負責主編過上海《紅衛戰報》。游雪濤給我介紹了以后，在我耳邊很得意地説："這個譚某，還有戲劇學院的侯某，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只要這兩個紅衛兵負責人在他那裏，他就可以動用這兩個單位紅衛兵的力量。我没想到，這兩個人過去我都認識的，現在却成了游雪濤的左臂右膀。

洋房的底層，有大餐廳和小餐廳，平時他們就在這裏開會。二樓是正屋，游雪濤妻子吴錫敏在那裏，裏面有辦公桌，有床。我很奇怪，這地方怎么好像是住家？我説："你們把家也搬來了？"

游雪濤笑了，吴錫敏就説"有時候工作忙了，晚上就睡在這裏，不回家了。"

我問："其他人呢？"因爲今天進來只看見外面一個姓譚的。

他説："都去執行任務了，每天都要很晚才回來。"

我走到陽臺上一看，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有一個池塘和造型很好的假山，我説："你這裏比我們康平路還幽静嘛，你真是成了'獨立王國'了。"

參觀了永福路二四四號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游雪濤送了一份材料給張春橋，這是他打印出來的《一年工作總結》。爲了表示對我的尊重，游雪濤也復打了一份給我。在《一年工作總結》的前面，

游雪濤附了一封寫給張春橋的信，信裏說："過去的一年，是自己參加工作十八年來最幸福的一年。聽到您在百忙中還曾問到我的近況，不禁熱泪盈眶。"在《一年工作總結》中，游雪濤寫道："一個非正式的工作機構，二十幾名没有合法活動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于是在兩派鬥爭激烈的時候，突然離開戰場的，又長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別人無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誹謗。這一年來，大量的工作是同敵人進行隱蔽的鬥争，從中央到地方直接間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來，極大部分同志始終像戰士處于一級戰備那樣，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覺就是工作，什么時候有情況，就什么時候出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們在一條特殊的戰綫上戰鬥了一年兩個月，爲無産階級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戰鬥指揮部提供了大約一百萬字以上的各種情况反映和調査報告，預報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現了一批混進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兩面派。"給我的那一份，我把它放在保險箱裏，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后被有關部門拿去。

張春橋收到了《一年工作總結》，在上面批了兩句話："已閱，退游雪濤同志。謝謝同志們。""你們的經驗，我還要想一想。"第一句話是對游雪濤小組的勉勵，從他嘴裏說出"謝謝同志們"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句話，實際上是埋下伏筆，將來爲他自己開脱。因爲他跟我和王少庸說過，"他們搞别人的特務活動，别人也會搞他們的特務活動"，還說如果傳出去的話，人家會説張春橋搞了一個特務組織，所以他對這個問題始終覺得不自在。他曾經對我說："游雪濤這樣搞法不行，他們的材料太懸了。誰相信了他們，被他們牽着鼻子走，會犯錯誤的。"但他盡管這么說，游雪濤送去的材料却拼命地看，看得很仔細，還不斷地有批件下來。我覺得，這好像一個人抽鴉片上了癮一様，覺得鴉片不好，但上了癮以后，就是要抽。游雪濤小組經常能搞到一些張春橋不知道的材料，張春橋對此已上癮，他就處在這種矛盾的狀態中。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這一年過去以后，游雪濤小組開始在兩個事件上出問題。一是插手

上海的部隊，他派人打進上海警備區，跟警備區辦公室主任都交上了朋友，然后從那裏不斷搞出警備區内部材料，如《上海警備區大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情況》，甚至寫了一份關於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方某某追查辦公室主任邱某某與張、姚兩位之關係的簡報送給張春橋。當時張春橋也認爲上海警備區裏有一股反對中央文革、反對他的勢力。二是直接把手伸到南京軍區許世友那裏去了。游雪濤的膽子非常大，居然還在簡報裏寫許世友支持廖政國在上海奪張春橋的權，廖政國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游雪濤在簡報裏還把上海警備區十四名師級以上干部的政治態度排了隊。游雪濤還把當時對南京軍區不滿的副政委、副司令、后勤部負責人等都請到他那裏談話，游雪濤與那些人接觸后，摸了很多軍隊内部的情況，整理了一份《關於警備區整理春橋同志黑材料問題的點滴》，送到張春橋那裏。

他給張春橋寫信説："我派人進去，會有風險的，但還是大膽謹慎地插進了警備區，爲弄清部隊的情況付出了艱巨而又艱苦的勞動。"張春橋開始對警備區的情況非常重視，因爲他兼警備區第一政委，他感覺到這個位置后面還有威脅他的力量。

游雪濤找那么多人談，挖内部材料，被警備區掌握，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很生氣，説"我們上海警備區有一只伸進來的黑手。"指的就是游雪濤和游雪濤小組。當時張春橋和南京軍區關係比較緊張，毛澤東還做許世友和張春橋的工作，并要張春橋到許世友設在安徽山區的指揮部去看望他。許世友有一時期也主動到上海來，請我們吃飯，給張春橋送禮，表示要搞好關係。有一次還送給張春橋一只大豹，是他在安徽山區打獵的收獲，張春橋把他挂在園子裏，我們都嘗了豹子肉，很腥。這些動作表明，毛主席做工作以後，希望雙方不斷團結，而游雪濤在裏面不斷搗黑手，張春橋覺得部隊已有反應，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於是他找我，問我游雪濤小組怎么辦？我説："是不是把他弄到市革會專案辦去？"當時有個專案辦公室，在高安路。張春橋表示同意，説："這樣吧，游雪濤小组解散，永福路停止。讓游雪濤到市革會專案辦去擔任領導核心。"這也是由我出面找游雪濤談的，游雪濤同意了。

但他到專案辦一段時間后，周圍的一幫人還是每天閙在他身邊，活

動頻繁，已經打不散了。張春橋一看不行，下了一個批示："游雪濤同志同各方面的聯係還是太多，要十分警惕！"這是警告他了。

當時我的感覺，好像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神話裏，從瓶子裏放出來的巨魔，要他再回去是很難的。游雪濤搞情報、綁架、插手的都是專政部門，又是軍隊，又是公檢法，特別是插手公檢法后，得罪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

王維國當時是跟林彪的，與王洪文和我們面和心不和，他在延安中路儀表局旁邊設了一個密點，也專門收集各種各樣的情況，他反過來收集到了游雪濤小組活動的材料，這使張春橋感到情況很嚴重，那時正是張春橋、江青這一伙和林彪集團發生矛盾的時候，要是王維國把游雪濤的問題攻到張春橋頭上，他會感到非常被動。

張春橋看到游雪濤插手軍隊、插手公檢法后給他造成很大麻煩后，就下決心，把游雪濤下放勞動。事情來的很突然，我想，第一次我把他安排到群運組，你張春橋自已把他放出來，搞了游雪濤小組；第二次我建議你把他放到專案辦去，過了一陣子不行了，就把他下放勞動。還要我出面去談，我感到這是蠻難談的，因爲不能把內情都告訴他。

一九七〇年八月，當張春橋和林彪集團大吵一頓、在廬山會議攤牌的前夕，我約游雪濤和他的妻子吴錫敏兩人，把他們找到康平路小禮堂。我說："春橋同志决定，你從明天起下放勞動。"當天他和吴錫敏兩人的情緒非常壞。我說："一個是到工廠去勞動，一個是到市直機關五七幹校去勞動，兩個裏面選一個。"下放勞動就是撤職，他們兩人非常生氣，吴錫敏還哭了，他們没想到爲無産階級司令部工作那么久，却落到這樣的結果。我說："你們回去很好的安排一下，這次是要堅决落實了。"我還對他說："我曾叫我的秘書張家龍到你家，勸過你兩次，叫你不要再搞這么大的活動。他到你家裏來，進門之前從窗子裏看到你家燈亮着，有人在你家談話，等到他一敲門進去了，人不見了。我們不是特務，也不搞情報，他是受我委托來看你的，這種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怎么能這樣搞呢？來過兩次，勸告你不要再搞這種活動，我是以朋友的名義，關心你，但你們已到了打不散的程度。"

他說："哦，還有這種事啊？"

那天談了以后，他們就回去了。回去后，游雪濤寫了封非常反感的信給張春橋，他的信一直是通過張春橋老婆轉的，所以這封信又送到文静那裏，信封上寫"文静同志轉張春橋同志"，由吴錫敏送到文静那裏。

信上説："我不理解，爲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於轉過身要槍斃的地步，我好比一頭受傷的熊，躲入叢林，舔乾自己身上的血，准備戰鬥。"他在信裏把牢騷主要發在王洪文、王少庸、王維國、王秀珍等人身上，意思是他被這些人陷害的。當時王承龍已被張春橋刷下去了。張春橋看了這封信，非常生氣，説這是給無産階級司令部下戰書了。

宣布游雪濤下放勞動，但他哪裏也不去，説身體不好，一直在家裏呆着，并繼續不斷地每天找人講情況，發牢騷，情緒很壞。他不知道，他周圍的那些人，運動一來，又把他賣了。接下去就是清查"五·一六"。有人揭發他講過這段話，"我研究過歷史，搞秘密情報工作的人從來就没有好下場，德國蓋世太保的情報組織頭子是這樣，蘇聯的契卡、克格勃頭頭的命運也是這樣，因爲他們知道的東西太多。"

他的話講出了一點道理，那時已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跟那些人差不多了，同時，他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廬山會議后他又同情陳伯達，他把自己與陳伯達比較，感到處境差不多。他手下那些人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寫了好多揭發他的材料，送到王洪文手裏，王洪文把這些材料收集起來給張春橋和我看，我們一看，這家伙越走越遠了。王洪文説："要把他抓起來，因爲他有這么多現行的言論，攻擊文化大革命，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情陳伯達。"王洪文叫人寫了一個報告是隔離審查，張春橋批准了。王洪文派民兵先把他的左右手抓起來，去抓的時候，他們把斧頭都已經准備好了，知道自己的命運不行了。

游雪濤被抓后關到民兵指揮部，這證明當時張春橋已决定把他徹底地悶掉，不能再放他在外面活動。負責該案的是市委組織組的金祖敏，我是回避的。我知道游雪濤有兩本筆記本，寫了文革中與所有人的交談情況，有一百萬字。張春橋對隔離審查游雪濤有批示："不要點什么問題，心平氣和，講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擊他，而是幫助他弄清問題，大家主動。"專案組根據張春橋批示去查，但能查出什么東西呢，結果把他一直關着。當時究竟抓了幾人，專案組不匯報，我也不知道，審查

到什么程度，也不講。估計材料都是單獨送到王洪文手裏。

游雪濤被抓后，一直没有審理作結論，到一九七五年，我看到了一分專案組的請示報告，說："對游雪濤經過審查，現在結束，決定撤銷隔離。"没有任何結論，報告提出把他送到"五七"幹校，每個月發給生活費30元。當時張春橋、王洪文長期在北京，一批老幹部都已落實了政策，對游雪濤查下去没有結果，就算了。這個報告送給王洪文、張春橋和我們幾個人看，最后大家圈閱。我記得《史記》裏有范蠡論越王勾踐的一段名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現在這段話又應驗到游雪濤頭上來了。

文革結束后，游雪濤又重新被抓起來，判了十五年，當時他要求是把前面被"四人幫"關押的三年多的時間抵算進去，但没有獲同意。他在監獄裏關足十八年。

“四·一二”炮打張春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炮打中央文革張春橋、姚文元的事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又發生第二次炮打事件，規模以及卷進去的人數遠遠超過第一次，第二次炮打主要針對張春橋。

炮打有它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炮打以後，相當多的紅衛兵造反派，以“紅革會”爲代表，被壓下去了，這批人心裏有氣，對張春橋不滿。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學后，在學校清查一九六七年炮打的事件，把其中主要的人員作爲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隔離起來，比如復旦大學胡守鈞、周谷聲等。這就引起原來反對過張春橋的紅衛兵更大的不滿。

外因是，從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八年年初，全國武鬥不斷，上海也發生過砸上柴“聯司”的事件，江青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以後，毛澤東在北京派出工、軍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他們把學校裏兩派武鬥壓下去了，但把原來造反派奪的權也拿回去了，權力到了工、軍宣隊手裏，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失掉了權力，内心潛伏着很大的不滿。中央的政治局勢也很動蕩，一九六七年八月，武漢事件后，王力煽動奪外交部的權，接着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和衝擊外交部事件，中央先後把王力、关鋒、戚本禹隔離審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又出現了“楊、余、傅”事件，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一個是代總參謀長、一個是空軍政委、一個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三月二十二日，中央撤銷“楊、余、傅”職務，任命黄永勝爲總參謀長，同時改組軍委辦事組。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系統萬人大會，當時中央文革領導人都到會。大會開到最後，毛澤東出現了，於是萬人向毛澤東歡呼。

那次大會張春橋正好没有參加，三月二十三日他到南京祝賀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賀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去的。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誓師大會”。會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都發表講話，講了“楊、余、傅”

事件。那次大會，中央也没有通知張春橋參加。

《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艾玲，由於在《海瑞罷官》的批判中收集情況有功，《文匯報》對她很推崇，曾希望她到上海任《文匯報》革命委員會主任，但她家在北京，丈夫賀瑞林是總參二部副部長，她就仍舊留在《文匯報》北辦工作。因爲上海没有參加"三·二七"會議，不瞭解中央精神，所以我很緊急地告訴艾玲，讓她無論如何到會場，把所有領導講話做詳細紀録，用飛機帶回上海，我們派人在機場接，拿到會議紀録，我們要在上海的大會上傳達、宣讀。

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召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張春橋也不知道北京其他領導在會上講話的内容。我們先討論其他方面的工作，接着就等待北京航班送來的大會講話紀録。我讓我的秘書在機場等，隨時與我通電話。那天航班遲到了，我們很着急。秘書拿到文件后，直奔展覽館。文件是艾玲手寫的，詳細地記録了當時北京會場的情況。我向全體委員傳達，他們做紀録后就到下面去傳達。我傳達完後馬上把這份記録送到張春橋那裏，因爲只有一份。

《文匯報》朱錫琪帶頭炮打

這事情引起了某些人的懷疑。市革命委員會成員、《文匯報》負責人朱錫琪就提出疑問："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動，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場，揪出一個代總參謀長、一個空軍負責人、一個北京衛戍區領導，爲什么張春橋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張春橋又是中央文革成員，北京的會議記録竟要徐景賢從《文匯報》北京辦事處那裏去搞，所以他對此產生了懷疑。

從三月下旬開到四月初，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朱錫琪負責籌備工作。朱錫琪在《文匯報》奪權中起了關鍵作用，上海"一月奪權"和《文匯報》有淵源關系。《文匯報》的奪權，事先没有向張春橋、姚文元請示。但奪權后，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文匯報》是全國報紙中奪權最早的。朱錫琪曾擔任《文匯報》報社機要秘書，共產黨員，又做過《文匯報》體育專欄記者，當時體育記者很

不受重視，但他造反很早，他們有一個三人核心：朱錫琪、邵傳烈、周國榮。他們三人在《文匯報》組成一個"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奪權，當天轉載了上海革命群衆組織的《告上海市人民書》。毛澤東就是看到這一期奪權后的《文匯報》，又看到張、姚給他發去的匯報，一月八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提到《文匯報》奪權的事情。毛主席說："過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報紙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綫，都是采取把報紙封掉的方式，現在《文匯報》造反派宣布奪權以后，宣布自己來辦報紙，這種做法很好。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毛主席還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這樣一來，朱錫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張春橋、姚文元在籌備上海奪權過程中，都叫朱錫琪來參與。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委任朱錫琪擔任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組長，同時又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相當於副主任。當時還沒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只有十來個人，朱錫琪在當時的地位很高。

朱錫琪平時模樣很樸素，背着軍用包，留平頭，穿藍布中山裝。他喜歡跟人爭論，嗓門很大。籌備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時，張春橋召集過幾次小會。當時社會上已經有流言傳播，傳張春橋是叛徒。有天晚上，張春橋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集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會議，也請各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到會，聽聽外面的動向。

張春橋在會上問同濟大學紅衛兵頭頭陳敢峰："最近有什么社會動向？"

陳敢峰說："有人散布謠言，說張春橋是叛徒。"

張春橋聽到這消息，臉色陰沉，非常生氣地講"我從來沒被捕過，怎么會是叛徒啊？"

我聽了，心裏動了一下，關於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一九六七年的炮打中沒有涉及，那時只不過說張春橋是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委爛掉了，難道他是正確的？一九六八年炮打前提到這個問題，我馬上聯想到他的妻子文靜，因爲文靜曾被捕自首，是不是文靜的這段歷史傳出去後，牽連到張春橋，但我不敢講。當時也沒有人說張春橋是特務。

張春橋在會上還說："我過去太寬大了，今后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說話的時候，手裏還拿着烟，說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裏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只要小指頭一點，你就會完蛋！"這話給我的印象非常强烈，從前我看過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報告裏說一九四八年南共脫離了情報局，斯大林當面對赫魯曉夫說："我只要把小指頭一點，就不會再有鐵托了，他就要垮臺。"后來，我又聽過傳達，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只要小指頭一指，劉少奇就會垮臺。"我心想，張春橋把斯大林、毛澤東用過的話在這個場合搬出來，說明他是非常恨人家提到他的歷史問題的。那天，朱錫琪也在。我對張春橋的這段話是相信的："我從來没有被捕過，怎么會是叛徒啊？"

這天晚上的會議後，關於張春橋有歷史問題，張春橋是叛徒的話還在外面流傳。游雪濤小組在外面捕捉動向，發出了警報，認爲上海正在醞釀第二次炮打。他發了一期簡報，題目是《條頓劍在行動》。當時有一部德國的紀録片叫《條頓劍在行動》，反映法西斯企圖復活，納粹要繼續上臺的情況。游雪濤引用這部紀録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勢劍拔弩張，上海又要再一次地炮打張春橋。

但我當時估計不足，認爲他們在上海翻不起浪花，所以還是集中注意力搞好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在大會上做了一個全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總結報告，張春橋在大會上也做了一個講話。

那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初，會議閉幕時，他上臺講話。那天很特別，他照例先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以后，接着說："最近的形勢大好，北京開了一個粉碎'二月逆流'的大後、大會揪出楊、余、傅。"他介紹楊、余、傅三人身份的時候，把余立金說成吴法憲，我們都楞住了。吴法憲是林彪非常信任的，軍委辦事組重要成員，空軍司令員，張春橋在講話時把余立金的名字錯說成了吴法憲。我在下面很着急，向他使眼色，張春橋發現自己講錯了，馬上在會上改正，但已經傳出去了。大家感到這事出在張春橋身上，好像很不應該。那天講話結束后，他下來時臉色很尷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議論，包括朱錫琪在內。

事情就這様慢慢地積纍起來，四月初，上海街頭已陸陸續續地出現了大標語："打倒楊、余、傅，揪出黑後臺。"我們理解楊、余、傅的後臺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帥，還没有把黑後臺想到上海來，當時張春橋的軍隊職務還不怎么高，最多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我們想，不可能成爲代總參謀長等人的"黑後臺"。

上海活學活用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開過後，《文匯報》、《解放日報》每天都是幾版幾版的發講用稿和消息，我們認爲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華社認爲這是地方活動，没有在全國發消息。接着，報紙上出現張春橋到江蘇、浙江去參加當地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報道，新華總社在發稿時，都没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頭銜，但是在報道其他人如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許世友時，提到他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而對出席祝賀的張春橋，只説他是上海革命委員會主任。

"四·一二"炮打后，我問過張春橋，我說："你參加江蘇、浙江兩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時，報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軍區的兩個身份？"張春橋説："他們新華社記者倒是寫上去的，但審稿時讓我刪掉了，因爲中央没有授權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賀，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負責人身份去的。"這樣，又引起一些人的懷疑。朱錫琪曾問我："報道中怎么没有寫張春橋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又說，"你看，到現在爲止新華社也不發我們上海市積代會的稿子，我要上海新華分社發稿到總社，他們還是没發。"

還有一件事，當時第二軍醫大學内部有兩派，一派"紅旗"，另一派"紅縱"。"紅縱"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爲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支持上海奪權，"紅旗"没有支持。但是"紅縱"在北京要打倒邱會作，正好與"紅旗"相反，"紅旗"是保邱會作、擁護林彪的一派。張春橋和我們比較傾向"紅縱"，市革命委員會開全體委員會議，都把"紅縱"請來。"紅旗"感到疏遠他們，對張春橋不滿，他們刷出"揪出楊、余、傅的黑後臺"的標語，署名是"三軍無革派"。朱錫琪在籌備"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時與"紅旗"的人接觸，他同意"紅旗"觀點，堅決反對炮打邱會作，邱會作當時是解放軍總后負責人，也是林彪心腹。朱錫琪幾次表示，市

革命委員會不能光與"紅縱"聯絡，也要把"紅旗"吸收進來。

四月七日，《北京日報》發表《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撲》的社論，提出"揪出楊、余、傅的黑後臺"的口號。朱錫琪要求轉載這篇社論，我認爲，從林彪講話和中央幾個領導人的講話中看不出還要揪黑後臺的進一步動作，所以我說："《北京日報》是北京的地方報紙，不是中央的《人民日報》，也不是新華社和《解放軍報》，他要揪出楊、余、傅的黑后臺是什么人，不明確，我不同意轉載。"這樣，朱錫琪對我也很不滿意，認爲我壓制他們捕捉到的新動向。

接著，《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艾玲用保密機給朱錫琪打了一個電話。艾玲說，北京學生也在傳說張春橋是叛徒，還說是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用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霍士廉曾做過浙江省副省長，后來調任陝西省委書記，當時也已經靠邊。這個說法傳出來，朱錫琪很相信。艾玲還通過保密機給朱錫琪傳來一條很重要的消息，說她丈夫賀瑞林在總參二部能看到中央的傳閱文件，中央傳閱文件后面附有中央傳閱名單，賀瑞林告訴艾玲，這個名單裏有姚文元，沒有張春橋。這條消息傳來，使朱錫琪吃准張春橋有問題。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錫琪在《文匯報》開了一個範圍極小的會，分析形勢，議論的內容是：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新華社爲什么不發報道？《人民日報》爲什么幾個月不轉載上海的社論？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萬人大會爲什么張春橋沒有去參加？江蘇省、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張春橋爲什么沒有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頭銜？爲什么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提出要用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爲什么上海沒有人參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會？提了好多懷疑，然后議了一個《十個爲什么》的傳單，署名是"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爲什么戰鬥隊"。文人搞炮打，還是有水平的，在傳單裏沒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指的方法。所以現在我看見好多人的文章裏提到"四·一二"《文匯報》寫的傳單上公開點名張春橋怎么怎么，這完全不符合當時的事實。他們幾個人高明的地方就在這裏，連最后提的口號是"誓死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以前的口號都是"誓死保衛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他把

“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的”幾個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馬上會産生一種聯想。他們基本上用文字戰的辦法來寫這份傳單，署名是“爲什么戰鬥隊”。傳單寫好后，連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張，到處張貼、散發。

四月十二日清晨，我正在睡覺，原來寫作組的朱維錚把我叫醒，他已經從墻上揭了一張傳單給我。我一看，這明顯把矛頭指向張春橋。我急忙把傳單給張春橋送去，他還没有起床，我叫他秘書來拿。我這裏到處告急，八點鐘上班時間還没到，很多人已圍在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樓前，貼大標語的有很多是穿軍裝的。他們拿着漿糊桶，從市革會大樓一路貼來，一直到“工總司”（總工會）大樓，穿軍裝的人貼標語時，把領章、帽徽都拿下來，表示他們不是現役軍人。當天，大標語鋪天蓋地貼了很多。王洪文給我打電話説“我問這些貼標語的人是什么單位的，他們不肯回答。大標語后面的署名都是‘三軍無産階級革命派’。”我把情况不斷地報告給在興國路的張春橋，他秘書來來回回，一會兒拿標語，一會兒拿外面情况材料，一會兒拿電話記録。

上午九點鐘左右，朱錫琪肩上挂着軍用背包，晃晃悠悠地來到康平路院子裏，他是來觀察動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我馬上把他叫到辦公室：“朱錫琪，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説：“不要緊張嘛，楊、余、傅的黑後臺誰都可以揪的嘛。”

我説：“你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你跟誰打過招呼了？”我把“爲什么戰鬥隊”的傳單拿給他看，并説：“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説“我們傳單上又没有點名。你看，傳單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嗎？没有啊。周總理説過，除了毛主席，誰都可以懷疑。”我吃了一驚，什么時候周總理講過這種話。朱錫琪很神秘地笑笑，露出兩個寬門牙，説“我是從北京紅衛兵小報上看到的。寫傳單，誰都有這個自由嘛。我們爲什么不可以寫呢？”

我説“你還講自由啊？你究竟還是不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當天，我給他氣得聲音都有點發抖，我們兩人正在房間裏吵的時候，馬天水來了，他看到我們兩人造反派對造反派，誰也不買誰的賬，也不好參加進來。

朱錫琪說"我爲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誰也沒有資格罷我的官！"聲音響得有些嘶啞了。

我說"那好，現在春橋同志還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吧，中央也沒有罷他的官，我們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你現在跟我到他那裏去一次，匯報匯報你們的活動，這總可以吧。"

馬天水一聽，覺得這是一個辦法："對，我們一起去，把問題談談清楚。"我馬上拿起電話，直撥興國路的電話號碼，朱錫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說："我不去。"把門拉開就走了。

張春橋奉召飛往北京

我們幾個人，王少庸、馬天水、我、王承龍都在辦公室裏議論這件事。張春橋打電話來叫我們到他那裏去。那天，張春橋很特别，特意叫理發師給他理發、刮臉，顯得鎮定沉着。他看見我們很着急，就對我們笑了笑，讓我們坐下，說："不要緊，他們勁頭還挺大的。我剛才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文匯報》轉載的《北京日報》社論，裏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譚震林式的人物，廣播員興奮得連聲音都變了，他們究竟想干什么？"

我們看到張春橋談笑風生、鎮定自若的樣子，覺得他總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我們說："上海的動向應該讓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給他打個電話，特别是把軍隊裏有人炮打張春橋的情况告訴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見？"我們就在張春橋辦公室給姚文元打了電話。

姚文元非常吃驚，說："我還不知道這情况，我馬上向江青同志匯報。"過了十五分鐘，姚文元回電說"江青同志非常重視上海發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橋同志問好。關於軍隊裏有人參加炮打的問題，江青同志說，她馬上找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同志談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對這事很重視。我腦子裏一轉 爲什么找李作鵬呢？第一，因爲這裏涉及到保邱會作還是反邱會作的問題，找邱會作不方便。第二，前兩天張春橋大會講話的時候，把余立金錯說成吴法憲，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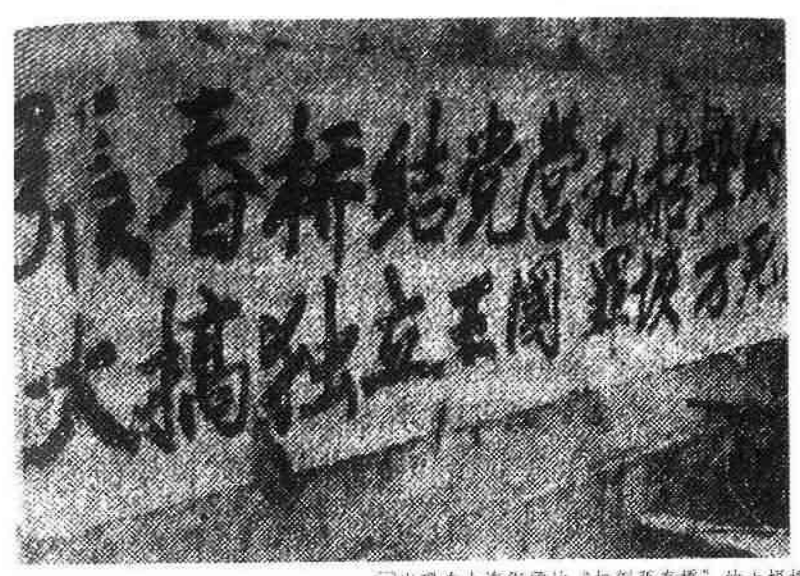
吴法憲也扯進來，所以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鵬是海軍第一政委，又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之一，可以找他。我們一聽江青出來保張春橋，心裏就比較定了。但我覺得光是姚文元、江青還不够，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報告此事。我知道，張春橋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較方便，所以我對張春橋説："是不是給毛主席、中央發份電報，把上海的情况寫一寫，我來起草。"張春橋没有表示反對，感覺到我的考慮還是挺周到的。

我離開興國路回到康平路，獨自寫了份絶密電報，把上海炮打張春橋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勢，特别是有穿軍裝的人上街刷標語、大字報，參與炮打的動向，都寫了進去。電報寫好后，我自己簽發，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義通過機要室火速發給中央、毛主席。電報發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帶了"工總司"一批頭頭來，他們商量要反擊。我把朱錫琪他們炮打的情况以及張春橋的意見告訴他，有一條意見比較明確，即不要組織搞反擊，一搞反擊的話，馬上會變成兩大派打内戰。

王洪文説："我們假如不明確地反炮打，基層造反派可能就亂套了。"王洪文告訴我："'工總司'内部有人已動摇了，比如文攻武衛指揮部頭頭張寶林，就在圍墻上跟着《文匯報》'爲什么'戰鬥隊刷標語，不承認上海市革委會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了。"

我與王洪文談話的時候，正好收到一張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匯報》，第三版上全文轉載《北京日報》社論，社論題目是《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撲》。第三版還用通欄大字標着五句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連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也没有了，張春橋、姚文元當然更不提了。我對王洪文説："你到總工會大樓上面挂一條標語下來，寫上'誓死保衛毛主席親自支持的、以張春橋、姚文元爲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樣一來，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見你們'工總司'的態度。我們打標語戰，不搞反擊。"

那天下午，中央派專機到上海把張春橋接到北京。我很清楚，這肯定是我們給中央發的電報以及姚文元向江青匯報的結果。張春橋臨走前，要我們對他去北京一事對外暫時保密。張春橋走后，我乘車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標語很多，署名大都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時多



□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打倒張春橋"的大幅標語

好幾倍，學生很多，特別是復旦大學的，拿着漿糊桶，從學校貼到最熱鬧的馬路上，不光墻壁上，連商店櫥窗上都貼滿大標語。標語的内容都升級了："揪出楊、余、傅的後臺張春橋！""打倒大叛徒張春橋！"張春橋的名字被倒過來，劃上紅圈圈，打着大叉叉。具名是"復旦大學抓叛徒戰鬥隊"、"復旦大學送瘟神戰鬥隊"。看熱鬧的人跟着貼標語的人，在路上擠來擠去。我的車從外灘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大樓兜到南京路，慢慢走不動了，到浙江路口，各種各樣的人像潮水一樣涌來，議論的、看標語的、貼標語的，一片亂哄哄。車輛被堵在那裏，排成長隊。到第一百貨商店門口，車徹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車窗上的窗簾拉起來，免得人家看到。幾個年輕人跑到車頭前面，出於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個人叫起來："徐景賢！徐景賢！"一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賢跑到這裏干什么，便都圍上來。警衛員坐在前面連忙把兩邊的車門保險按住，揮手讓他們走。我裝得很嚴肅，不流露出任何情緒化的東西，但是我很尷尬：人家在炮打張春橋，我在南京路上做什么，十分引人注目，好像在凑熱鬧。後來警衛員對司機説："無論如何要衝出去。"駕駛員拼命揿喇叭，整整用了十幾分鐘，才衝出一段，後來警察來了，

把人排開，我才衝出“重圍”。

回到康平路辦公室，臨近下班時，東海艦隊送來一份電話紀錄，海軍第一政委、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同志的三點電話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同志，我們軍隊不要介入。第二，已經貼出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第三，不要搞反擊。電話指示先傳到東海艦隊，東海艦隊再給我們傳來。很多書上寫着，那天吳法憲乘飛機到上海，傳來四條指示，没有這回事，吴法憲在這事裏没有出現過。

除了李作鵬的三條指示，我也接到復旦大學空四軍軍宣隊的電話報告，説他們接到空軍通知，已向學生們明確表態，反對炮打張春橋。復旦軍宣隊負責人是方耀華，因爲復旦大學是當時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們的表態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鵬的電話指示和空軍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態度。這時，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工作人員向我們反映，上海政宣系統群衆思想非常混亂，因爲政宣組組長朱錫琪主張炮打。政宣系统分成兩派，反對炮打的一派要求與《文匯報》和朱錫琪辯論，我一聽，既然李作鵬和空軍的指示都來了，我手裏有了王牌，政宣系統要搞辯論，我説：“那好，我們連夜召開宣傳文化系統大型辯論會，通知朱錫琪他們到場。”我和王少庸、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場大辯論，早上朱錫琪特地到這裏，態度强硬，我們准備晚上跟他們面對面幹，我是要去參加的，看看還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説，他和王承龍在康平路留守，馬天水自告奮勇地説：“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説：“是不是請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高志榮也一起去。”我説：“好，建議在會上由他傳達東海艦隊收到的李作鵬三點電話指示。”

那天晚上，在外灘市革會底樓大廳召開辯論會。我、馬天水、高志榮出席會議，在主席臺長桌前就座，會場裏座無虚席，四周過道上都站滿了人。來的不但是政宣系統、文化系統各基層代表，而且還有工交組、財貿組、科技組、地區組、郊區組等系統的代表。朱錫琪帶着《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當天我主持會議，宣布辯論會開始。

朱錫琪那邊先聲奪人，好幾個人站起來，提出各種各樣的質疑“既然周總理講什么人都可以懷疑，爲什么我們不可以寫‘爲什么戰鬥隊’

的傳單？"

其他單位的人反駁"隨便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懷疑一切的反動思潮的表現。"

接著，朱錫琪站出來發言了，他說話咄咄逼人："我們《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爲什么戰鬥隊'今天是宣了誓來的，决心要學習邱會作同志的硬骨頭精神，不獲全勝，决不收兵。我在這裏再提幾個爲什么：爲什么中央没有叫張春橋去參加'三·二四'大會？爲什么張春橋參加江蘇、浙江兩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時候，新華社發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爲什么北京都在傳説張春橋是叛徒？請大家好好想一想，這就是中央對于張春橋的態度嘛。"

我一聽他還在繼續煽動群衆，非常生氣，因爲有李作鵬電話指示的底，我一拍桌子，大聲説："朱錫琪，你到現在還在散布謠言，蠱惑人心，我現在就來答復你幾個爲什么：中央召開'三·二四'大會，文元同志已經在北京了，春橋同志要到江蘇、浙江去祝賀，所以没有參加大會，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懷疑的？第二，張春橋到江蘇、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去祝賀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義去的，凡是搞新聞報道工作的人都懂得，什么時候用什么頭銜，什么職務、職稱，你朱錫琪難道就不懂嗎？第三，你參加過市革會的小會，明明知道春橋同志没有被捕過，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廣衆面前，公然散布謠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説的中央對張春橋的態度，我也可以告訴你，同時也告訴大家。現在我們就請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東海艦隊高志榮副司令傳達中央軍委辦事組領導、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同志的三點電話指示。"因爲前面没有提起過有中央軍委電話指示，所以大家非常驚奇，朱錫琪他們也非常注意。

這時候，穿着灰藍色海軍軍服的高志榮清了清嗓子，他是長征老紅軍，從皮包裏鄭重其事地拿出三點指示的電話紀録單，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來。念了一遍還不够，又重復地念了第二遍。全場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記録。高志榮説："我們上海部隊堅决執行中央軍委首長指示，我們决不參加炮打。"接着，馬天水發言，强調中央對張春橋很重視，他説："我和春橋同志長期共事，我了解春橋同志的

歷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我根據中央來電的指示，進一步發揮："朱錫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樣，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這次性質更嚴重，上海主要報紙的主要負責人，又是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政宣組組長居然帶頭炮打。"朱錫琪在下面臉色有點發青，頭上不斷冒汗。

大家都叫："朱錫琪表態！朱錫琪表態！"這時候，朱錫琪沒有表態，《文匯報》三個造反核心之一的邵傳烈表態擁護中央軍委辦事組三點指示。我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統還要回去傳達，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統召開大會批判朱錫琪。

如此一來，全市的炮打形勢急轉直下。第二天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政宣系統的批鬥會，朱錫琪到場受批判。我和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讓他再領導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要他回《文匯報》繼續接受批判。我們決定調上海警備區的團政委繩樹珊到政宣組主持工作。

另外，《文匯報》不能再讓朱錫琪負責。我和王洪文、王承龍商量，外面派人進去不好，還是要《文匯報》自己的力量繼續主持工作。朱錫琪、邵傳烈、周國榮三個造反頭頭中，邵傳烈態度較好，平時與我們的關係比較密切，他的文字比較好，我曾把他調到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參與起草"九大"黨章的草案，同時在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專門編寫過簡報。這樣，我們連夜把邵傳烈找到康平路個別談話，批評他卷進"四·一二"炮打的錯誤。邵傳烈跟我們講他思想演變的過程，特別講到艾玲用紅機子從北京給他們傳消息，使他相信了張春橋有問題。他表示懺悔，流着泪向我們檢討，承認錯誤。我們當場要他把《文匯報》的編輯擔子挑起來。但是叮囑他，凡是遇到重大問題，必須隨時向市革命委員會請示，邵傳烈答應照辦，以後，《文匯報》每天版面的定稿情況他都用紅機子打電話向我匯報，請示得非常頻繁。

最使我們不能容忍的是在市革命委員會要害部門出了"動搖分子"。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組組長，原在市委組織部造反，是部隊轉業干部。這個人給王承龍看中，王承龍讓他掌管市革會組織組，這個組裏還有幾個負責人，是市監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這些人得到王承龍的信任，王承龍還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誰知道，這個組織

组組長在外面炮打的關鍵時刻倒戈了，他和幾個頭頭商量，私自從檔案保險櫃裏找出張春橋檔案，當時張春橋、姚文元檔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調走，上海只留下他們檔案材料的簡本。外面傳說張春橋是叛徒，從檔案簡本裏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們又擅自翻閱張春橋妻子李文静的檔案，看到李文静被日軍俘獲，后來投敵爲日本人效勞的歷史情况，這幾個組織組負責人看了以后，還議論過。本來他們認爲這是秘密地看檔案，不會對外泄漏，誰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勢逆轉以后，有人就出來告發這事。

幾個組織組負責人偷看市領導及李文静檔案的事被揭后，我們非常生氣，怎么會出這種事情？王承龍有苦說不出。王洪文與我商量，要發動群衆揭組織組的蓋子。王少庸提出，在那裏的市領導人的檔案，不光是張春橋、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的，都要拿回來；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檔案，也要抽出來，加上封條送到他辦公室鎖進保險箱，不然，那裏要是再看，怎么得了？這樣，我和辦公室負責人朱玉佩兩人進入檔案室，指令組織組工作人員打開一個個鐵櫃，看到《張春橋檔案簡本》和《姚文元檔案簡本》，我也很緊張，不敢打開看，我說："趕快把它封起來。"這樣，好幾個工作人員把這兩個檔案簡本和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承龍的檔案，還有王洪文的新檔案袋，都捆起來，然后用封條封好，由我和朱玉佩兩人監督，押送到王少庸辦公室。王少庸叫人當着我們的面把檔案放進他的保險櫃裏封起來，免得以后有人從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對我說："市革會組織組這樣不行，我要派人進去。"實際上，王洪文覺得他掌管的部門比較少，組織人事大權很重要，他認爲抓權的機會來了。他說："我要派一個工人出身的到組織組，機關裏的人關鍵時刻就動摇，我不放心。"我本來對王承龍獨攬組織大權不滿意，認爲他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的，我說："你派人進去，我同意。"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張派工人代表進去，也同意了。王承龍吃了一記悶棍。這樣，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組織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閔行地區上海電機廠工人，黨齡和工齡都比較長，三十

多歲，曾在車間擔任工段長，造反以后，曾在“工總司”閔行聯絡站工作。金祖敏爲人謹慎，不像王洪文別的小兄弟在外面衝衝殺殺，犟頭倔腦，經常惹出亂子。王少庸在上海電機廠搞過“四清”，也認識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來，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組織組宣布金祖敏擔任一把手，從此以后，上海組織人事大權從王承龍手裏轉移到王洪文手裏。

接着，我們在上海連續不斷地開會，肅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張春橋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二OO號文藝會堂的上海群衆組織負責人大會上，詳細介紹了這次炮打經過，批判了以朱錫琪爲代表的懷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還聳人聽聞地用歷史來對比，我說“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發生過一個‘四·一二事件’，當時是獨夫民賊蔣介石叛變中國革命，屠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這個日子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四十一年以後，上海又發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對准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他們爲什么選擇這樣一個日子來炮打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這些現象不值得引起我們深思嗎？”這樣，我把兩個“四·一二”相提并論來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機關和市人委機關兩個造反聯絡站勤務組成員與下屬造反隊負責人會議上，我說得更徹底：“要是社會上有些人受了懷疑一切的反動思潮的影響，參與了炮打，這還可以想象，但是這次在我們機關內部，居然也有人起而響應，這是不可原諒的。”我在講話中對張春橋歌功頌德：“我們兩個機關造反聯絡站所有造反隊成員，都長期在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身邊工作，難道我們對他們兩人還不了解嗎？一九六七年初，他們一到上海的時候，春橋同志就宣布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是他們的工作機構，而現在作爲這個機構的工作人員一有風吹草動，居然掉轉炮口，向自己的領導開火了，這種性質還不嚴重嗎？我們要問這些人，你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堅定性到哪裏去了呢？有的人爲自己辯護，說只是五分鐘動搖。不行！一分鐘動搖都不行！”我當時疾言厲色，宣布兩個聯絡站重點整風，實際上是要檢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表現，有沒有錯誤言論，來勢非常凶猛。市委監察委員會有個工作人員，在“四·一二”時，議論過張春橋的歷史，現在要追查，

他很害怕，從延安西路三十三號海格大樓七樓跳下，當場身亡。這也是在“四·一二”整風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

這樣一來，《文匯報》的炮打被壓下去了，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組織組以及兩個機關造反聯絡站內部的基礎穩固了，但是我們聽說，復旦大學有一部分學生還不服氣，這個單位還沒有穩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龍、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四軍副軍長姬應伍等市革命委員會所有領導成員，一起開到復旦大學大飯廳，召開大學各年級紅衛兵代表大型座談會，我們還把在這次反炮打中表現最堅定的兩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同濟大學陳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靜慧，也請去了。雖然名義上是開座談會，但是所有領導輪番發言，陳敢峰和高靜慧也發言，大家都批判所謂的炮打逆流，爲張春橋唱贊歌，把復旦大學炮打的聲勢全部壓了下去。

過了一天，王洪文給我送來一份材料，說國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參加炮打。我們說：“參加炮打的穿軍裝的人露頭了。”我們懷疑，幕后是有人指揮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統的炮打情況。

毛澤東說：“無事。”

我們把上海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況，每天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書面的、口頭的都有，游雪濤小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報、大標語、口號收集編印了厚厚一本，作爲原始炮打資料，裏面有“打倒大叛徒張春橋”的口號。

正當我們在上海很起勁地追查的時候，一天晚上，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我，他主動問：“朱錫琪這幾天的情況怎么樣？”

我告訴他：“正在《文匯報》接受批判。但是檢討很不深刻，群衆通不過。”

張春橋說：“那他還是願意做檢查的羅？”

我對他的話摸不着頭腦，回答說：“這個嘛，他也是被迫的。”

張春橋接着說：“肯做檢查嘛，也就可以了，群衆通不過，我們去

做做工作。這樣吧，你到《文匯報》去，親自召開一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也派人去，包括朱錫琪手下的一幫人，都要參加。讓朱錫琪在會上做一次檢查，他檢查完了后，你就帶頭鼓掌表示歡迎。"

我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說："這恐怕比較困難，群衆情緒一下子扭不過來。"我嘴上這么說，心裏想，其實我自已也扭不過來，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張春橋在電話裏聽出了我的爲難之處，他勸我說："要考慮到群衆嘛，這次炮打，卷進去的人很多，我們把朱錫琪解脱了，其他人心裏的這塊石頭就放下來了。"

我說："有些問題還剛剛露了個頭，遠遠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隊的問題，我們剛剛布置下去。"

張春橋說："不要查了。復旦大學、二軍大、國防科委這些單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你把《文匯報》的事情落實，可以宣布朱錫琪留在報社參加一般的編輯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況回來以後再跟你們說。"那天接了電話以後，究竟怎么回事，我確實弄不明白，但是對張春橋的話，我一直是堅决執行的。

第二天晚上，我根據張春橋指示，到《文匯報》去召開大會。因爲前面我們不斷地加温、升級，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怕到會的人缺乏思想准備，會上如果很多人對朱錫琪的檢查不滿意，進一步使批判升級，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事先跟市政宣組負責人繩樹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幾個人，把底告訴他們，在朱錫琪做檢查以後，發言表示歡迎他的進步。繩樹珊也摸不着頭腦，他是部隊干部，對地方造反那一套很不習慣，上級命令他怎么辦，他就怎么辦，前兩天還要他不斷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對朱的檢查表示歡迎，他發愁地說："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我先說了一段開場白："一個人犯了錯誤不要緊，只要願意改正錯誤，就是好同志。我們今天也給朱錫琪同志提供這樣的機會。"下面的人一愣，從市革會大廳大會到今天爲止，我没有叫過朱錫琪一聲"同志"，大家感到我講話的調子跟前幾天大不一樣。朱錫琪那天站到臺前，頭也抬不起來，心情沉重，他把怎么卷進炮打的來龍去脉講一遍，應該說，檢查還比較深刻，有進步。他剛剛講完，人還没有離

開擴音器，我就帶頭鼓起掌來，這真叫"孤掌難鳴"，全場的人没有思想准備，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長脖子看臺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聲音。只有繩樹珊和政宣組幾個人因爲事先已有布置，跟着我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這稀稀拉拉的掌聲，算是完成了張春橋的任務。接着我引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這次的事件給我們的教訓呢，就是知識分子跟工農群衆不一樣，一遇風浪，前者動搖，后者堅定；前者曖昧，后者明朗。這是毛主席早就教導過我們的，我們應當從朱錫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訓。朱錫琪同志今天的檢討是值得歡迎的，市革命委員會决定，根據他對錯誤的認識，讓他從明天起參加《文匯報》編輯工作。希望《文匯報》全體革命同志，團結起來，振奮精神，不要辜負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産階級司令部的希望，把報紙辦得更好。"説到這裏，全場才熱烈地鼓起掌來。那天，朱錫琪也感動得流泪。《文匯報》有些人，本來確實覺得臉上無光，因爲整朱錫琪，把《文匯報》也整得够嗆，這樣一來，《文匯報》的工作也正常起來。消息很快地在全市傳開，各系統的清查活動暫時停息下來。

張春橋回到上海後，把王少庸、馬天水、我、王洪文等比較核心的領導找到興國路招待所。那天，他穿着軍裝，顯得很精神。他坐在籐椅裏，一面抽烟，一面跟我們講話。張春橋喜歡抽没有過濾嘴的中華牌烟，他嫌帶過濾嘴的烟抽起來没勁，香烟把他的手薰得焦黄焦黄。他噴出一口烟，説："我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誰知道，我去的時候，老人家已經站在門口等我呢，我趕快上去和主席握手，問主席好，心裏非常不安。"張春橋説到這裏，顯得非常感動的樣子，我們幾個一聽，也被感動了，説明毛主席對張春橋是十分信任、十分關心的。張春橋接着説："我向主席匯報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談到這次炮打，主席説'我已經知道了，就是爲這件事特意把你找來的。你可以對那些炮打你的人講'無事'。北京不是有個謝富治嘛，學生炮打他，他對學生們講'無事'，那些學生就炮打不下去了。"聽了這段傳達，我們才明白是這么回事，所以張春橋要我們來個急轉彎。我和王洪文交换了一下眼色，兩人會心地笑了，説明毛主席高明啊。張春橋那天説："游雪濤小組怎么還編了這么

一本東西。"他非常不滿意，說："立即全部收回，銷毀。這些東西留着幹什么，要惹禍的。"我們回來后馬上要游雪濤把它銷毀。游雪濤本想做一件邀功的事情，結果吃了一個批評。看起來，"四、一二"炮打的追查工作似乎到這裏告一個段落了，但是，事情遠遠没有結束。

張春橋后來多次與我們談話的時候，說到穿軍裝的人炮打，總是很惱火。他多次提到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點可以查，我們也都覺得這些問題没有查清楚，都是隱患。所以到一九七〇年，全國、全市範圍都搞清查運動時。王洪文提出全市要清查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十大事件，把一九六七年"一·二八"炮打和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列爲其中重點清查的兩大事件。清查十大事件得到張春橋的正式批准。

我想，一九六七年炮打的時候，毛主席不是說："紅革會這筆賬是要算的。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嗎？"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又說"無事"。我認爲"無事"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炮打張春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應該把它查清楚。這樣，我們通過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把原來一批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紅革會"頭頭，重調回上海，給他們辦學習班，實際上是隔離審查，最后把"紅革會"原負責人馬立新（復旦大學"紅革會"）、李功佐（上海師院"紅革會"）、勞元一（復旦大學"紅革會"）定爲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把他們重新分配到外地。"四·一二"炮打后，朱錫琪已經在做一般的編輯工作，他聽了傳達，十大事件中有一個是關于他的，很害怕，逃走了。在外面東躲西藏了好幾天，走投無路，最后只好回來。清查時，不光查朱錫琪，還查周國榮，查《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當時《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曾給上海傳來幾個重要信息，在"四·一二"炮打后負責人艾玲給中央文革寫過檢討，陳伯達看了以後，批了兩個字："很好。"還說艾玲寫了一個又長又好的報告，陳伯達表揚了，張春橋就没話講了，當時就没有整艾玲。后來艾玲調回上海，在朱錫琪下臺後，做過《文匯報》革命委員會主任。上海清查時，發現艾玲與林彪下面的王維國那些人接近，張春橋采取措施對艾玲隔離審查，對《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全體成員也審查，打擊面很大，有關艾玲的詳細審查情況我在后面專門說。當時《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十幾個人，統統被弄到上海，關在上海民兵指揮

部，罪名是炮打的時候辦事處給上海傳回懷疑張春橋的材料，每個人都被審查，有的是資格很老的報人，有的是一般的編輯、記者，也有的是一般工作人員，如打字員、機要人員。不光這樣，當時我們寫作班派去北京辦事處的朱維錚，與艾玲關係很好，兩人無話不談，議論過江青過去的歷史以及在延安的表現。審查艾玲時，把朱維錚也關起來。朱維錚思想不通，關在民兵指揮部的時候，他在裏面大聲地叫喊、用拳敲、用脚踢鐵門，要求把他放出來，没人睬他。查了很久，查不出《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有什么問題，只好把那些人放掉，但艾玲一直被關着。艾玲的消息是從她丈夫賀瑞林那裏來的，張春橋就記仇了，林彪事件以後，張春橋任總政治部主任，利用他在軍隊的權力，要總政專門查過賀瑞林。

據有關部門統計，上海因爲參加炮打張春橋而受到打擊迫害的有兩千五百多人，一般請罪和寫檢查的不計在內，其中隔離審查、不能回家的有兩百多人，辦學習班審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審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瘋。

葉群林立果上海“選美”内幕

林彪、葉群爲兒子林立果找美女、選“妃子”的事，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也屢見報刊披露，但有相當一部分是道聽途説，有的甚至是胡編亂造。

我對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全國各地“選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對他們在上海的“選美”活動，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爲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周恩來總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王維國專案組，每天要把清查的進展情況書面報告給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選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筆記本、照相册以及僞裝的照相機等，還有參與此事的有關人員的交代，當時就感到驚心動魄，難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現在我把它們實録下來，公諸于世，以正視聽。

葉群派員來滬試探

葉群、林立果在上海“選美”，開始的時候只敢小規模偷偷地進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葉群通過她所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從北京派了一個幹部，拿着海軍李作鵬的介紹信，爲她的兒子到上海“選美”。那個干部到上海後找了東海艦隊高副司令，説是要在上海物色幾個女青年，調到海軍系統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高副司令當時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就擅自給他出具了市革會某部門的介紹信，讓他到基層去自己選拔。這個幹部行動非常詭秘，一會兒穿海軍軍裝，一會兒穿陸軍軍裝，今天去學校，明天下工廠，東打聽，西盤問，專找漂亮的女青年，引起了群衆的懷疑，向上級領導作了反映。上級領導派人查問此事，那個幹部見情況不妙，趕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果組建“找人小組”

這以後，林立果就親自出馬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軍内物色人員，建立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開始時選了最貼心的八名核心人員，所以叫“八人小組”，后來又擴大成員，由林立果親自命名爲“上海小組”。關于這項“選美任務”，當時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林彪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成員）對他的心腹説：“這是爲天才人物選助手，是有偉大深遠的意義的。”

林立果當時的身份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但在空軍裏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他爲“上海小組”題了字，製作了精緻的組標，還親自來上海主持授槍儀式，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凡是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都要舉行“小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長”，爲“林副部長赴湯蹈火”，“絶對保守林副部長的機密”。“上海小組”的成員還要認真學習《人組需知》，該“需知”稱：“本小組的任務，是完成無産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上海小組”的成員后來發展到二十多人，都會打槍，會攝影，會駕駛汽車。每個人配備了一輛蘇聯造的“伏爾加”小轎車。王維國也參與領導這個“上海小組”，他下令説：“小組的每一件工作行動，都要有助於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長”。“上海小組”爲林立果“選美”的行動，對外當然是絶對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連空四軍的有些領導也不了解這個小組的内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上海小組”的成員采取了隔離審查的措施，同時繳獲了《人組需知》、“誓言”、林立果題寫的組標、“選美”用的照相機、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上海小組”成員陶某的一本記錄本。按照林立果的規定，關於他的任何活動，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這個陶某當時却忽發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每一次活動，按照時間的先后作了詳細的記録。等到林立果和林彪一起毁滅之后，這本記録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惡的重要罪證，使我們對於林立果在上海“選美”的種種丑態，有了比較真實而具體的瞭解。

"選美"據點：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動，都住在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大院內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裹。這裹原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文革開始後被占用了。花園洋房被高高的圍墻包圍着，汽車從巨鹿路穿過一條長弄堂，可以駛進大鐵門一直開到客廳前面的草坪旁邊。另一扇小鐵門，又可以直通空四軍招待所大院。這個地點既隱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這裹直接指揮"上海小組""選美"。

"上海小組"的找人方式種種

小組的成員都集中在招待所裹，基本上是兩人一檔，共同行動。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參加其中的一檔。

"上海小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種是"盯梢"。這是舊社會上海的流氓、惡少慣用的伎倆：看見漂亮的女子，就死氣白賴地緊盯在人家后面，不把人家弄到手決不罷休。不過，林立果所采用的是現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過去上海灘上的洋場惡少、流氓地痞們所望塵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參加的兩人一組的轎車出動，左邊握着方向盤開車的是"上海小組"的一個成員，右邊前座上就坐着穿軍裝的林立果。轎車沿着馬路邊的人行道，緩緩地行駛；林立果就在車窗口伸着腦袋，蹙起他那又濃又黑的眉毛，用鷹隼一樣的眼睛，尋找他的獵物。

他們盯梢的時間往往選擇在工廠、學校、機關、商店上班的時刻，馬路上來往的行人絡繹不絕。林立果發現了長得漂亮的年輕姑娘，馬上命令左邊的駕駛員跟上。轎車就慢速前進，緊緊尾隨着被"盯"的姑娘。有時候，正好瞥到一個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轎車迎面交錯而過，林立果就下令要轎車立即調頭，繼續跟上路邊的姑娘。

這種轎車盯梢，一直要盯到那個姑娘走進某個工廠或者學校爲止。林立果他們也就趕快下車，跟着她進門，認准她的具體去向。然後回過頭去找這個單位的人事部門，拿出部隊的證件和介紹信，聲稱是來招特種兵的——部隊文工團團員或是醫務人員等等，向人事部門調閱有關檔

案，瞭解那個姑娘的姓名、年齡、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層單位的工作人員出于對解放軍的信任和熱愛，又看到他們隨帶的證件齊全，手續齊備，對他們的要求决不會拒絶。

書面檔案摘録好以後，林立果等又當場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談話。於是，這個年輕的姑娘就被找到單位人事部門的辦公室。面對兩位軍人，其中的一個人和她隨便聊開了天，先是説明來意，然後問她想不想當演員或是醫生，有哪些愛好和特長等等 另外一個穿軍裝的人偶爾也在旁邊插上一兩句話，但是更多的時間却在擺弄一只草绿色的軍用背包。這只軍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舊，和任何一個解放軍戰士用的并無二致。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誰曾想到，就在這只毫不顯眼的背包裏，却隱藏着一架高級照相機。背包內層，四周用硬襯襯好，使它立在桌面上不會卧倒。背包的一側，開了一個小洞 裏面的硬襯上也相應地挖了一個小孔。照相機被固定在背包內壁上，它的鏡頭，正好嵌在硬襯的小孔裏。通過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機可以對准任何需要拍攝的對象，背包的另一側，拖出一根綫頭，那便是照相機的快門按鈕。當那位年輕的姑娘進來、坐下、談話及出去的過程中，她萬萬不會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側面像、説話（露齒）像、微笑像……統統都已經被攝入了鏡頭。

林立果他們“選美”活動的第二種方式，就是“相面”。這是從第一種方式發展而來的，因爲“盯梢”雖有收獲，但是費時費力，而且有一次差點出嚴重事故：林立果和旁邊開車的“上海小組”成員，同時盯著馬路上的女人看，結果駕駛員手裏的方向盤没有把穩，伏爾加轎車撞到馬路邊的電綫杆上。車撞壞了，虧得車順速較慢，林立果没有受傷，氣得他連聲駡娘。自此以後，“選美”的方式就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組”的二十來人，分成兩人一檔的許多小小組，分片包干，直接闖進工廠、學校……裏去，通過各個單位的領導，一個一個車間，一個一個教室，挨着看過去。“重點”單位如劇團等文藝團體，則由林立果親自去看演員排演、練功等，直接進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課或是排戲的年輕女孩子，誰也不會想到他們是來“相面”選人的。凡是被“選美”小組選中的人，就和第一種方式所講過的那樣，被叫到本

單位的辦公室談話，然後偷偷地被拍了照……

"復選"對象編號入册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帶回後，冲洗出來，再加以比較對照，進行復選。凡復選被選中的相片，就正式編號，粘貼進照相册。每本照相册中共貼有七、八十個年輕女性的照片，每人占一頁，寫有編號、姓名、年齡、工作（學習）單位、住址等，還特别注明了身高；文字紀録旁邊就貼着這個女性的正面像、側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還有從人事檔案材料上翻拍下來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個面容姣好、身材優美的芭蕾舞演員，她的照片被貼在這本相册的第一頁，編號爲201。當我翻閲相册時看到這些照片，着實吃了一驚，因爲這位演員是上海市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的主要演員，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樣板戲"劇組，他們的"選美"觸角也鑽進來了。相册上除了這位演員的正面照、側面照以外，還貼着一張她穿緊身的練功服正在練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圖索驥、實行"點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組"的成員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給點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動員她們參軍、入伍。可憐的女孩子，她們有的是想去部隊文工團當演員，有的是羡慕部隊領導機關優越的工作條件，也有的甚至是爲了穿上軍裝可以不再上山下鄉……就這樣，一些女青年被蒙在鼓裏，經過體格檢查，辦了入伍手續。

"獵物"入伍進學習班與個别談話

入伍以後的第一件事，先進學習班，重點學習"林副部長"的"講用報告"。這種學習班很特别，有時候只有一、兩個人也辦班。等到她們稍稍熟悉了部隊生活以后，"林副部長"就找她們個别"談話"了。

"談話"的地點就在巨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園洋房裏。林彪垮臺以後，王洪文和我到這個地方實地去看了一下。花園洋房的樓下是客廳和餐廳，大客廳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國式雕花墻板鑲嵌着，很有氣派。

但是這個地方不够隱蔽，所以林立果不願選定這間客廳作爲"談話"的地點。他看中二樓的一個大套間，外間布置成會客室模樣，淺色面料的沙發套扶手上，覆蓋着白色的花邊，沙發背上放着織錦緞的軟墊。會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軟椅子，桌上鋪着白色的臺布。"談話"都在晚上進行，"談到"半夜十一點鐘左右，招待所的厨師就會做好酒菜、夜點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組"成員送上樓來。套間的裏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墻安放着一張席夢思的大床，床上鋪着當時罕見的電熱毯。大床的兩側，擺着兩隻長條形的進口立體聲音箱；床邊的櫃子裏，放着一架立體聲收録機和當時一般人從未見過的大量盒式録音帶。林立果把卧室和"談話"客廳緊捱在一起，當然是别有用心的。

關於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談話"的詳細情况，在陶某的記録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發材料中，都有記載。一旦林立果選中哪個已經入伍的年輕女性，就由"上海小組"的成員開車去把她單獨接來，時間都在晚上七、八點鐘以后，"上海小組"的成員就退到樓下大會客廳裏等候着，這叫做"值班"。"值班"必須值到"談話"結束爲止，不得中途離開或擅自上樓，如果林立果臨時按鈴吩咐要辦什么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員上樓。

"副部長""談話"舉例

等到陪同上來的人員退去以後，在二樓會客室的沙發上，林立果的"談話"就開始了：

"你請坐，叫什么名字呀？原來在什么單位工作？有些什么愛好呀？……"明明都是早已知道的，但是從這些問題問起，可以使氣氛顯得親切、自然些。

等到女青年女性的忸怩、緊張的心態開始轉變，整個"談話"進入一個比較鬆弛的氣氛以后，林立果就逐步轉入了正題：

"你知道我是誰嗎？"

"剛才帶我來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紹過了？你是林副部長……"

"不要叫職務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嗎？"

"知道……入伍以后，聽過您的講用報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學習體會，請多提意見……不過，這個報告的錄音放給我爸爸聽過，他還是讚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不知道……"她確實是不知道，因爲事先作過布置，不讓"上海小組"的成員把底細告訴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么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么樣的幹部？"

"您都是副部長了，您的父親肯定是個高級幹部……"

"什么樣的高級干部？"

"是將軍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將軍還要大，莫不是元帥吧，可是不敢說出來。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擔任什么職務？"

"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吧？"

"哈哈！那還太小……"

"哦……"簡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兒子。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看着姑娘的驚愕的、簡直難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兩只眼睛眯成一條綫："談話"到了這個時候，收到了他預期的出奇製勝的效果。

"超天才"圖窮匕首見

猫兒在捕捉到老鼠以后，有一個習慣，就是把那只可憐的小家伙放在自己的爪子底下，撥弄來，撥弄去，看它在自己面前膽戰心驚、索索發抖，從而感到極大的刺激與滿足。當然，最後還是要把那已經到手的"俘虜"吃掉的。現在，林立果也要作"吞吃"獵獲物的表演了。但是，人畢竟不是老鼠，即使這些手無寸鐵的嬌弱的女孩子，其中也不乏剛烈之士，她們不是那么容易被欺侮、被凌辱的。因此，當林立果一旦越出"談話"的軌道，露出了利牙厲齒的時候，有的姑娘嚴詞拒絶，有的姑

抵死不從。從那個陶某的記録本來看，大概有半數以上的女青年，林立果沒有得手。

記録本上寫道："×年×月×日，副部長找×××談話，至晚上九時半結束，送回。""×年×月×日，副部長找××談話，談至晚上十時，不理想。"凡是這類記録，都蘊含着一段曲折而又激烈的鬥爭。但是，逃過了這一天晚上的人，却逃不脱另一種非常艱難的處境：由"上海小組"通知有關部門，把她放到部隊下屬單位的某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去當女兵，過着幾年與世隔絶的生活，爲的是怕她到處亂講，泄漏"機密"。

至於其他的那一些没能逃脱魔爪的女青年，在記録本上也記下了她們的命運："×年×月×日，副部長找××談話，晚十一時進夜餐，至凌晨三時結束後送回。""×年×月×日，副部長找××談話，晚十二時進夜餐，直至天明。副部長早晨説：'昨天晚上犯了路綫錯誤。'"看來，凡是進夜餐的，往往是林立果可以得手的信號；至于"犯路綫錯誤"的説法，在本子裏有過多次記録。林立果所謂的犯一次"路綫錯誤"，似乎就意味着一個清白的女孩子被糟蹋、被凌辱了。

以上就是林立果這個惡棍所干的獸行。他打着"副統帥接班人"的招牌，憑藉着手中的權力和最現代化的工具，到處横行。他的秘密據點，不僅上海有，還設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地。他以"選美"爲名，犯下了多少令人髮指的罪行啊！

就憑這一條，以"超天才"自居的林立果，隨林彪葬身温都爾汗，也是罪有應得。

影片《南京長江大橋》爲何停映?

南京長江大橋的建造，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橋樑建築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橋竣工之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當時，中央新聞紀録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彩色長紀録片，片名就叫《南京長江大橋》，記叙了從打下第一根橋墩管柱樁到大橋正式通車的全過程。片長一個多小時，配上了動聽的樂曲，公映以後受到了全國觀衆的歡迎。

影片放映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此片在全國立即停映。理由很簡單：影片的音樂有問題，受到了江青的嚴厲批評。

江青勃然大怒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紀録片《南京長江大橋》上映以後，有一個在北京的音樂界人士向江青打小報告，説是這部影片配樂的主旋律是從蘇聯歌曲《列寧山》裏抄襲來的，列寧山是莫斯科大學的所在地。江青接獲那個好事之徒的報告以后，很快調看了這部影片，聽了音樂資料，勃然大怒。她召集北京的文藝界人士和各個樣板劇組的藝術人員，舉行了一次大會，由她出面訓話。這就是一九六九年江青的"八月講話"。

江青在講話中回顧了自己"領導'文藝革命'與'文藝黑綫'鬥爭的歷史"：毛主席講文藝界存在着一條又長又粗的黑綫，挖掉了這條黑綫，還會有新的黑綫。現在，"文藝黑綫"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現代修正主義文藝的"牙慧"，把蘇聯歌曲《列寧山》裏的旋律，塞進歌頌我們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紀録片裏，是可忍，孰不可忍！因爲影片上没有創作人員的署名，所以江青下令要查一下作曲者是什么人，而且指示影片《南京長江大橋》必須對配樂作修改以后，才能放映。于是，這部影片就被從全國各地的電影院和放映隊裏，統統撤了下來。

作曲者是個青年

在調查作曲人員情況的時候，發現作曲者竟是上海的，這就引起了當時在北京的張春橋的注意。他趕緊把江青“八月講話”的全文，轉給了我，要我在上海“嚴肅處理”。我聽說江青批評了上海的作曲者，十分緊張。原來以爲可能是一個長鬍子的老作曲家寫的，誰知道調查下來，作曲者竟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名叫樂祖風，他一九六〇年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在管弦訓練大專班學習了三年，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上海電影樂團工作。

樂祖風愛好作曲，在一批老作曲家紛紛靠邊或被打倒以后，他和其他幾個青年作曲人員一起，爲當時拍的一些紀録片、科教片作曲配樂。他們所編創的一些音樂片斷，録好音以后都貯存在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的音樂資料庫裏。

中央新聞紀録電影製片廠在拍攝完成《南京長江大橋》以后，并没有聘樂祖風爲影片配樂，而是到上海科影廠的音樂資料庫裏找了一些音樂素材作爲這部紀録片的配樂，結果采用的那段主旋律，恰恰就是樂祖風寫的。至于樂祖風的家庭情況和本人歷史却是一清二白，没有什么辮子好抓。

我特地調來了蘇聯歌曲《列寧山》的唱片，和《南京長江大橋》影片的音樂録音對照着聽，覺得《列寧山》歌曲的第一部分，與《大橋》一片的主旋律確實有些相像。可是這首樂曲并不是樂祖風專爲《大橋》寫的，所以很難給他加上用修正主義的音樂丑化社會主義大橋的罪名。但是江青的“嚴厲批評”既然已經下達，必須貫徹執行。我便把實情報告了張春橋，緊接着在上海兒童藝術劇場召開全市文藝界的大會，在會上逐字逐句地傳達江青的“八月講話”，還點了樂祖風的名，説他雖然是個年輕人，但作的曲子説明深受文藝黑綫的影響，是修正主義文藝流毒的具體表現，應當對他進行“幫助”。同時强調：這次批判不僅僅是針對樂祖風個人的，江青的講話更爲整個文藝界敲起了警鐘，説明對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鬥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江青的“八月講話”傳達以后，上海文藝界爲此討論了好幾天，樂

徂風也被迫在上海電影樂團做了檢查，表示自己雖然在作曲時根本没有想到過《列寧山》這首歌曲，但是在腦子裏確實存在着蘇聯音樂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并只得表態"願意進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肅清在靈魂深處的修正主義文藝的流毒"。

音樂界"鴉雀無聲"

江青"八月講話"傳達以后，事態還在繼續發展，有人進一步引伸開去，在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聲稱"七個音符裏有階級鬥爭"；還有人捕風捉影，在上海交響樂團和上海合唱團揪出一個"反革命小集團"，誣稱作曲者在爲交響合唱《智取威虎山》配樂時，私自塞進了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的御用音樂家理查·斯特勞斯的樂句等等，無限上綱，種種莫須有罪名滿天飛，一時搞得音樂界人人自危，作曲家"鴉雀無聲"，没有人再敢譜曲了。

可是，那個年代爲了配合政治需要，重大活動像毛澤東會見外賓的影片仍然要拍，國慶節盛大游行的紀録片也仍然要放，這類片子總不能只有解説詞没有配樂呀！於是，爲了提高配樂的"保險系數"，凡是莊嚴的影片，就采用李劫夫作曲的語録歌"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旋律，可是，稍爲輕松一點的紀録片或科教片的音樂又怎么辦呢？作曲家們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意外地找到了一個"救星"。

原來張春橋擔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的組長，他親自審查通過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配樂也是一個青年作曲者寫的，影片開始時一段引子，接着唱出"春風楊柳萬千條……"，旋律比較徐緩、舒展，具有民族風格。因爲片子是張春橋審查通過的，音樂自然也就保了險，於是大家一擁而上，一時間，許多新聞片、紀録片和科教片，紛紛采用這部影片的音樂作配樂。

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審看"一部某國國家元首訪問中國南方的彩色紀録片，一聽音樂我們就皺起了眉頭，原來這部歡迎外國貴賓的影片配樂，竟是《送瘟神》！

張春橋"九大"整陳毅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終積極參與了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全過程。

關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脉，首先得從中國共産黨的八届十二中全會説起：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舉行。

這次全會是在黨内生活極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開的，八届中央委員原共九十七人，除十人去世外，還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爲"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等等，紛紛被靠邊或打倒，因此，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只有四十人，表决時連過半數的人數都達不到。爲了通過《關于叛徒、内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内外一切職務"的决定，爲了通過准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幾個文件，只能臨時把十名候補中委提爲中央委員，使他們具有表决權，這樣才使中委的到會人數達到五十名，表决時可以符合法定人數。

這次全會，把不是八届中委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擴大了進來，還把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群等擴大了進來，連當時正在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請進了會場。擴大參加者共達七十四人。

毛澤東説，陳毅"有右的方面的資格"

毛澤東主持了全會。在開幕式上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必要？是否正確？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求大家討論。毛澤東自己强調指出："這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産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接着，全會就對參加所謂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進行了批判、鬥争。當時譚震林已經被打倒，被剥奪了參加會議的資格。其他到會的六位老同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

被分隔編人各個小組，受到圍攻，聽取別人對他們的揭發批判。主要批了他們三個"反對"："反對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無産階級司令部"。揭發的結果説，這幾個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兩個攤子互相串連，反對文革，其中的"聯絡員"就是陳毅，他來往于兩攤之間傳話。按照黨内鬥争的慣例，一個人在倒霉的時候，他在歷史上的老賬就會被翻出來加以清算。這樣，陳毅早已作過檢查的關於在井岡山時期不支持毛澤東、犯了路綫錯誤的事，就被作爲今天犯新的錯誤的歷史根源，聯係起來，刨根問底，進行嚴厲批判。全會并把批判發言印成簡報分發。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會上作了一次講話，他説"二月逆流"是一次"資本主義復闢的預演"，"是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綫'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爲王明翻案。"

林彪的講話給所謂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會在討論召開黨的"九大"的准備工作時，對參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還要不要選舉他們當"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見。陳毅則表示自已當代表不够格。

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出來講話了：

"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

毛澤東吩咐：對一些細枝末節，不要去追究了。毛澤東説：對這些老同志，還是選他們當"九大"代表；"陳毅同志説他没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資格"。

事情就這樣一錘定音了。

張春橋説，陳毅"不會打仗，只會下棋"

張春橋回到上海，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備工作領導小組，由張、姚和王洪文、徐景賢、王少庸等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

豐堂召開市革委會各組、辦和各群衆團體負責人會議。張春橋在會上作了布置，他説：

> 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幹將，要把他們的材料收集起來，供"九大"開會的時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衆組織，把這些人在上海的活動情況，統統搜集起來，把知情人都發動起來……

張春橋還當場決定，在康平路大院裏成立一個專門的"九大"材料小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於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黨刊的朱某，分別擔任這個"九大"材料小組的具體負責人。材料小組開會商量，決定從三個方面着手收集材料：

一是把這些被稱作"黑幹將"的老同志過去在各個場合、各種會議上的講話集中起來，摘錄其中"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

二是把歷屆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辦等機關的檔案，來一個翻箱倒櫃，從中摘取有關的材料；

三是動員過去和這些老同志共過事的人，或是在他們領導底下工作過的幹部，起來"反戈一擊"，寫出書面的揭發材料，即使關在"牛棚"裏的審查對象，也不要放過，動員他們"檢舉揭發，戴罪立功"。

張春橋重點要整陳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陳毅當過新四軍代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上海的幹部中有許多人是新四軍和"三野"轉下來的，對老首長陳老總十分愛戴。

陳毅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親率第三野戰軍解放上海，殲敵十五萬三千余人，接着出任解放後的上海首屆市長兼軍管會主任，爲人光明磊落、坦誠豪爽，與上海人民憂樂與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因此，現在張春橋想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陳毅而代之，成爲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就必須千方百計削弱陳毅在上海群衆中的影響。有一天，張春橋看到康平路市革委會辦公室編的一份情況簡報，內中反映有些幹部在得知陳毅捱整的消息以后，背地裏議論陳毅過去如何善於指

揮戰鬥、而現今的上海市領導根本没有打過仗等等 還有静安區的一個幹部, 在聽説陳毅受到批鬥以后, 難過得落下了眼泪。張春橋看了以后, 氣得要命, 决定馬上召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擴大會議, 由他自己親自主持并作講話。

這次擴大會議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舉行, 參加者有市革委會全體委員、各組辦負責人、各區縣局以上主要領導幹部, 以及各群衆組織的負責人約四百人, 連宴會廳旁邊的走廊裏都擠滿了人。張春橋親自出馬, 在會上傳達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精神, 直接點名批判了參與所謂"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 對陳毅批得尤其厲害。他説:

>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判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將, 他們都是黨內一些"資格老、地位高、名氣大"的人。這伙人實際上就是第二個劉、鄧資産階級司令部, 執行没有劉、鄧的劉、鄧路綫……

説到這裏, 張春橋用冷峻的目光、從眼鏡的鏡片後面掃了一下静静的會場, 略略停頓一下, 又説:

> ……主要是七個人, 形成了兩個中心: 一個是以李富春的家爲"裴多菲俱樂部"的中心, 有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參加, 多次開黑會; 另一個是以京西賓館和西山爲黑據點的中心, 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三個副總理, 三個軍委副主席, 一文一武。在這兩個中心之間穿針引綫的就是副總理兼軍委副主席陳毅, 他實際上是"二月逆流"的總聯絡員, 兩面跑, 一下到國務院, 一下到軍委, 起了特别惡劣的作用。兩個中心, 是一股勢力, 實際上是一個資産階級的中心。他們一文一武, 互相配合, 企圖扼殺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張春橋慢悠悠地、一字一句, 把重點轉到陳毅身上:

> 陳毅, 過去是新四軍的, 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個時期,

所以有些人至今對他還有迷信。靜安區有一個人，聽說陳毅受了批判，居然還替他掉眼泪！因此，我們要揭穿陳毅的老底：他這個人，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反對毛主席。有人把他在軍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實他不會打仗，只會下棋……

講話完畢，張春橋規定必須把全會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到上海的基層群衆，企圖用高壓政策來抑制上海人民對陳毅的懷念和愛戴。

徐景賢給陳毅寫信："選你作右的代表"

過了幾天，張春橋和姚文元到北京參加"九大"籌備工作、起草"九大"文件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組收集材料的節奏，也加快起來。不久，張春橋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

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額爲八十名；另外，張春橋、姚文元兩人以及陳毅，都由上海選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額。至於陳毅，應當由上海的"九大"准備工作領導小組出面，將代表履歷表寄給他自己填寫，同時可以寫一封信給他，告訴他上海打算選他爲"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態度如何。

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陳毅的信：

陈毅同志：

黨的"九大"即將召開，我們熱烈歡呼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

根據中央的决定，你作爲"九大"代表將由上海選舉産生。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萬共産黨員同意推選你作爲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現將"九大"代表履歷表寄去，請填寫後寄回，同時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萬壽無疆！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九大"准備工作領導小組

這封信的後面蓋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紅色大印。信發出以後不到一個星期，陳毅就把履歷表填好後寄回，并附了一封簡短的信，無奈地對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選他作爲右的代表參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趕緊把陳毅的回信寄給張春橋閲，張看了以後催促我們要加緊材料准備，因爲在"九大"會議上，肯定有一場面對面的"遭遇戰"了。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來，要求"九大"材料小組在最短時期内拿出材料來。

"九大"材料小組的成員爲了把陳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種檔案資料，還挖空心思地尋找陳毅的社會關係。有一個干部過去當過陳毅的警衛員，"九大"材料小組就通過組織對這個警衛員施加壓力，讓他寫出揭發老首長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館反映了一個情況，説陳毅當市長時批示過要讓一個反革命分子當文史館館員。"九大"材料小組馬上跟踪追擊，發現有一個國民黨的舊人員，戴過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對金石篆刻頗有造詣。他把陳毅寫的詩詞收集起來，刻成一本印譜，送給陳毅。陳毅愛才惜才，就寫了一張條子給上海市文史館，安排他爲文史館館員，按月發給津貼，一方面展其所長，一方面解決其生活困難。這可是一條尖端材料！"陳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馬上成爲材料小組收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經過一個多月的奮戰，一本三十來頁的《陳毅同志言論小集》的清様趕排出來了。這本小册子是從陳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間，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種會議上的報告、講話以及接待外賓時的談話記録中摘抄編成的，共分九個部分，都是上綱上綫的，標題如下：

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否定歷次政治運動，鼓動右派分子翻案和向黨進攻

頑固反對在各項工作中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爲復闢資本主義大造輿論

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反對社會主義革命

否定工人階級領導，丑化工人、貧下中農，反對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販賣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綫，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小冊子編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審定，我覺得上綱上得不够，便把小冊子的標題改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最后送張春橋、姚文元過目後，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備分發給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開了一次區、縣、局的黨員代表會議，會上王洪文宣讀了"九大"代表的預選名單，還專門宣讀了陳毅的來信，大家舉手通過，上海參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選出來了。

根據張春橋的"指示"，八十名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OO號文藝會堂，舉辦"九大"代表學習班。學習班由王洪文介紹"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聯司'"的經過，由我介紹"一月奪權"的基本經驗，由馬天水介紹上海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基本情況，由王少庸介紹專案工作情況，等等，使代表們做到心中有數。學習班結束之前，又把鉛印的《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小冊子，分發給每個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冊，要他們預作准備，以便到"九大"會議上去和陳毅"展開面對面的鬥爭"。

除了收集陳毅的材料以外，張春橋還指名要收集"'二月逆流'黑幹將"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等人的材料。上海"九大"材料小組當然也不遺余力地收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經印成了清様，還有些關於陳毅、葉劍英等的内部絶密材料，是手寫的，僅供領導參考。這批材料，共計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一九六九年三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飛機去北京，參加"九大"預備會議。臨上飛機之前，王洪文的秘書小廖提來一個大皮箱，交給我們拎到北京去。

皮箱裏面滿滿地裝着上海收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還把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簡報全部帶上，因爲那裏面刊載着揭發陳毅從井岡山時期起反對毛澤東的多篇發言稿。這些都是我們准備在"九大"會議上向陳毅等人猛烈開火的"重磅炮彈"！

王洪文對陳毅說，"送你一本《言論集》"

"九大"開會期間，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領的上海代表團住在京西賓館，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員住在釣魚臺。大會開幕之前，張春橋、姚文元到京西賓館看望上海代表團。張春橋穿了一身軍裝，洋洋得意，氣色很好。他對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說：

> 陳毅是上海選的代表，他應當參加上海小組的活動嘛。你們可以通過大會秘書處通知他，什么時候開會，就讓他來參加，聽聽大家的意見……

姚文元也穿起了軍裝，但衣服看起來總是不太合身，縐巴巴的，袖子過長，樣子顯得有些滑稽。他接過張春橋的話頭：

"我同意春橋同志的意見……"這是姚文元的習慣用語，一開口往往先來這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復他所要强調的話，"你們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陳毅那本言論集的幾個部分，要上海的代表們分頭准備一下……准備一下，從不同的角度發言，進行批判。"

"我們想把那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送一册給陳毅本人，讓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個點子。

"可——以。"張春橋拖長了聲音回答，"應該是肅清陳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時候了。"

一切部署就緒，就等陳毅出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北京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裏燈火輝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齊地坐在會場裏。張春橋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場。王洪文和我以及上海警備區的一位副司令，坐在鋪着白桌布

的主席臺前，旁邊給陳毅留了一個空位子。

王秀珍喉嚨響、聲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會場門口，一看到陳毅進場，就帶領大家喊口號。當時，"九大"秘書處由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空軍司令員吴法憲負責，他聽説上海小組要批陳毅，特地派了兩名聯絡員來，坐在后排，一面作記録，一面觀察動向。

會場裏的空氣一時顯得有些緊張。開會時間到了，代表們都齊刷刷地轉過臉去，朝會議室的入口處張望，等待陳毅進場。

忽然，聽見王秀珍的尖嗓子高聲喊將起來：

"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

"陳毅必須老實交代！"

"陳毅必須低頭認罪！"

代表們也跟着齊聲叫喊起來。

陳毅來了。他的額頂已經幾乎全秃了，頭部兩邊出現了許多花白頭髮，過去紅潤豐滿的臉顯得瘦削了許多，臉頰邊原來鼓起的腮幫子，現在也鬆弛地垂了下來。他穿着一身半舊的暗青色呢軍服，没有戴軍帽，也没有佩領章、帽徽。見過的人，覺得他和過去那種戴着法蘭西小帽、風流倜儻的模樣比較起來，簡直判若兩人。

會議由我主持。我示意陳毅在主席臺的邊座上坐下，接着便來了一段開場白：

> 今天，我們"九大"上海小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這裏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陳毅同志作爲上海小組的成員之一，今天也來參加會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上海市的共産黨員，選舉陳毅同志爲右的代表。陳毅同志過去在上海工作期間，存在着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又卷進了"二月逆流"。對這些問題，我們上海的代表們必須進行清算。

我說到這裏，王洪文從文件袋裏取出早就准備好的《陳毅反動言論小集》，舉在手裏揚了揚說：

> 我們把陳毅同志過去在上海等地發表過的講話，摘了

> 一本集子……今天，我們要把這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當面送給陳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徹底清算自己！

說罷，王洪文把小册子遞給陳毅。陳毅一下子懵掉了，他萬萬没有想到今天會收到這樣一份見面禮。他欠起身子，雙手接過小册子，訥訥地說：

"應該清算……應該清算……我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承蒙上海黨選我當'九大'代表，我很慚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黨、北京黨的，我們的黨只有一個。你陳毅這種說法是製造分裂！"主席臺下面飛出一條大嗓子，打斷了陳毅的話。

"是的……是的……"陳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主持會議的我見到一上來就讓陳毅威風掃地，很是滿意，就宣布批判發言開始。第一個發言的就是王洪文，發言的題目是《徹底揭露陳毅同志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丑惡嘴臉》；接着，嘉定縣農民代表周某的發言題目是《批判陳毅同志反對工農兵、大搞階級投降的反動本質》，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唐某的發言題目是《看陳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們事先都作了準備，他們的批判發言一個接着一個，像連珠炮似地向陳毅射去；陳毅忙不迭地在桌子上做着記錄。批判會足足開了兩個多小時才暫告結束。

午夜，代表們聚集到京西賓館底層大餐廳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興高采烈，以爲聲名顯赫的陳毅元帥，如今被我們批得暈頭轉向。初戰告捷，使我們的情緒處在興奮的狀態之中，幾個人胃口大開，多吃了幾根炸油條，多喝了幾碗酒釀蛋。在餐桌上，我們商定要趁熱打鐵，繼續再批。

陳毅說，"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

第二天上午，向來起床很晚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一反常態，早早就從釣魚臺聯袂趕到京西賓館來了。在上海代表團住的七樓小會議室裏，他們津津有味地聽取了匯報。其實，他們早已從大會秘書處派來的聯絡員

那裏，瞭解到批判陳毅的情況，但是，他們意猶未足，仍然饒有興趣地聽着我們幾個爭説昨天晚上的具體情景；特别是聽説陳毅收到小册子時，猝不及防、頗爲狼狽的時候，一向嚴肅正經的張春橋放聲大笑。笑了片刻，當王洪文提出還要再批陳毅的時候，張春橋慢悠悠地説：

"你們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讓陳毅講講話嘛。"

一言爲定：三月二十九日晚上繼續開會，而且事先通知陳毅讓他發言，在代表們批完以後，聽聽陳毅説些什么；如果他的態度不好，再批。第二次會議開的時間更長。這次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們又作了連篇累牘的批判發言，隨後讓陳毅表態。今天，陳毅看來已經有所准備，而且比較不在乎會議的氣氛了，神態和情緒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襲擊那樣局促和不自在。

陳毅一邊翻著上海編的那本小册子，一邊侃侃而談。他談到自己曾經有較長時間在上海工作，對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雖然從一九五四年起調到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但是仍然兼着上海市的市長，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當了九年的市長。在上海工作久了，講話的機會又多，確實存在着不少缺點錯誤，歡迎代表們批判。陳毅又談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認開始的時候確實不理解，犯了嚴重錯誤，但還是願意跟的。接着，他談起自己幾十年的革命歷史，他説，自從上了井岡山以后，四十多年來，自己一直緊跟毛主席幹革命，雖然有的時候思想一時跟不上形勢，或者對毛澤東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一邊的……

陳毅一口氣講了三刻鐘。下面的代表們聽得不耐煩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來，打斷了他的講話：

"陳毅不要評功擺好！"

"陳毅老實交代實質問題！"

陳毅没有理會中間插進來的干擾，還是繼續他的講話。多數代表并不瞭解黨史、軍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論據來批駁陳毅。

王洪文見狀，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黨的八届十二中全會上一些老紅軍揭發陳毅"反對毛主席"的材料拋出來，將陳毅的氣焰壓下去。王洪文從文件袋裏面取出他事先准備好的八届十二中全會簡報，交給了

我，讓我發言。

陳毅剛剛講完話，還沒有來得及喝一口水，我就抓過話筒，對陳毅的發言進行"消毒"。我說：

> 剛才陳毅同志給我們上海小組的全體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課。他的發言又長又臭，說明他直到現在還在堅持"二月逆流"的反動立場。我們上海給你編了言論集，代表們花了兩個晚上的時間批判幫助你，可是你卻采取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捨近就遠的方法，大談自己的光榮革命歷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貫緊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這是妄圖欺騙一些不瞭解黨史、軍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過關。這種手法，必須予以揭穿……

說到這裏，我把那本裝訂成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簡報"啪"地放在桌上，當衆打開，把其中的內容揭了出來：

> ……難道你陳毅真的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緊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嗎？否！根據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揭發，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是紅四軍前委書記，你陳毅是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舉行的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你卻反對毛主席總結和創造的關於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原則，反對黨對軍隊的絶對領導，反對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迫使大會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

我所念的簡報內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聽說，大家都吃驚地瞪大着眼睛，會場裏鴉雀無聲。

> ……也是在這次紅四軍"七大"上，你陳毅這個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趕下臺，取而代之，自己當選爲前委書記。這還不算，以你爲首的前委還决定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到閩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這些錯誤，在后來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終於被揭發出

來。大會所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毛主席所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不就是對你的問題作了嚴肅的批判嗎？……

會場裏出現了輕微的騷動，代表們剛剛才曉得爲自己所熟讀的"古田會議決議"，原來有着這樣的歷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繼續向陳毅猛攻：

就是你這個在四十年前就反對過毛主席的陳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來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成爲"二月逆流"的黑幹將。你在剛才的發言中胡說自己是一貫緊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這是對代表們發言的猖狂反撲，也說明你根本不肯承認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國演義》裏劉備手下有一個大將，名叫魏延，他的后腦長着一根反骨，一有機會就會跳出來反對蜀國。四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你陳毅就是腦后長着反骨的當代魏延！

我那帶有煽動性的發言，把代表們激怒了，王秀珍高聲呼叫口號
"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打倒陳毅！"
很多人都舉起手跟着吶喊起來。這時，大會秘書處派來的聯絡員急匆匆地走了，估計是去向領導匯報會場上的情況的。

周恩來說，批判陳毅要"適可而止"

陳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他那發亮的額頭。顯然，剛才我的發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微胖的臉龐漲得通紅，頸後有幾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輕輕地翕動着，想要說些什么，但終於沒有說。

是的，關於這一段黨史、軍史，陳毅是最熟悉不過的了。當年，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確實和毛澤東發生過爭論；可是，後來在毛澤

東離開部隊以後，紅四軍失去了領導中心，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有增無已。陳毅爲此深感憂慮，趁着到上海去參加軍事會議的機會，向黨中央作了詳細匯報。當時任中央軍委書記、組織部長的周恩來，聽取匯報后作了指示，要陳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來信”，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確主張。周恩來在和陳毅面談時，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要陳毅馬上返回，把離開部隊的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紅四軍前委的工作。陳毅回到蘇區，都照辦了。

關於這一段歷史，中央早已做過結論，陳毅自己也作過多次檢查。可是，陳毅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偏偏有人把這段歷史重新翻了出來，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會議上，又把這些歷史上的陳年舊賬，作爲陳毅反對毛澤東的新鮮話題，抖落在不了解黨史、軍史的青年后生面前。在毛澤東的威望達到無與倫比的高度的今天，聽到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們的憤怒呢？陳毅想作説明，可是“夫復何言”！

陳毅在座位上緊緊地蹙起了眉頭，通紅的臉頰上兩塊下垂的肉微微地顫動着，嘴裏呼哧呼哧地吐着氣，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陳毅，認爲他的氣焰已經完全被壓倒了，就趁勢收篷，宣布説：

“我們奉勸陳毅同志認真考慮代表們的批判、幫助，作出一個像樣的檢查來，下一次向代表們作徹底交代……好，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陳毅緩緩地站起身來，檢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論集，顫巍巍地走了。代表們也都散去了。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來，正在分析形勢、討論下一步的打算的時候，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通知我們幾個馬上到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吴法憲的辦公室去一次。

吴法憲的大辦公室裏空無一人，臨時用會議桌拼起來的大辦公桌上，散亂地堆放着各式各樣的文件和材料。工作人員端來了茶水，隨即退了出去。我們幾個人小聲地議論着，不知道究竟有些什么事。

等了十分鐘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憲進來了。他客氣地和我們逐一握手，然後坐在辦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説：

> 上海的'九大'代表們開了兩次會，幫助陳毅同志，我們的聯絡員都在場，已經向領導上作了匯報。上海的代表們對"二月逆流"的黑幹將表示義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剛才總理把我找去了，總理指示：適可而止。所以，找你們幾位傳達一下，下一次會議是否就不開了？

我們頻頻點頭：周總理的指示不能不聽，會議看來不能再開了。稍稍停頓了一會兒，吳法憲又說：

> 這次"九大"，要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毛主席指示：要保證這些捲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

由於周恩來的保護，張春橋和我們沒能再整陳毅。

由於毛澤東的安排，陳毅和其他幾位老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舉行的"九大"全體會議上，仍被當選爲中央委員。

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提名，王洪文、我和王秀珍，全都進入了九屆中央委員會。

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誰?

林立果選南京的張寧爲“妃子”一事,報刊曾着力渲染,有的甚至把林立果描繪成了一個温情脉脉、感情豐富的“多情種子”。可是,公衆并不知道,早在張寧之前,林立果就在上海選到了一位“上海夫人”李勤貞。在李勤貞身上,林立果一伙使用了最歹毒的手段和最卑鄙的伎倆,因而鑄成一個荒誕的悲劇。這些情況,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原空四軍政委王維國被捕以后,我在接觸他的專案材料時瞭解到的,現在把它公諸於世。

小家碧玉被選入伍

當年的李勤貞,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典型的上海姑娘。她的家,住在上海幽静的西區,距離林立果一伙出没的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并不太遠。在翠緑的法國梧桐覆蓋的林蔭道旁,有一條小小的西式里弄,弄内有一幢兩層樓的房屋,這就是李勤貞母女倆的家。

李勤貞的父親過去是個小資本家,很早就和妻子離异。李勤貞的祖籍是天津,外婆家在石家莊,她自己從小跟着母親住在上海,中學畢業後留在家中待業。姑娘面容俏麗,身材匀稱,有着一股上海姑娘所特有的靈秀、嫵媚之氣,還有那種天真爛漫的“嗲勁”,非常討人喜歡。

這樣一個理想的“選美”對象,很快成了林立果直接指揮的“上海小組”捕獲的“獵物”。據“上海小組”的負責人蔣國璋交待:有一天,“上海小組”的成員在淮海中路上開車“兜風”尋人,發現了李勤貞,暗暗尾隨,跟踪進了某弄某號,然后馬上找派出所的空四軍軍代表瞭解情況,於是,她的本人經歷、家庭情況等調查材料,以及從各種角度給她偷拍的臉部、半身、全身的照片等,統統都被送到了林立果手中。林立果表示十分滿意,立即批准“入伍”。可是,李勤貞本人還被蒙在鼓裏,只知道自己被部隊招兵的選上了,可以參軍去搞醫務工作。李勤貞穿上新軍裝,回到家裏見了母親,母女倆當然歡喜不迭。

林彪的心腹、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看到李勤貞被林立果選中，立刻下令給她辦了入伍手續，并給她改名爲李雲，編制列入上海西郊哈密路的空軍第三醫院，讓她以學習醫務知識、熟悉護理業務爲名，日夜住在醫院裏，以便林立果隨召隨到。

林副部長"路綫交底"

不久，林立果來到上海，果然在巨鹿路空軍招待所的秘密住處中，召見了李勤貞。當時招待所隔壁是上海社科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他們把它拿下作爲秘密據點。這天晚上，林立果和李勤貞"談話"，采取"路綫交底"、誘使上鈎的辦法，開始時裝得一本正經，漸漸地用隱晦的語言進行暗示，最後亮出自己的身份——副統帥的兒子、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女方吃驚和害怕的情況下，林圖窮匕見，刻意求歡。

當天晚上李勤貞毫無思想准備，她畢竟是個純真無邪的青年姑娘，萬萬意想不到這個道貌岸然的穿軍裝的年輕"首長"，居然會向她提出這種卑鄙無耻的要求。她的純潔正直的天性，還没有泯滅，所以她哭着拒絶與林立果發生兩性關系。林立果十分刁鑽詭譎，他對李雲并不采取强行玷污的做法，而要誘使她乖乖地自願入彀，他覺得這才"够味兒"。所以，當天晚上放過了她。

第一次"路綫交底"的失敗，使王維國和"上海小組"的成員大傷腦筋，於是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對李雲進行"攻心戰"，甚至連空軍第三醫院個别領導也直接過問起這件事情來，派了一個女幹部專門找李雲談話，規勸説服，軟硬兼施，曉以利害。在進行"思想工作"的同時，還采取"組織措施"——提前把李雲提拔爲上海空軍第三醫院的正式護士，享受排級待遇，從拿戰士津貼一下子變爲領取部隊的幹部工資，用名利地位等手段來籠絡她。

"上海夫人"獨守空房

林立果乳名"老虎"，名如其人。當他再次來上海，就接二連三地

"召見"李雲，露出自己的真面目。這樣一個缺乏人生經驗的姑娘，當然抵擋不住"老虎"的"威勢"。再說，她也没法不崇拜林副部長一家的顯赫地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爲他們家庭的成員。這樣，她的脆弱的防綫崩潰，林立果終于得手了。一天晚上，李雲在林立果的甜言蜜語下，成爲"林副部長"最寵愛的秘而不宣的"上海夫人"。

林立果占有李雲以後，就把她藏在巨鹿路招待所，不讓她去醫院上班了，兩個人厮混了好長一段時間。等到林立果玩得有點膩了，他就單獨飛去北京，留下李雲一個人，在上海守着空房。

經過前一階段的纏綿生活，李雲對林立果的幻想越發抬頭，她一厢情願，决心一輩子跟定"副部長"了。但是林立果根本没有和她結合的意思，他只是逢場作戲，得手以後就一走了之，杳無音訊。

李雲苦苦地等待着林立果，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毫無消息。她向"上海小組"的成員提出，要到北京去當面見見"林副部長"；"上海小組"向王維國作了請示，答復是"副部長"在北京的地址是保密的，爲了"副部長"全家的安全，不同意李雲去北京，要她繼續耐心"待命"。

"夫人"出走殃及池魚

李雲左等右等，没有回音，她一氣之下，離開上海出走，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這下子王維國和整個"上海小組"都慌了手脚，他們一怕李雲跑到什么地方去告狀，這樣便會暴露林立果所幹的丑惡勾當；二怕李雲一時想不通，自尋絶路，下次如果"副部長"要起人來，"上海小組"交不出人，就該倒霉。

王維國發急了，一聲令下，"上海小組"成員幾乎全部出動，通過各種途徑尋找李雲，可是找不到下落，只查到李雲過去有一個男朋友，住在虹口區。王維國濫用專政手段，立刻命令他所控制的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軍管組，把李雲的男朋友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起來，單獨關押，由"上海小組"的成員直接審訊，旁敲側擊地逼問李雲的去向。一連逼問了兩個星期，毫無所得。

王維國之流實在没有辦法了，就使出最毒辣的一手，索性把李雲的

母親直接抓起來，要她交代李雲的可能去處。李雲的母親身陷囹圄，又驚又怕，被迫說出了一連串親戚朋友的家庭地址。"上海小組"的成員立即按圖索驥，追踪尋找，還是毫無所得，最后李雲的母親說她可能去石家莊看望外婆去了，"上海小組"成員又連夜乘飛機趕往石家莊，總算找到李雲，把她帶回上海，這才使王維國等鬆了一口氣。

李雲回上海以後，她依然鬧着要見"副部長"。"上海小組"的成員不敢得罪這位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又擔心她到處亂跑，更忌諱她和母親攪在一起，把林立果的丑聞擴散到社會上去。於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們不讓李雲回家，捏造了一個罪名，先給李雲的母親定了罪，把這個無辜的婦女送到江蘇北部海邊的一個勞改農場——大豐農場，强迫她去勞動改造。在王維國等人喪心病狂的迫害下，這位可憐的母親大禍從天降，有冤無處伸，女兒被別人霸占，自己被遣送勞改，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啊！

李雲過去的男朋友，被莫名其妙地關押了一段時期。"上海小組"成員勒令他今后切斷和李雲的一切聯系，在得到他的承諾以后，才把他放了。

白雲山秘藏金絲雀

至於對李雲本人如何處理，王維國等人感到最傷腦筋。不能過於嚴厲，又不能聽之任之。在左右爲難的情況下，王維國等只好把李雲暫時轉移到外地的一個空四軍軍管單位，客客氣氣地要李雲在那裏小住一個時期，生活條件、日常伙食等盡量搞得優裕一些，實質上是把她軟禁了起來。

過了一個時期，王維國等人聽說林立果又主動問起李雲的情況，知道"副部長"對這個姑娘舊情難忘，仍有好感。爲了進一步巴結林立果，王維國又想出了一個主意，讓自己的女兒和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的女兒一起，陪着李雲去廣州，通過關係進了中山醫學院"讀書"。這個三人"讀書小組"，由上海空軍第三醫院的一名護士長親自帶隊。名曰"讀書"，實際上是對李雲暗中進行監視、控制。由于林立果在廣州白雲

機場有一個秘密住所，他經常飛到那裏去。“上海夫人”李雲放在中山醫學院，可以隨時應召。

這一招果然靈驗。林立果十分欣賞王維國的安排，他一到廣州，就把李雲接到豪華的白雲山招待所同居。這位“上海夫人”和林立果久別重逢，當然倍受寵愛。林立果一邊在白雲山頂上和李雲一起收看香港的半夜彩色電視，一邊縱情聲色，而且，還暗藏着殺機。林立果開導李雲說：“你膽子不要太小，要學會殺鷄，要見血不驚慌、不害怕。”當時，王維國還派出空四軍政治部文化處的副處長李偉信隨侍在林立果的左右。每當林立果召李雲去過夜，都要由副處長取出他親自去香港采購來的避孕藥片，當面交給李雲兩片，親眼看着她吞下以後再送走，以免惹出新的麻煩。

李雲原來夢想跟着林立果可以飛黄騰達，哪裏想得到從此長期被軟禁在廣州，而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早已被押送到江蘇大豐農場去勞改了。母女倆活活被拆散，天各一方，不通音訊。

直至林彪葬身異域以後，廣州軍區和上海聯係，這對母女才得以返回上海團聚，李雲也進了工廠工作，從此結束了她們那種受盡凌辱的奇特而又悲慘的生活。

狼狗鬧"康辦"

效忠於人，這是古今中外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但是，效忠於狗，卻可以稱得上是曠古奇聞了。

這件事發生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當時王洪文和我都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的家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裏。他養過一條狼狗，故事就發生在狼狗身上。

康平路市委大院，簡稱"康辦"，那時由三排房屋組成：北部的一排是小禮堂和市委書記們的辦公室，中間一排是三幢五層樓高的公寓，南部的一排是八幢兩層樓的花園洋房。王洪文是一九六八年搬進康平路市委大院的，開始的時候住在中間一排公寓房屋的西部三樓，住公寓樓當然是不便養狼狗的。

一九七〇年以後，張春橋和姚文元長期留在北京，他們的家屬還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裏。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給王洪文主持，他便從公寓樓搬進了南面的花園洋房裏，占用了兩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較大的花園；住宅的後面，有一條可以貫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過小路，橫穿草地，就可以到達姚文元家屬以及我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鄰右舍，則是張春橋和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進花園洋房以後不久，南京軍區的一位領導送給他一條純種的德國狼狗。這條狗剛來的時候，還比較小，王洪文很疼愛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懷裏，給它取名叫"馬林"。王洪文有兩個兒子，當時正在念小學，王秀珍給他倆起了兩個外號——"大呆瓜"和"小呆瓜"。每天一放學，兩個"呆瓜"就牽着小狼狗馬林滿院子奔跑。半年過去了，一年過去了，這條狼狗迅速地長大起來，昂起了頭，足足有半人高。它長得越來越象一條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紅的舌頭，怪怕人的。

狼狗馬林長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幾斤牛肉，憑王洪文每月六十八元的工資，怎么養得起？那就找個借口：狼狗既然是保衛王洪文的，它的供給關係就隸屬于市委警衛處。警衛處當時設在康平路市委對門，負責人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幹部，文革初期到"工總司"支

左，跟上了"工總司"司令王洪文。市委警衛處這個要害部門原來掌握在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手裏，林彪自我爆炸，王維國隨之倒臺，警衛處的大權就落入了王洪文之手。警衛處的頭頭對王洪文可謂忠心耿耿，成天緊跟着他。現在養了一條狼狗，也算多了一個幫手，它的食品供應當然可以公費開支。頭頭關照下去，每天就由穿軍裝的警衛員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

說也奇怪，這條狼狗對于穿軍裝的人，既不叫也不咬，大概是"吃了人家的嘴軟"吧；對于王洪文一家，它當然也是搖尾乞憐、俯首貼耳的。可見了别的人，它却凶相畢露，狺狺狂叫，不管你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大院裏面的或是大院外面的，它都要衝上去威嚇一番。

王洪文的住宅後面，隔着一條柏油小路和一片草坪，有一幢辦公樓，是市委機關和行政、後勤人員的工作室。這裏進進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員不少，他們經常受到狼狗馬林的威脅，大家的心裏很惱火，可是誰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整個大院裏，還住着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屬，以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全家。我們到小禮堂開會，或是外出活動，後面都跟着穿軍裝的警衛員。那條狗見了穿軍裝的特别客氣，所以"首長"們倒也没有感覺到狼狗的騷擾，特别是王秀珍，她幾乎天天到王洪文家去，那條狗對她也特别親熱。但是，那些家屬和孩子們就倒霉了，每天上班、上學去的時候，或是下班、放學回家的路上，往往就和狼狗馬林"遭遇"上了。

當時，大院裏的家屬中女孩子特别多，張春橋家有三個女兒，姚文元家三個女兒，我和王秀珍各有兩個女兒，此外，還有馬天水的女兒、柯慶施家的女兒等，總共十幾個女孩子進進出出。那條狼狗看見女孩子們好欺負，老遠的就狂叫着撲過來，直嚇得女孩子們尖聲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兒和我的女兒幾次被狼狗馬林嚇得哭了起來。

大院裏的工作人員和家屬們對王洪文家養一條惡犬都有意見。康平路辦公室也好，市委警衛處也好，多次聽到工作人員及家屬們對養狗的反映，但是因爲王洪文不鬆口，那條狼狗就照様在大院裏四處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點出事，才開始研究對狼狗馬林的處理問題。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備去上班，剛步下樓梯，走出大

中，還沒來得及注意周圍環境，狼狗馬林就突然從遠處朝她猛撲過來。馬林豎起兩只尖耳朵，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齒，伸出長長血紅的舌頭，雙目露出凶光，惡狠狠地朝金英身上撲去。金英猝不及防，手腳發軟，她本來就有心臟病，經這樣一嚇，差一點昏過去……

凶惡的馬林這一次終于激起了衆怒，而且驚嚇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嚇壞了誰來擔當這個責任？院子裏的各家各户以及普通的工作人員，都强烈要求市委警衛處趕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這節骨眼上，王洪文調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於是，大家開始出主意，給馬林安排一條出路：有人主張把狼狗送回部隊去，有人建議將它送給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作動物試驗，也有人在背后發牢騷，說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頓噴香肥美的狗肉。

正當惡狗面臨厄運的時候，王秀珍出來發布"指示"，挽救了狼狗。她說：馬林是"洪文同志從小養大的，洪文同志很喜歡它，把它送到什么單位去都不合適，還是送給上海西郊公園，好好養起來供人參觀"。市委警衛處原來是王洪文直接管的，王洪文一走，把領導權移交給了王秀珍。王秀珍的"指示"一下達，警衛處頭頭立即行動，派了專門的警衛員開了專車把馬林送到了西郊公園，每天供應幾斤新鮮牛肉，還築了像模像樣的狗窩，讓狼狗在那裏過上了養尊處優的生活……

康平路大院裏由狼狗馬林引起的風波，終於逐漸平息下來。過了不久，人們對狼狗事件開始淡忘了。然而，也有人没有忘記。幾個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園去的狼狗馬林，不知道養得怎么樣了，她要親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個交代。選了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爾巴尼亞訪問時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帶上王洪文的幾個"小兄弟"，由警衛處頭頭陪同，開了幾輛轎車直馳西郊公園而去……

一場"探望"狼狗的活劇演完以后，王秀珍從西郊公園回來，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我們到西郊公園去看過馬林了，那狗長得又肥又大，真神氣。它還認識我，可討人喜歡啦！"

遠在北京的王洪文，通過紅色保密電話得知了這樣的"喜訊"，高興地笑了。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過來的道理也是一樣："敬狗爲了孝主人"。

狼狗馬林在西郊公園一住幾年，誰也不敢動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幫”覆滅以后，動物園的飼養工人們怒不可遏，立即動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頓狗肉，才算解了心頭之根。

毛澤東與林彪决裂的關鍵

—— 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目擊證言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共中央委員的。此前或此後一段時間，中央召開會議，都在北京舉行。因爲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年事已高，各地的形勢又不穩定，所以中央不便在外地開會。而我則覺得去北京的次數較多，對文革以前中央召開過的北戴河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昌會議、鄭州會議、廬山會議、杭州會議……心向往之，很想到這些地方去邊開會邊領略大好風光。

想不到我的這種願望，竟然在一九七Ｏ年夏季變成了現實……

毛澤東下令封掉廬山

一九七Ｏ年的初夏，雄奇壯麗、雲霧繚繞的廬山，突然被宣布封山了。

一批批的建築隊伍和園藝工人，絡繹不絶地開進廬山加緊施工和整修布置……

接着，江西省領導又從南昌、九江等地，調集了大批厨師、司機、接待服務人員和各類工作人員。被選中的人都是在政治上“絶對可靠”的，先對他（她）們加以緊急培訓，然後分批送上廬山。上山以後宣布紀律：有關人員一律不得和家裏聯係，不許寫信、通電話，更不准泄露自己的去向……

廬山上上下下都有居民，特别是熱鬧的牯嶺街上，以及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附近，居民更多。但是，凡屬於廬山範圍内的幾千居民，這次都受到了嚴格的政治審查，有一些被認爲政治上“不合適”的人員，統統都被遷移出山；連山上幾所寺廟、道院中僅存的幾名和尚、道士，也被動員下山。

大批戎裝的解放軍戰士，把偌大的一座廬山嚴密地警戒起來，每個道口、山隘和樹叢后於面，都有一雙警惕的眼睛；在附近的九江機場

上，忙碌升降的飛機整天轟鳴；在廬山的峰頂上，架設起了雷達和天綫，幾架雲雀式直升飛機，也在山巒上盤旋、翱翔……

廬山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一些游客在被封掉的廬山脚下，紛紛打聽，茫無頭緒。雖然時值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是歷年來游廬山的人，仍然爲數衆多。廬山，這座淮南弧形山系裏的名山，共有九十多座山峰，形成群山環抱、首尾相接、重巒叠翠、神秘莫測的奇景。古往今來，有多少騷人墨客爲之傾倒。崇敬慕名而來旅游者更衆。可是，現在他們只能被遠遠地擋在外地，望山興嘆。

誰也没有想到，促使廬山實行封山的，就是毛澤東本人。他覺得在中蘇邊境衝突和中國共産黨"九大"以後，國際、國内的局勢逐步趨向緩和穩定，全國各級黨的組織已經基本恢復，所以他决定：在一九七O年夏天把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召集到廬山來，舉行黨的九届二中全會，接下來再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會的議程定爲三項：

一、討論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

三、討論加强戰備問題。

就這樣，被封掉的廬山又一次卷進了中國的政治漩渦的中心！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

關於修改憲法時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毛澤東在决定到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早已成竹在胸。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主席就是毛澤東。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向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代表會議提出：爲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請求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這樣，劉少奇當選爲第二任國家主席。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劉少奇被打倒并死于河南開封，國家主席空缺。一九七〇年，毛澤東考慮要召開四届人大，他建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樣就要修改憲法，改變國家體制。毛澤東對於這個問題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他後來所説的：設了這個職務，就會有人伸手。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澤東正式提出准備召開四届人大和修改

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當時，毛澤東正在武漢小住，特地派汪東興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轉達他的建議。政治局同意毛澤東的建議，并決定由康生主持憲法的修改工作，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等人參加。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由周恩來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央政治局負責人以外，還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會議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

本來，事情可以到此結束了，可是，林彪却睡不着覺。他在"九大"當上了唯一的黨中央副主席，而且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明確寫入了中共黨章，但他并不滿足，因爲不管是副主席還是副統帥，畢竟是個副職，没有多大實權。黨内的一切重大事務，都要由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點頭；政府的重要决策和職能，都由周恩來總理掌管。林彪要挺到正職，不知道還要挺多少年，何况他又體弱多病……所以，葉群在私底下發牢騷説："林彪同志不就是個副主席、副總理、國防部長嘍！這么多年來就是這么多工作。"

從葉群的話來分析，林彪有一個盤算：只有設了國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擔任這一國家元首職務的最爲適當的人選。因爲毛澤東既然早已辭去此職，肯定不會再重新復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議由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大家當然讚成，而毛澤東定然會謙讓；這一謙讓，國家主席的頭銜就會順理成章地落到林彪頭上。記得在黨的"九大"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就出現過這樣的場面：林彪當衆提議由毛澤東擔任"九大"主席團的主席，可是毛澤東却謙説："我不當，還是由林彪同志當！"所以，林彪的盤算并不是没有根據的。

於是，在獲悉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澤東正式提議不設國家主席之后，遠在蘇州的林彪，馬上要秘書往毛澤東那裏打電話説："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未予置理。

到了三月間中央工作會議開過以後，林彪覺得形勢不利，就鄭重其事地説了三條意見，于四月十一日深夜叫秘書記下后用電話傳給已經到達長沙的毛澤東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原話如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内、黨外、國内、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認爲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爲，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這三條真够厲害的、簡直是對毛澤東緊緊相逼了：你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這三條也够"大公無私"的，林彪認爲"自已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多設幾名讓别人去當"關系都不大"。

可是、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却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九七〇年五月中旬，林彪對人說："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没有一個頭。"七月間的一天，葉群當面對吴法憲説："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辦？往哪裏擺？"

林彪的個人盤算和小肚鷄腸，怎么逃得過毛澤東歷經風雨的政治慧眼。在收到林彪三條意見電話記録的第二天，毛澤東就作出了明確的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把林彪的建議頂了回去。

一九七〇年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引用了《三國志·魏書》中"武帝紀第一"的典故："孫權上書稱臣，稱説天命。王（指曹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毛澤東風趣地説："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説，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七月中旬，毛澤東又一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并説：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可是，當時在場的林彪硬是聽不進去。普通人很難理解 一個身居高位，已經明確作爲接班人和第二把手的領導人還會有野心嗎？有的，林彪就是一個例子。他已經到了權欲薰心、難以自製的地步，對毛的多次指示和警告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繼續指示陳伯達、吴法憲、李作鵬等人，在憲法修改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堅持要寫進"設國家主席"這一章。

這樣，就導致了憲法修改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争吵。

張春橋與吳法憲激烈爭吵

憲法修改工作，經政治局研究，毛澤東決定由康生負責，陳伯達并不是工作小組的成員，這一點使陳伯達感到老大的不愉快。

事情的根子還是在"九大"。當時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和姚文元三個人負責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可是陳伯達撇開了張春橋、姚文元，搬出了釣魚臺，住進了米糧庫胡同，另外找了幾個人准備材料，獨自寫起政治報告的草稿來。

陳伯達把政治報告的大綱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有意見，作了批示；陳伯達把已經寫好的幾部分拿到釣魚臺去討論，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一致不滿意。最后，在康生的主持下，由張春橋、姚文元在釣魚臺突擊起草了另外一份政治報告。兩份政治報告都送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選了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一份，退回了陳伯達起草的那一份。陳伯達感到丢了"理論家"的面子，十分傷心，哀哀痛哭了一場。之后，陳伯達就常到林彪那兒去，和林彪、葉群挂上了鈎。

一九七Ｏ年的憲法修改工作，毛澤東干脆指定康生主持，沒有陳伯達的份，其他參加憲法修改工作的還有張春橋、吴法憲、李作鵬等人，可是，筆杆子捏在康生和張春橋的手裏。就在討論憲法修改方案時，吴法憲秉承林彪的意願，主張在憲法中繼續寫上設國家主席的章節，可是康生和張春橋却説毛主席已有指示，主張把原憲法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一部分，全部删去。這樣，雙方就引起了争論，最后只得統一在毛澤東的指示上，康生、張春橋占了上風。

吴法憲等一肚子窩火，於是在憲法中關于毛澤東評價問題的寫法上引起了争吵。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文革中最權威的就是林彪在《毛主席語録》"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話：

"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以後，在各種文件或文章中，都沿用這樣的提法，毛澤東也曾表示過同意。可是，到了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大"召開之時，在《中國共産黨章程》和林彪的政治報告中，又采用了這樣的提法，毛澤東却兩次把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這三個副詞圈去，林彪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都知道這件事。所以，在後來定稿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九大”政治報告中，都删去了這三個副詞。

三個副詞的風波

這次修改憲法，又輪到張春橋執筆，他在撰寫憲法的“序言”部分涉及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没有用三個副詞，而只用了“繼承、捍衛和發展”的提法。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憲法修改小組在懷仁堂開會。吴法憲在會上提出，一定要把三個詞加上去。張春橋没有同意，吴法憲拍了桌子，勃然大怒。張春橋説：“九大”圈掉三個副詞是毛主席的意見。吴法憲指責張春橋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虚，否認毛主席是“天才”。康生站在張春橋一邊。這天晚上，張春橋和吴法憲激烈争吵后，雙方不歡而散。會後，吴法憲到陳伯達那裏詳細談了争吵的情況，陳伯達對吴法憲表示支持。

吴法憲當即通過黄永勝向林彪和葉群匯報了他和張春橋激烈争吵的經過，説張春橋不願在修改憲法時加上“天才”，就是反對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林彪對張春橋早已心存疑慮，他覺得張春橋此舉不是對毛澤東的，實際上是對着三個副詞的倡導者他林彪的。林彪稱讚了吴法憲，認爲他的意見對，并説今天抓住了張春橋，抓得好。黄永勝還在八月十四日打電話給在外地的李作鵬，要他趕回來參加憲法修改小組會議，支持吴法憲。

有一件事使林彪一直耿耿於懷：在一九六九年“九大”結束之后，毛澤東曾經當着林彪的面説道，你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并且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這話立刻引起了剛確定爲接班人的林彪的猜疑。林彪必然會考慮到：“九大”以后，張春橋羽翼逐漸豐滿了，至於他自己却是疾病纏身，説不定等不到接班就被别人搶班奪權了。這次修改憲法如果再不設國家主席，自己如果再不抓住這個機會當上國家元首，恐怕今生今世就很難遇到這樣千載難逢的良機了。

從後來的行動來分析，林彪的打算是：這次一定要抓住時機把對立

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左起）在一起。

面打下去。如果先打擊康生，目標太大；如果先打擊江青，又會投鼠忌器。不如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先從張春橋開刀，說張反對稱毛主席是"天才"，激起衆怒，以毛之刀誅毛之人，這是古已有之的"清君側"的策略。然後，把"天才"問題與建議毛當國家主席問題聯係起來，鼓動與會中央委員們堅持要求設國家主席，這樣毛就不便反對，到時候毛一謙讓，林彪自己就可瓜熟蒂落地坐上國家主席的寶座 即使當不上國家主席，那么副主席的位置也非已莫屬，毫無損失可言。

盤算好以後，林彪决定在廬山上導演一幕"打張奪權"的活劇。可是，這一切都是背着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進行的。

"躍上葱蘢四百旋"

林彪"打張奪權"的謀劃，毛澤東事先當然是無從知曉的。毛澤東注慮的是帶有全局性的問題：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召開的，已經過去六年了，四届人大理應列上議事日程。國家政權機關應該恢復正常運轉。除了修改憲法以外，由周恩來總理主持草擬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制

訂新的國民經濟計劃，憲法草案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經中央全會通過以後，四屆人大就可以開會了。

毛澤東進一步考慮的還有國際形勢問題，包括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問題。自從中蘇兩國邊境發生衝突之後，兩國關系日益緊張，於是，毛澤東覺得中美關系的進一步突破和發展，已是題中應有之義。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五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毛澤東在"九大"提出了"團結起來，争取更大勝利"的號召，看來黨內、國內的局勢都比較穩定和平静，有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條件，所以他在這一年的十二月間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故意讓斯諾給美國領導人捎去信息，歡迎他們來訪。

根據國内外形勢毛澤東决定：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指示留紀登奎和黄永勝兩個人在北京值班，主持一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其他人統統上山去。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向各地的中央委員們發出了通知。由於對開會的地點和時間需要嚴格保密，所以通知的內容也限制在極小的範圍內。例如中央辦公廳給上海打保密電話，只把開全會的地點和時間告訴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和我兩個人，并且通知一定要保守機密 領導的去向連對自己的機要秘書都不能講，會議期間上海如有急事或急件需要處理，可以通過北京中央辦公廳收轉 對其他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只能通知在上海的集中地點和時間，同時通知隨帶外衣和薄的毛綫背心，集中以後再告知開會地點。這樣嚴格的保密，在當時是爲了戰備的需要。

八月二十一日，王洪文和我通知在上海的九屆中委王秀珍、楊富珍，候補中委馬天水、金祖敏、陳敢峰和王維國，到上海空軍招待所集中；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决定直接前往。在登機前，上海的其他中委、候補中委仍不知道是去廬山開全會，上棉一廠的楊富珍笑着説"我還以爲是到北戴河或者青島去開會呢！"同濟大學的陳敢峰跳了起來，因爲當時上海正值攝氏三十八度的高温，他只穿了汗衫，短褲前來報到"哎呀，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帶，怎么辦？"只得臨時借了幾件再動身。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們搭上北京來的專機飛抵南京，江蘇以及南京軍區的中委許世友、杜平、彭冲、吴大勝、張才千、王六生、尤太忠等登機，和上海的中委們會合。大飛機在合肥降落，再轉乘"安-24"型的小飛機。飛機最后降落在九江機場。前來迎接的是空軍司令員吴法憲等人。所有參加全會的人，都是由空軍派專機接來的。

各地的中委們分乘小轎車上山。山下正是盛夏酷暑，氣候悶熱異常，但是上得山來，汽車在茂樹密林間的公路上拐了幾個彎，在"之"字形的路段上旋了幾個旋，馬上使人感到通體凉爽。山上的夏季平均氣温，要比山下低七度至八度，早晚還得備穿毛綫背心呢！

車到牯嶺，這個設在廬山上的城鎮也被修葺一新。汽車再穿過一個圓洞形拱門式的大隧道，就進入了全會成員居住的禁區。這裏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築的小洋房，大多是過去達官貴人以及外國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後新建的招待所和療養院。開全會期間，政治局委員們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員是兩人住一幢，候補委員是三人合住一幢。

上海的中委們分住四幢别墅，在一座小山的半山坡上，通過一條逶邐的石板路，把這一幢幢洋房聯成一氣。每幢别墅裏都配備了一名服務員，每兩幢房子配備了專門的厨師。他們白天來，晚上去，負責整理房間、做清潔工作、打茶水和做飯。在房子外方的樹林裏，警衛戰士們日夜站崗放哨。

從林間小道走下去，左邊挨着的分别是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住的别墅。右邊朝西走，就到了脂紅路一百七十五號毛澤東的住所。過去毛澤東上廬山，都住在蘆林湖畔的蘆林一號招待所，便於閑時到凉爽的湖水裏去游泳。現在毛的年紀大了，不下水游泳了，汪東興便把他的住處安排在脂紅路這幢用高墻圍起的别墅裏。這幢别墅從前屬於美國亞細亞銀行，建造於二十年代，至今仍很完好，是一幢便於保衛的獨立西式洋房。上述幾個人的房子，都住得很近，但和其他各地中委們的住處，則間隔着一段相當的距離。

上了廬山的中委們，情緒都很高漲。因爲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都

比較亂，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都只能在北京開。現在毛澤東决定在廬山開會，說明他對形勢的估計是樂觀的，同時也說明他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以七十七歲的高齡而能重登廬山，這是當時的中委們都爲之歡欣鼓舞的事。

所以，中委們都利用會前的閑暇，飽覽了雄奇秀麗的匡廬風光。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委們在瀑布前合影，姚文元還陪同江青游了仙人洞。誰也没有發現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却有意避開鏡頭，很少和别人合影，事後才知道他上山以後，和吴法憲以及隨同林彪上山的林立果，建立了密切的熱綫聯系。

周恩來總理是個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賣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樓房裏，便於和各地的中委們接觸。但是，全會開始前的氣氛是輕松的，這從周恩來的神態中也可以感覺到。會前，我們幾個年輕的中委相約去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領兩用衫，一條米色的長褲，足登一雙半新的牛皮凉鞋，顯得風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周恩來告訴來訪者，這次全會的議程很簡單，主要是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給四届人大正式通過后頒布；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等。他說："會期不長，有三五天就可以了。""啊，只有三五天！"我們幾個年輕人都驚呼起來，覺得會期太短，看廬山都看不够。

鄧穎超也說，好不容易來江西一次，她已邀了幾位老大姐，在全會結束以後到向往已久的井岡山去訪問。

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在住所的陽臺上安排我們這些年輕的中委們和周恩來比賽了幾場乒乓球。大家說："總理是今日得寬餘呀！"周恩來微笑道："我還踢足球呢！"大家都很詫異，錢秘書說："就在走廊裏踢，每次兩三分鐘，活動活動身子。"大家哄堂大笑。

會前的"水鴨式"活動

在這輕松歡樂的氣氛中，誰也没有想到：大塊的烏雲正向廬山襲來。周恩來原來預期三、五天可以結束的會期，后來竟開了十五天；足

足半個月留在廬山，還遠遠未能解決問題。

正當毛、周打算在廬山召集一個比較輕松的短會的時候，林彪却緊鑼密鼓地准備全綫出擊了。

在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中，本來没有林彪講話這一項，但是林彪却在暗底裏准備着一篇份量很重的講話，打算到時候拋出。葉群根據林彪的意思，打電話給陳伯達，要他編一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語録，分發給幾員大將，讓他們配合林彪的講話、引經據典去批判那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并一致要求設國家主席，一致要求毛爲國家主席。

陳伯達接到任務以后，緊急布置隨他一起上山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秘書，連夜查找出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論天才的語録。先是從廬山圖書館館藏的馬列著作中查找，再打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央政治研究室幫助查找，然後通過電話一一傳上廬山；恐怕電話傳送有誤，另外又把書面語録用絶密件通過中央辦公廳用飛機直送廬山。因爲查得匆忙，一時没有查到馬克思關於天才的語述；陳伯達就根據已經查到的一些條文，連夜編成《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録》，用電話一條一條告訴吴法憲。陳伯達還要汪東興交打字員打印。印好以後，急送林彪、葉群，同時分發給陳伯達、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人手一份，也給了汪東興一份。這些都是背着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進行的。

林彪抵達廬山的那天下午，就和陳伯達晤面，密談了一個多小時，商量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張春橋發動進攻。陸定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早已被打倒，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對林彪；現在，林彪又把張春橋比作陸定一。

八月二十一日黄昏前，葉群邀請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同游仙人洞，布置他們還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吴法憲立即找了空軍的王秉璋、浙江的陳勵耘、上海的王維國等人布置此事，他還對有些人講：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辦？往哪裏擺？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廬山舉行常委會，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出席。毛澤東繼續以"九大"説過的話，來要求開好這次全會：希望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不要

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周恩來對次日大會開幕式的安排，作了說明。毛澤東建議 除了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計劃以外，還應該加個形勢問題。這樣，全會就增加了一項議程。常委會上還確定由周恩來、康生分別在開幕會上講話。林彪表示同意，并說自己要講點意見。常委會結束之後，陳伯達又去林彪那裏，第二天上午，大會開幕之前，陳伯達三度到林彪處密商……

全會開會前的表面氣氛，是平靜的；但林彪、陳伯達、葉群、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王維國、陳勵耘等人的幕後接觸，十分頻繁，正如某些人所形容的，這是“水鴨式”的活動：鴨子浮在水面，水面波平如鏡，一派平靜景象；但水下鴨子的雙脚却急促地來回划動，忙碌異常。這就活活勾勒出林彪、陳伯達等人在全會開幕前的真實動態……

林彪發動突然襲擊

在牯嶺鎮的半山腰裏，有一座大禮堂，可以坐五六百人，一九五九年曾在這裏舉行過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即批判彭德懷的那次會議。現在，這座灰色的龐大建築物，又成了九屆二中全會的會場。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毛澤東宣布全會正式開幕。這次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一百五十五人，按姓氏筆畫爲序，坐在前排 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人，坐在後排。

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開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的指示，并根據昨天常委會的决定，宣布了三項議程。他說，頭一項議程就是討論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早已印發給全體到會成員。在這個修改草案中最重要的一處修改，就是“不設國家主席”，而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爲國家元首，總理爲政府首腦。這條修改意見是毛主席提出來的，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同意。以上情況，都已向全黨作了傳達。

在全會的開幕會上，原定先由憲法修改小組負責人康生就修改憲法問題作說明，但是林彪却突然改變議程，他對毛澤東說，我要講點意見，便逕自在話筒前講起話來。

穿着淺灰色中山裝、坐在藤靠椅上的毛澤東，顯然對林彪的講話内容事先并不了解，他有些意外地朝旁邊的林彪看了一眼，便側耳傾聽他究竟説些什么……

穿軍裝的林彪臉色很蒼白，襯出臉上兩條倒挂着的八字眉毛顯得更粗更黑了；他脱下軍帽，童山濯濯的額頭上只剩下兩旁長着少許稀疏的頭髮。他手裏没有拿講稿，好像他的講話是即興式的，但是仔細聽來就會使人覺得這次講話是經過仔細斟酌和反復推敲的。事實上也是如此，直到開幕會議的這天上午，他還和陳伯達、葉群在一起研究了半天。

林彪首先説了一通套話，什么憲法修改、人代會的召開都是主席提出的，很必要，很合時宜啦；這對於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對于鞏固和加强無産階級專政，對於反帝反修的鬥争，對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都會有深遠影響啦，等等。

接着，他把話鋒一轉，説他仍然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的觀點，又講道：“我們説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林彪説這些話的時候，没頭没腦，那些不知道憲法修改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過激烈争吵的聽衆，聽不懂他話中的弦外之音，但又彷彿覺得有人反對林彪關於“毛澤東是天才”的論斷，所以林彪要反復强調“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

毛澤東在會上聽到林彪一再吹他是“天才”，側頭看看林彪，顯得有些不高興，因爲早在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就對林彪的過份吹捧表示過不安。

林彪又説：“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的。有人説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没有發展。從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爲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變化的，是隨着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原則，是反馬列主義的。”

毛澤東大出意外

林彪的講話采取使人聽了可以産生很多疑問的表達方式，但是實際

結論是明確的: 有人覺得"老三篇"不起作用, 有人説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没有發展, 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

這個"有人"是指什么人呢? 林彪用很濃重的湖北腔鼻音講話, 拖腔拖得很長; 他喜歡重復, 有些在他看來很關鍵的話, 至少要重復兩三遍。這裏, 他又用慣用的語氣説:

……這點是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的, 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爲他那個中央不同, 我們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 一股風吹下去, 就把整個事情改變面貌, 改變面貌, 改變面貌。

林彪連用了三個"改變面貌", 以强調性質之嚴重。林彪指的當然是在中央的那個"陸定一式的人物", 可是他没有指名, 所以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員們聽得疑疑惑惑, 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

林彪的這一番話, 實際上是對他手下的一班文相武將們下達了總攻擊的動員令。歸根到底, 他還是要設國家主席, 要當國家主席。然而, 這個問題毛澤東已經講過六次, 所以他在大會上不便再正面提出來, 只好改換一種説法。

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 表现出這樣的一個情况的特點, 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這種地位, 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 這一點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是憲法的靈魂。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 非常好。

林彪還煽動説, 這種領導地位是"國内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認的"。

林彪的講話講得很長, 哼哼哈哈地講了一個半小時, 改變了會議的議程。之后, 周恩來和康生都説不講了, 開幕會議就此結束。

毛澤東從頭至尾, 仔細地聽完了林彪的長達四千多字的講話。如同他後來所説的: "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 他們搞突然襲擊, 搞地下活動,

爲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綫，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爲有什么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

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聽了林彪的“突然襲擊”的講話，一言不發，宣布散會。

林彪講話以後，文相武將們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陳伯達馬上趕到林彪住處密商，陳伯達再到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住處串連，那幾員大將都收到了“稱天才”的語録，手裏有了理論武器，只待到各組宣講了。

當時，全會把所有的中委和候補中委按地區編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則分别編到各組去參加討論。許世友、張春橋、李德生在華東組，陳伯達、汪東興、李雪峰在華北組，李先念、葉群、李作鵬在中南組，邱會作、姚文元在西北組，吴法憲在西南組，陳錫聯在東北組……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未編入各組，江青屬自由參加。這樣，陳伯達、葉群、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就成了毛澤東后來所稱呼的“宣講員”，按照林彪的意圖，紛紛到各組去宣講。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毛和林没有參加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吴法憲在會上突然提出：明天全會重聽林副主席講話録音，各組要學習、討論林副主席講話。對于這樣的提議，會上誰也不便公開反對。於是，全會的議程又一次被打亂，而吴法憲却受到了林彪的贊揚，誇他“立了一功”。

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在全會重放林彪講話録音之前，葉群對所有的“宣講員”作了布置：“下午分組討論時，你們要在各組發言，如果你們不發言，林副主席的講話就没有根據了。”葉群規定發言時要堅持林彪的“天才”觀點，堅持設國家主席，但後者因爲常委會已作了决定，可緩提；集中火力攻擊“陸定一式的人物”，但打擊面要小，不能點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葉群還强調，各“宣講員”在發言時，“要用眼泪

表達自己的感情"，要各自串聯空軍、海軍、總后勤部的中委們，按統一口徑發言。

江青到華東組與許世友"較量"

上午，全體中委又集中到大禮堂，重聽林彪講話的錄音，反復聽了兩遍。中委們覺得這個講話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朧朧覺得講話內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所以把注意力都轉移到這一方面來了。可是，講話中沒有點名，使大家疑竇叢生，說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連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陳勵耘和王維國，也吃不准林彪講話具體指的是誰，他們去找吴法憲，吴法憲詭秘地在手心裏寫了一個"張"字，陳勵耘和王維國這才心領神會。可是，吴法憲關照："這件事你們可不能說。葉群同志講過：不能點名。只能不點名地點名。"

陳勵耘和王維國參加華東組的討論。許世友是華東組的組長。這個組沒有那幾員大將當"宣講員"，張春橋倒來參加了。他換下從文革開始就穿着的軍裝，改穿一身淺灰色的毛嗶嘰中山裝，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數人因爲不知道林彪講話指的就是他，所以對他很是客氣。

許世友掌握的華東組討論，比較平穩。一是因爲華東組没有"宣講員"，二是陳勵耘、王維國雖然知道底細也不敢輕舉妄動、搶先出頭，至于其他各省的中委們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談，正面領會林彪講話的精神。上海小組的王洪文和我們幾個人，在林彪講話以後還没有和張春橋單獨接觸過，搞不清楚林彪講話究竟針對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勢再說，我們在華東組第一次討論時没有發言。其他的像安徽省也覺得把握不定，省一級領導人都没有發言，而是讓一個來自農村的中委、基層大隊黨支部書記，作了一般性的發言。

華東組總的發言基調，比較平和。在談到林彪講話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的時候，大家一致表示擁護，而且講了很多頌揚毛澤東的話，在談到"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大多數人表示：從自己的願望來說，還是希望毛主席能够當國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辦，聽從中央的决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華東組討論到一半的時候，江青來了。江青沒有編入固定的小組，而是任她自由選擇。許世友熱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發裏。這時，這次廬山會議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開腔了，他當着江青的面，提出憲法裏還是應該"設國家主席"。這時，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見。許世友一向對毛澤東非常尊重，他也開口說："我看還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吧！"他倒是真心實意擁護毛澤東再當國家主席的。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設國家主席，就插話說：

"我覺得，不設國家主席，可以減少國家機構的層次。關於這個問題，主席已經作過多次指示，你們也都聽過傳達。大家還是尊重主席的意見吧！"

"不設國家主席，群衆在感情上通不過。"浙江的陳勵耘發言了。

"群衆要我們去做工作嘛！"江青答。

"毛主席也應該聽聽群衆的意見嘛！"程世清的講話有些不太客氣。

"我們要看得遠一些。主席不但高瞻遠矚，而且深謀遠慮……"江青扶了扶眼鏡，朝會場四周看了一眼，慢條斯理向衆人交底，"要知道，設了一個國家主席的位置，就會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慮到了。至於主席自己，他是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的，他說過：'不要黃袍加身……'"

江青在這裏引用毛澤東所說的"黃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兵變時，他的部將用黃袍披在他的身上，擁立他做皇帝。毛澤東以此借喻他自己不願意別人擁立他當國家主席。

聽了江青的講話，大多數人不響了，有些人還在嘀咕。這時，江青側過臉去對坐在旁邊沙發上的許世友說：

"許師傅，你來幫幫我的忙嘛……"江青稱許世友爲"許師傅"，因爲許年輕時在少林寺當過和尚。

"别的事我可以幫你的忙，這件事情上我思想還是不通。"許世友是個爽快人，有啥說啥，他看時間不早了，就宣布散會，"好了、好了，今天就討論到這裏。江青同志，歡迎你什么時候到南京去……"

"好罷，我們到南京去再較量……"江青吃吃地笑着，一邊和許世友等人握手道別，一邊回答。

張春橋在華東組的第一次討論會上，坐着靜聽，没有發言。

整個華東組的第一次討論的氣氛，由于没有人煽風點火，比較平和，没有劍拔弩張的景象。

類似情況的還有陳錫聯所在的東北組。

陳伯達搶了頭功

但是，其他各組的討論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除了華東組、東北組以外，其他各個大組的討論，都有“宣講員”參加，他們紛紛出動，登場亮相。

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陳伯達迫不及待，第一個搶先發言，他發表了一大通蠱惑人心的言論：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虚，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

“竟然有個别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説成‘是一種諷刺’。”

“這種否認天才的人是歷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説，這次修改的憲法裏面規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憲法的靈魂……但是同志們要懂得、加進這條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經過很多鬥争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以後，有的人居然懷疑（八届）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公報。這是不是想搞歷史的翻案？”

講到最后，陳伯達激動地站了起來，比劃着説：“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説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興、高興得跳起來了。”説到這裏，一向老成持重、外號“陳夫子”的陳伯達，居然也做出手舞足蹈的樣子。

陳伯達講完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録》的汪東興，也跟着發言。本來，是他向政治局傳達過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現在在全會上發言時，他却提出了要設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他還講了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他們兩個人一講話，華北組的討論馬上升温。發言者强烈要求毛主席當

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要求把"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揪出來"，要求把"野心家、陰謀家""鬥倒鬥臭"、"千刀萬剮"。

在中南組的討論會上，葉群聲嘶力竭地說：

"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組的討論會上，吴法憲氣憤地嚷道：

"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説法，説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在西北組的討論會上，邱會作呼之欲出地説：

"林副主席説'毛主席是天才'……這次演説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爲什么在文化革命勝利、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説法，有人説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組的討論會上，李作鵬着重替林彪"抬轎子"：

"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内有股風，是什么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説不符合歷史。"

汪東興站錯了隊

這幾名"宣講員"中，陳伯達起了帶頭羊的作用。他不但在華北組率先發言，而且搶先印出簡報。陳伯達畢竟是搞輿論出身的，他懂得如何制造輿論、煽風點火。

當時中共中央舉行全會或是工作會議，都要出簡報。簡報上刊登會議的動態以及各組的討論情況，上送毛、林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讓領導瞭解情況；同時分發各省、市、自治區與會者，起到交流溝通的作

用。每次會議的每期簡報，有一個總的編號，報頭上同時説明這是華北組或是華東組的第幾號簡報。凡是簡報上的重要發言紀録，特别是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要經本人過目，修改審定，簡報付印以前還要由各組組長和副組長簽字，以示負責。

陳伯達和汪東興在華北組第一次討論會上發言以後，會議簡報組派到華北組做記録的工作人員，整理出了一份九届二中全會簡報（總號爲六號，同時注明爲華北組的二號簡報）。這份六號簡報整理出來時間已經很晚了，但陳伯達一反常態，馬上審稿，迅速改定。簡報改定稿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點多鐘送到華北組的組長手裏，由組長李雪峰、副組長吴德、解學恭簽字後連夜付印，在二十五日一清早就印好分送到有關領導和各組成員手裏。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稱第一，在所有各大區的分組討論簡報中，六號簡報出得最快，陳伯達又搶了頭功。

九届二中全會的這份六號簡報，摘登了陳伯達的講話，講得很凶，不但爲林彪的講話作了詮釋，而且極具煽動性。雖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已經明確無誤地指出：反對稱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要搞歷史翻案的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憲法修改小組裏面，只剩下薄薄的一層紙，一戳就破。簡報同時用較大的篇幅，刊登了汪東興在華北組討論會上的講話，進一步證實了陳伯達所謂的有人反對毛主席是事實；簡報上汪的講話比陳的講話還長，正像後來汪東興自己所抱怨的“他的很少，我的很多”。而且簡報上的語言已經明確使用了“揪出來”“鬥倒鬥臭”“千刀萬剮”等只適用于敵我矛盾的詞匯。簡報對全會所起的引導作用是非常强烈的。

這份六號簡報當然十分符合林彪的心意。怪不得林彪在聽完秘書讀完這份簡報以後，高興得笑了起來。林彪説：

“聽了那么多簡報，數這份有份量，講到了實質問題，比較起來，陳伯達講得更好些。”

六號簡報出籠以后

六號簡報一出，天下果真大亂。

在陳伯達所在的華北組，一些部隊的中委和工農中委特別氣憤，他們的發言集中到了所謂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連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陳毅也說：我陳毅是有反黨經驗的人，一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陳毅當場表示自己的決心說，不論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搖台兒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

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還有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她在一九六六年列席過八屆十一中（擴大）全會，搶先點過鄧小平的名。現在她是九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她在廬山又活躍起來，先後找了河北的中委、軍委總后的中委，甚至還找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串聯，要求揪人。然後，河北省的四名候補中委，就在會上先後發言，對中央憲法修改小組提出質疑，點了康生的名。

六號簡報分發到華東組和其他各組，同樣掀起軒然大波。

我們上海小組住在華東組的中心地帶。八月二十五日一清早，王洪文還沒有起床，我和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會議秘書組送來的兩份六號簡報。

我看了陳伯達和汪東興的發言，大吃一驚，連早飯都無心吃了，馬上拿了簡報，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別墅，把他叫醒。看過簡報，兩個人議論開了。

王洪文和我越談越覺得無所適從，疑竇叢生，而且下午華東組又要開會，上海小組該怎么表態才好呢？我們想找張春橋，可是又想到此刻恐怕不太適宜。我拎起電話，要總機接到坡下張春橋住的那幢別墅。接電話的是嚴秘書，他說張春橋還沒有起床。我問他看到華北組的簡報沒有，他說沒有收到。我就在電話裏把六號簡報的主要內容告訴了嚴秘書，讓他叫醒張春橋請示下一步該怎么辦。

我擱下電話，過了片刻，電話鈴響了，還是嚴秘書打來的，他說已經報告了張春橋，張要他馬上來拿簡報。電話掛斷不久，嚴秘書就氣喘吁吁地爬坡上山，到上海小組把我手裏的一份六號簡報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趕緊把上海的中委們全部找來，緊急討論下午如何表態。小組的成員們沒有到齊，王洪文和我站在別墅門口的臺階上朝坡下望去，只見張春橋從他的住所裏匆匆走出來。幾乎是同時，左首別

墅裏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門。看來他們事先已經電話聯係過了。兩個人見了面，不說一句話，就一起坐進了早已停在院子門外的一輛轎車裏。轎車朝着江青的住所疾馳而去……

上海組也有反骨

上海的中委們齊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號簡報，七嘴八舌地議論着，獨有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沉默不語。

大家議論後認爲整個上海小組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態度，下午由王洪文代表小組集體發言。對於林彪的講話，上海小組討論后一致表態：應該堅決擁護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大家覺得還是應當聽從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設國家主席爲准。至於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因爲不了解情況，上海決定暫不表態。討論的意見基本趨向一致以後，大家推舉由我執筆起草一份上海小組的集體發言。

我把發言稿寫完後給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見；大家表示同意，王維國的臉上毫無表情，依舊一聲不吭。王洪文瞥了他一眼，正式宣布："没有不同意見就算一致通過。"散會以後，和王維國住在一幢房子裏的上海電機廠候補中委金祖敏，偷偷地告訴王洪文和我："王維國這幾天接到過吴法憲的電話，多次單獨外出活動過。"

下午，華東組的會場設在廬山圖書館旁邊的一幢小樓裏，場内的氣氛異常。其他省、市的中委們正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一見上海小組的人員進場，馬上停止議論，用一種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們。等到張春橋進場的時候，會場裏寂無聲息，空氣簡直像凍結了似的。

張春橋還是像上次來華東組參加討論時一樣，面帶微笑走進來，但是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個笑臉。張春橋顯得十分尷尬，訕訕地找了一個單人沙發坐下，連開水也没有人給他倒一杯。

會議開始之前，我拿了謄寫清楚的上海小組集體發言稿《我們的態度》，給上海的各個中委傳閱，以便交王洪文代表大家發言。其他人都一一畫圈表示同意，發言稿傳到王維國那裏，只見他提起鉛筆，在發言稿向下方批了一句話：

“不搞集體發言，各人發各人的爲好。”

我拿到稿子一看楞住了，趕緊找王洪文緊急磋商。

我説：“王維國這家伙怎么搞的，上午討論時不發表意見；下午突然來這么一下子，簡直是從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氣得呼哧呼哧地“不曉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見鬼？只好不發言了，看看再説。”

張春橋變成火力點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華東組組長許世友宣布大組討論開始。很多人的手裏都拿着那份六號簡報。

王維國搶先第一個發言。前一時期他在什么事情上都回避退縮、沉默不言的，如今却判若兩人。他今天在發言中，先是大肆讚揚林彪的講話如何重要，爲全會指明了方向；接着聲稱“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衆。他又提出：“憲法裏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一個國家總要有一個頭嘛”，希望毛主席考慮大家的意見。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王維國的發言和上海小組集體討論的意見正好相反。在他發言時，張春橋聽得非常仔細，板着面孔不動聲色。

王維國打了頭陣，華東組發言的調子越來越高。

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熱情地謳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憤地斥責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時炸彈”妄圖“篡黨奪權”，“罪該萬死”，必須把他“揪出來”“千刀萬剮”，“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有的人發言時拿着六號簡報，直接引用陳伯達等人的講話。可是，所有的人發言時都不公開點名。

郭沫若副委員長作爲中央委員，也被編入華東組參加討論。郭老耳朵重聽，戴了一副助聽器，困難地聽着别人發言，聽到一半，他也要求發言了：

“我是一個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華北組的簡報，又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才知道全會上出了大事……”

其實郭沫若還是沒有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上海的馬天水坐在我的旁邊，他用胳膊肘輕輕地碰了碰我，輕聲問道

“把野心家、陰謀家揪出來，究竟要揪誰呀？”

我只是朝他苦笑。

過了一會兒，空五軍政委、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陳勵耘邁着八字步，一搖一擺向衛生間走去，馬天水緊隨在他的身后跟了進去。片刻，馬天水出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滿臉懊喪地對我說：

“剛才我問陳勵耘究竟揪誰，他在厠所裏回答：誰是陰謀家、野心家就揪誰！這小子，看來他是知道底細的，不肯對我們說。”

陳勵耘從厠所裏回來，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張春橋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側，兩個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說來也巧，這時，正好有一個中委在慷慨激昂地發言，說是“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决不收兵！”陳勵耘聽到這裏，馬上打斷他的發言，側過臉去衝着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全場爲之震驚。

張春橋的臉色非常難看，他過去總是“揪”别人的，現在輪到自己在中央全會上被别人“揪”了，心頭該是什么滋味。但他强作鎮静，也不看陳勵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發前面的地毯上，只顧猛吸香烟……

會場裏的“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省的一個穿着海軍軍裝的候補中委，索性站了起來，帶領大家高呼口號：

“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

“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全場隨之高呼，聲震屋宇，呼聲一直傳到外邊的街道上去。

毛澤東宣布“立即休會”

八月二十五日這天，隨着六號簡報的下發，各組的討論情况，莫不如此。這股氣勢，正如毛澤東后來所形容的，“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看來今天這個會議，不把人“揪出來”真的不會收兵了。誰知道事

情發展到了這步田地，却突然來了一個戲劇性的急轉彎——

華東組會議開到下午四點鐘左右，有一個工作人員匆匆地走進會場，把許世友叫走了。許世友在臨行前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來！"

許世友一走，張春橋也走了。

大家守在會場裏，心裏捉摸不定，不曉得上面有些什么精神。大約過了五十多分鐘，正當衆人在翹首盼望的時候，許世友回來了。他一進門就没頭没腦地大聲嚷道：

"不開了！不開了！散會！"

大家都楞住了，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敢動彈。

許世友既不說話，也不坐下。他身穿軍裝，脚蹬草鞋，天熱時也從不取下頭頂上的軍帽。他低頭無語，還在想什么事。在廬山這種清凉的氣候中，他忽然顯得混身燥熱。他把軍裝前面的一排扣子統統解開，讓自己敞着懷，在會場門口不停地來回走動。大家悄無聲息地注視着他，等待他說些什么，室内静極了，只聽得他的草鞋摩在地毯上嚓嚓作響。

又過了幾分鐘，許世友好像突然從沉思中醒來了，他發現大家都没有動，就停住脚步，揮揮手說：

"不開會了。剛才我到毛主席那兒去了，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會！大家回去吧。"

原來，剛才毛澤東臨時决定：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請各大組組長一起參加。這天上午，張春橋拿到六號簡報以后，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來三人相約到周恩來那裏去的，臨時改爲直接去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在了解了一些情報以后，决定下午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采取了斷然措施，在會上作了三點指示：

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

二、收回六號（華北組二號）簡報；

三、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等人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毛澤東嚴肅地說："有些話提起來千斤重，放下來只四兩，叫做'提起千斤，放下四兩'。國家主席問題不要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

我早點死。你們再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

毛澤東又一次講了孫權要把曹操放在爐火上烤的典故。他正色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林彪蔫掉了，悶聲不響。

毛澤東要許世友摸摸他的手，心情沉重地說“你摸摸，我手都涼了。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

許世友一向最敬重毛澤東，他馬上果斷地回答“我聽毛主席的！”

全會休會以后，廬山一片肅靜。

中央辦公廳通知各組與會人員：白天可以游覽廬山，晚上放映電影，是當時內部放映的幾部日本影片《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啊，海軍》等。可是，誰還有閑心游山逛景看電影呢？中委們都等着毛澤東新的戰略部署。

與中委們的無事等待成對比的，是周恩來的格外忙碌。爲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脉，周恩來調集了各大組的發言記録，發現幾個“宣講員”的發言內容驚人地相似，説明事先有過串連，統一過口徑。於是，周恩來和康生一起，找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到各組“宣講”的由來，結果查明了陳伯達編選的、通過汪東興印發的那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録》的出籠經過。

筆桿子打敗槍桿子

爲駁斥陳伯達、吴法憲等人散布的謠言和詭辯，周恩來特意把北京存檔的關於毛澤東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的文件原件，調來供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參閲。周恩來白天黑夜地操勞，據他自己説：“足足有三十六小時没有合過眼！”

由於查到了幾條“槍杆子”事先有預謀，毛澤東作出決定：要李德生下山回北京去，主持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把總參謀長黄永勝换上山來開會。李先念同時回北京值班，换紀登奎上山參加會議。這樣，黄、吴、葉、李、邱就齊集在廬山了。周恩來找吴法憲談話，要求吴法憲作檢討。吴法憲很慌亂，向林彪請示，林彪説：“我們這些人打不過他們。搞文

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没有錯，不要作檢討。"

吴法憲本來想和陳伯達搶功，要西南組趕快出簡報，并在自己的發言裏加了許多上綱上綫的"揪人"語句，現在却統統撤了回來。葉群也緊張地通知秘書不要整理自己的發言稿了，把草稿要了回去。邱會作做得更加徹底，乾脆從會議紀録本中撕掉了自己的發言記録。跟着林彪、葉群上山的林立果則驚呼："翻車了，倒大霉了！全怪主任（指葉群，時任軍委辦事組辦公室主任）指揮錯誤！"

至於那被"揪"的一方，休會以后倒開始活躍起來。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到張春橋的住所去看他。

張春橋向我交底説："他們早就想揪我了！就在八月份，憲法修改小組開會時候，吴法憲就和我大吵了一場。"

張春橋把因爲删去三個副詞而引起的争吵經過，講了一下。

我問："那么所謂有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提法，指的就是删去三個副詞這件事情嗎？那是毛主席自己的意見呀！"我參加過黨章修改工作，知道毛澤東删去副詞的經過。

張春橋憤憤地説："就是。他們存心要尋事，才不管這些呢？"

我又問："那末伯達同志爲什么會在華北組作那樣的發言呢！"

張春橋説："咳，你不知道，這個陳夫子呀，我和文元給他做了多少工作，想不到他竟……"張春橋長嘆一聲，又講下去，"毛主席對他説：'我這條船還没有沉，你這頭老鼠就跑走了！'"

我對張春橋説，目前有些情况還弄不清楚，這幾天想分别去接觸一些人，聽聽情况，過幾天再去看他。張春橋頷首讚同。

我回到住所，向王洪文、馬天水等介紹了去看望張春橋的情况，大家一致覺得不能關在屋里，要多出去走動走動。於是，在休會的那幾天裏，王洪文和我去找了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北組組長李雪峰，馬天水去找了河北省一把手劉子厚；我和陳敢峰去找了浙江省的南萍和陳勵耘……

江青秘密接見王洪文、徐景賢

這一天晚上，我們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廳裏，交流外出活動的

情況; 約摸九點鐘光景，有一個穿軍裝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廳門外，輕聲說："首長請你們去一次，車已經派來了。"

首長？哪一位首長？王洪文和我不便多問，只是緊隨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輛大"紅旗"轎車。"紅旗"在粘綢的柏油馬路上行駛片刻，在一個大院子的門外停了下來。

夜已深，一幢長長的房屋好像一艘軍艦，停泊在大院裏的草坪上。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內的燈光都無法透射出來，只看得見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輪廓，使人感到有一種神秘的氣氛。

穿軍裝的人把我們引上高高的臺階，穿過一條狹長的玻璃棚通道，走入房屋。這時，只見江青的警衛員大周迎了出來，原來是江青接見。王洪文和我交換了一下會意的眼光。大周帶領我們穿過幾個房間，繞到後面的一個小客廳裏。

我們跨進客廳，看見張春橋和姚文元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了。張春橋的神情比前兩天愁快得多了，他主動招呼我們在對面沙發上坐下，并說："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見見你們。"

過了片刻，江青出來了，一頭烏黑的頭發齊耳根剪短，朝後梳着，看得出還吹過風，有一點暗波浪。她裏面穿着白襯衣，外面罩一身淺灰色的毛料服裝。江青從眼鏡後面仔細打量了一下王洪文和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握手，接着輕鬆而隨便地往身後的長沙發上一靠，邊坐邊說：

"今天——找你們兩位來——是想聽聽你們對這次會議的看法。"

我們還沒有接口，江青就側身朝左首的張春橋看了一眼：

"我聽春橋說，你們華東組開會的時候，有些人很凶呀。"

張春橋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

"其實各個組都差不多，我這次參加西北組，也有'宣講員'。"

江青打斷了姚文元的話，自顧自地說下去：

"二十五號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還是從你們那兒拿來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後來才查到的。我這裏倒是早發來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呐！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么搞的，一開開到主席那兒去了……"

"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張春橋在一旁補充說。

"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准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着，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

江青說到這裏，用手探到她那件淺灰色上裝的裏襟夾袋裏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裏揚着開懷大笑。

"四人幫"由此結黨

"哈哈哈哈……喏，這就是那份華北組六號簡報，他們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說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厲害呀！野心家、陰謀家，兩頂帽子，千刀萬剮，這就是證據！"

"我們的幾份統統交掉了。江青同志這份可以算是海內孤本。"姚文元從旁插話。

"你們要知道，陳夫子后面有幾條槍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聲音壓得低低的，以顯示她說的這番話十分秘密和重要，"他們要陳夫子搞了一份馬、恩、列、斯、毛關於天才的語録，給幾條槍桿子每人發一份。二十四號那天，他們都充當'宣講員'，到各個大組去宣講，所以，問題不僅僅出在華北組一個組，各個組都鬧得很厲害，因此主席決定休會。"

"那末，東興同志爲什么要這樣發言？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王洪文把憋在肚子裏好久的問題，當面向江青提出來了。

"哦，老汪嗎？他也收到了一份語録材料，不過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他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那份語録材料也上交了。"聽得出毛澤東對汪東興采取保護的態度，所以江青也跟着說。

"你們知道吧，在八月份修改憲法的時候，有人就和春橋大吵一場。"江青指的顯然是吴法憲和張春橋的爭吵，她接着又說下去，"其

實、矛盾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軍派的飛機，在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雲。"

姚文元聽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起勁地介紹起來"那次可危險了，飛機進了雷雨區，差一點飛不出來，后來又迫降在濟南……像這種事，在空軍裏照理是不允許發生的……"

"找你們來，是要讓你們心中有數，那幾條槍，主席已經找他們談話進行批評了。要相信，任何情況，主席總是有辦法處理的。"江青說完這一番話，停頓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個呵欠。

張春橋及時提醒："讓江青同志早點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身來告辭。江青就在沙發前握手告別，一邊握手，一邊用左手食指點點王洪文說：

"知道吧，對你的希望很大的！"江青在這裏說的是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間，毛澤東曾幾次接見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大會上發言。

王洪文很快反應過來，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負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我緊跟着說："前一陣子聽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太好，頭痛，請多加保重。"

"是呀。不過這幾天他們一鬧，我的頭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哈……"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青秘密接見以後，受寵若驚，回到住處，三脚兩步跨上臺階，雀躍不已。因爲我們知道，由于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王洪文從別墅的酒櫃裏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臺，一飲而盡。

在對文革的重大問題上原本態度一致的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如今爲了權力爭奪而反目成仇。但是，在廬山一度處于劣勢的江青集團，由於毛澤東的直接干預，居然轉敗爲勝，因禍得福，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其勢力，在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占據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過，這些都是后話了……

毛澤東依靠周恩來對於廬山事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收繳了陳伯達編選、印發的那幾份"稱天才"的語錄，封存和查閱了"宣講員"作

在各個大組的發言記録，從北京調來了毛澤東删改過的文件檔案……事件漸露端倪，這次突然襲擊的來龍去脉也清楚起來。

毛澤東"一點"定乾坤

從八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毛澤東分别找政治局委員們作個别談話，進一步了解情況，同時思考如何處理這一事件，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個星期。

盧山的這一場鬥争的實質，毛澤東看清楚了：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他們利用了"天才"這個理論問題做文章，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人，搞地下活動，搞突然襲擊，欺騙二百多名中央委員……毛澤東憤怒了："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會讓步的。"但是，毛澤東又冷静思忖，"九大"剛開過一年多，接班人剛剛被寫進黨章，應該考慮到全局，目前全黨不能發生重大的分裂，所以對林彪還是要持保護的態度。想好以后，毛澤東專門找林彪談了一次話，而且决定先從陳伯達身上開刀……。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揮筆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長七百字，是他用鉛筆寫的，正好寫在收繳得來的陳伯達編選的語録打印本上。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乎没有什么修改，揮灑下筆，一氣呵成；第一頁紙的天地邊緣都寫滿了，再轉到第二頁，寫在背后，文字密密麻麻……寫完以后，文章送到了周恩來手裏，周恩來仔細閲讀辨認着那略帶顫抖而又龍飛鳳舞的字迹，逐字、逐句、逐個標點做了認真的校對，然后排印出來給毛澤東最後審閲，立即印成鉛印的會議文件，附陳伯達編的語録，分發到每個中央委員的手裏。

毛澤東寫道：

> 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没有配合過，更不去説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盧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

> 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絶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説：'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上過廬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詩人李白。毛澤東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氣勢奔放的《梁甫吟》中的一句"杞國無事憂天傾"，來勸喻各位中央委員不要學"杞人憂天"，因爲廬山不會炸平，地球不會停轉。

寫到這裏，毛澤東筆鋒一轉，又言簡意賅地論述起關於天才的哲學問題來：

> 最后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説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换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爲：這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争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説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的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有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决不能跟陳伯達的謡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在闡述理論的同時，他没有忘記向全體中央委員發出信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爲……"這就是説，告訴大家在批評時要區别對待，集中火力批陳伯達，同時要保護林彪。至於批在陳伯達身上，是否痛在林彪心上，那只有像佛家所説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一下達，全會的風向立即轉變，前幾天還是陳伯達一伙大叫"揪人"，不幾天馬上又變成了衆人狠批陳伯達。林彪給吴法憲下達指示説"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强調上當受騙！"葉群則給吴法憲打電話予以安撫"你犯錯誤不要緊張，還有林副主席、永勝同志在嘛！只要不牽涉到他們兩人就好辦，'大鍋裏有飯小鍋裏滿'。"

全會分組批判了幾天陳伯達，毛澤東叫開檢討會。政治局討論決定，要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最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自己不到會，而是要林彪主持檢討會，周恩來、康生協助。到會的是政治局委員和各大組組長，擴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負責人如吳德、王洪文等參加，其他中央委員們聽會議的錄音。會議開了四小時左右，林彪强打精神自始至終主持了會議。

會上，林彪宣布陳伯達第一個做檢討。陳伯達當年正是六十六歲，但不是“六六大順”而是“六六倒運”。他的檢討發言稿是康生幫助寫的。他滿口的福建惠安土話，再也不能藉助“手舞足蹈”的姿勢表達了，因此別人很難聽懂；於是，讓陳伯達開了一個頭以后，由周恩來替他把檢討發言稿念了一遍。接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先後作檢討，口徑差不多，强調自己不學馬列，不懂理論，上了陳伯達的當，做了“宣講員”等等。汪東興則在檢討中說自己犯了錯誤，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和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是他向政治局傳達的，但是在這次會上，他頭腦發熱，又提出了與毛主席相反的意見，毛主席已經批評了他……

會議開到最后，林彪宣布讓張春橋發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豎起耳朵，想聽聽張春橋說些什么。張春橋發言很簡短，主要有兩點內容：一是表示堅决擁護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自己一定要加强學習，加深領會；二是表示堅决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周圍，做好工作。聽了以後，別人反映張春橋確實工於心計，他的發言避開了“揪人”的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真可謂滴水不漏。

在會上，還傳達了毛澤東對陳伯達等人的批評：“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提醒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們，不要學陳伯達的樣子，注意保持晚節。年輕的中央委員聽不懂這兩句話，也不了解這兩句話的出處。我在會場上遞了一張紙條給郭沫若，請求解答。郭沫若當場拿起筆寫下了答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詩·大雅》。意思是，萬事萬物無不都有一個開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終的。”

關於整個全會究竟怎么收場，毛澤東也有一句話，叫做“孔夫子打牌——和爲貴”。據說很有文化教養的孔夫子爲人豁達大度，他老人家打牌的時候從來不想打贏，只想打“和”，叫做“和爲貴”。毛澤東引用

這句歇後語，主張"和爲貴"，全會批了陳伯達，最後還是"團結起來，争取更大勝利"！

張春橋奉命請許世友吃飯

九屆二中全會的討論接近尾聲了。毛澤東先後找有關人員作個別談話，做做工作。他找了許世友，又找了張春橋。他特意叮囑張春橋，要在廬山請許司令吃一次飯。

毛澤東知道許世友和張春橋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許世友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張春橋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内"造反派"造南京軍區的反，許世友當然老大不高興。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澤東視察華東地區時，就要許世友用直升機把張春橋接到軍區所在地，促進他們的團結。這一回在廬山，由於陳伯達和幾條槍杆子的發難，毛澤東覺得許世友和張春橋更有加强團結的必要，所以他親自出馬做調節關係的工作。

張春橋也覺得現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和許世友的矛盾，他對我説："這次會上揪人，許司令倒没有出面，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只是開始的時候他也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并不瞭解陳伯達他們的活動，后來主席找他談了話，他馬上把華東組的會停了下來。"

張春橋在自己住的別墅裏備了一桌豐盛的筵席，讓厨師做了十幾個菜，厨師還别出心裁地烹調了廬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鷄、石魚和石耳。石鷄是一種長在山間石罅洞穴裏的蛙類，上海人把青蛙叫作田鷄，這裏便把廬山上的蛙類叫作石鷄；石魚是在山澗清溪裏的魚類，身體不大，肉質特别細嫩肥美；石耳是生長在廬山岩崖邊縫裏的一種菌類，很難采集到。"三石"俱全，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檔次了。

張春橋鄭重其事地向許世友發出邀請，許世友也知道這次請客是毛澤東的意思，所以欣然應邀赴宴。這桌筵席就兩個人吃，没有陪客。兩個人又都善飲，許世友喝茅臺量大是有名的，張春橋呢，别看他文縐縐的，喝起茅臺來却很凶，在上海當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期間，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對喝茅臺，打了個平手。這一次在廬山，許、

張兩人第一次開懷暢飲，喝得痛快，把張春橋餐廳裏玻璃櫃子裏的存酒，喝了個精光……

會議快結束之前，各大組分別搞了一次會餐。華東大組的會餐地點設在山坡上的一幢俱樂部裏。南京軍區和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福建的中委們濟濟一堂。許世友特意把張春橋也請來了，作爲對張春橋設宴的回請。

張春橋和許世友坐在一桌，舉杯對飲，我們作陪。飯吃到一半，空五軍的政委陳勵耘，手裏舉着一杯茅臺酒，一搖一擺地從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張桌子旁走過來，走到張春橋身邊。就是他，八月二十五日在華東組會議上衝着張春橋大吼："站出來嘛！"現在，那股有恃無恐的氣勢半點也沒有了，他臉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謙恭地說：

"春橋同志，對不起，多多冒犯。請允許我敬你一杯！"

張春橋把眉毛一揚，嘴角略帶微笑回答：

"我不在乎。"

兩個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了了。

林彪集團向江青們示好

與陳勵耘的情況相仿，上海空四軍的政委王維國的處境也十分尷尬。全會的局面明朗化以後，上海的中委們都興高采烈，只有候補中委王維國，躲在房間裏偷偷地哭了兩次。在小組討論時，王洪文追問他：爲什么事先不提反對意見，臨時推翻上海小組的集體發言稿？王維國皺着眉頭，噘著嘴巴，連聲檢討有錯誤，但對自己爲什么要這樣做，却又吞吞吐吐，不肯說出真情；說着說着，竟又哭了起來……事後才知道，不但吳法憲給他交了底，林立果還秘密約他出去，兩個人坐在汽車裏一邊兜風一邊密談。林立果要他在華東組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的話，101（林彪的代號）可以當嘛！"現在，林立果驚呼"翻車了"，王維國的尾巴被別人抓在手裏，他當然傷心不止。

與這些人的倒霉情緒相反，江青則顯得神采飛揚。那一天，張春橋、姚文元正在起草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以後准備發表的公報，王洪文

和我、王秀珍、楊富珍等幾個上海的中委到張春橋住的別墅去拜訪。正在談笑之間，江青來了。這幾天江青的情緒特別好，頭也不痛了，讓警衛員和護士替她在山上撲蝴蝶、捕蜻蜓。她和大家握手招呼以後，叫警衛員大周去把她的"戰利品"統統拿來，炫耀一番。

過了一會兒，大周呼哧呼哧喘着氣，奔上山坡，手裏捧着一塊大木板，板上用大頭針釘着十幾個模樣各异、大小不同的蝴蝶，色彩斑斕，栩栩如生；旁邊還釘着幾只鼓着大眼睛的蜻蜓。

江青要大周把標本木板放在沙發前的茶幾上，自己蹲身在木板前，向大家一一介紹她的獵獲物：

"這叫玉帶鳳蝶，翅膀下邊有兩條飄帶……這叫黑蛺蝶，翅膀上紅白相間，比較稀少，我都查過昆蟲辭典……哎，你們看，那紅蜻蜓的樣子挺可愛的！"

說着說着，她忽然停住了，站起身來，又把話題轉到全會的形勢上，她的思想和性格就是這樣，經常是跳躍性的。她把眼光在衆人的臉上掃了一圈，正色說：

"你們別以爲，這場鬥爭就算結束了，還早着呢，那幾條槍桿子可厲害哪！"

正在江青擔心那幾條槍桿子的時候，林彪也想到了江青， 他先是屈尊拜訪了江青。一天深夜，林彪又給江青打電話，說是要派葉群來看望她。過了一會兒，葉群果然到江青在廬山的別墅登門造訪，她不是一個人來的，後面還跟着上山不久的黃永勝，以及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原來她是帶着那幾條槍桿子"負荊請罪"來了。

葉群故作沉痛地說："這次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副主席多次批評我們，辜負了主席的教導，對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們來向江青同志道歉，請江青同志原諒。"

江青聽了喜出望外，順勢說："陳夫子跟春橋、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輕嘛！我們不要上陳夫子的當。"

雙方表面一套，心裏一套，握手言歡。

陳伯達從主席臺上消失了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下午，歷時十五天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宣告閉幕。

那天下午，到會的中央委員們發現，在廬山大禮堂的主席臺上，開幕式時出席的五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只剩下四個 陳伯達從主席臺上消失了。

穿着軍裝的林彪，仍然坐在穿着中山裝的毛澤東的身邊 但是他臉色煞白，自始至終一聲不吭，再也聽不到他在開幕式上的那種滔滔宏論了。

會上，宣布了中央關於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

在開幕會上沒有講話的毛澤東，在閉幕會上講了較長時間的話。他強調共產黨要搞唯物論，不能搞唯心論。他指出要加强對幹部的教育，特别是中央委員們，要認真讀馬列的書，不然就會上陳伯達這樣的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一類人的當。毛澤東再一次號召黨内外都要團結大多數，反對分裂。

針對林彪、陳伯達等人提出的“代表人民的標志就要當國家主席”這種說法，毛澤東一語道破 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辦法呀！

毛澤東的講話總是旁征博引、議論風生的。他說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他援引了馬克思的一封信，說明當時馬克思的經濟很困難、生活很窘迫，因此在應美國的一份刊物約稿時，故意把文章寫得很長，爲了多得稿費……

毛澤東錯批陳毅

毛澤東在講話中，有一句話使全場爲之驚愕，他說，這次廬山會議是“二陳合流”。這第一個“陳”，指的是陳伯達；第二個“陳”，指的是陳毅。因爲陳毅也跟着發言，說自己是有反黨經驗的人，不論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等等。毛澤東聽說了陳毅的這一番發言，就在閉幕會上提出了“二陳合流”的說法。

其實，毛澤東此話是錯怪陳毅了。陳毅在會上最多也屬於上當受騙之列，根本談不上和陳伯達"合流"。後來，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陳毅立即投人了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他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陳伯達之流毫無瓜葛。一九七二年一月陳毅逝世之后，毛澤東以七十八歲高齡親臨陳毅的追悼會會場，對陳毅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這也是在實際上糾正了過去對陳毅的錯誤批評。在一九七O年的廬山會議上，發生過這樣一段小插曲，補叙如上。

在閉幕會議上，周恩來和康生都講了話。周恩來進一步部署了"批陳整風"的工作，康生從理論上分析了"天才論"，并就毛澤東提出的幹部學習馬列的問題，作了較詳盡的補充發言。

全會開到最后，才又回到最初的議程上來 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國務院關于全國計劃會議和一九七O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准了中央軍委對于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全會還一致通過了即將公開發表的九屆二中全會公報，這才宣告正式閉幕。

毛澤東步出會場、登上汽車之前，在會場外圍日夜操勞的警衛戰士和工作人員們都簇擁上來，歡呼萬歲，山坡上一片喧騰，連綿不絶。可是，這些在場外工作的人們，只曉得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他們怎么會知道在會場裏發生了如此驚心動魄的事件呢!

出於安全的考慮，等到所有的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委員們離開了廬山以後、即一九七O年九月九日的晚上，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才公開發表。

這份公報寫得四平八穩、措詞平淡。所有的國際國内的中國問題研究家們，誰也不可能從中得到任何驚人的信息，甚至也見不到這次會議是在廬山召開的有關内容。只有深諳内情的人，才能讀懂公報蘊含的深意。

廬山埋下"九·一三"事件之因

還在廬山的時候，毛澤東就在《我的一點意見》裏明確地寫道，他"并不認爲事情已經完結"。

事情確實沒有完結。廬山會議以後，除了全黨學習馬列以外，中央下令要吳法憲等人寫出書面檢查。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查上批道：

"作爲一個共產黨人，爲什么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見過。"

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群的書面檢查上批道：

"當上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綫抛到九霄雲外……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十月十六日，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决定召開華北會議，接着又准備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議，進一步揭批陳伯達的問題。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前，毛澤東要周恩來到北戴河去看林彪，請林彪出來參加一下會議講幾句話，實際上給他一個臺階下。可是，林彪既不表態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

最后，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做了總結講話，指出黄、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希望他們實踐自己的聲明，認真改正錯誤。

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在這些人的書面檢查上作嚴肅尖銳的批示，這叫做"甩石頭"；他指示改組北京軍區，把李德生、謝富治、紀登奎派進去，這叫做"挖墻脚"；他批評軍委辦事組"根本不批陳"，因此派紀登奎、張才千等參加由黄永勝、葉群等把持的軍委辦事組，這叫做"摻砂子"……

毛澤東"并不認爲事情已經完結"，林彪當然也"不認爲事情已經完結"，他一面要黄、吳、葉、李、邱等做檢討蒙混過關，一面加緊策劃武裝政變。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等人寫出《"571工程"紀要》；九月，趁毛澤東南巡的機會，林彪企圖另立中央，謀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陰謀敗露之後，林彪等人倉惶出逃，於"九·一三"事件中自取滅亡。

一九七〇年的廬山會議是因，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果。只有弄清了因果關系，才會對林彪的結局有一個透徹的了解。

雲遮霧障的廬山，現在終於揭開了迷霧；林彪"炸平"廬山的前前後後，真相開始大白於天下。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十年前塵封至今的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一頁驚心動魄的歷史……

毛澤東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一九七一年九月，毛澤東重返上海，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海之行。此行使當時的上海成爲激烈鬥争的一個聚焦點。

外界傳説：就是在這次上海之行中，王洪文救了毛澤東的命，因此後來毛澤東提拔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做了"接班人"。事實究竟如何呢？中國共産黨"九大"以後，張春橋、姚文元長期留在北京，上海的日常工作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直至一九七二年王洪文調去北京爲止。因此，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澤東最後一次抵達上海時，王洪文和我都在上海，我對當時的真實情況比較了解，可以證明關於王洪文救了毛澤東的傳聞，純系誤傳。

毛澤東南巡"吹風"

一九七〇年八月，林彪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搶班奪權，想當國家主席，爲毛澤東識破；然後毛澤東對吴法憲、葉群等人的檢討作了嚴肅批示，在全黨全軍開展了實際上針對林彪的批陳（伯達）整風運動。林彪一伙意識到罪行即將暴露，因而密謀對策。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上海找心腹周宇馳、于新野等策劃武裝政變，起草《"571工程"紀要》，明確提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毛澤東的代號）"。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澤東從北京出發南巡，先後到達武漢、長沙、南昌和杭州。行前，毛澤東决定要在國慶節以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因而此行也是爲這兩個會議做准備的。毛澤東每到一地，總是住上幾天，聽聽情况，然後給黨政軍負責人"吹風"。他先後找了武漢軍區、廣州軍區、福州軍區負責人，以及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委、自治區黨委書記談話。他尖鋭地指出：廬山會議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他們心裏有鬼，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毛澤東明確宣

布：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后面還有人！

毛澤東專門關照，這次"吹風"先不要傳達。但是，自有"耳報神"通過周宇馳和黄永勝，在九月五日和六日密報住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和葉群。林彪得悉，極爲驚恐，決定孤注一擲，提前實施武裝政變，而且首先就要謀害毛澤東。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澤東從南昌到達杭州。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他的"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令。

九月八日，林彪在一張十六開的白紙上，用紅鉛筆寫下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

九月九日，林立果向他們的心腹宣布謀害毛澤東的計劃："現在的情况很緊急，我們已經决定在上海動手！"具體方案有三：

一、用火焰噴射器噴燒毛澤東乘坐的專列；

二、用四零火箭筒和一百毫米口徑的高射炮平射專列車廂；

三、派飛機轟炸毛澤東乘坐的火車。

這三條如果都不行，就在毛澤東接見負責人時，讓擔任外部警衛工作的王維國，帶上手槍，在火車上動手。

林立果嫌這幾條謀害手段還不够十拿九穩，就在北京西郊機場秘密據點裏，要他的心腹、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出主意。江騰蛟熟悉上海的地形，他建議：如果毛澤東的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旁邊的支綫上，就先炸附近的小油庫。他當場拿起筆，畫了油庫和專列停靠的位置，并惡狠狠地説："汽油流到火車附近，連車帶人都報銷了！"

毛澤東突然抵達上海

毛澤東住在杭州西湖旁邊的汪莊。因爲距離國慶節尚有相當一段時間，按照慣例，人們估計他還會在杭州休息一陣，然后到上海耽上幾天，臨近國慶節再回北京，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活動。林彪一伙也正是這樣估計的，所以他們正反復研究在上海動手的具體方案。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午夜，毛澤東叫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指示停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的專列，連夜轉移，也正是那一

天，林彪剛簽署了他的手令。

九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突然提出："我們馬上就走！"

十日晚上九點，專列駛進上海，停靠在虹橋機場旁邊的鐵路支綫上。

當時，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北京，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就帶上王維國上車迎接毛澤東。王維國當時任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是林彪一伙的心腹。他在上海還擔任市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軍管會的主任，同時負責對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工作。毛主席突然來到上海，王維國措手不及，因爲没有接到林立果動手的命令，他也不敢造次。

毛澤東的專列停靠在上海西郊一座灰色的大鐵門裏的鐵路支綫上，這樣就不會影響整個滬杭綫列車的正常運行。鐵路支綫旁邊新築了一條月臺，築得比普通的月臺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車廂門口的踏步相平。這樣，上了年紀的人登車就不太費力。

王洪文他們的汽車從灰色大鐵門進去，可以直達月臺。下車以後，登上專列，進入一個用整節車廂改裝而成的客廳。客廳裏圍放着一圈沙發，每個沙發旁邊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鋪着地毯，車窗上挂着綢紗窗幔。客廳兩壁的壁燈和車廂的頂燈，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綫

毛澤東坐在車廂頂端一頭的沙發上，穿着白色的長睡袍，黑色的圓口布鞋，豆沙色的長襪，顯得隨便而有氣度。

王洪文問候毛澤東最近身體可好。毛澤東回答：馬馬虎虎。王維國乘機向毛澤東檢討，説自己在廬山犯了錯誤，没有聽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毛澤東瞅了王維國一眼，他早已知道王維國的底細，前幾天在杭州的時候，毛澤東曾經當面問過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你同吴法憲的關係如何？吴法憲在廬山找了幾個人，有你陳勵耘，有上海的王維國……你們都干了些什么？"現在，看到王維國裝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毛澤東不理睬他，扭過頭去對王洪文説："看來他們要動手了！"

王洪文聽了很納悶，揣摩這是什么意思；王維國聽了大吃一驚，意識到毛澤東已察覺了他們的計劃。

王洪文請毛澤東下車住到"414"（即現在的西郊迎賓館）去，毛澤

東揮揮手，讓王洪文、王維國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車，要休息了。王洪文告辭出來，得到汪東興的通知：“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主席找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上海王洪文談話。”

王洪文很興奮，連夜布置和檢查警衛工作，他琢磨了半天，還是鬧不清楚誰要動手，怎么動手。王維國則坐立不安，他馬上給遠在北京的林立果發出信息：“王維國因病住院了。”這是事前約好的暗語，翻譯出來就是：“B-52 抵達上海。”促使林立果加緊了謀害的步伐。

可是，這些情況，當時王洪文和我們毫不知曉，所以也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專列的外部警衛工作，仍然交給王維國負責。

林彪集團陣脚大亂

正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澤東抵達上海的消息，大爲意外。毛澤東提前離開杭州到達上海，打亂了他們的部署，原來制定的一些謀害措施失靈了。林立果和周宇馳、江騰蛟、魯珉等人商量，決定派江騰蛟到上海指揮，派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駕駛飛機，轟炸毛澤東的專列，或者趁毛澤東離開上海返回北京時，炸掉蘇州、無錫之間的碩放鐵路橋，制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就像當年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的手法一樣。

就在毛澤東抵達上海的九月十日這一天，躲在北戴河的林彪給在北京的總參謀長黄永勝寫了一封親筆信，原文如下：

“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

王飛，是空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林彪的親信。林彪一伙准備在上海得手后，由王飛在北京帶領空軍直屬警衛部隊，連同林彪前任秘書、陸軍某師政委關光烈調來的部隊一起，攻打釣魚臺。

也是在毛澤東抵達上海的這一天，在北京的黄永勝和在北戴河的葉群之間，連續通了五次保密電話，通話最長的一次竟達一百三十多分鐘！

在上海，王維國派他的部下、警衛處的李處長，親自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查看，准備在林彪一伙謀害毛澤東得手以後，立刻抓人，對外宣布是王洪文、徐景賢等人謀害毛澤東。最後，由林彪出面，接受大權，向

國內外宣告：已把所有與謀害毛澤東案有牽連的人一網打盡，就地正法。

毛澤東在危險中！毛澤東在危險中！！

但是，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戰略家，在這關鍵的時刻，他又走了出奇制勝的一步。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時許，毛澤東在專列車厢客廳裏，找許世友和王洪文談話。毛澤東看見兩人進來，微微欠動身子。因爲他的膝關節有病，行動不便，負責內部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就招呼來客主動上前和毛澤東握手。這天，王維國也到場了，可是毛澤東不與他見面，把他冷落在車厢外面。

毛澤東問許世友什么時候到上海的，許世友回答説，接到通知以後，今天一早就乘南京軍區的飛機趕來了。

毛澤東説，這一次出來，到了武漢、長沙、南昌和杭州幾個地方，今天是找南京和上海的同志，找你們吹一吹。他説，廬山會議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他問許世友：我那個時候不是叫你把會停下來嗎？許世友回答：毛主席説停，我們馬上就停了，我們聽主席的！

毛澤東把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并着重地説：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説，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許世友和王洪文都聽懂了：這是在説林彪和葉群，因爲葉群當時就是"林辦"的主任，人稱葉主任。他又針對林立果説：二十幾歲的人捧爲"超天才"，這没有什么好處。沉吟一下以後，他又説：廬山這件事還没有完，林彪同志當然要負一些責任，這次回到北京，我還是要找林彪同志交換一下意見……

毛澤東又説：要爭取主動，有了錯誤，不認識，不改正，在那裏頂着不好，這會加重錯誤，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輕裝上陣，人就舒服了。

毛澤東問許世友和王洪文：你們會不會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王洪文搶着回答：會！毛澤東説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

照去做。許世友回答：一定。

談着談着，毛澤東忽然問："你們吃飯了没有？"

"還没有呢，"王洪文看看表，時間已經是正午十二點了。

"那好，上海的同志應該請許世友同志吃一頓飯，喝幾杯酒，就在錦江飯店，你們的菜要搞得好一些！"毛澤東風趣地說。

"主席指示，照辦！"王洪文忙不迭地回答。

大家都高興地笑了。

"你們吃飯，我休息。"毛澤東欠身送客。

臨別的時候，王洪文請毛澤東在上海多住幾天 許世友說，離開國慶節時間還早，請毛澤東在路過南京時，無論如何要留幾天。毛澤東笑而不語。

辭别毛澤東以後，許世友、王洪文、王維國等乘轎車駛向錦江飯店。因爲王維國也是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上海請客吃飯，他應該是主人之一。

在錦江飯店南樓中條頂層的小宴會廳裏，擺開了一張大圓桌。王洪

毛澤東和林彪在一起接見群衆。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和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

文特地把飯店經理叫來，關照菜肴要搞得豐盛一些。小廚房忙着烹、煎、炒、熘、炸……；許世友善飲，一瓶茅臺不在話下，大家就輪流向他敬起酒來。

主多客少；主人有上海的王洪文、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和駐滬三軍負責人周純麟、高志榮、王維國；客人就是許世友一個。他輪流和各人干杯，應付裕如，因爲毛澤東剛剛接見過他，所以他的興致也特別高。

吃飯吃到下午一點二十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聽電話了。一會兒，他聽完電話回來，給許世友司令咬耳朵說："主席走了，剛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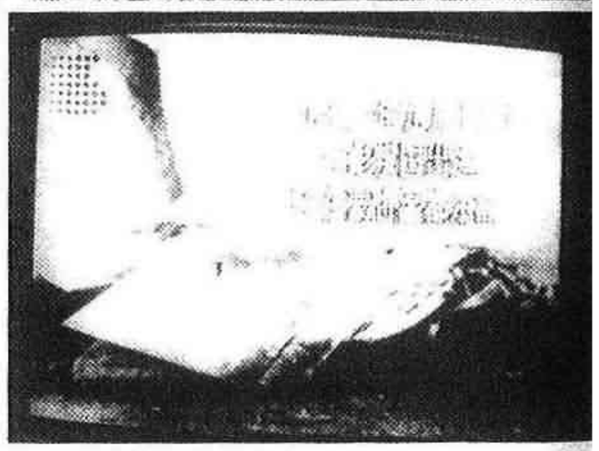
"唔？"許世友把眉頭一皺，大出意外。

過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維國聽電話，他聽了回來，我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

許世友已經無心吃飯了，他呷了一口酒，叫道：

"結束吧，我還要趕回南京去呢！"他很着急："怎么走得這樣快？我要飛在火車前頭，趕到南京車站爲主席送行。"

毛澤東走了，王洪文和我只好把許世友送到虹橋機場，讓他乘飛機



〔上圖〕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葉群等乘機逃往國外。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圖為飛機墜毀現場的林彪屍體。
〔右圖〕當年有關林彪事件的電視新聞。

返回南京。當許世友登上飛機的時候，毛澤東的列車已經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馳了，過了蘇州，過了碩放的那座鐵路橋，又過了無錫......任何車站都不停。許世友的飛機果然搶在專列的前面，他又急忙趕到南京火車站，可是，專列在南京站只停靠了十分鐘，很快就走了......

毛澤東一走，王維國馬上向警衛處瞭解毛澤東離開的確切情況，向林立果挂電話。王維國又連夜和妻子杜貴珍商量，覺得有些話在電話裏不便說，决定派自己的兒子王大章親自飛往北京，當面向林立果匯報。第二天一早，王大章化名王嚴，搭乘頭班飛機向北京飛去......

這以前，在北京西郊機場的一間密室裏，林立果正在和心腹們最後antml商定由誰去具體執行謀害計劃。林立果宣佈："101（林彪的代號）講了，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是開國元勛，搞成了，我在北京開十萬人大會歡迎你們，那個時候，你們都是國家的棟樑，有功之臣，要論功行賞。"

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周宇馳補充說："誰能完成任務，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位置由他挑！"

正在這個時候，王維國的電話來了："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現在已經走了！"

晴天霹靂！張牙舞爪的林立果頓時被兜頭澆了一桶冷水，所有的謀害計劃都破產了。幾個人刹那間都變得灰溜溜的，不知所措。當時的情景，在場的李偉信在後來的供詞裏描述得很具體生動："我發現他們開會的房門打開着，走到屋裏一看，魯珉不知何時已走，裏面還有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于新野四人，室內空氣異樣。剛才那囂張氣焰已爲神色茫然所代替，衆人目光呆滯，低頭不語，原來偉大領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了，企圖謀害毛主席的陰謀破產了。林立果流着泪說'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没有完成，首長連生命都交給我了，我拿什么去見首長……'"

毛澤東的專列跨過長江，在江淮平原、華北平原上奔馳，晝夜兼程，直駛北京。九月十二日下午，專列抵達北京市西南郊的豐臺車站，毛澤東下令停車，把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政委紀登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吴忠、衛戍區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吴德召來，作了嚴密的部署，專列再駛進北京車站。毛澤東平安地回到中南海，已經是九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多鐘了。

林立果得到毛澤東回京的消息，慌了手脚，在九月十二日晚上連夜乘了林彪的256號"三叉戟"專機，趕往北戴河，和林彪、葉群一起倉皇出逃……

毛澤東最後一次上海之行，倏然而至，又突然離開，從而徹底打亂了林彪一伙的"571工程"計劃，粉碎了一個可能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陰謀。

王維國"敢死隊"的覆滅

林彪在廬山九届二中全會上搶班奪權失敗以後，直接授意林立果主持起草《"571工程"紀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林立果伙同他的心腹周宇馳、于新野，在上海完成了這份"特級絕密"文件。

周宇馳向"上海小組"宣稱："王政委説太陽從西邊起來，也要相信"

當天晚上，在上海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裏，舉行了一個隆重的集會。林立果、周宇馳接見了以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爲首的"上海小組"的骨幹。在接見時，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發表講話，竭力吹捧王維國，他説：

"王政委的意見，有時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説白的，就是白的，説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説太陽從西邊起來，也要相信！"

那末，爲什么林立果、周宇馳等人要"大樹特樹"王維國的權威呢？這是因爲，王維國在實施林彪集團的陰謀活動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571工程"紀要》中寫道："九·二"（指九届二中全會）以后，"B-52"（林彪集團稱毛澤東的代號）"對我們不放心"，"與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最後"奪取全面政權"或形成"割據局面"。文件提出要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一種導彈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等恐怖、殘忍的手段，達到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的目的。而林彪一伙要完成這個充滿着血腥味的計劃，在上海就得全力依靠王維國"牽頭"。

林立果給自己取了個代號"聯合艦隊"的"康曼德"（COMMANDER），意爲"司令官"。這個"司令官"信奉的是法西斯主義。他在那份文件裏規定："堅决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

成仁。"所謂"江田島"精神，是林立果看了日本影片《啊！海軍》以後移植過來的。影片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設在日本江田島的海軍學校教官，一邊打着部下的耳光，一邊大聲叫嚷："我就是你們的父親和母親！你們一切都要聽我的！"

王維國就是"一切聽從林副部長指揮和調動"的排頭兵；如今，林立果等人又要王維國的部下們一切聽王維國的，連他說"太陽從西邊起來"都不能懷疑。這是向他們灌輸"江田島"精神，要他們無條件地替林彪賣命。

那末，作爲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員戰將的王維國，怎么會受到林彪集團的如此倚重，以致深深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的呢？我和王維國在中共上海市委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共事多年，深知其人。

林彪誇王維國："很年輕，很優秀，很聰明"

王維國，河北省元氏縣人，生于一九一九年。林彪自我爆炸那年他才五十二歲，是當時全國軍級幹部中比較年輕的一個。他中等身材，方方的臉盤上有兩撇倒挂的八字眉毛，下面閃爍着一雙機敏的眼睛。他說起話來喜歡噘着嘴，慢悠悠地，講一口標准的普通話。他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的，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此人打過硬仗，有過戰功，這一段光彩的歷史使他得到了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二級解放勛章。全國解放以後，他比較早地轉到空軍工作，很快地被提拔爲軍級幹部，曾經在武漢地區擔任過空降兵部隊的領導工作，文革以前調到上海任空軍第四軍政委。

早在文革之前，王維國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鈎。一九六五年"四清"運動期間，葉群化名到江蘇省太倉縣農村蹲點，由王維國所在的空軍部隊派人保衛和照料生活，每天給葉群打飯去的時候，在白飯底下放兩個荷包蛋或一條鷄腿，使葉群既得到艱苦奮鬥的美譽又吃得實惠，葉群當然是心中有數的。一九六七年三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參軍，就是在王維國屬下的碩放機場正式穿上空軍服裝的。林立果一入伍就當上了幹部，得到了王維國的悉心照顧，從此開始了他們相互之間的一貫吹

捧。林立果說"王政委是好領導、好班長、難得的人才"；王維國吹林立果"是天才，是好領導、是最好的接班人"。

林彪一家對王維國另眼相看、特别垂青，而王維國也亦步亦趨，緊緊相隨。林彪和江青等人大權在握以后，王維國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相當于副市長，并兼任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委主任。他秉承"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旨意，對這個系统的廣大革命干部進行殘酷迫害。從此，他的政治地位青雲直上。

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大期間，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維國，却被提名爲軍隊系统的九屆候補中央委員。當選以後，王維國趕到北京去參加九屆一中全會，剛在北京飯店報到住下，他立刻去找空軍司令吴法憲，感恩戴德地通過吴法憲向林彪表忠心。這樣，王維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林彪一伙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林立果等人向王維國交底說："要一邊倒，不要兩邊靠"，要"自由選擇政治領導"，"與其分散投資，不如集中投資"。這些話説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維國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自由選擇"一個"領導"，然後來個"一邊倒"，"集中投資"。而且，林立果又誘之以餌，當面向王維國許願"打算讓王政委擔當南京軍區空軍的副政委。"王維國打了一下算盤，終于决定把賭注統統押在林彪一邊，開始作巨額的"集中投資"。

"九大"剛剛閉幕，一九六九年六月，王維國就賣力地在上海爲林立果"選美"。與此同時，王維國幫林立果建立了配備槍支、汽車進行陰謀活動的秘密組織"上海小組"，這是他們的第一支"敢死隊"。

王維國用全家的名義向林彪寫了效忠信，他在信裏寫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聲稱自己對林彪"海枯石爛不變心"。接着，他親自帶了老婆和兒女，到北京去當面拜望林彪，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毛家灣林家大院接見了他們，還和他們全家合影，王維國受寵若驚。林彪還當面稱讚王維國"很年輕，很優秀，很聰明"。這三個"很"，就把王維國的魂兒"很"舒服地勾過去了。

王維國很快學會了臣下要向主子進貢的規矩。好在他所在部隊駐防的地區，都是江南的富庶之鄉，四時八節，應時鮮果，土特産品，一應

俱全。於是，浙江黄岩的蜜橘、寧波的楊梅、杭州的龍井茶、江蘇無錫的水蜜桃、蘇州東山的白沙枇杷……都成了王維國孝敬主子的"貢品"。他多次派女兒帶上一筐筐果品，搭乘飛機去北京、登門直送毛家灣，受到葉群的熱情接待和滿口讚譽。"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當然也有"賞賜"下來，芒果、荔枝或是大型地球儀、軍用地圖……，每次"賞賜"，王維國都要召開慶祝大會，高呼"永遠忠於"和"永遠健康"！

王維國阿諛林立果爲自己"開政治車、幸福車、保險車，我們坐了不會迷失方向，永不翻車"

林彪最鍾愛他的兒子，得意地稱讚林立果像他，甚至連作"講用報告"時的語氣都像他。王維國看准了林彪的心思，就當着林彪的面吹捧"第二代接班人"是"天才"，并且阿諛説："副部長在上海和我們一起工作，經常從各方面指點我們，這樣，我們方向就明確了！"一番話説得林彪心花怒放，這就引出了"兩老挾一少"的奇聞：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林彪到廬山會議上爭當國家主席的前夕，王維國和前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一起，去北京拜見林彪，然后由林立果親自開着林彪的專車——大"紅旗"厚鋼板防彈轎車，帶着王維國和江騰蛟一道逛長城。他們在長城上邊散步邊密談，同時合影留念，還用當時很稀罕的攝像機，把那些日后有用的"值得紀念"的活動場面，統統攝了下來，這架攝像機，還是廣交會上一名外商送給我外貿部門的樣品，當時就被王維國手下的副處長李偉信以"國防科委需要"的名義拿走了，送給林彪一家使用。

在他們攝下的録像帶和照片上，可以看見沿着逶迤起伏的長城，年過半百、體態臃腫的王維國走在左邊，瘦削蒼老、戴着眼鏡的江騰蛟走在右邊，他們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夾在中間的二十多歲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階，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這時，王維國諂媚地對林立果説：

"今天副部長開的是政治車、幸福車、保險車，我們坐了不會迷失方向，永不翻車！"

誰知道，在不久以後舉行的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伙差一點“翻車”。王維國一上廬山，就卷進了林彪搶班奪權的陰謀活動，他迫不及待地找了吴法憲和林立果，摸到了氣候，他在華東大組會上搶先發言，而且拒絶在主張“不設國家主席”的上海組集體發言稿上簽名。他還立此存照，在發言稿上注明“各人發各人的爲好。”表明了他的立場。但是，林彪一伙的陰謀被毛澤東識破了，他們被迫作了檢討，林立果氣得破口大駡。

組建“教導隊”——繼“上海小組”後的第二支敢死隊

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林彪一伙從和平奪權轉向武裝奪權，并且加快了暗殺恐怖活動的步伐。爲此，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中專門寫了一段：

> 教導隊：以培訓基層干部爲名，建立教導隊。要精幹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華一村。教導隊的幹部很重要，要選好。光靠教導隊的幹部還不行，上海小組要去抓。小組裏以龔著顯、蔣國璋爲主，小組每一至二人還要抓空四軍所屬的一個部隊，每個人在他抓的那個部隊，都要挂個職務。另外要給教導隊多配些汽車和槍，增加機動能力。可以叫王維國造槍。軍事上要多學幾手，政治上培養對“首長”“副部長”的感情。

這是林立果繼“上海小組”以後，進一步提出建立的第二支“敢死隊”，以便直接用來進行謀殺恐怖活動。他把這個重任又交給了王維國。

王維國接受任務後立即付諸實施。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在上海江灣大柏樹新華一村内由他親自組建了“教導隊”。他規定共建立三個區隊，九個班，每班十二人，一共一百多人。選入“教導隊”的成員條件是：“不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不要幹部子弟”，只要對林彪和“林副部長”感情深的。矛頭所向，昭然若揭。王維國還提出：要把“教導隊”培養成爲“誓死捍衛”林彪一家的“堅强戰鬥集體”，“將來要起

钜大的作用”。

“教導隊”成立的那一天，用集體名義給林立果寫了一份決心書，在會上進行了宣讀：

> 我們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緊跟您，一切聽您的領導，一切服從您的指揮，緊跟您，頂逆風，戰惡浪，風吹浪打不回頭……
>
> 爲誓死捍衛林副主席最高統帥的地位，爲誓死捍衛您——我們的好領導，不怕犧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聲令下，我們就立即行動，您指向哪裏，我們就衝向哪裏！

王維國指示，對這支“特種部隊”要進行格鬥、捕獲、駕駛車輛以及打巷戰等特別訓練。爲了避人耳目，還規定他們不得在新華一村內訓練，而是把他們拉到江灣機場進行秘密訓練。這支“教導隊”由“上海小組”成員、司令部軍務處處長蔣國璋和政治部組織處處長龔著顯具體負責，可見它的重要性。

秘密據點新華一村
和“樂器箱”裏的輕型衝鋒槍

爲了在情況緊急時能够讓林立果親臨現場直接指揮，王維國還按林立果的要求，在新華一村大院内建造一所秘密據點。林立果提出：這項工程“要絕對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室，門窗要裝防彈玻璃，院墻要開暗門”。根據林立果的要求，王維國親自找設計人員繪製了圖紙，成立了專門的修建班子，調集施工隊伍，日夜秘密施工。王維國等人既不依靠上海的建築工人，又不調用工程兵部隊，而是專門調來一批對情況完全陌生的浙江民工進行施工，以免泄密。爲了配合林彪一伙進行陰謀活動的時間表，王維國下令：“房子一定要在國慶節前完工！”連林立果没有考慮到的事情，王維國也替他周全地設想好了：王維國要求“在新華一村院内搞一個直升飛機場”，這樣，林立果就可以隨時隨地“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了。

至于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裏要王維國造槍的事，后來林立果進一步布置制造6.72毫米的輕型衝鋒槍，這是一種可以僞裝起來的武器。王維國以加强戰備、改進輕武器的名義，把這項絶密任務下達給某軍械廠。對於這樣重要的"戰備"任務，當然誰也不敢怠慢，經過多次試制，終於造出6.72毫米的輕型衝鋒槍八支。這些輕型衝鋒槍非常輕便和小巧玲瓏，可以拆卸成幾節，裝在一個扁扁的長方形小黑箱子裏，箱子的一邊有一個提手，可以拎起就走，好像提着一只裝了黑管或長笛的樂器箱一樣。誰也不會想到裏面是一件秘密武器。這種衝鋒槍安裝起來十分便捷，壓上子彈，一梭子掃出去，殺傷力幾乎和其他衝鋒槍一樣，在較近的距離内具有極大的威懾作用。王維國把兩支質量最好的輕型衝鋒槍送呈林立果。林立果收到以後十分歡喜，就裝入黑箱子，隨身放在他乘坐的汽車的後座裏。這種秘密制造和僞裝携帶槍支的方式，本身就埋藏着險惡的殺機。

林彪自我爆炸前夕，林立果説："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隱蔽得很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在北戴河下達了手令，謀殺毛澤東的計劃進入了倒計時的最後階段。 當天晚上，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機場的秘密會議上下達了具體的行動方案："用100（指口徑100毫米）高炮平射打火車（指毛澤東乘坐的專列），要空四軍把教導隊帶上，就説有壞人要害毛主席，以搶救爲名往上衝！"這樣，王維國以及他率領的兩支"敢死隊"，立刻就投入了這場驚心動魄的陰謀活動。

九月九日，林立果指定"上海小組"進入"一等准備"，"集中待命"，下令"教導隊"抓緊打靶訓練。

九月十日，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從杭州到達上海，停靠在西郊專綫車站上。王維國對"上海小組"主要成員和"教導隊"的頭頭蔣國璋説："你們和教導隊的訓練都要選好靶場、注意隱蔽，可以利用一些停機窩，不要讓人家發現了你們的行動。"

九月十一日中午，毛澤東突然離開上海，王維國兩次打保密電話給周宇馳，向林立果密報了毛澤東在上海找人談話以及離開上海的情况。

九月十二日早晨，王維國派他的兒子乘飛機趕往北京，向林立果、

周宇馳當面密報了毛澤東在上海的情況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林立果動情地對王維國的兒子說："在這種情況下，你爸爸還派你來給我們講這么重要的情況，說明你爸爸對我們感情很深，對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們今天所以能得到這么重要的情況，說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隱蔽得很好。"

九月十二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報以後，決定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大小"艦隊"成員，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分裂國家。決定以後，由周宇馳指使李偉信從北京打電話通知上海蔣國璋，要蔣馬上轉告王維國："明天（九月十三日）有一架大飛機到上海，'小組'全體、'教導隊'全體帶武器和戰鬥化行李，隨機出發。"并且特地關照："告王政委明天上機場，有話告訴他。"王維國聽了蔣國璋的匯報，心裏自然明白，他蹙起了兩根倒挂着的八字眉毛，沉吟地說："這次出發，可能和把毛主席來上海的情況，向林副主席他們講了有關。"

"九·一三"以后，王維國還完整地將一套林立果講話材料深埋地下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變原决定，叛國北逃。周恩來在請示毛澤東以後，以中央軍委名義下達全國禁空令。王維國收到禁空令，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猶如驚弓之鳥，坐立不安，馬上又派兒子趕乘火車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況，但還不知道已經摔死。王維國得悉後慌了手脚，馬上把蔣國璋和龔著顯兩人叫到身邊，訂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同時商量銷毀罪證。王維國對這兩個人說：

> 爲了對立果負責，殺腦袋也不能講！也可能把我們抓起來。你們仍要有單獨作戰的能力。你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一件事一件事地研究，要經得起人家問幾個爲什么。……'教導隊'目標大，解散算了；"上海小組"的人可以分散到職。把立果歷次來上海講話的材料，弄一份完整的藏起來，或者用塑料

紙包起來埋藏在地下；其他人的筆記本和材料，都要燒掉。

到了此時此刻，鬼迷心竅的王維國還想保存一套完整的林立果的講話材料，把它深埋在地下，以待來日“變天”、“登基”之需。就在禁空令下達以後的那幾天裏，上海空軍大院的一角烟霧彌漫，紙灰亂飛，王維國身邊的幾個人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日日夜夜清查文件，燒毀罪證，總共燒掉了林立果講話記録等不可告人的文件三百多份。王維國哪裏知道，這些紛紛揚揚漫天飛舞的紙灰，正好充當燒給游蕩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裏的那幾條孤魂野鬼的紙錢吶！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多鐘，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命令，王維國在上海被拘押審查。“上海小組”和“教導隊”被徹底解散。王維國及其兩支“敢死隊”覆滅了，“江田島”精神崩潰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王維國被押上審判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和策動武裝叛亂罪，判處王維國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奪政治權利三年，剥奪他的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二級解放勛章。王維國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經最高人民法院審理，認爲上訴無理，予以駁回，維持原判。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王維國刑滿釋放，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安置。後因病死于河南某地——他妻子的家鄉。

林彪公館：神秘的毛家灣

毛家灣一號，原來的高崗公館

我先後去過兩次林家大院——林彪在北京毛家灣的公館。

第一次是林彪剛剛自我爆炸不久，林家大院對內開放，我隨着衆人一起入內參觀。走馬看花，看得很不仔細，但是却激起了我想深入了解、研究一下林彪的家庭結構和日常生活的願望。

第二次我通過關係單獨進入了林家大院，整整看了一個下午。說來也巧，這次去的時候，正好遇到一個熟人，他參加了林彪住所清查整理工作的全過程，在他的向導下，我逐屋細看細問，見到了很多第一次參觀時見所未見的東西，也聽到了不少聞所未聞的奇聞怪事。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條胡同裏，離開平安里不太遠，門牌號碼是毛家灣一號。五十年代初期，這裏曾經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的公館，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以后，搬了進去，并且劃進了平安里醫院的一部分，加以擴建。這條胡同的兩頭都有警衛戰士站崗。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圍墻，南墻上有兩扇大大的鐵門，門裏是一個占地面積約一萬九千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築物的面積爲一萬一千平方米。

來到了林家大院

進了大門，分成東、西兩院，東院有一幢三層樓房，是林辦工作人員的住所和辦公樓，西院是林彪和葉群的居所，那是一大片經過精心設計、結構巧妙的平房，外墻都是灰色的，毫不引人注目，但是内部的裝飾却非常考究。這個設計思想，同樣也體現在后來我參觀過的上海"415"（現在虹橋迎賓館）以及杭州梅家塢附近的林彪別墅等建築物上。毛家灣林家大院内的西院房屋，四周都環繞着一條寬闊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紅旗防彈轎車，可以直接開到回廊裏，在屋内上下車，既防風避雨，又有利于保衛工作；回廊環繞着一間一間的房間，所有房間的門

窗，都開在回廊裏，安全是絶對有保證的。這些窗户，均爲雙層，便于隔音和保持恒温 有的窗户上，還安裝着防止外邊用電子儀器竊聽的銅絲網罩。房間裏都是清一色的柚木地板，鋪着暗紅色的大地毯。當初所以要造平房而不造樓房，一是因爲居住者年齡大了，可以免去爬高之苦；二是爲了保密，高墻裏的平房外人無從窺探……

我統計了一下，這一大片西院房屋裏有四個會客廳、四間卧室。進了屋門，穿過回廊，便是第一個客廳。這個廳的面積不大，陳設也很樸素簡單，就是幾把軟椅，旁邊幾只茶几，據説是專門用來接待并不親密的一般來客的。客來了，小坐片刻，主人見面寒暄幾句，不作深談；有的時候，主人自己甚至并不見客，一切均由秘書代勞。至于很多圈内的人或是林彪信得過的人，則被直接請到裏面的第二客廳。

第二個客廳面積很大，墻上挂着林彪手書的條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大塊地毯的四周，安放着一圈沙發，有單人的，有雙人的，足足可以供一、二十個人圍坐。這裏就是林彪親自接見來訪客人的重要場所。

在客廳的一角，安放着一個碩大無比的軍用地球儀，比之卓别林在影片《大獨裁者》裏面玩弄的那個地球儀，還要大得多。

大客廳的另一個角落，放着一座專供拍照用的階梯，共有三級平臺，每級可以站五、六個人，誰要是能够得到"副主席"的垂青，就能榮幸地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在兩間客廳之後，有一個很奇特的房間，面積不大，不過二十來個平方米，像是個小會客室。室内的陳設也十分平常，放着幾把軟椅子，没有桌子，窗户也都用窗簾遮得嚴嚴實實的。可是，室内的燈光却特别明亮，後壁的天花板兩邊墻角上，還特意安裝了兩盞小水銀燈，燈光斜射下來，把整個房間照耀得如同白晝。原來，這個特設的房間是專供葉群"相面"用的——把已經被層層篩選後選中的"妃子"、"駙馬"的候選人，帶到這裏來，由葉群暗中觀察。

從走廊裏的另一扇小門進入，我這才發現小會客室的後部隔着一堵墻，還有一個小房間，房裏暗洞洞的，靠壁放着幾只高凳子。我們跨上高凳，眼前正好有幾扇玻璃小窗，就跟電影院後部放映室墻上的小窗差

不多。從小窗望出去，下面那個被燈光照得通亮的小會客室裏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當年，葉群下令叫人把選出來的"駙馬"和"妃子"的候選人，帶到外面的小會客室裏，讓他們隨意地休息談話。她自己并不和那些人照面，而是偷偷地從走廊上溜進后邊的小房間，爬上高凳，從玻璃小窗裏窺探那些青年人的相貌、身材、言談、風度……因爲外面的小會客室照明度很強，而後部的小房間裏完全是黑漆漆的，所以，在會客室裏談話休息的男女青年，根本覺察不了有人正躲在暗處窺視他們。邱會作的妻子胡萍，就帶過人到這兒來給葉群"相面"。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林彪的藏書室

客廳的對面，有一個面積相當大的圖書室，四壁都是書櫥。藏書的数量不少，内容也很豐富，那個時期外邊看不到的圖書，這裏倒很齊備。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古籍，有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的現實主義經典文學作品，我還看到一本傅東華翻譯的美國小說《飄》（即《亂世佳人》）。在圖書室中央，有好幾只卡片箱，裝滿了名人名言的摘録卡片，我隨意抽出一張，抄録的是一句成語"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但是，聽説這些卡片是林彪的秘書兼圖書管理員摘抄的，而林彪自己則不讀書、不看報，每天聽聽文件，所以卡片上的文字并不能代表林彪的觀點。後來，江青要清華、北大兩校的大批判組，從這些卡片裏摘出了不少孔、孟的論述，對照林彪的言論，編成材料，加上按語，印發文件，作爲批林批孔的"靶子"，實在是牽强附會的。

地下電影放映廳

在室内走廊的盡頭處，有一座通往地下室的水泥扶梯，扶着一旁的欄杆往下走去，原來是一個裝飾得相當雅致的電影放映廳，是將原設計的防空洞改建成的。放映廳兩邊的墻上飾着壁燈，前座是沙發，後座是軟座，可以供二十來個人看片。林彪的代號是"101"，用"101"的名義可以調看所有的内部影片，包括江青釣魚臺片庫裏的影片，地安門外

中國電影資料館裏的封存影片，以及外交部等通過有關途徑要來參考的過路片等。但林彪自己很少看影片，看內部影片看得最多最勤的是林立果，放映次數最多、頻率最高的影片是美國故事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殘》，林立果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津津有味。可以想象：這一類影片對于林立果後來策劃的謀害活動，起了相當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恒温游泳池

從地下放映室走上來，拐一個彎，穿過門洞，走過甬道，豁然開朗，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座寬敞的室内游泳池，長二十五米，寬七米。林彪怕水，連水聲都怕聽，當然不會下游泳池。這座游泳池實際上是吴法憲專門爲葉群建造的。游泳池頂棚下的鋼鐵支架，也是吴法憲下令從空軍調來的。葉群一年四季都要游泳，池水一直保持攝氏三十度的恒温；游泳完畢，就在池旁的卧塌上休息，還叫專人來按摩，所以葉群到了五十來歲，體態還是保持得很好。帶我參觀的人告訴我，葉群曾在游泳池畔的卧榻上，勾引自己的男秘書，遭到拒絶……

最奇特的是林彪卧室

我參觀得最仔細的，當然是林彪和葉群的卧室。林彪的卧室在整座大院的深處，因爲他怕風、怕光，所以房間的窗户都緊閉着，還挂着厚厚的窗幔，室内的光綫很暗。但是林彪也不是終年不見陽光的，在他卧室的外邊，有一間專門設計的曬太陽的房間，屋頂很高，上無片瓦，從頂上直到房前的窗子上，都安裝着大塊進口的石英玻璃，價格昂貴，能透過紫外綫。逢到晴日，林彪的心情和身體都比較好的時候，他就到這兒來坐坐，曬曬太陽，使他的臉色不致太蒼白。

林彪的房間裏有温度自動調節設備，必須保持恒温，墻上挂着温度計，指明温度總是自動控制在攝氏二十一度左右。房間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只六尺寬的大板床，據説林彪有油漆過敏症，所以這張床是白木制成的，没有上色。林彪怕水，主要是怕聽流水的聲音，不要説江水、河

水，就是連抽水馬桶裏的水聲他都害怕，他聽了流水聲，腸子就要蠕動，跟着就拉稀。所以林彪房間旁邊厠所裏的抽水馬桶就被封起來了，可是他要方便怎么辦呢？服務員就在他睡的大板床的床板中央，挖了一個圓洞，洞下安放着便盆。每天林彪起床時由服務員把褥子和板床上的圓蓋拿掉，林彪就蹲在床上行方便，連厠所都不去的。

最令人稱奇的是，在大床靠近林彪足部的一方，懸空豎起一塊和板床同樣寬度的大木板，和板床形成直角形，好像一堵照墻，同樣用本色的白木製成。據説原來是用來擋風的，現在却成了林彪的"水粉牌"。林彪自已用他那歪歪斜斜的粉筆字，幾乎把整塊木板寫滿了：

"吃鷄蛋會内熱"

"吃芝麻可生黑髮"

"喝茶葉會升高體溫"

"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

這些"座右銘"，有的是林彪從自已的厨師那裏聽來的，有的是他自已的"生活實録"，還有的是從醫書裏翻到的。不看書、不看報的林彪，只愛好翻醫書和查辭典。一旦找到新的"秘方"，他就把已經寫滿的大木板擦掉幾行，補上新條目。當然，有些條文令人費解，例如"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林彪的膀胱上怎么會有汗腺？只好留待醫學專家們去研究了。

在房間靠窗的一隅，放着兩只小沙發，上面安置着竹編的坐墊，因爲林彪害怕出汗，坐在竹墊上可以透氣，防止出汗。他每天要在沙發上坐上好幾個小時，活像老僧入定，或是昏昏欲睡，或是念念有詞，只是在心裏打着主意。他的那些"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啦，"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啦，還有什么"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等等，就是這樣冥思苦想地"創造"出來的。

"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林彪自畫像

林彪提倡"活學活用"，可是自已不看東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等

都由秘書選出來以後念給他聽。他則端坐在沙發上，連在批件上畫圈都由秘書代勞。這種辦公的方式，在林辦叫做"講文件"。林彪聽得疲勞了，室內既没有電視機，也不放收音機，但是在白木床板底下放着一只像樟木箱般的雕花箱子，只是略小一點，即是清朝宮廷裏遺留下來的一架八音琴，現在成了林彪唯一的消遣品。打開箱蓋，啓動開關，連在齒輪上的軸心有一根根突出的小尖刺，當它徐緩轉動的時候，便有規律地撩撥着一根根鋼絲，八音琴就會奏出古老而悠揚的樂音。林彪閉目靜聽，室內縈繞着一種神秘和怪异的氣氛。

在大板床頭部後面的墻上，挂着一卷裱好了的條幅，是林彪自己用毛筆書寫的八個大字：

天馬行空
獨來獨往

從卧室的布置、陳設、環境和氛圍來推想卧室的主人，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個身體虚弱、死氣沉沉的老者，他怕動、怕死，於生活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如果以爲這就是林彪的真實形象的全部，那就大謬了。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到了他生前指定專人爲他拍攝的一部長紀録片，在這部記録片裏，那真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林彪：

在影片裏，林彪在大客廳裏揮舞着指揮棒，朝着鋪在地毯上的一幅巨大的軍用地圖指指點點、比比劃劃……

影片鏡頭：在大辦公室裏，或是在航行中的飛機座艙裏，林彪揮筆在宣紙上大書特書，"大海航行靠舵手……"

影片鏡頭：林彪到全國各地視察，林彪和高級幹部們熱烈握手，談笑風生……

影片鏡頭：在國防科委某個導彈研製單位，林彪在軍事科學家陪同下參觀人造衛星和巨型火箭等運載工具，他精神抖擻，在烈日下走了好長好長的路……

這部紀録影片，完全是林彪打算爲自己"登基"以後作宣傳用的。兩相對照，使人懂得了：古往今來的陰謀家們所使用的"韜晦"之計，

是怎么回事!

看完了林彪的卧室,我們再看葉群的房間。這可是迥然不同的兩種風格。葉群的房間和林彪的卧室相距很遠,據葉群自己說,因爲她希望室内温度要低一些,兩間卧室太靠近了會影響林彪的室温,所以要拉開距離。其實是還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

葉群卧室:貪婪、腐化、糜爛

走進葉群的卧室,就好像是走進了一個暴發户的儲藏室。左邊靠墻是一長排紅木制的玻璃橱櫃,一層層,一格格,擺滿了珍貴的文物古玩:銹紋斑駁的青銅器皿,玲瓏細薄的古瓷瓶罍,巧奪天工的象牙雕件,晶瑩剔透的瑪瑙翡翠……在右邊和中間的墻上,挂滿了國畫,仔細一看,幾乎全部是張大千的畫,有仕女,有山水……這些價值連城的國寶,都是用林彪的名義向故宫博物院等單位"借"來的。當然,文物的數量遠遠不止放在葉群卧室裏的這一些,就在毛家灣林家大院的后進,有一條二、三十公尺長的長廊,密密麻麻地陳放着"借"來的書畫文物。總計起來,在林家大院查抄出來的用各種手段侵吞的文物,總共有一千多件,當時價值就達數百萬元。在這批國寶的旁邊,同時展出了一樣東西:一張文革初期由林彪派人以"101"的代號開給故宫博物院的"借條"。

在葉群卧室裏,和這批古玩文物極不協調的是她那張歐洲古典式的洋派眠床,整部床架全部是用黄銅澆鑄的,飾以金色的花卉圖案,非常奇特。床頭墻上奶油色的鏡框裏,挂着一幀葉群的放大彩色照片。那是她到普陀山去游覽時照的,穿了一身淺灰色的料子西服,頭上戴着一頂同樣顏色的鴨舌帽,像她平時的習慣一樣,帽子總要推到頭頂後面,帽舌朝天,在帽檐底下故意露出一绺彎曲的前發,襯着她那張扁扁的臉龐,嘴角露出一絲微笑,這是她最得意的姿勢和神態。照片鏡框下邊的大床上,鋪着一副松軟而富有彈性的"席夢思"床墊,上面蓋着當時還少有的電熱毯。

在大床的旁邊,放着一張特制的餐桌。這張餐桌只有一條腿,像一

架落地風扇的柱子一樣、底部安裝着有幾個滑輪的支架，上部橫裏伸展出一塊像報紙般大小的木板托盤，可以上下升降調節。這張餐桌是專供葉群進英國式早餐使用的。每天早上，睡够了懶覺的葉群醒來以后，并不起床，而是按電鈴唤女服務員進去，侍候她漱洗完畢，就在床上像英國貴族夫人一樣進早餐。服務員端着早餐進來，一盆盆、一碟碟地放在餐桌的木托盤上：牛奶、烤面包、白脱油、火腿蛋、小牛肉，還有剛擠出的新鮮橙汁、擱在小盅上的糖黄白煮鷄蛋……最後是冒着熱氣的咖啡。服務員把餐桌推到葉群的床邊，伸展出來的木托盤正好對着靠在高枕頭上的葉群，她就用這種英國式的大嚼開始了一天的生活。這個一九三八年參加工作的十二級老干部，在文革中仗着林彪的權勢被提爲九級，可是已經連半點共産黨人的氣味都没有了。

葉群大床的一邊是一座英國式的壁爐。當然，恒溫的房間是用不到另外生火的。裝置這座壁爐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房間顯示出西方的高雅氣派。壁爐的四周鑲着精緻的烏木雕花架，爐頂的擱板上放着一叠進口的畫報。翻開其中的一本，大都是半裸的女性照片。有一幅照片上，一個穿着三點式"比基尼"泳裝的金髮女郎，嬌嗔地斜躺在大海邊的沙灘上，而她身上的所謂泳裝，實際上是幾片極窄的網眼布條。帶我參觀的人打開旁邊的櫃子，取出一件實物，原來就是照片上的女郎穿着的網眼三角褲，據説這是葉群看了照片以後，讓人專門到香港去買來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褲片上的網眼完全可以通得過硬分幣。而徐娘半老的葉群，居然敢穿着這樣的泳裝，當着警衛人員和男秘書的面，大搖大擺地跳到後邊的游泳池裏去游泳。

床上橡皮人，令人不寒而慄

參觀完葉群的房間，我正想離開，可是帶我參觀的人朝我呶呶嘴，我便隨着他向大床的另一側走去。他猛地揭開床罩：喲，一個人！一個和真人同樣大小的橡皮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乍一顯露，真是令人不寒而慄。細看之下，原來這具模特兒有着一副外國年輕男子的俊俏面容，光着身子，充氣的軀體顯得肌肉發達而富有彈性。他躺在葉群的枕

邊，供這個五十來歲的婆娘在長夜難捱時作伴……

但是，政治上墮落、生活上糜爛的葉群，怎么會滿足于這具沒有生命的進口貨橡皮人呢？她實際上早就和野心十足、臭味相投的總參謀長黄永勝勾搭上了。在檢查葉群的文件櫃時，發現了葉群在廣州休養期間，黄永勝寫給她的一首"情詩"：

纏綿五周月，
親手折幾枝。
雖是寒冬日，
黄葉熱戀時。

"黄葉"，指的就是黄永勝和葉群。這個"熱戀"，自然是背着林彪進行的。但是，兩人間的隱私和秘密，却被林立果發現了。

陰險詭秘的林立果卧室

在葉群的卧床旁邊，有一個床頭櫃，上面安放着一架紅色的保密電話機。她躺在床上，就可以拿起聽筒和别人通話。她經常緊閉着房門，和黄永勝打長長的電話。而做兒子的，便千方百計地想要竊聽自己親娘的通話内容。在葉群的卧室外邊，一個隱蔽的屋角裏，林立果從葉群的電話綫另外接了一根竊聽綫，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間裏。

我們沿着這根偷裝的綫路，來到了林立果的房間。這個房間的陳設比較簡單，和他在上海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裏的别墅相比，簡直天壤之别。他很少來這裏睡覺，即使人在北京，也經常耽在西郊機場招待所和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他回到毛家灣，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動非常詭秘，爲了不讓人發覺他的出入規律，他很少走前門，而是經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從後邊的小胡同拐進後門。他的房間就在西院的最後邊，緊貼着後門，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車，所以他來來去去確實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的味道。

林立果的房間裏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這些陳列的物品，都是從

北京、上海、廣州等處的林立果秘密據點裏集中起來的。有一架高級的進口照相機，裝着一個望遠鏡頭，從取景框裹看出去，一千公尺以外的樹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消調整好相機的清晰度，一按快門，遠處的風景和人物，就會縮短距離，像在近處一樣被攝人鏡頭；而且被攝的對象，根本不會察覺自己已經被别人偷拍了。林立果弄來這架照相機究竟派什么用場，是可想而知的。

在林立果的房間裏，放着兩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箱子的外殼上釘着"上海小組"的標誌。打開A箱，裏面是一部録音電話機。到了一處地方，按上綫頭，就可以通話。萬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聯合艦隊"和"分艦隊"的成員仍然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他，重要内容都可以録在録音帶上。林立果回來以后，一按機鍵，就可以聽到全部來電的録音。兩只箱子中的B箱，是專門用來偷聽偷録他人的電話的。像這類電話機，在海外可能早已有之，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中國，確是新鮮玩意兒哩。

"黄葉熱戀"，林立果録下悄悄話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葉群的保密電話機上安了一個竊聽器，把綫頭接到自己的房間裏，再接進B箱，就可以直接偷聽、偷録葉群和别人的通話了。林立果一共偷聽、偷録過葉群的多少電話，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幾盤十分重要的録音帶，准備有朝一日，只要他把這些不可告人的電話録音放出來，黄永勝和葉群等人就會乖乖地讓他牽着鼻子走，對他俯首貼耳，有求必應。可是，林立果的如意算盤終究没有實現，這幾盤被繳獲的録音帶，后來在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時，成了黄永勝、葉群等人的部分罪證，也是他們一伙丑惡行徑的最真實的自供狀。

這些録音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葉群生了小病以後，給黄永勝打的一個較長的電話録音。録音一開始就可以聽出葉群那故作嬌懶慵悃的聲音，她的普通話講得很標准：

"……我這幾天病了，還發燒吶，心裏可想你呢……"

“現在好一點沒有？要多休息……”黄永勝用湖北口音關切地問。

“你也不來看看我……萬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話，我希望你親眼看我一次。”録音帶裏傳出葉群的哭聲。

“我一定來！一定來！你不要這樣，這樣我也難受。”黄永勝誠惶誠恐地回答。

“這幾天在病中，我想了好多事情……我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滿足闖出禍來。我跟你說，我和你這個生命是連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和個人生命……”

“我懂的。我完全這樣瞭解，完全請你放心。我一切都是很順利的。”黄永勝賭咒發誓地回答。

“……我考慮到你今后，我們除了寫一些詩，互相安慰以外，我覺得我們還應該讀一點豪邁的東西。也說不定將來，你能在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領域裏，會起很大的作用。”

“在這個方面，我要向你學習。”黄永勝說。

“我願意永遠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書，而且我決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領導下，以你的意志爲意志。”葉群在向黄永勝“效忠”以後，又設計了一個“世襲”的方案：

“我們都有孩子。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慮，每個孩子往哪方面培養。另外，連我的加到一塊兒，至少有五個吧，連新朝（作者注：吴法憲的兒子）六個……”葉群開始安排起幾個家庭的未來了：“這五、六個虎大將，將來都可以。國家這么大，他們互相不會矛盾，一個人把一個關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說是不是？”

“對，對！”黄永勝忙不迭地答應。

“你永遠是元帥。我永遠是元帥帳下的一個兵，一個傳令兵……”

葉群在電話中簡直是信誓旦旦，老實說，她早就把寫給林彪的誓言“他年定隨到黄泉”，抛到九霄雲外去了。她知道林彪虛弱的身體將是短命的。她心目中的元帥，已經轉移到了黄永勝的身上。林彪假如聽到這段對話，會氣得當場吐血。然而，這樣一個重要的電話録音，却落到了林立果的手裏。林立果小名“老虎”，這頭張牙舞爪的“老虎”，怎

么會甘居黃永勝之下呢？有朝一日，他完全可以拿着這盤録音作爲要挾，然後爬到黃"元帥"和葉"主任"的頭上去。

離開林家大院，回頭看看那道灰色的高墻，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暗自額手慶幸：天理昭昭，這個"永遠健康"的"副統帥"，虧得没有當上"接班人"！

一封原件已被燒毀的重要信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林彪機墜人亡八個月之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等共一百多人。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首次公布

我正好率上海芭蕾舞團出訪朝鮮，回到北京後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最重要的議程是向與會者公布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大家對信件的內容極感興趣，因爲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裏毛澤東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道出了對自己的評價，不讚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時，也揭示了爲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據周恩來在會上說，這封信的原件已經燒毀了，現在發給與會者的文本是根據抄件翻印的，其中還有着頗爲曲折的情節。爲了閱讀和研究的方便，現在先把這封信的全文援引如下：

江　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爲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准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

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爲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衆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有一次橫掃牛鬼蛇

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爲左派和廣大群衆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黄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産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産黨又没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没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争，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争、中日戰争，最後是四年大内戰。他就滚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爲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摇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　澤　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時候，身在湖北武漢，而江青則在上海。此前的幾個月，毛澤東發動了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把矛頭直指"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委；毛澤東先後在上海、杭州等地找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

義，你們怎么辦"？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五月，由劉少奇主持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没有參加，會上批判了彭眞、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反黨錯誤"，通過了陳伯達等人起草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林彪到會做了講話，大談政變，大事頌揚毛澤東。這就是那個使毛澤東"總感覺不安"的《五·一八講話》。

林彪講"政變"驚心動魄

那麽，林彪的講話有哪些内容使毛澤東"感覺不安"呢？毛澤東説，"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林彪所念的"政變經"，其基本觀點就是："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内，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爲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隊，掌握了思想戰綫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産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林彪的這些觀點，是和毛澤東一致的，也是毛澤東多次强調過的，只是林彪在講話中，系統列舉"政變"的歷史和事實，從古講到今，從海外講到海内，講得赤裸裸、血淋淋，令人驚心動魄，直接道破了毛澤東"打鬼"的本意。所以毛澤東認爲"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没有過。"毛澤東在信中還認同地説："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正因爲毛和林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因此，毛澤東在信中説："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准備同意發下去。"

毛澤東對林彪的露骨吹捧妥協

當然，毛澤東也覺得林彪的有些"提法""不妥"。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反復説，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産階級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

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的話, 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等等。最後, 林彪宣布: "誰反對他, 全黨共誅之, 全國共討之。"

對于林彪這樣露骨的吹捧, 毛澤東終於表態了: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 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 簡直吹得神乎其神。" 毛澤東又說: "我歷來不相信, 我那幾本小書, 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 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 真是王婆賣瓜, 自賣自誇。" 盡管毛澤東有這許多 "不同意見", 林彪還是照講, 而且在把林彪講話作爲中央文件發至全黨這件事上, 毛澤東又妥協了: "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 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在重大問題上, 違心地同意別人, 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爲什么呢? 因爲有更加重大的任務: "爲了打鬼, 借助鍾馗",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 (不可能全部) 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就在毛澤東寫給江青這封信以后不到一個月, 他回到北京, 主持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月四日, 毛澤東指責向各單位派工作組 "是鎮壓、是恐怖, 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八月五日, 毛澤東寫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向劉少奇發出致命的一擊。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 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劉少奇靠邊了, 林彪的位置上升, 僅次于毛澤東, 名列第二。

至此, 毛澤東給江青的這封信的內容, 前后關聯的脈絡比較清楚了。現在再回過頭來說說這封信的公開發表過程。林彪機毀人亡以后, 一九七二年五月,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告訴我們: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 江青收到以後, 感到十分重要, 給周恩來看了, 江青和周恩來商量覺得應該把這封信給林彪看一下, 於是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同意, 但指示給林彪看後當面燒掉。當時林彪正住在大連, 周恩來特地把信送往大連, 給林彪親自看后當面燒毀, 這封信的手稿從此消失了, 只有毛澤東、江青、周恩來、林彪四人看過(據說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也看過此信手稿)。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喪蒙古大漠以后, 毛澤東却從他的檔案裏找出了這封信的抄件。原來,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寫完了給江青的信, 當即要隨身秘書照抄一份,

原件發出，抄件存檔。所以，盡管原件已經當着林彪的面燒掉，毛澤東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決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出來。爲了使與會者相信這封信件的真實性，周恩來特地把抄件復印後發給與會者過目，并帶回去各自存檔。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的字迹很稚拙，抄在直條紙上，上面留有一、兩處改動處，是毛澤東的筆迹，改動不大，記得有一處是把“他（指蔣介石）就逃到一個海島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島上去了”。周恩來并把抄件印成鉛印本，發給與會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在鉛印印發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江青要求把原信開頭的稱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經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没有同意，印發時仍維持原稱呼，只是在作爲中央文件印發時加上了一個標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了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做了發言，大意是說：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當面喊萬歲，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他人的發言，也都是這樣一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發言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緻唐納的公開信，認爲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這些發言都有簡報爲證。

說實話，參加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我心頭也有一些疑慮：毛主席既然對林彪“早有察覺”，爲什么仍舊堅持選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這一點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周總理既然早就看過毛主席給江青的信，知道毛對林的《五·一八講話》有“不同意見”，爲什么仍舊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作專題發言，盛讚“林彪同志的這一重要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成爲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當然，這些疑問，在當時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事情已經過去幾十年了，我至今認爲：這封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資料之一。而且，這封信從燒毁到公布的過程，也是耐人尋味的。至於寫信人、收信人、送信人、讀信人、燒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態，就只有留待讀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細心揣摩分析了。

睡夢裏當上了中央委員

人們形容那些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的喜事，往往說："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然而，就在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確確實實發生了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一批來自上海各個基層單位的工人，連黨的"十大"代表都沒有被選上，却在一夜之間，真的在睡夢裏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四人幫"謀劃已久

這件事情，王洪文、張春橋等早就在策劃了。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張春橋向上海下達指令："我們要培養工人大使。現在的外交人員，到聯合國去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張春橋特別强調 "還要培養女大使。"

根據張春橋的布置，上海市委組織部門當時選調了八十名工人，有男有女，在復旦大學專門辦了一個外語培訓班，對他們進行重點培養，以便有朝一日派到外交部門去。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在奉調北京前夕，他又一次作了專門布置 "上海要培養工人新幹部"，"上海一定要打破按部就班的迷信，准備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干部，隨時打算抽調出去。"選拔這批新幹部的標准，據他說一定要"領導熟悉，群衆擁護"，一定要"老造反"、"對文革有感情的"。

根據王洪文的意圖，市委組織部門的負責人金祖敏，經過層層布置、層層篩選，搞出了一份厚厚的名册，總共一百人，交給市委印刷廠作爲絶密件排印出來，上報給在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王洪文突然交底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中央通知上海的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去北京，參加黨的"十大"預備會議。我們幾個人到達京西賓館的當天晚上，

王洪文就來到了馬天水寢室外邊寬敞的套間裏。王洪文坐在沙發上，馬天水的秘書老房給他倒了杯茶，他呷了一口，開始談話交底：

"這次我在'十大'准備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內容突出强調'要培養接班人'，'着重從工人、貧下中農中選拔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王洪文說到這裏，長長地噴了一口"中華"烟，接下去說，"根據列寧的思想，他指出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應當直接選拔優秀的工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因此，我們中央考慮這次'十大'要大量增加工人中委，你們看上海有哪些人可以入選？"

王洪文這么一說，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感到意外，連聲回答：

"我們没有想到！""這次來没有做這方面的准備。"

這時，我想當然地問道：

"是否可以從這次的'十大'代表裏物色人選？"

王洪文顯得很不高興，他批評說：

"這次上海的'十大'代表選得不理想，我們看了幾遍材料，選不出幾個中委候選人來……你們犯了戰略性、路綫性的錯誤！"

馬天水挨了一悶棍，訥訥地說：

"我們考慮不周……"

"我不是早就提出要准備一百人的名單嗎？"王洪文追問。

"那早已印好上報給領導了，"王秀珍嘟噥着，她是在上海分管組織工作的，"不過那批新幹部還只是培養對象，准備陸續進讀書班培訓以后，再向有關部門選送，他們不是作爲中委候選人的呀！"

"你們應該想到嘛！"王洪文急了，"我前幾天還給老金去過電話，要他抓緊選人。可是選了派什么用場，這是絶密的，我在電話裏不能講呀……"

上海市委組織部門的金祖敏確實接到過王洪文的電話，也向馬天水和我們匯報過，正在繼續選人，可是誰也没有想到要馬上挑選十届中央委員候選人，所以没有來得及上報。

王洪文聽說如此情況，大聲地嚷道：

"現在離'十大'開幕只有幾天時間了，可是上海連一個人的名字都提不出來！"

馬徐王狼狽不堪

馬天水和我們面面相覷 中委候選人的提名可不是一件小事——至少得熟悉這些人,瞭解這些人,可是我們對名單上的一百人很不熟悉,對其中的大多數人還不認識,甚至没有見過面,也没有談過一次話……

王洪文看這件事"卡殼"了,就搬出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意見來,他説他和張、姚已經商量過了,"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簡稱)的老頭頭們在上海都已經作了安排,這次不考慮了。這次中委候選人要直接從基層單位選拔,最好是經過工宣隊的鍛煉、有一定實踐經驗的 同時要考慮這些人進了中委,將來都要調到中央各部門擔任領導職務。

馬天水想了一想,提出了補救的建議,他説金祖敏了解情况比較全面,而且他在上海,可以和有些人再當面接觸一下,然後提出一個初步名單來,報給北京逐一討論。

王洪文看到别無他法,就在京西賓館客房裏,當場拎起聽筒,要通了上海的長途電話……

金祖敏暈頭轉向

這時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金祖敏從甜夢中被叫醒,睡眼惺忪,聽説王洪文要名單,仍舊以爲是按照過去布置的口徑,准備向中央各部輸送新幹部的。他在電話裏答應等天亮上班以后,馬上和市委組織組的另一個負責人王日初商量,盡快拿出一個備選名單來。

王洪文聽了大爲生氣,對着聽筒吼起來:

"老金,你想得不對呀!我要的人不是派那種用場的,他們擔任什么職務,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你懂了吧?"

"格末……究竟是到啥地方去啦?"金祖敏操着一口紹興官話回答,他還是没有聽懂。

"你真笨!我電話裏不好對你説呀!"王洪文急得幾乎要跳脚,"我告訴你:你馬上要來參加什么會呢?你想一想,腦子怎么不會轉彎?!"

“哦……”金祖敏想到了他即將去參加黨的“十大”，他終於明白了王洪文要的是在“十大”增選的中央委員，但他也想不到要在“十大”代表以外另行找人，所以，他囁嚅着說，“代表的簡歷、檔案都已經送上來啦!”

“那些不管用!”王洪文繼續訓示，“我要你另外找人，在代表以外找人! 等天亮再辦已經晚了，現在我睡不着覺，也不能讓你老金睡覺!你給我連夜找出人來，每個人還要當面談過話。”

“好，好!”金祖敏只得連聲允諾。

王洪文挂完電話，時間已近拂曉，他餘怒未消，悻悻地離開京西賓館回釣魚臺去了。

馬天水和我們也不敢安睡，等到天亮，匆匆吃完早餐，就守候在電話機旁，等待上海陸續傳來名單。

在上海，金祖敏和王日初兩人半夜爬起來，緊張地找人談話，可是實在來不及，臨時又把市委常委、工交組的負責人黄濤拉上，三個人分頭接觸有關對象，從中物色人選。他們每談完幾個人，就把這些人的簡歷、表現以及談話後的印象，用電話傳到北京京西賓館。馬天水的秘書老房一手拿着電話聽筒，一手握筆記下這些預選人的材料。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坐在旁邊的沙發上等着，邊看邊議，忙得不可開交。

中午剛過，上海已經傳來了十來個人的材料，秘書老房還在繼續記錄、整理，王洪文又趕來了。他急於要和我們商定名單，説是最後要請春橋、文元兩人拍板。於是，就在京西賓館的套房裏，我們開始議論起預選名單來。只是，這十來個人有的根本不熟悉，有的也只有一面之緣，因此在議論誰該進中委的時候，都覺得心裏發虛。但預選名單必須限時限刻上交，我們只好硬着頭皮挑選，依據的就是電話中傳來的簡歷、以及金祖敏他們連夜“相面”談話的印象，這樣選人簡直是“瞎子摸象”、“霧裏看花”。

我們議了幾個鐘點，提出了一份初步名單，由王洪文帶回釣魚臺去，和張春橋、姚文元商量。同時，通知上海的金祖敏，把這些候選人員的書面材料趕印出來，一式幾份，派市委的機要交通員乘飛機專程送到北京，交給王洪文。

張春橋當場拍板

晚上，張春橋親自出馬，到京西賓館的套間裏和我們"拍板"來了。張春橋當時正處在政治上的巔峰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他將擔任黨的"十大"的秘書長。這個職務，過去都是政治局常委才能當的，這預示着張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將會上升。所以，張春橋顯得神采飛揚、情緒高昂。他脱下了歷來一直穿着的軍裝。自從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張春橋就開始恢復他的"文官"的形象，現在改穿了一身淺灰色的毛料中山裝，頭上没有戴帽子，人也顯得年輕多了。

張春橋坐在沙發裏，拿起前面大茶几上放着的候選人員書面材料，翻閲了一下，然后抬了抬眼鏡，用眼光掃視着環坐在旁邊的我們，慢條斯理地説：

"這幾天忙得够嗆，没有時間見你們。洪文已經跟你們説了，中央考慮鑒於林彪反黨集團竊取中央領導地位的教訓，今後要加强工農中委在中央委員會中間的比例。這個考慮是前不久才定下來的，事先没法和你們通氣，所以這次要上海提名就顯得倉促一些……"

張春橋顯然知道了上海的幾個人爲這次准備名單搞得很狼狽，他微微地笑了一下，把薰得臘黄的手指凑近嘴巴，抽了一口烟，繼續陳述他和姚文元的打算：

"這次增選的上海工人中央委員，將來准備陸續都要調到北京來，參加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的領導工作。比如文元就一再跟我商量，《人民日報》需要調一個上海的工人中委去，擔任社長。那些知識分子不向我們反映報社裏的真實情况……今后工人中委當了社長，他用不着看稿子，不必卷進具體的編輯業務當中去，稿子由總編輯負責，社長專管政治。至少這些工人中委可以向我們反映些真實的情况。文元和我想讓上綱一致的周宏寶到《人民日報》去，他是産業工人，聽説他在上海當過同濟大學的工宣團負責人……"

"最近剛把他調到市民兵指揮部當領導核心。"王秀珍插嘴説。

"……他在大學裏搞過一個時期工作，對上層建築的文教部門有了一些發言權，所以文元一再指名要他。"張春橋把他和姚文元、王洪文

商定的意圖，明白無誤地攤牌了，"洪文還提出，像公安部這樣的重要部門，也要派工人中委進去，公檢法不徹底改造不行。至於中央的工、青、婦機構，在'十大'以後都要相繼重新建立起來，我覺得：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都應該有上海的工人參與領導。我還考慮，從我們國家工人運動的傳統來看，在全國還要成立一些有影響的產業工會，像海員工會、郵電工會等等。所以，名單裏的海運局遠洋輪的海員馮品德，參加中委以后，就可以考慮調到北京來，將來擔任全國海員工會的主席……"

新中委糊裏糊塗

原來張春橋等人早有深謀遠慮 凡是上海新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將來都要在中央的各個重要部門占據一個舉足輕重的職位。這些人，必定是堅決地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必定是絕對地忠誠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綫"的；換言之，他們將不折不扣地聽從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指揮。

就這樣，在京西賓館的馬天水套房裏，又經過了一個通宵的比較、醞釀和篩選，終於確定了一個使王、張、姚都比較滿意的上海增選中委的名單。

這些十届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有：

周宏寶，上鋼一廠車工，姚文元要挑選他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后被張春橋調至中央教育部任二把手；

祝家耀，原上海5703廠（飛機製造廠）工人，王洪文認爲他是"老造反"，后任公安部副部長；

張國權，原江南造船廠船體車間冷作工，后調至六機部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擬提副部長；

陳佩珍（女），原上海市第五百貨商店營業員、支部書記，后擔任上海市革委會財貿組領導核心；

汪湘君（女），原上海市紡織局停經片廠工人，後擔任上海市婦聯主任；

馮品德，原上海市海運局某遠洋輪海員，擬調至全國海員工會任主

席：

于會泳、原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系教師，因參與搞樣板戲有功，被江青、張春橋看中調至北京，在國務院文化組工作，後任文化部部長。

名單確定以後，加上原來上海已進入中委、候補中委的人員，總共有十六名之多，比例很大。名單經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確定后報了上去。至於“十大”全體會議最後的選舉，只是一種程序，結果所有的候選人全都穩穩地當選了。可是，這些新增選的中委、候補中委，大都不是“十大”代表，没有來北京參加大會；他（她）們自己還都遠在上海，蒙在鼓裏。

大會選舉一結束，會議公報還未發表，第十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尚未公諸于世，馬天水就馬上從北京打電話給上海市委辦公室，急如星火。因爲即將召開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所以要求市委辦公室連夜通知名單上的這些人集中，乘飛機來北京，可是還不能告訴他們到北京干什么，暫時保密。

名單上有些人確實是被從睡夢中叫醒的，稀裏糊涂地趕到集中地點，被飛機一股腦兒地載到北京。當他（她）們掀開被窩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已經“中了頭獎”——在夢裏當上中央委員了！

當天晚上，名單公布。第二天上午，在北京京西賓館大禮堂旁邊的會議室裏，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接見了這批上海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王洪文、張春橋等和大家一一握手，可是對有些人根本不認識。姚文元更是鬧笑話，他當場把周宏寶和張國權兩個人的姓名和面孔都認錯了。

握手已畢，大家圍坐成一圈。

張春橋笑吟吟地説：“你們都要有調到中央各部門工作的思想准備……本來我不大願意從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説什么是‘上海派’。現在感到有需要，就要抽！”張春橋説到這裏，自左至右把大家環顧了一周，然後問道：“你們想到過自己這次會到北京來嗎？”

“想不到！”“根本没有想到！”衆口一辭。

"十大"期間，北京正在舉行規模盛大的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所以，從上海市第五百貨商店選拔上來的候補中委陳佩珍這時直着嗓子說道："半夜裏通知我上北京，我還以爲是要我參加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的接待外賓工作呢！"大家聽了哄堂大笑。

這樣，一批來自基層單位的職工，一夜之間，在睡夢裏當上了中央委員，在黨史上留下了一則奇聞。

毛澤東爲何選王洪文接班?

毛澤東選過三個“接班人”: 第一個是劉少奇, 最早主張把“毛澤東思想”寫進中共黨章的就是他, 可是後來又說他是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終於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搞掉了。第二個是林彪, 作爲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寫進了“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可是到第二年兩個人就在廬山會議上鬧翻決裂, 最後林彪想另立中央, 出逃殞命。這下子給了毛澤東沉重的打擊, 他考慮再三, 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 選定了第三個接班人——王洪文。

關於毛澤東爲什么要選王洪文做接班人, 外界曾經有過很多議論、分析和猜測, 作爲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十年文革中和他長期共事的人, 我願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實細節, 供人們瞭解毛澤東選中第三個接班人的全過程。

毛澤東是怎樣認識王洪文的

一九六六年, 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王洪文在上海市第十七棉紡織廠造了廠黨委的反, 一個是共產黨中央的主席, 一個是基層工廠的保衛科干事, 可以說根本沒有謀面的機會。在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起了媒介和橋梁作用的, 就是張春橋。

張春橋當時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被毛澤東看中, 升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 以後又被委派到上海處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后所引發的“安亭事件”, 和當時的“工人領袖”王洪文、潘國平等接觸頗多, 對處於困境中的他們表示支持, 因而使王洪文等人對張春橋感恩戴德, 言聽計從。解放以前, 上海的地痞流氓都盛行拜“老頭子”, 找靠山, 以謀求占領地盤和站穩脚根。有一次, 張春橋在和我談到“工總司”的這一批頭頭時, 公然笑着說: “他們把我當‘老頭子’了! ”這并非言過其實, 對於“工總司”, 張春橋確實發一句話就可以“擺平”一切。

在選擇"工總司"的主要領導人時，張春橋考慮到王洪文的出身好、成份好，又是共產黨員，做過工廠的保衛干部，所以讓他當上了一把手，而把另一個在造反初期影響更大、年紀更輕、不是黨員的潘國平貶了下去。王洪文對此是心領神會的，所以他對張春橋更是俯首貼耳，没有二話。而張春橋自己，也多次聲稱要穩定上海的局勢，主要靠兩百萬職工，特别是一百二十萬產業工人。所以，他緊緊地把王洪文和"工總司"捏在手裏，當作自己的籌碼。

張春橋、姚文元從一九六七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後，每隔幾天就要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寫一份書面匯報，加上毛澤東也給了張春橋一個任務，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領導的人選。這樣，毛澤東就從張春橋的一系列書面報告中，陸續瞭解了"工總司"以及王洪文等人的情況。

要説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王洪文，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事，毛澤東經周恩來安排，從武漢來到上海，住在西郊顧家花園代號爲"414"的招待所。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三十多萬工人，提了長矛、拿了短棍，出動了卡車、 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命委員會和"工總司"的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組織。毛澤東深夜坐了裝甲保險轎車到外灘巡視，只見一群群"文攻武衛"戰士頭戴籐帽，手持長矛，雄糾糾地守衛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門口。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的形勢大相逕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澤東感到很高興，當張春橋向他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時，毛澤東指示："武裝十萬工人。"張春橋問："要不要發槍？"毛澤東説："每人發一根棍子！"

毛澤東在上海期間， 張春橋對我説，要在電視臺的頻道裏多安排一些節目。我讓電視臺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裝衝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毛澤東在"414"招待所裏看得津津有味；我還安排播出了一批文藝節目；實況轉播了幾場批判原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的電視批鬥會，批鬥會會場放在上海雜技場和文化廣場， 全市各單位都可以收看。張春橋陪同毛澤東在招待所收看電視，適值王洪文在批鬥會上作總結發言，張春橋向毛澤東介紹了王洪文的情況，毛澤東直接收看、收聽了王洪文的講話。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王洪文，這個指揮幾十萬工人踏平上

海柴油機廠的"工總司"司令，在電視裏侃侃而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和王洪文的首次談話

毛澤東在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主要是借助青年學生的力量，支持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他自己八次接見紅衛兵，鼓動他們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到天下大亂以後，毛澤東想要從"大亂"走向"大治"，可是已經不行了，那些青年學生、紅衛兵們不聽話了，他們打派仗，搞武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再也收不攏來了。於是，毛澤東又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澤東作出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批示，中央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毛澤東說："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一時間，工人階級又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榮譽和地位，知識分子淪爲"臭老九"。王洪文們更加神氣了，"工宣隊"進駐了所有的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甚至連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各個部門也改名爲"工宣隊一辦"、"工宣隊二辦"……。一九六八年國慶節，黨中央、國務院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去觀禮，王洪文就是上海代表團的領隊。

這次國慶觀禮，王洪文他們住進了中南海。文革初期，王洪文帶領上棉十七廠"誓死造反隊"上京告狀時，只能住在北海附近的商業招待所裏，現在和那時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别。深夜，周恩來總理還到觀禮代表的駐地嘘寒問暖，更使代表們感到激動萬分。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檢閱國慶游行隊伍以後，毛澤東竟然又在天安門城樓上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喜出望外！

毛澤東這時已經向清華、北大派出了"工宣隊"、"軍宣隊"，他還用向他們贈送芒果等方式，表示自己對他們的支持。毛澤東深知，此時此刻，全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對穩定文革局勢、鞏固文革成果，是有着決

定性的意義的；他當然也清楚：以上海的重要地位而言，上海的工人階級在全國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應當成爲“領頭羊”。自從他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上海的電視熒幕上見到了王洪文以后，現在他也有意要進一步認識和瞭解一下這個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首領人物。正如他一貫所主張的：要瞭解一個人，就得要和他談一次話；要認識一條路，就得要用脚親自去走一走。

於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經過張春橋的引見，毛澤東單獨和王洪文談了一次話。王洪文接到通知，懷着興奮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進天安門城樓，步入用屏風阻隔着的貴賓會見廳，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這時，張春橋避開了，這是張春橋的聰明之處，他知道這種時刻是毋需他在場的。

穿着當時流行的軍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他介紹給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禮節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對王實在是一無所知，他瞅瞅這年輕人，萬萬没有想到面前的這個工人日後會取代他的位置，成爲毛澤東的第三個接班人。

毛澤東按照他的習慣，首先問王洪文是哪裏人，這樣便可以憑借他的淵博知識，展開話題。王洪文回答説，自己是吉林省長春市人，一九三五年出生在長春市郊區。毛澤東屈指算來，那正是僞滿洲國時期，溥儀上臺，長春易名“新京”，成了僞滿的首都。毛澤東問王洪文，家裏是幹什么的。王洪文回説是貧農家庭，父親早死，自己從小没有讀完小學，就給人放牛、放猪，也種一點田。到十六歲上，東北解放了，就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后，又跟着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抗美援朝。毛澤東問是什么部隊，王洪文説是二十七軍，毛澤東很熟悉，記憶力相當好：哦，軍長是尤太忠，“尤大麻子”。王洪文説：我就是軍部的警衛員和通訊員，當了六年半兵，在部隊裏入了黨；一九五六年復員，又到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當保全工，一九六四年調到保衛科當干事，文化大革命當中跟着毛主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澤東不要聽後面的這些話，打斷了問：你現在是在工廠裏還是在“工總司”工作？王洪文説：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也兼着“工總司”的工作，廠裏每個禮拜都去勞動。毛澤東點頭叮囑：永遠不要脱離勞動、脱離群衆。

這次個别談話，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後來他一再向别人推薦説：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干部，經歷比較全面"，這段評價源出于此。對于王洪文來説，毛澤東和他的個别談話也是一次重大的契機，將影響到他今后畢生後發展道路。

王洪文在中共"九大"上成了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

自從一九六八年國慶節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單獨接見以后，身價倍增。國慶觀禮的代表們集體返回上海，王洪文却没有回來，他被指定列席從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就是這次全會，把劉少奇定爲叛徒、内奸、工賊，并作出了把他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内外一切職務的决定；這次全會，還批判了所謂的"二月逆流"，批鬥了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王洪文還是生平第一次參加黨的高級政治生活，而且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當衆提名。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讚揚了上海，他説："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萬工人掌握了局勢。"在十月三十一日的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又對參加中央全會的全體人員説："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來）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多大了？（王答：三十四歲。）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這次會議，有年輕的同志參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肯定上海的形象，表揚上海的工人，并當衆推薦了王洪文，説明他早在一九六八年的時候想要從工人階級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頭已經開始萌芽了。至於王洪文自已，把毛澤東的接見和能够列席中央全會，看作是一種殊榮。回到上海以後，他向我們激動地談論毛主席接見的經過，參加中央全會的感受，還把毛澤東和他合攝於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送到上海展覽館展出。

由於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重視，張春橋和姚文元回到上海以后，也做了一個調整，就是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的排名次序變更了一

王洪文造反出身，青雲直上，紅極一時。這是當時為宣傳他而拍的照片。

下、將原來名字排在后邊的王洪文，調整到了我的前面。這樣，本來上海的紅衛兵給我起的外號叫“徐老三”，現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王老三”。

接下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在各地展開，王洪文擔任了上海“九大”籌備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他和我一起布置收集了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譚震林等人的材料七十多份，主持編印了一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帶到“九大”去作批判用。在“九大”開會期間，王洪文不僅擔任了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而且被指定爲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毛澤東對王洪文，也由於接觸增多而更加熟悉起來，例如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的“九大”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曾三次提到王洪文，和他展開了對話，一問一答，說明毛澤東對王洪文越來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鋒頭的是在“九大”四月十四日大會上代表全國工人階級作了發言。本來，最有資格代表全國工人階級的，不是王洪文，而是王進喜，外號“王鐵人”。他是大慶油田的優秀工人，全國勞動模範。在

"工業學大慶"的運動中,"王鐵人"的英雄事迹已被人們廣爲傳頌,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钜大貢獻使他成爲全國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而且"王鐵人"這次也參加了"九大",被選爲大會主席團的成員。按理說,王進喜("王鐵人")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大會上發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王進喜的這種資格却得不到"中央文革"的認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爲文革以前的勞動模範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思想偏於保守,"路綫覺悟"比較低,不敢造"走資派"的反,所以不同意像王進喜這樣的勞動模範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九大"發言,主張另選"路綫覺悟"高的造反派工人代表發言。

由於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格外垂青和關注,也由於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中對上海作出了明確的肯定:"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衆、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王洪文作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領,在上海的奪權鬥爭中立了大功,因此,他當仁不讓地成爲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并且取得了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九大"發言的資格,赢得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青睞。

王洪文爲獲得了這樣的榮譽而神采飛揚,但是發言人的名單到四月十三日下午才由毛澤東最後確定下來,四月十四日就要發言了,王洪文十分着急,我答應爲他起草發言稿并送給張春橋、姚文元審改,他才定下心來。隨即,他向我借了十五元錢,到大會小賣部去買了一條黑色的的確凉長褲,配上一件新的上裝,使這身新的裝束更符合一個工人階級代表的身份……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發言以後,毛澤東親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講話。"王洪文一本正經地從主席團座位上走向旁邊特設的講壇,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帶一點東北口音的普通話,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向全黨發言。

王洪文在發言中代表廣大的工人階級熱烈擁護毛澤東在"九大"的重要講話,擁護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他講了四點內容:一是代表廣大工人階級表示要努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二是要遵

照毛澤東"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教導，完成工廠的鬥、批、改任務，搞好上層建築的鬥、批、改；三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四是要學習解放軍，武裝好工人，隨時准備粉碎來犯之敵。

王洪文在發言時，毛澤東以及坐在人民大會堂裏的一千五百十二名"九大"代表都凝神諦聽，攝影機沙沙轉動，照相機嚓嚓閃光……第二天，大會公報發表的時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林彪以及其他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登上了報紙的顯著地位。王洪文的名字，從此響遍國內，傳至海外……

在與林彪集團鬥爭中王洪文取得信任、調往北京

從"九大"開始，毛澤東就有意減少黨內老同志的位置，在中央委員會內大量吸收文革新人。在大會選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原八屆的中委、候補中委只有五十三人。毛澤東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接見部分代表時說過"我們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毛澤東又說"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這說明他的"吐故納新"思想，已經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中得到體現了。

在"九大"的選舉中，王洪文和我都當上了中央委員，上海的老幹部馬天水當上了候補中央委員；張春橋、姚文元則都進了政治局。張、姚此后的精力都要放在中央工作了，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回到上海來，他們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九大"以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爭奪權力的鬥爭漸趨激烈，在中央，爲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問題，吳法憲和張春橋發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上海，王洪文和林彪的心腹、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在關於武裝民兵和公安部門行使職權的範圍方面，也不斷地發生磨擦。這場鬥争延續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來了個總爆發。

毛澤東識破了林彪等人的用心，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支持了江青和張春橋，拋出了陳伯達。王洪文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是堅决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同時，由於我們向江青、張春橋提供了華

北組六號簡報，爲他們及時向毛主席告狀并取得勝利立了一功，所以江青在廬山寓所秘密接見了王洪文和我。她當場對王洪文說："知道吧，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在毛澤東和林彪決裂的關鍵時刻，我們聽懂了江青轉達的是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殷切期望 此時此刻，這個期望含有特殊的意義。

廬山回來以後，王洪文在抓批陳（伯達）整風的同時，表示要遵照毛澤東的教導，加强自身的學習，認真讀幾本馬列的書。他和我結成"一幫一、一對紅"的對子，每天上午在我家一起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以後又組織市委常委共同學習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有了一些學習體會以后，他接受我的建議，由我代他起草了一份向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書面報告，匯報他自己學習馬列著作的情况和收獲，并表示要堅决揭露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所推行的唯心論的先驗論，這實際上是表示要和林彪所鼓吹的"天才論"劃清界限。這份報告深得毛澤東的讚許，批示同意作爲中央紅頭文件印發全國省軍級干部參閱。這一來，王洪文又成爲毛澤東所肯定的學習典範。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中央舉行批陳整風匯報會，王洪文在會上看到了毛澤東對葉群、黄永勝、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檢討的批示，覺得對林彪等人的鬥争升級了。王洪文和我在會上作了聯合發言，揭露林彪一伙在廬山搞突然襲擊，實際上是一次未遂的政變。此舉遭到林彪一伙的嫉恨，他們事後在商量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時，曾打算在事成之後，把謀害的罪名加到王洪文和我頭上，先把我們逮捕滅口，然后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是這一伙人幹的，再順藤摸瓜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網打盡。只是這個如意算盤因林彪等人的覆滅而未能實現。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巡視南方，一路講話吹風，揭露林彪一伙的反黨活動。九月十日，毛澤東從杭州突然來到上海，第一天在專列上接見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叫到上海，當面召見了許世友和王洪文，向他們交了林彪事件的底。緊接着，毛澤東又不告而別，乘着專列風馳電掣般返回北京。林彪等人張皇失措，連夜出逃，自我爆炸，機毁人亡。

林彪自爆以後，王洪文接獲中央的通知，趕到北京，接受毛澤東的

命令，立即返回上海抓捕林彪的心腹 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并且負責上海地區的林彪專案工作。有些重要的材料，都是由王洪文派人直接送周恩來轉呈毛澤東的。在揭露林彪集團反黨活動的過程中，王洪文的忠誠進一步取得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

林彪的覆亡，事實上已經説明了毛澤東個人遴選接班人的實踐的失敗，可是他仍是不肯罷休的，他憂心忡忡，思量自己的身後事，覺得接班人的問題還是没有解决。當然，現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周恩來在主持，毛對忠心耿耿的周也是信任的，但是，周已經七十四歲高齡了，毛自然不會選這位只比自己小五歲的老同事做接班人的。本來，這件事還可以從長計議，可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對周恩來進行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他竟患了膀胱癌。這個突發事件促使毛澤東加快了另選接班人的步伐。

毛澤東麾下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分屬兩部分人， 一部分是像葉劍英、李先念這樣的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以後又重新恢復了工作；另一部分是像江青、張春橋這樣的"文革派"，這一派動輒訓人，積怨甚多。無論從哪一部分中選接班人，都難以擺平；即使毛澤東比較屬意於張春橋，但從九屆二中全會上張春橋受到圍攻的情况來看，他很難得到中央委員會裏大多數人的支持。於是，毛澤東决心撇開現有的中央政治局，從省、市一級選拔一個接班人上來，這樣，兩方面都没有理由反對。他想到的第一人選，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實于毛澤東的文革路綫，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對這個年輕人只見過幾次面，畢竟還不够了解，毛澤東决定先把他調到身邊來全面地加以考察，看他是否能當此重任。

一九七二年九月間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張春橋的電話，通知他把工作移交一下，中央决定調他到北京去學習。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問學習什么、怎么學習。張春橋説，學習要有一段時間，所以要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隨帶一個秘書。

王洪文接完電話，趕緊找我、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們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議論半天。我説："這次中央决定調老王去學習，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爲毛主席在'九大'就説過，要從工農積極分子中提拔

幹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進中央政治局了！"

王洪文趕緊制止她："噓，不要亂說。"

馬天水頻頻點頭："林彪集團垮臺以後，中央的人越來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後，很有可能回不來了……"

其實，當時我們幾個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們認爲：王洪文去中央"實習"一個時期以後，很可能會增補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王洪文的職務會超越張春橋和姚文元，一躍而爲黨中央副主席。這一點，連王洪文自己當時也是萬萬預料不到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六日晚上，我們幾個在錦江飯店小禮堂設宴爲王洪文餞行，九月七日上午，我們到虹橋機場爲他送行，王洪文和秘書小廖提着手提箱向我們揮手告別。我們目送着他乘坐飛機，"青雲直上"，向北京飛去……

王洪文調到北京以後，中央要他一面學習，一面參加中央的工作。周恩來特別關心他，安排他住進釣魚臺九號樓，和張春橋、姚文元住在

一起，又通知他參加中央的各種會議……王洪文自己也搞不清楚中央調他去的最后意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毛主席要他上北京是要進一步重用他。

事實確實如此，毛澤東等王洪文安頓下來以後，連續找他談了幾次話，詳細地詢問他的歷史，并且在交談中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和觀點，既對王洪文進行考察和面試，又對他進行開導和幫助。毛澤東還關照周恩來親自幫帶王洪文，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周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連絕密的討論運載火箭把人造衛星送上天的專案會議，都要王洪文參加并讓他發表意見，這也是周恩來對王洪文的幫教和考察。與此同時，中央辦公廳還給王洪文送來了完整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供他學習使用。

王洪文面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考試"和考察，開始時確實是兢兢業業、謹慎小心的。中央説調他去是爲了加强學習，他也就像模像樣地學習起來，他向我提出，要把上海市委寫作組的肖木調去北京，當他的理論學習輔導員。蕭木是寫作組的主力，有理論水平，筆頭又好，文采風流，我當然舍不得他走；可是王洪文指名要人，我不得不放。蕭木幫王洪文訂了一個學習馬列著作的計劃，每天共同讀兩小時，工作再忙，雷打不動。王洪文看到毛澤東認真地學習英語，他也仿效起來，他通過我從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物色到一位姓黄的英語教員，調往北京，經常輔導他學習 ABCD。

王洪文很快適應了中央高層的夜間工作的日常生活。因爲毛澤東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的，於是，從周恩來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都是睡到中午以后起床，處理文件；吃過晚飯以於，參加各種會議，參加政治局集體辦公，有事隨時由周恩來請示毛澤東，一直忙到清晨才上床。王洪文因爲隨同周恩來實習，會議特別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張春橋來上海，對馬天水、我和王秀珍説："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們只參加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的會議，他呐，總理開的會，他都要參加，國務院那一坨，中央軍委那一坨，甚至連國家計委的會議，都請他去參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們多，總理指示：各個口都要向他

送文件，他看都看不過來……”張春橋還向我們透露了訊息：“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他宣布：經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老幹部馬天水主持。

王洪文在北京忙則忙矣，但整天學習、開會，和他在上海的小兄弟們見不到面，一貫喜歡衝衝殺殺、“猴子屁股坐不住”的人，現在要他整天練“坐功”，實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都不在北京，難怪他要給上海的馬天水打電話訴苦，說是自己感到很寂寞……但是，王洪文還是強制自己“耐得寂寞”，因爲他知道：現在是關鍵時期，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經得起毛澤東、周恩來的考察、了解……

毛澤東有時也把王洪文派到全國矛盾比較尖銳的地區去，觀察和鍛煉他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先后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區。王洪文很喜歡外出，因爲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抵達那裏，能受到當地負責人的隆重歡迎和盛宴招待，至於處理兩派衝突和地區武鬥等，又是他所熟悉的，他在上海的時候，經常要到現場去處理和調解兩派的矛盾，解決文革中“老、大、難”單位的問題，積纍了一定的經驗。所以，現在他到了這些“老、大、難”的省、市、自治區，把兩派的頭頭都召集攏來開會，向他們轉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關懷和希望，要求兩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頗有成效。經他去處理過的省、市、自治區，形勢都有所好轉。這些成果，反映到毛澤東和周恩來那裏，使他們感到欣慰，對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好評也逐步升級了，毛澤東對張春橋當面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考慮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張春橋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張春橋的工作。

當然，對於王洪文的文化水平低下、知識比較欠缺，毛澤東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由于他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抱有偏見，他更欣賞大老粗。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就對黨內的領導幹部說過：“大寨黨委書記是個大老粗，可不能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比較沒得知識，知識分子辦不了什么事，歷史上當皇帝的朱洪武（朱元璋）識字不多可是有本

領。我們軍隊裏邊老粗很多，可是老粗打敗了黄埔的學生。"根據這種推理，當過工、農、兵而又不是知識分子的王洪文，也是一名有本領的老粗，自然具備了當接班人的資格。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通知我們到北京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議題是討論"十大"的准備工作。中國共産黨"九大"是一九六九年召開的，按理説，"十大"可以相隔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舉行，可是，那個寫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九大"黨章，實在不能再用，拖下去的話在全世界都要貽笑大方。所以，毛澤東决心提前召開"十大"，看來他選擇新的接班人已經胸有成竹了。

周恩來主持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他向我們宣布：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參加工作。又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决定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并提出新的黨章草案。至此，新的接班人已初露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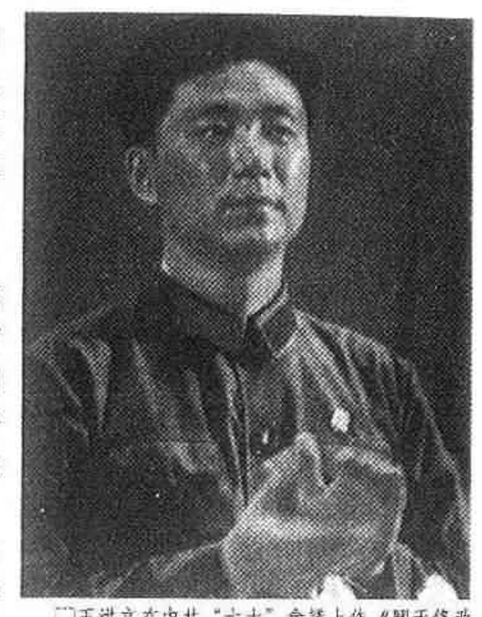
同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又通知我們出席"十大"選舉准備委員會會議。毛澤東没有到會，請周恩來傳達他的要重視提拔新生力量的建議，接着，毛澤東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暗示：周恩來宣布，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准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爲副主任。周恩來宣布完畢，立即謙恭地從主持人的地位上退讓，請王洪文接下去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全黨一百零四名高級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和中央各部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立刻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選舉准備委員會王洪文爲正，周恩來爲副，説明王洪文躍升到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來的任務就是輔佐他，帶一程、送上馬……

王洪文代替毛澤東投票，擢升爲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澤東選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黨中央最高層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開以前，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

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王洪文做過工、當過兵、種過田，以後又在工廠裏當了幹部，工、農、兵、幹部……比較全面，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輕幹部……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會議上作《關于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的報告》，在此次會議上，他當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

不料，周恩來說話以後，政治局委員們都不吭氣，李先念、紀登奎等悶聲不響，張春橋、姚文元不便搶先表態，會場裏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尷尬。過了片刻，許世友嘟囔着說王洪文太年輕了，意思是他不讚成王當副主席。最後，還是葉劍英出來表態，葉劍英說："重視提拔年輕干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六十年代，主席就多次說過：群英會中諸葛亮只有二十七歲，孫策小霸王十七歲，周瑜拜大都督時也只有三十歲……"葉劍英又調過頭來做許世友等人的工作，"我們這些當軍長、師長的時候，有的還不到二十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三十八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贊成王洪文同志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后……"

經過葉劍英一再做工作，同時在副主席預選名單上又增補了一名軍隊幹部李德生，這才使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但是，這已經使王洪文嚇出了一身冷汗。事後，他向我提到這件事，仍是耿耿于懷……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大"開幕。毛澤東親自出席并主持大會，他宣布：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由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

告，這樣一來，王洪文就躍升到黨內第三號人物的位置。

那天，大會的氣氛有些特別，開會之前，周恩來向代表們宣布，今天“十大”開會，對外是保密的，現在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等候開會，而三樓宴會廳裏正在舉行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的酒會，許多外國朋友在酒會上跳舞，正好掩護了“十大”的召開。代表們都覺得神秘兮兮的，而且，除了年老體弱的以外，大多數代表們來到會場，不是乘車來的，而是通過漫長曲折的地下通道走進人民大會堂的，這更加增加了神秘感。代表們在大會堂裏等候毛主席出場，等了許久不見毛主席上臺，據王洪文後來告訴我：“毛主席有病，兩條腿走路不方便（作者：毛患的是運動神經元病，或稱內側縱索硬化症），所以他在后臺練習走步，走了好一陣，適應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緩步登上主席臺。”當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大家沒有呼“萬歲”的口號，因爲怕驚動了樓上的外國朋友，只是熱烈鼓掌，所以大會的氣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靜得多。

開幕會議結束以後，毛澤東宣布散會，所有的代表們都鼓掌歡送黨中央領導人，可是，毛澤東却站不起來了，因爲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見毛澤東用雙手撑了兩下座椅旁邊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舊站不起來。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裏。正在一旁的周恩來着急了，他向全場代表宣布大會已經結束，可是代表們看到毛澤東還坐着，就誰也不肯走，周恩來揮動雙手指揮大家走，大家還是不走。周恩來急了，快步走到後臺找護士長、衛士長等商量，當時既不能公開宣布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又不便派人上臺去把毛澤東扶下來。周恩來只得重新上臺，對一千二百多位代表說：“現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場。請代表們分幾路同時退場！”毛澤東也說：“你們不走，我也不走！”在這種情況下，總算有人帶頭退場。毛澤東目送大家，又和身邊的蔡暢等人談話。代表們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可是看到毛澤東神態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邊退場邊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鐘。當我們幾個最後一批從主席臺上離開時，毛澤東還坐在臺上。當然，第二天的報紙上，還是赫然登着：“偉大領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臺，紅光滿面，神采奕奕。”只有細心的觀衆，才會發現，當年關于召開“十大”這樣重要的電影紀錄片，由於上述原因根本没有公開放映。

正因爲有了開幕式上這頗爲尷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閉幕會議時，毛澤東索性不來了。可是，閉幕會議要進行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毛澤東是不能放弃選票的，于是，毛澤東靈機一動，又想出了意味深長的一招……

八月二十八日，"十大"全體會議將在舉行大會選舉後閉幕，大會按時召開，却不見毛澤東登臺，代表們心中正在嘀咕，只聽見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委和候補中委。"

這簡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釋，就使一千二百四十九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這莊嚴的一票、説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親自選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來，當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的時候，穿着簇新軍裝的王洪文，畢恭畢敬地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毛澤東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澤東的選票。早在"九大"的時候，毛澤東就提議：誰讚成選票上的名單就不必一一畫圈了，如果反對的話就在某人的姓名上打一個"×"，所以，這份不着一個符號的名單，就表示毛澤東完全同意。王洪文雙手捧着這張選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鄭重的信任和囑托，他緩步走向票箱，投下這莊嚴的一票……從周恩來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視着他，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他們不僅是爲毛澤東鼓掌，而且是爲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毛澤東的全力支持下，在周恩來的鼎力相助下，王洪文終于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失寵"

最初的幾個月，一連串"三駕馬車"的照片刊登在中國的報紙上，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開始，凡是毛澤東會見重要外賓，都是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坐在兩側作陪。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底，這種"三駕馬車"的照片

連續發了十六次。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三十八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爲毛的繼承人。"

也就在這幾個月裏面,王洪文開始忘乎所以,本性畢露,生活上越來越追求享受,并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一九七四年初,他們大搞"批林批孔"反對走後門,"三箭齊發";七月十七日,毛澤東當面批評他們:"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小宗派"開會後,决定派王洪文飛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再次說:"你們不要搞上海幫。"自此以後,毛澤東明顯冷淡了王洪文;在周恩來病重以后,毛澤東逐步把權力轉移到鄧小平身上。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我和馬天水、王秀珍到北京去參加十屆二中全會,住在京西賓館,王洪文來看望我們。在這次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原來已經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鄧小平,又被增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全會討論四届人大即將通過的國務院人選時,還確定鄧小平爲僅次于周恩來的常務副總理。而王洪文則在所有的名單中没有得到任何一個座次。

此刻,王洪文坐在京西賓館的套房裏悶頭抽烟,很少說話。我看他情緒低落,臉色難看,便安慰他說:"現在總理病了,中央還是你主持工作嘛。"王洪文把烟頭一掐,恨恨地說:"什么主持工作,現在權都是他的(指鄧小平),國務院是他的,軍隊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讀書班!"他停頓了一下,無可奈何而又氣鼓鼓地說:"這些都是主席定的呀!"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澤東决定王洪文到上海"蹲點"——調查研究"、"幫助工作"。王洪文徹底"失寵"了!

從一九七三年"十大"毛澤東正式選定王洪文爲接班人,到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對他大失所望、决定"下放"爲止,只有兩年時間。

毛澤東遴選第三個接班人,又以失敗告終,但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王洪文與“劉盆子”

王洪文，是“四人幫”裏曾經身居黨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重要人物；劉盆子，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西漢末年一個放牛娃出身的小皇帝。這兩者之間怎么會發生聯係呢？使這兩者挂上鉤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奉調從上海到中央工作。毛澤東把他放在身邊，開始時没有讓他擔任中央的重要職務，而是委托周恩來培養他，考察他。王洪文剛到北京的這一階段，倒也兢兢業業，經常列席政治局、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會議，并受命到浙江省去處理兩派矛盾，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過了一個時期，毛澤東開始正式考慮選拔王洪文當接班人了。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同時爲召開中國共産黨的“十大”作准備。一到市委康平路辦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

王洪文説，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二十四史”《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爲是古文，很深奥，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朱永嘉原來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專攻古代史，最熟悉明史，在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前，被調到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是“羅思鼎”小組的負責人。對于“二十四史”，他當然熟悉，他曾經在康平路擔任市委常委的學習輔導員，和王洪文接觸比較多。所以，王洪文一來上海就找他“解惑”。

毛澤東對《後漢書》、《三國志》讀過許多遍，稱得上滚瓜爛熟。他曾説過，兩漢史中高、文、景、武、昭烈各帝，較有意思；東漢史光武帝可讀。毛澤東還曾先后叮囑他的秘書等人，要讀《後漢書》、《三國志》

中的《黨錮傳》、《曹操傳》、《郭嘉傳》、《荀彧傳》、《程昱傳》、《賈詡傳》、《劉曄傳》、《夏侯淵傳》、《田疇傳》和《董卓傳》，獨獨沒有提要讀《劉盆子傳》。這次，是毛澤東單獨向王洪文作出的讀書指示。朱永嘉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馬上敏感到：毛澤東讀書，向來是提倡"古爲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肯定是寓有深意的。爲了探索其中的含義，我要朱永嘉趕緊把《後漢書》找來一讀。

劉盆子何許人也

《劉盆子傳》中寫道："劉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后也。"式縣，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劉章，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而盆子是劉章的后代，身上有點皇屬血統，可以算是劉氏的宗室。不過，當時他的社會地位很卑微，是個放牛娃，人稱"牧牛童子"。

新莽末年，赤眉農民起義，"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長安"。有人給起義軍的領袖樊崇出主意說："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樊崇采納了這個建議，同意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以便師出有名，號令天下。

當時，在赤眉起義軍中有景王劉章的後代共七十多人，其中數劉盆子、劉茂、劉孝三人的皇族血統最近。究竟該挑選誰來當皇帝呢？赤眉軍的首領樊崇等人商議，聽說古時候天子帶兵者稱爲"上將軍"，他們就想了一個有趣的辦法：找了三塊小木片，其中一塊木片上寫了"上將軍"三個字，作爲憑證，和另外的兩塊空白的小木片，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竹器裏，用"摸彩"的方式來確定誰當皇帝。

辦法想好以後，赤眉起義軍在陝西華縣的鄭北地方築起了高臺，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樊崇把軍中的高級將領都請來，會集在臺階下，讓劉盆子等三人站在高臺中間，依照年紀的大小先後到竹器裏去"摸彩"。"牧牛童子"劉盆子的年紀最小，輪到最後一個摸，却偏偏給他摸到了那塊寫有"上將軍"字樣的木片憑證。於是，劉盆子僥倖當上了皇帝，將領都向他膜拜稱臣。這個放牛娃當時只有十五歲，看到這么多人朝拜他，緊張得差一點哭起來。劉盆子當了皇帝以後，依舊故我，經常和一

班放牛娃玩耍嬉戲……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隱憂

王洪文的經歷，在某些方面和劉盆子有相似之處，他原來的社會地位低微，從小也放過牛、養過豬，在東北吉林的田野裏干過農活。早在一九六八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時，他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已的這段經歷。毛澤東也曾經多次向別人介紹過王洪文的身世，說他是"三結合"的：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以後又當過干部。

因此，當毛澤東得知周恩來患了絶症，決心選拔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時候，就特意從《後漢書》中挑出了放牛娃劉盆子的傳記，讓他閱讀，無非是提醒他：按照劉盆子的資歷、能力和社會地位，是没有資格當皇帝的，只是依仗着劉氏宗室這一條，"摸彩"摸得了一個皇帝的寶座；你王洪文自小也是個放牛娃，革命資歷很淺，只是依靠文革的機遇造反起家，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我們的黨總得挑選一個各派都可以接受的年輕接班人，你才僥倖地被選上了。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少長進，結果也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務正業，整天和一幫"牧兒"嬉戲，最后將以失敗下臺告終。

當時，毛澤東對王洪文確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誘，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同時，毛澤東心中也有隱憂：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選拔一個工人擔任黨内的高級領導職務，是有過先例的，結果很不理想。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過這樣的風氣：推選產業工人或血統工人出任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職務。中國共產黨當然也受到過這種影響：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會後，在六届一中全會上選舉出中央政治局，由于過分强調工人成份，推舉了工人家庭出身、在武漢當過水手和碼頭工人的向忠發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向忠發雖然在名義上成了黨中央的一把手，但是實際上無論從能力、水平或是資歷、威望來看，他都難以勝任這個重要職務。結果大權旁落，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其實是由知識分子出身的李立三在主持，以后領導權又落到王明手裏，向忠發不過

是擺擺樣子的傀儡而已。如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思想又席卷中華大地,這種領導作用在組織上也必然要體現出來,于是,王洪文就應運而"上",成了乘直升飛機登上黨中央副主席高位的幸運兒。

但是,王洪文能不能勝任這個職務呢?會不會又成爲向忠發第二呢?這一點,毛澤東是不無擔憂的,他吩咐王洪文讀《劉盆子傳》,也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種擔心和憂慮。

王洪文讀懂了没有

至於王洪文自己,當然最清楚自己的底子,不是毛主席親自點名提拔,在中央誰也不會服他的。這次毛澤東要他讀《劉盆子傳》,肯定是要他從中領悟些什么。這件事找別人講解、議論都不方便,只有找朱永嘉最合適。

王洪文約朱永嘉第二天帶了《後漢書》到康平路大院裏去,給他詳細講一講《劉盆子傳》。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寫作組辦公室把這篇文章又認真讀了一遍,讀畢,拍案而起,對坐在旁邊的市委寫作組幾個領導核心説:"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劉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來到康平路市委小禮堂樓上我的辦公室,和我商量怎么講《劉盆子傳》。我們都懂得:天機不可泄漏。毛澤東要通過《劉盆子傳》傳達給王洪文的訊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我給朱永嘉出了一個主意:只做古文翻譯,不發表任何議論,除了把《劉盆子傳》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話都不説。

第二天,朱永嘉進了康平路大院,坐在王洪文辦公室裏的沙發上,兩個人翻開了《後漢書》。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講解着《劉盆子傳》;王洪文聽得很仔細,還自己捧着《後漢書》看了許久。聽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聲不吭。

王洪文是個乖巧人,政治嗅覺很靈,他只消把翻譯成白話文的《劉盆子傳》聽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澤東叫他讀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動聲色。讀完了《後漢書·劉盆子傳》,他也不發表讀后感,故意把話題扯開去,談了一些别

的事情，問了問市委寫作組的工作，這項讀書活動就算結束了。

此后，王洪文在毛澤東的推薦下，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僅在周恩來之后。這個職務使他着實風光了一陣，凡是毛澤東接待外賓，陪同接見的除了周恩來之外，必有王洪文，報紙上的大幅照片和新聞紀錄影片裏的鏡頭，都少不了他。

比劉盆子還"劉盆子"

隨着政治地位的上升，王洪文生活上的排場也大起來了。他住進釣魚臺十六號樓，這裏原來曾經是"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后來給張春橋、姚文元兩個人合住，現在經過全面修繕，成了王洪文一個人的府第。這是一幢高級的國賓館，和江青住的那幢樓可以媲美。

此外，他又通過中央軍委在北京西山八大處新建了一幢高級別墅。因爲他在上海的時候，陪同某個外國的國家元首打羽毛球打出了癮，他就在北京專門布置了一個羽毛球館，可以連續幾小時和人廝殺。

在王洪文身邊，配備了一個專門的服務班子。有幾名男性服務員專門給他整理房間、調節温度、打掃衛生、端茶送水等等；他愛吃北方口味的飯菜，就派了一個烹調手藝很高的厨師，天天給他做北京菜。每天深夜十二點鐘以后，王洪文要吃宵夜，厨師得做好一頓豐富的夜餐才能休息。此外，還有專門的保健醫生和保健護士，給他定期檢查身體和定時服藥。

王洪文還有一個龐大的工作班子，先後配備過四名秘書，最受信用的隨身秘書，是在上棉十七廠隨他一起造反的，負責保管他的文件，傳達指示，安排生活，對外聯絡等等；一名文字秘書，是從上海市委寫作組調去的，負責替他起草文件，撰寫講話稿等；從上海警備區調去一名幹事，負責值班、聽電話、做記録等；最后又從中央辦公廳調去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和各省、市、自治區聯係。此外，還從復旦大學調去一名英文教員。

王洪文在北京有四輛車：兩輛"大紅旗"，兩輛進口轎車，配有專門的轎車司機 可是，王洪文爲了自己的行動方便，特地從上海調去一

個駕駛員，作爲自己的專用司機。在警衛工作方面，八三四一部隊給他配了貼身警衛人員，叫做“隨衛”，除了睡覺以外，幾乎整天都跟着他。遇到王洪文外出活動或到外地視察，中央警衛局還要派出一名科長，帶着專門的警衛班子負責他的保衛工作。

按理講，有如此優裕的政治條件和生活條件，王洪文應該加倍努力地工作才是。可是，隨着政治地位的上升，王洪文的貪欲也變本加厲了。

他嗜酒如命，甚至發展到一天三頓都離不了酒。他的心腹和小兄弟到北京出差、開會，王洪文就在釣魚臺設宴招待，大喝特喝。還要從上海調廚師、帶餐具去北京，替王洪文特意操辦請客用的筵席。

吃完了酒，就打撲克，打麻將，打球，打獵，看電影，經常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連軸轉。有一天深夜，王洪文正在和幾個心腹打撲克，突然江青有急事找他，事先没有通知，直接闖進了王洪文住的十六號樓。王洪文慌了，忙不迭用報紙把桌子上的撲克蓋起來……

要問王洪文那些奢侈的消費品和吃、喝、玩、樂的東西從哪兒來？這裏有一個秘密 那就是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馬振龍，到上海市輕工業局去擔任局黨委副書記和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馬振龍原來是上海搪瓷機修廠的工人，江蘇泰興人，長着一張長長的臉，王洪文叫他“馬頭”。這個“馬頭”造反以后，由于死保王洪文，成了王的“鐵杆”心腹，先是擔任“工總司”閘北區分部的頭頭，后來調到“工總司”辦公室工作。王洪文看到輕工業局“油水”很大，生產的產品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就把馬振龍調去。這個局的正職是老幹部，看到馬振龍是王洪文派來的，根本不敢得罪他。馬振龍事實上成了輕工業局的“太上皇”，直接控制了試制試用產品的大權。

王洪文調去北京以后，馬振龍就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大量產品去，從香烟、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表、照相機、打火機到録音機、電視機，連王洪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馬振龍送去。王洪文拿到大批物資，有的自己享用，有的轉手送人，例如馬振龍送去“試戴”的手表，王洪文就抓一把在自己的口袋裏，到人民大會堂或是京西賓館等地去，隨手拿出來送給女服務員，籠絡人心。

從此，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等一應俱全的上海市輕工業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資供應總站。而執掌這方面大權的馬振龍，也越來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當上了四屆人大的代表，而且經王洪文批准，連續到日本、阿爾巴尼亞等國去訪問。

中南海的槍聲

王洪文提着馬振龍送去的釣魚竿，到處晃蕩，尋找釣魚場所。特別是一九七四年他到長沙去面見毛澤東，告周恩來等人的狀，受到了毛澤東的嚴肅批評以后，王洪文的政治情緒一落千丈，更是沉溺于漁獵之中。毛澤東説過："釣魚臺無魚可釣"，王洪文便走出釣魚臺，到中南海去，到養蜂夾道去，甚至到葉劍英的住處去釣魚，因爲那裏屋前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水草豐富，魚兒衆多……

王洪文背着上海送去的獵槍，到首都的軍用機場去尋找他的獵物。秋天，他打野鷄，因爲那個時候散落在田野裏的穀物比較多，野鷄容易覓食，長得很肥壯。王洪文坐在吉普車裏，舉起雙筒獵槍，汽車掠過草叢，驚起躲藏着的野鷄；王洪文不愧是當過兵的，槍法很准，他叩動扳機，一槍一只，可以連續打上幾個小時。

冬天，他打野兔，機場裏的草都枯萎了，被大雪覆蓋着，野兔往往在晚上從洞裏跑出來覓食。王洪文的勁頭可大了，在漆黑的冬夜驅車到機場，他的吉普車的前車窗旁，裝了光度很强的照明燈。王洪文戴着皮帽，穿着大衣，坐在車裏舉槍瞄准。吉普車在機場的雪原上疾馳，野兔看到像利劍一樣射來的照明燈燈光，會嚇得匍匐在地，不敢動彈。王洪文的槍聲一響，野兔應聲倒地……這樣，在王洪文的宵夜餐桌上，又多了一道美味的下酒菜。

王洪文外出釣魚、打獵，不只是一個人去，還要有一大批人隨行：秘書、司機、警衛員、護士……夏天給他張傘遮陽，冬天給他披衣禦寒。直至毛澤東病重期間，他的這種沉迷于漁獵的積習還是改不了。毛澤東病危時，中央決定由王洪文和華國鋒等人日夜輪流值班，照看毛澤東的

病情。可是，這個被毛澤東一手提携的王洪文，竟然在這樣重要的時刻，撇下他的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的湖邊去打起野鴨來了。“砰！砰！”的槍聲，不僅驚起了滿湖的野鴨，也驚動了中南海的工作人員，大家對他怒目相向，義憤填膺……

這槍聲，宣告了王洪文必然覆滅的命運。

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王洪文終究没有讀懂。當年的劉盆子，當了皇帝以後，和放牛娃終日嬉戲；今日的王洪文，比之劉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澤東的擔心不是多餘的：王洪文終於變成了“劉盆子”。

周恩來的告別旅程

再見了，上海！再見了，上海人民！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當周恩來站在黃浦江游艇的甲板上，向浦西、浦東投去深情一瞥的時刻，他清醒地意識到：這也許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了。對于這片他長期生活過、工作過、戰鬥過的土地，他無比熟悉；對于這座城市中他所摯愛的人民，他無比眷戀。可是，現在，身患絶症的他，知道自己將永遠告別上海……這一切，當時陪着他巡視黃浦江的我們，却是渾然不知，怎么能想到周總理已經患了癌症……

全程陪同蓬皮杜總統訪華

一九七三年九月，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蓬皮杜訪華，在北京會見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決定自己全程陪同愛好藝術的蓬皮杜，訪問幾處經過他精心選擇的地點，最後一站就是上海。當他氣度從容、面帶微笑地陪同蓬皮杜總統走下飛機時，那些在虹橋機場上載歌載舞、揮動鮮花的上海歡迎群衆，没有一個人會意識到：周總理是抱病出行的。

過去周恩來陪同國賓到中國各地訪問，從不讓鄧穎超隨行。可是，這回却破了例：周恩來所到之處，都有鄧穎超的踪迹，只是她不在外賓面前露面罷了。周恩來陪同蓬皮杜一行，從北京先到山西大同，參觀了聞名于世的雲崗石窟，這處文化古迹還是第一次對一位外國元首開放。接着，他們游覽了秋色宜人的杭州，領略了江南風情。最後，九月十六日下午，他們來到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蓬皮杜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錦江飯店；周恩來和鄧穎超，就下榻在飯店對面的茂名南路五十八號，當時的錦江俱樂部。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五十八號樓下的客廳裏稍事休息。他們的興致很高。周恩來對上海出面陪同的我們說："法國人很重視民族文化傳統，所以我推薦蓬皮杜總統看看我們的雲崗石窟。"鄧穎超在一旁補充說：

"恩來和我也都没有去過雲崗石窟，這次是從北京乘火車直接到大同去的，我們也開了眼界。"

在談起一路上的觀感時，周恩來高興地說："這次到杭州，最滿意的是在樓外樓吃的一餐飯。"我們聽不懂，忙問原委，原來是九月十六日上午，周恩來陪蓬皮杜一行游覽了西湖，送别外賓以后，時近中午，周恩來忽然提出要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到樓外樓吃飯。

樓外樓就在西湖旁邊的孤山脚下，以西湖醋魚、龍井蝦仁等菜肴著稱。周恩來請他的秘書、醫生和警衛人員等登樓就座。飯店的服務人員和厨師發現周總理來了，驚喜異常。周恩來點了幾個菜，這一餐飯，由於没有尊貴的外賓需要應酬，也没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領導人作陪，他們一行人就像家人團聚一樣，吃得很愜意，也很舒暢。此刻，當周恩來在上海談起這餐飯的時候，他幽默地說：

"吃完飯我請飯店開賬單來，這是我自己請客嘛，結果他們開了十塊錢。我説，這么多菜，十塊錢怎么够？重開、重開，哈哈哈……"他仰天大笑，雙手交叉在胸前抱住左右兩肘，臉上露出那最富于魅力的笑容。

從他爽朗的笑聲和坦誠的氣度中，你根本覺察不到一個身患重病的人極易流露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憂悒和傷感。只有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周恩來的病，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發現的，開始的時候病情發展比較緩慢，忙過了黨的"十大"，他的體力逐漸下降，這次全程陪同國賓到各地訪問，也許是最後一次了。所以，他終於同意趁自己的健康狀况還能堅持的時候，和畢生共同戰鬥過的鄧穎超一道遠行，親眼去看一看祖國的文化瑰寶雲崗石窟；在湖光山色交相輝映的樓外樓，請多年來爲自己辛勞服務的工作人員吃一餐飯，爲的是表達一點感謝的心意；當然，最後他還要和鄧穎超一起，去看望那座能够引起他們無限回憶和懷念的城市——上海！

關于禮查飯店的回憶

這座城市的歷史，有一些輝煌的篇頁都是和周恩來的名字聯系在一

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到上海發動和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他擔任起義的總指揮，指揮着拿起槍桿子的八十萬上海工人階級，從反動軍閥的手中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第一個屬于人民的上海市民政府。關於這段歷史，周恩來極少向人提起過，但是，這回在他陪同外賓登上上海大厦鳥瞰市容的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却親口講述了一段久遠和珍貴的記憶……

那一天上午，周恩來較早地來到上海大厦十四樓等候外賓。王洪文和我迎上前去，負責外事工作的馮國柱副主任向周總理匯報說，外賓出發要推遲一會兒，車隊還没有從錦江飯店發車。這樣，周恩來得以在貴賓休息室小憩片刻。周恩來呷了幾口茶，和我們三個人一起，信步走上休息室外邊的陽臺。這裏一南一北有兩個陽臺，可以俯瞰蘇州河，遠眺黄浦江。

周恩來憑着石欄，眯起眼睛，眺望架在蘇州河上的四川路橋和橋堍的郵政總局：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一批衝鋒過橋解放這座城市的戰士，曾經在橋上灑下殷紅的鮮血……

周恩來神情嚴肅，目光凝重，他緩緩地回過頭來，掃視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的目光掠過外白渡橋，最后停留在橋堍一座英國式的古老建築物上，這便是當年蘇聯領事館對面的浦江飯店。

周恩來指着它問我們："知道不知道這個飯店的原名？"

我們幾個都回答不上來。

周恩來介紹說："過去這裏叫禮查飯店，是公共租界裏一座比較豪華的飯店。我在這裏住過，那還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后……"

周恩來陷入了深沉的回憶之中，他講起了一段塵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以后，蔣介石叛變革命，當時的形勢很緊急……我們黨想要和當時駐在附近的一支國民黨軍隊取得聯系，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因爲在這支軍隊裏，有我們黨内一個同志的弟弟，擔任師長的職務，記得他是浙江人，我們以爲他會同情我們的……"

説到這裏，周恩來的語氣在平静之中略帶激動：

"那一天，我和上海總工會的幾個同志，找上門去和這個師長談話。他表面上裝得很熱情，和我們談了很久，最後還留我們在那兒吃晚飯。實際上這個人完全是在應付我們，盡量拖延時間。"

周恩來的眼神裏閃過一陣痛楚的光：

"……我們上當了！白白拖掉了好幾個鐘頭，等到我們從他們那兒出來，回到上海總工會的時候，已經晚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都被繳掉了！還有一些同志被捕……就這樣，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和鄧穎超住進了禮查飯店……"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朝我們嚴肅地看了一眼，用一種深沉的語調說

"這是嚴重的教訓：應當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而不應當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右派的身上啊！"

周恩來認爲，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免不了會上當，會犯錯誤，會輕信別人，從而使革命事業遭受挫折；然而，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善於總結經驗教訓，才能在鬥争中逐步地成熟起來。年輕的周恩來從這次經歷中，得出了"應當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的結論，這對此后的中國革命，具有着無比重要的意義。當他和鄧穎超在禮查飯店隱蔽了一段時間以后，他又轉移到江西，領導了震驚中國和世界的"八一"南昌起義。

寫到這裏，使我不禁想起：在一些關於周恩來的傳記作品中，根據傳聞，總是把周恩來在"四·一二"事件中的這段經歷，編寫成了被逮捕，被關押，最后得到營救等等。這樣，一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獨特的鬥争體驗，一個富有思想内涵的歷史教訓，被降低成了一出通俗的驚險故事，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只有周恩來的親口叙述，才是最真實可信的。

關於周恩來住過禮查飯店的事，我旋即在鄧穎超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當我第二天陪同鄧大姐外出參觀時，我告訴鄧大姐：周總理曾經說，"四·一二"事件以後，他和鄧穎超一起在禮查飯店住過。鄧穎超聽後馬上興奮地連連點頭，用她那清晰的嗓音說道：

"對！對！那可是一個高級的飯店哪，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以後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來聯係。真把我們

給憋死了！”

在上海從事地下鬥爭五年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以後，周恩來取道香港等地，重又返回上海從事地下鬥爭，條件就更艱苦了。周恩來化名爲伍豪、鄧穎超化名爲逸豪。關于這些化名，周恩來也說過一個有意思的故事，他講：

“‘五四’以后，我和鄧穎超都在天津參加了‘覺悟社’，當時的進步青年爲了表明自己和舊的傳統决裂，提倡廢名。我們‘覺悟社’的社員也都不用自己的原名，但是總得有一個新的代號當名字呀，于是就在紙上寫了號碼，實行抓鬮，誰抓到幾號就是誰的名字。我抓到五號，就改名爲‘伍豪’；鄧穎超抓到一號，就改名爲‘逸豪’。”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周恩來在上海化名伍豪，和鄧穎超一起堅持了五年的地下鬥争。周恩來當時是黨中央的五位常委之一，還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和軍事部長的職務，他的行動和住所必須絶對保密。當時，他們的工作環境非常危險，爲了躲避敵人的搜捕，不得不三天兩頭搬家。鄧穎超經常爲着找房子，到處奔波。

就在周恩來這次陪同蓬皮杜訪問上海期間，鄧穎超没有外事任務，她就參觀了興業路中共一大會址，憑吊了虹口公園的魯迅墓。她已經多年没有來上海了，如今舊地重游，勾起了她許多回憶。上海的不少馬路和建築物，她都熟悉；長期在這座城市裏從事地下鬥争的她，能講一口流利標准的上海話。她要我和她一道，坐車走遍上海的角角落落，想要尋訪過去周恩來和她一起住過的一些普通民宅。

鄧穎超告訴我說：周恩來那時的公開身份是商人，有時長袍馬褂，有時西裝筆挺，經常要化裝以后才能外出；鄧穎超的身份是家庭主婦，也需要打扮得比較闊氣。他們找的房子還不能太差，要相當於上海的小資本家的水平。住房既要隱蔽，又不能孤零零地顯得突出，要分散穿插在上海的市民階層中間。房子的附近必須没有敵人的機構，也不能和熟悉的同志和朋友靠得太近。住的房間最好在二樓前樓，便于觀察外面的動静，以及和來接頭的同志聯絡；住房必須有後門，可以隨時撤退和轉移。

那天，鄧穎超從虹口公園參觀了魯迅紀念館出來，在車上提起當年她和周恩來曾經在閘北的一幢民房裏住得比較久。于是，我們立即驅車前往，在中山北路一帶兜了好幾個圈子，想要尋找當年舊居的踪迹。由于年代的久遠，時過境遷，具體來説究竟是閘北區的哪一幢房子，已經難以辨認了。鄧穎超在車窗裏，指着沿街的一幢灰墻黑瓦的老式兩層樓石庫門住宅，對我介紹説："我們當時租的，就是這樣的房子。"

這種居民住宅是上海老式的里弄房屋，每幢房子有一樓一底，樓下是客堂、后房和竈披間，竈披間旁邊有一扇后門通向后弄堂；樓上是前樓、后樓和亭子間，亭子間頂上還有一個晾衣服的曬臺。前樓的這間房間，往往是整幢房屋中最好的一間：通風，敞亮，光綫充足，視野開闊。通過木框的長窗，可以眺望街景或觀察外邊的動静，也可以在窗臺上放花盆或掛窗簾等，作爲聯絡的暗號。

鄧穎超講述的驚險故事

鄧穎超回憶起了當年的生活，她説："那時，我們兩個人租了一間前樓。因爲恩來的身份是商人，有時候要外出'談生意'；我就作爲商人的太太，在家操持家務。我們的房東是一個小老板，浙江寧波人，他們就住在樓下。老板和老板娘對我們非常客氣，逢年過節還要熱情地請我們吃飯。記得那年過舊曆年，老板一定要邀請我們一道吃年夜飯，准備了許多酒菜。在敬酒的時候，恩來不小心闖了禍，把一個飯碗掉在地下打破了。寧波人規矩很多，大年夜打碎了碗可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恩來慌了，趕緊給人家道歉，我也忙着打招呼；那個小老板嘴巴裏念念有詞：'歲歲（碎碎）平安！歲歲（碎碎）平安！'總算把這件事對付過去了。"

鄧穎超説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她越説興致越高，當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具體細節，一一浮現在她的眼前。她繼續説道：

"恩來有時外出開會，算是出門'談生意'去；可是，我也不能老耽在家裏啊，人家會引起懷疑的：你這個商人的太太怎么在上海没有熟人，没有親戚朋友？因此，每過一段時間，我就要外出，對房東家説是走親戚、看朋友去。其實我坐上一輛黄包車，就在馬路上兜風；兜了半

天，然后回家去，說是從親戚家回來了……

"在黨內，我也分工擔任一些聯絡工作和機關工作。有一次，我穿得很考究，外面是皮大衣，裏面是長旗袍，帶了一包黨內的機密文件，準備從中國地界送到租界上的一個聯絡點去。我叫了一輛黃包車，把那包文件放在前面的踏脚板上。黃包車拉到一個十字路口時，我忽然發現前方有一排外國巡捕和中國警察，攔住了去路，他們攔下了過往的車輛行人，正在'抄靶子'（注：搜身檢查）。我正想折回去，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硬着頭皮讓黃包車拉過去。我裝得非常鎮定，兩只脚就踩在那包文件上，不過心裏可緊張吶！車到了那幫巡捕和警察面前，他們看我穿得這樣講究，樣子又很'篤定'，以爲是個闊太太，居然不搜查了，揮揮手就讓我過了關。好危險哪！"

鄧穎超講完這段驚險的經歷，自己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時，汽車剛好駛過茂名南路，鄧穎超瞥見了窗外的上海藝術劇場，她指着這座精巧而古老的建築，又想起了一段往事：

"那不是從前的蘭心大戲院嗎？這裏過去叫慕爾鳴路，蘭心大戲院從前也放電影。恩來和我秘密轉入地下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兩個人實在悶得慌，就偷偷地溜到這兒來看了一場電影。誰知道組織上了解了這件事，對我們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批評我們違反了黨的秘密工作紀律，擅自到公共場所露面，這種做法有危險。我們也作了檢查，從此再也不能偷偷地看電影了。"

從鄧穎超的回憶中，人們了解了不少周恩來在這座城市裏從事地下鬥爭的鮮爲人知的故事。時間的長河流過了四十多年，如今他們又一起來到上海，他們不再處于地下的秘密狀態了，他們和上海人民一道，成了這座偉大城市的主人。周恩來的心中裝着上海人民；上海人民也最爲鍾愛他們的總理。在這次周恩來陪同法國蓬皮杜總統來訪的過程中，人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總理的心和上海人民的心，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

傾盆大雨中的周恩來

蓬皮杜一行結束在上海的訪問回國的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瀝瀝

地下起雨來。周總理堅持親自到機場爲客人送行。機場上還有千把名手持花束的女青年以及服裝艷麗、跳着舞蹈的少年兒童。周總理和客人一一握別，目送他們登上舷梯，進入機艙。正在這個時候，雨勢陡然轉猛，瓢潑大雨嘩嘩地從天而降。周恩來的身上淋濕了，歡送群衆的身上也濕透了。

蓬皮杜的專機從關上艙門、撤走舷梯、到飛機發動、開始滑行……至少要五、六分鐘時間。雨越下越大，遠望飛機小圓窗洞裏的法國客人，因爲隔着厚厚的雨簾，也影影綽綽地看不清楚了。可是，周恩來仍然堅持站在所有歡送隊伍的最前列，向飛機揮着手。

周恩來没有戴帽子，灰白的頭髮濕透了，一身淺灰色的中山裝浸了雨水變成了深灰色。他的隨身警衛實在看不過去，急步上前，撑開一把黑色的雨傘，想要替他遮擋一下。没想到周恩來側過頭來，朝着隨衛嚴肅地盯了一眼，又嚴肅地説："歡送群衆都没有雨具，我怎么能打傘？！"

隨衛挨了批評，只好把雨傘撤了下來。這時，大家都把目光齊刷刷地集中到周恩來身上。只見雨水從他花白的頭髮上淌下來，從他的濃黑的長眉梢上淌下來，直灌進他的脖子裏去。大家都不忍心看着他挨雨淋，外事部門的負責人走上來，悄聲問道"可不可以請總理先退場？"隨衛摇了摇頭。大家都明白：站在我們面前的這位老人，是我們民族形象的楷模；在對外接待上，他一向熱情、坦誠、禮貌、周到而又不失尊嚴，爲全世界所共知。如今，他連雨傘都不肯打，怎么還肯先行退場呢！

透過雨幕望去，專機上的信號燈已經前前後後地跳亮、閃爍起來，發動機開始由低到高地轟鳴；可是，從飛機發動到滑行，還有好幾分鐘時間呢。周恩來仍然巍然不動，久久地向飛機揮着手……

我和在場的群衆一樣，實在心疼這位七十五歲的老人被滂沱大雨夾頭夾腦地淋澆，要是給冷雨澆出病來怎么辦？我從後排的隨身警衛手裏接過一把黑雨傘。那個受過批評的隨身警衛有點擔心地看着我。我不顧一切地走到總理身邊，把雨傘打開擋在他的頭頂上；總理以爲隨身警衛又來了，側過頭來正待發作，一看是我，他的略帶責備的眼光馬上變得溫和起來，他對年輕幹部向來是寬容的，他忍住了，他知道這是我們

對他的尊重和愛戴。

就這樣，周恩來在雨傘下向飛機上的客人揮了幾分鐘手，直到專機升空以后，他才轉過身來，深情而焦慮地注視着渾身稀濕的歡送群衆。外事工作人員請周恩來登上汽車，可是他不肯，他把機場的負責人叫到面前，當面叮囑說："快把隊伍拉到室內休息、馬上給每個人喝一碗生姜糖茶，免得感冒……"等到一切關照妥當，他才揮手和群衆告别。

回到茂名南路五十八號錦江俱樂部，周恩來跨進底層客廳，就讓秘書給機場打電話，詢問歡送群衆的情况。直到聽說每個人都喝了滚熱的姜糖茶以后，周恩來才安下心來。他更换了衣服，休息了片刻，准備吃飯。

睡了八個小時

錦江俱樂部的厨師、服務員們，多次接待過周總理，對他的飲食起居、生活習慣，瞭如指掌。當天，厨師做了幾個家常菜，讓總理品嘗。可是，他們萬萬没有想到，這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給敬愛的總理做飯做菜了。那天，他們端上來的有霉乾菜燒肉，這是浙江紹興的家常菜，周恩來的祖籍是紹興，所以他從小就喜歡吃這個菜。周恩來嘗了幾筷，稱贊南方的霉乾菜燒肉就是做得入味，北京人民大會堂也做過這個菜，總覺得味道差一些，醬色也不够，恐怕關鍵是霉乾菜不够軟熟；紹興人的家庭裏做這個菜，要蒸煮很久，使肉味都滲透到乾菜裏去，而且醬色濃赤，入口酥軟，乾菜的味道比肉還要好吃。說到這裏，周恩來呵呵地笑了起來，他說：

"不過，這個菜我也做不好，我最拿手的菜是紅燒獅子頭！"

飯後，上海手表廠送來了新式的手表樣品，請周恩來審看。這項活動的起因是這樣的：周恩來手上戴着的是一只六十年代購置的長三針上海牌日歷表。他堅持戴國産手表，不戴外國貨的表，雖然有好幾次其他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送給他名牌手表，他也總是交公。他説過："我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對外活動，就應該戴我國自己生産的表。"他稱贊上海牌手表走時很准。可是，周恩來戴的這只表不但式樣已經陳舊，而且没有自動上弦的裝置，每天都要他自己按時上弦。有關工作人

員看了覺得心裏很過意不去。當時，上海手表廠設計和生產了一批新表，不但外觀比較新穎大方，而且能够自動上弦，防震、防水，帶日歷、帶星期，做過高空和深海試驗，性能良好。所以，廠裏想讓總理從這批手表的新產品當中選擇一只，而且不敢提出要總理試戴，只是向周恩來的秘書建議：是否可以讓總理買一只新表，把舊表換下來。

因此，上海手表廠就把樣表送來了。這批款式各异的新表，盛放在幾個襯着棗紅色絲絨的盤子裏，顯得格外璀璨奪目；每只手表的表面上，都鎸刻着毛澤東手書的"上海"兩個字，體現出國產手表的莊重和質樸。

周恩來上樓休息，幾只盛着手表的托盤被送到二樓的卧室裏去了。傳來的消息是：周總理和鄧大姐正在觀看手表。又過了一會兒，幾只盤子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傳話說：周總理和鄧大姐一一看過了這些手表，稱贊上海的工人有創造性，上海手表廠的新產品做得很好。總理最後叮囑說："請把這些手表全部退回去，謝謝你們！"至于他自己，仍然戴着那只老式的上海牌手表。總理還說，我用了這么多年走時還這樣准，説明上海牌手表的質量不錯。

周恩來在上海美美地休息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鄧穎超逢人便說："恩來昨天晚上睡了八個小時！"這真是一條新聞：全國睡得最少的領導人周恩來，居然能在上海一個晚上睡了八小時，誰聽了都會高興的。

周恩來提名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

我對周恩來懷着一種對待自己父輩一樣的感情，是有着特殊的原因的，我覺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對年輕幹部特別關心和愛護。一九六九年，我參加黨的"九大"時在華東大組會上發言，那天周恩來也到會了，所以我在發言開始時稱呼："總理、各位代表，"他馬上打斷我的話："我今天不是以總理身份參加會議的，請你以同志相稱。"我只好改口說："恩來同志、各位代表"。

中央有些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往往看不起年輕人。一九七〇年，我和馬天水一起到廬山參加中央全會，天下雨了，我們從小別墅裏走到大會堂，我打着一把傘，和馬天水一道登上臺階，忽然，一個警衛部門

的工作人員，從我手中把傘接過去，對我說："你可以回去了！"原來、他把我當作馬天水的隨員了。又有一次在北京，我和許世友、彭冲一起，走進京西賓館參加中央的一個重要會議，我們邊走邊談，忽然一名解放軍幹部叫住了我，單獨要檢查我的證件。在北京開會時，晚上往往在首都劇場等處觀看文藝演出，我當時是上海代表團負責人，當我進入劇場，看到中間幾排已坐着一些人，我正想在空位上就座時，就有人前來阻擋，說："這裏是首長席。"堅持要我坐在邊座。過了一會兒，周恩來來了，他在中間的座位上坐定，環顧四周，忽然看到我坐在邊座上，就大聲叫喚起來："徐景賢，來，坐到這裏來！"我客氣地婉辭，他却更加堅决地說："快來，就坐在我旁邊！"弄得剛才阻擋我的人十分尷尬，而我却深深感激總理對我們年輕人的關愛。

周恩來的以身作則，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他周圍的人。根據他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和京西賓館的會場邊上都放着一個小托盤，裏面擺着香烟、小包茶葉和零錢，每次參加中央全會，坐在我左右的郭沫若和聶榮臻，都自己掏錢泡茶喝。一次，周恩來召集我們各地負責人在北京飯店小會議室開會，開得很晚，大家又累又乏，周恩來招呼服務員端來咖啡，并對與會的十幾個人說："請大家喝咖啡，記在我的賬上。"堂堂的一國總理，請他的屬下討論公事，也要自己掏錢請客喝咖啡，這真是廉潔自律的楷模呀！

所以，我從心底裏尊敬周恩來，也牢記他對我的厚愛。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了，各地的革命委員會也建立了多年，毛澤東建議恢復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選舉省、市委書記。選舉的程序是：先由各地黨代會提名候選人，然后報中央審批、任命。

上海市也舉行了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對市委書記候選人進行了提名。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金祖敏，帶了提名的名單到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參加了。會議討論的初步名單是：張春橋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姚文元任第二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任書記，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金祖敏等任常委。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今後張春

橋、姚文元要長時間留在中央工作，上海市委書記的人數較少，建議增加徐景賢擔任市委書記。張春橋和姚文元當即表示同意。接着，江青又提出：上海對外接待任務很重，要有一名女書記，提議王秀珍擔任，這樣，王秀珍也當上了市委書記。政治局通過的這一名單，由周恩來報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新的上海市委書記就産生了。

金祖敏回上海后，把政治局討論的情況向我們作了通報，我才知道：我當上市委書記原來是周恩來提的名。這一次周恩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上海期間，又讓鄧穎超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新幹部家屬，鄧穎超爬樓看望了我的妻子葛蘊芳和女兒徐遥、徐蘊，親切地囑咐説：“你們要和徐景賢一道，保持革命本色，一輩子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當時，我正隨着周恩來陪外賓活動，晚上回家，我的家人告知我這一切，我們全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動，對周恩來和鄧穎超充滿了敬愛和感激之情。

告别黄浦江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上午，雨後初晴，天氣涼爽，周恩來和鄧穎超在王洪文、馬天水和我的陪同下，乘船游覽了黄浦江。我們在北京東路外灘的輪渡碼頭，登上了“上海號”游艇。上海港務局的負責人在艇上迎接了周恩來一行。

游艇緩緩地駛離外灘，向着吴淞口開去。黄浦江上，汽笛喧騰，百舸争流。周恩來注視着在眼前掠過的挂滿各色旗幟的中外海輪，眺望着正在忙碌起吊的沿江裝卸區的作業情景。他詳細詢問了這個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億噸大港的通過能力。他深思熟慮地指出：上海港是我國最大的内外貿綜合港，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目前的通過能力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還要多建若干個萬噸級泊位。他説不久將會委托國務院業務組的粟裕同志前來具體考察瞭解。

游艇駛抵吴淞口。這裏便是黄浦江流入長江、然后匯進東海的所在。黄浦江，上海人民的母親河！周恩來對您太稔熟了。他走到游艇的甲板上，久久地凝視着吴淞口的燈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告别過雄偉的吴淞炮臺；和胡志明在上海接上組織關係

的時刻，吹拂過江上的寒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槍聲，震蕩過黃江兩岸的土地 馬斯南路“周公館”的燈火，照亮過上海人民的心……

從周恩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第一次到達上海，直到這一次的最后告別，一晃五十多年時光過去了。五十年來的風風雨雨，猶在眼前；而如今，却要離去，却要離去……

周恩來扶着游艇甲板旁的欄杆，默默無語。

永别了，黄浦江！永别了，上海！永别了，上海人民！

一個平凡而質樸的人正和上海人民告别，但是，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切，一定會魂牽夢縈，久久地回繞在他的心頭……

“瞻仰”王副主席辦公室

一個極其普通、平凡的人，一旦身居高位，總會有一批追隨他的人，圍集在他的周圍，肉麻地吹捧他，神化他，給他的頭上罩上一圈神聖的光環。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幕帶有濃重封建色彩的活劇，竟然落到了王洪文的頭上。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五十年代，王洪文從部隊復員，進了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當一名普通機修工，紡織廠稱作“小加油”。干了幾年，被提拔爲上棉十七廠保衛科的干事。爲此，在廠保衛科的辦公室裏，有了他的一張小小辦公桌。

一九六八年，王洪文和我都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有一天，借着到楊樹浦路上棉十七廠參加勞動的機會，他“順便”帶我去參觀保衛科辦公室。

保衛科辦公室在上棉十七廠廠部辦公大樓的底層，從大門進去一拐彎就到了。辦公室很小，只有十多個平方米，光綫也很陰暗，裏面要坐三個人。王洪文這個小干事的辦公桌只能縮在房間的角落裏，又舊又矮，毫不起眼。唯一可以説明這張桌子的主人的標志，就是在桌面上的小玻璃板底下，壓着一張當年寫有“王洪文”姓名的選民證，如此而已。

王洪文發迹以后，對這間辦公室和這張辦公桌很是重視，曾幾次帶着親信前往參觀。文革中期，隨着王洪文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這間辦公室也變得越來越“神聖”起來。中國共産黨“十大”以前，王洪文對心腹王秀珍説“這個辦公室是有意義的，要保留下來。”王秀珍當即告訴了上棉十七廠黨委負責人。“十大”以后，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這間小屋即被冠以“王副主席辦公室”的稱號，鄭重其事地原樣保存了下來。王秀珍下令，辦公室裏的桌椅都要按照當年的情況放置，那張壓在玻璃板底下的選民證也不准挪動。當然，廠保衛科再也不能使用這間副主席的舊“官邸”了。

“十大”結束以后，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們回到上海，王秀珍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瞻仰”活動。有一天，她把中央委員上鋼

一廠的周宏寶、5703廠的祝家耀、候補中央委員江南造船廠的張國權、海運局遠洋輪的馮品德、紡織局停經片廠的汪湘君、上海市第五百貨商店的陳佩珍等人，召集到上海市總工會，向他們宣布：

"今天集體到上棉十七廠瞻仰王副主席當年的辦公室，接受一次路綫鬥爭的教育。"

接着，這批人由王秀珍帶頭，坐着一長串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奔向上棉十七廠。大家畢恭畢敬地走進"王副主席辦公室"，瞻仰那張舊辦公桌和那張顏色發黄的選民證。

就在這間辦公室裏，王秀珍滔滔不絕地講述了王洪文當年的"造反史"。她介紹了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如何帶頭貼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大字報，"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事迹"。王秀珍在講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繪聲繪色，因爲正是在王洪文處于極端孤立的時候，隔壁貼鄰的上棉三十廠裏，王秀珍挺身而出，帶了一批造反娘子軍，衝進了上棉十七廠，有力地支援了身陷絶境的王洪文。因此，王洪文不斷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也始終緊跟王洪文。宣揚當年王洪文的"光榮史"，當然也給王秀珍自己的臉上貼了金。

這批新當選的中委、候補中委們，都是造反比較晚的，他們做夢也没有想到自己會進入中央委員會，本來已經誠惶誠恐、感恩戴德，現在聽了"老造反"司令王洪文的"事迹"，更不免肅然起敬。王秀珍趁熱打鐵，當場組織大家進行討論，要他們挨個兒發表感想，補上文化大革命這一課，每個人在談到今后决心一輩子忠于老人家革命路綫的時候，都要表明態度：自己在參觀瞻仰了這間辦公室以后，更感到要向王副主席學習的必要性，在兩條路綫鬥争的關鍵時刻，堅定不移，百折不撓。

不但對新當選的中委、候補中委們，要通過"瞻仰"進行"路綫教育"，而且對於一批"老造反"——王洪文的"小兄弟"們，同樣要通過"瞻仰"進行"效忠"活動，據王秀珍自己説：一九七五年曾"帶領'小兄弟'去這個辦公室開會，以增强對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參加者有葉昌明、陳阿大、黄金海、馬振龍、王日初、金祖敏。王秀珍説："我和金祖敏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對黄金海、戴立清的'指

示'，目的是使我和這幫'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團，效忠王洪文，爲王洪文争氣。"

林彪的黨羽們所搞的"效忠"活動，剛剛被揭發批判不久，王洪文的幫姐幫弟們又來搞什么像模像樣的"瞻仰"活動，可謂無獨有偶。而恰恰是這個王洪文，還負責過林彪集團成員的專案清查工作，他在聽了王秀珍向他匯報中委們去上棉十七廠的"瞻仰"活動以后，不但不表示異議，而且還得意洋洋。

可見，從林彪到王洪文的血管裏，流着某種同樣類型的血液，這種血液是由千百年來中國封建意識所積澱和釀造的。

文匯報艾玲文革浮沉記

在爲文革大造輿論方面，在林彪一伙與江青一伙鉤心鬥角的衝突中，有一個人的遭遇值得加以詳細的叙述，她便是原上海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后來擔任過文匯報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艾玲。

艾玲曾經深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副組長張春橋等人的信任，后來却又大倒其霉，被張春橋親自命令關押起來，抄家、審查，厄運臨頭……

艾玲在文革的輿論准備階段立了大功

在新聞界和文化界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有這么一個艾玲。艾玲，原姓陳，廣東人，抗日戰争時期去過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她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是文匯報的老報人。艾玲的家庭和孩子，都在北京，丈夫是軍隊的高級幹部。爲了照顧她就近和家人團聚，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匯報社領導上决定讓她長期留京工作，擔任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主任。

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在報社内簡稱"北辦"，原來是一個駐京記者站，兼帶辦理報紙北京版的印刷發行等業務。可是，隨着國内階級鬥争的激化，文匯報"北辦"的地位和作用，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除了新聞業務以外，它成了一個專門收集北京各界的情况和動向，直接向"無産階級司令部"匯報的特殊機構。而艾玲，就是這個特殊機構裏負責上通下達的重要人物。

文革前夕，艾玲正好四十多歲，矮矮的身材，黑黑的皮膚，剪着短發，挎着女式提包，操着一口廣東普通話，出入于北京的機關、團體、學校、劇院……由于她有着文匯報駐京記者的身份，所以，有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她可以去；由于她在北京有許多熟人，特别是能够接近一些高級領導人和各界代表人士，所以，她可以通過比較自然的方式，了解到許多重要的情况和思想動向。

六十年代中期，江青以養病的名義常住上海，先后抓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樣板戲，由北京和上海的京劇院、團演出。每演一個戲，每開一次座談會，艾玲就忙碌起來，她把北京各界對這幾個樣板戲的反應，源源不斷地加以收集、整理，密封起來，通過民航的班機直送上海文匯報社。

當時，文匯報社編有鉛印的《文匯情況》，每天出一到兩期，供內部閱看；還有一種《文匯情況（增刊）》，分發的範圍更小，只供領導參閱，印數很少。至於艾玲從北京趕班送來的情況，更享有一種特殊的待遇，它往往是手抄的，只抄一式幾份，由文匯報社直送張春橋，然后由張春橋轉報江青。江青總是懷着極大的興趣閱讀這些來自首都的第一手情況，并考慮下一步的做法。因此，艾玲以及文匯報"北辦"的工作，越來越得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器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由江青直接指揮、由張春橋具體組織、由姚文元執筆寫成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這顆"重磅炮彈"，震動了京華。很多人都不了解這篇文章的背景，正如江青后來所說的："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連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都搞不清楚，他要人打電話給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楊永直部長，打聽情況。由于彭真下令北京的報紙不得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北京的報刊堅持了十九天沒有作出反應。毛澤東大爲震怒，他原來是要借這篇文章對北京市委開刀的，現在遭到了抵抗，他就指示由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印成小冊子，發行到北京去。

當時，毛澤東坐鎮杭州，江青常駐上海，他們迫切需要知道姚文發表后各方面的反響，特別是北京各界的反應。張春橋也要文匯報闢出"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專版，以期引出各種不同的意見。張春橋還通知文匯報社，要抓緊收集各地各界對姚文的反應，特別是"北辦"，要隨時報告北京的動向。

接到了命令以后，文匯報"北辦"就緊張地開動起來，艾玲自己也日夜奔波。人們可以看到文匯報的駐京記者，一會兒出没於北京市的機關，一會兒闖進文化部大樓，一會兒又來到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一封

封"絕密"情况，迅速地飛向上海。江青下令，《海瑞罷官》批判的反應不登《文匯情况》，改出《記者簡報》，只印十二份，這樣就可以繞過其他政治局委員，直送毛澤東。於是，北京市的領導們怎么說，文化部的部長們作何反應，知名的歷史學家、戲劇家、文學家們如何議論……一連串重要情况，陸續傳送到偉大領袖的面前，這對於下一階段的戰略部署，起着重大的决策參考作用。張春橋對"北辦"的工作備加贊賞，多次加以表揚。從此，艾玲身不由己地和"無産階級司令部"挂上了鈎。

張春橋說："我在上海只保兩個人！"

《海瑞罷官》的批判揭開了文革的序幕，可是，當文革的狂飈席卷中華大地之時，艾玲也被卷入了。當時，上海文匯報所有部主任以上的編輯、記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統統都被打倒、靠邊了，艾玲也不能例外。報社内以朱某爲首的造反組織"星火燎原"總部奪了權，造反派開始批判艾玲并要她交代問題。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張春橋出來說話了，一九六七年初，在上海展覽館咖啡廳召開的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上，張春橋宣布："……我在上海只保兩個人：于會泳和艾玲。他們是對革命樣板戲和《海瑞罷官》批判作出過貢獻的。"

張春橋一旦表態，文匯報社的造反派馬上調頭，立即"解放"艾玲，并且把她作爲革命老幹部的代表，結合進了文匯報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艾玲仍要求留在北京工作，以便就近照顧家庭，於是，她便繼續擔任文匯報"北辦"的負責人。正當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的各級當權派們紛紛遭受批鬥的時候，艾玲却已輕裝上陣，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到北京的各個文革熱點進行穿梭采訪了。凡是"中央文革"的領導成員到哪個單位發表了講話，作了指示，哪個單位就會出現艾玲的身影；凡是北京的哪個部門或單位兩派發生激烈的衝突，或是哪裏有人反對"中央文革"，哪裏就有文匯報"北辦"記者的踪迹。從一九六七年奪權高潮直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文匯報"北辦"成了爲"中央文革"收集社會動向材料的特殊機構。

艾玲在一九六九年對我說，"北辦"收集到的北京各界社會動向，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上海《文匯報》被造反派揭奪權，揭開了所謂"一月革命風暴"的序幕。

當天就直送"中央文革辦事組"；陳伯達和戚本禹還多次接見過她，稱贊"北辦"的工作效率高。戚本禹拿出"中央文革辦事組"編的《快報》，當面翻給艾玲看，上面刊載有文匯報"北辦"提供的不少情況材料。戚本禹說，這些《快報》是直送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由于"中央文革"直接向"北辦"布置任務，艾玲感到責任重大，原有的班子已不能適應這樣艱巨的任務了。她便趁到上海匯報述職的機會，向當時在上海市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我提出要求，希望增派幾名活動能力強、寫作水平高的筆桿子，到"北辦"工作；艾玲還說，由于每天要向"中央文革"報送書面情況，手抄已經來不及，需要增調機要打字員打字，但這些特殊任務與上海文匯報社的關係不大，內容又需保密，因此不便向報社提出，希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幫助解決。

我當即答應幫助艾玲解決困難，同時也提出要求，說是上海"一月奪權"以后，張春橋、姚文元大部分時間留在上海工作，需要及時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北京的動向，因此希望"北辦"把收集到的情況材料，除了"中央文革"指定下達的絕密件以外，能够復打一份給上海。我還和

艾玲相約：今後如遇到重大的事件，由艾玲或“北辦”其他可靠的人，通過紅色保密機直接給我打電話，由我轉報給住在上海的張春橋和姚文元。

雙方商定以後，我便從原市委寫作班中選出幾名扎硬的筆桿子，分期分批地送往“北辦”，協助艾玲收集和撰寫情況。這幾個人有着很强的活動能力，筆頭又快。艾玲調到了生力軍，真是如虎添翼。接着，又從康平路市革會辦公室選調了機要打字員，并給“北辦”裝上了紅色保密電話，保證了聯絡綫路的暢通。從此以後，“北辦”不僅是“中央文革”的耳目，而且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駐京聯絡點。

在某些關鍵時刻，文匯報“北辦”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之間的這條“熱綫”，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北京召開大會，親自登臺作了“揪出楊、余、傅”的長篇講話。當時，張春橋正在上海，没有參加北京的大會，他迫切想要了解林彪講話的全文。艾玲以記者身份進入了北京的大會會場，記録下了林彪的長篇講話。散會後，艾玲把記録稿密封後送上當天的民航班機，由上海市革委會康平路辦公室派小轎車專程等候在虹橋機場。等班機一到上海，辦公室秘書取到了艾玲的記録稿，轎車直馳上海展覽館的會場，使張春橋得以通過最迅速的途徑，讀到了林彪的講話，了解了打倒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軍區副司令傅崇碧的重大情況，并且立即向等候在會場裏的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成員們作了傳達。艾玲由此也立了一功。

當然，艾玲也經常利用這條“紅色熱綫”，與文匯報造反派的頭頭朱某等保持密切的聯系，經常提供北京的信息。正因爲如此，那幾個人在編報紙時，常常得風氣之先，搶着把“無産階級司令部”的聲音播到版面上來。有一個時期，上海文匯報甚至每天要發兩到三篇社論，引起了林彪的注意。有一次，林彪在北京給新聞界講話，贊揚文匯報跟“無産階級司令部”跟得緊，文章“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很有看頭。他號召全國的報紙向文匯報學習。上海文匯報從此名聲大振，報紙印數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一九六八年初，在“上海市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文匯報被評爲先進集體，獲得了上海市革命委

員會的表彰。這些榮譽的取得，當然也是與艾玲從“北辦”通往上海文匯報的專綫分不開的。

陳伯達說：“你寫了一個又長又好的報告。”

可是，有一次這條“專綫”却導致了一場大風波。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艾玲在北京的幾所大學裏聽到一則傳聞：“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用黨籍擔保說張春橋是叛徒。”到了晚上，艾玲向上海文匯報社的頭頭朱某打保密電話，迅速把這條傳聞傳給上海。艾玲還對朱某說，自己的丈夫在北京看到一些中央的絶密文件，文件末尾的收件人姓名欄目中，“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都赫然在目，唯獨缺了張春橋的姓名（當時張春橋在上海）。

朱某當時既是文匯報革委會的負責人，又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暨政宣組的組長，他接獲了艾玲的保密電話后，自認爲“炮打張春橋”勝券在握，于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這一天，利用文匯報向張春橋發難，在第三版上用曲折的方式進行“炮打”，同時印發了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傳單《十個爲什么》，向張春橋質疑。朱某等還去復旦大學等串連，在全市掀起了“炮打”浪潮。但是，這次“炮打”只持續了一天，由于張春橋向“中央文革”呼吁，江青便直接出面找林彪一伙干預，最后由軍委辦事組成員、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給上海打電話表態，把這場“炮打”很快地壓了下去。文匯報的朱某挨了批判，他交代出了艾玲打來保密電話之事，使艾玲大爲驚慌。

幾天之后，在北京的艾玲主動向“中央文革”寫了一份檢查，表示自己給上海文匯報打電話傳小道消息是錯誤的，但申明自己没有參與報社的“炮打”。這份檢查送到了陳伯達的手裏，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當時還要重用艾玲，還需要繼續利用“北辦”作爲伸向北京各級重要部門的觸角，爲此，陳伯達專門召見了艾玲，當面安撫并鼓勵她說：“你寫了一份又長又好的報告！”艾玲見陳伯達不但没有批評她，居然還稱贊自己的檢查，簡直有些受寵若驚，便當場表態要加倍努力地爲“無産階級司令部”工作。

至於張春橋，當時自己在中央還沒有站穩脚跟，看到陳伯達這么器重艾玲，便也順水推舟，繼續委艾玲以重任。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上海在醞釀推選九大代表的時候，張春橋特地提名，讓艾玲作爲上海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出席九大。艾玲對此感激涕零。她在回上海參加九大代表學習班時，眼眶裏含着熱泪對我說："我真没有想到……我實在不相稱……"

後來，艾玲在參加九大的過程中，對上海代表團的領導跟得很緊，積極參與批判陳毅、整理簡報等，她還主動外出，承擔了額外的任務：她利用過去熟識的老關係，在會外接觸了一些知名的造反派，馬上寫了專門的情況反映，繼續通過文匯報"北辦"直送"中央文革"。

九大閉幕以後，艾玲的政治地位節節上升：她調回上海主持文匯報的工作，擔任報社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并遴選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經常參加市裏的重要會議，成爲上海新聞界的頭面人物。

張春橋决定對艾玲進行隔離審查

隨着權力的再分配，林彪一伙與江青一伙的争奪日趨激烈。到了一九七○年的廬山九届二中全會期間，一場衝突終于爆發，由于毛澤東的決策，林彪等人不得不從進攻轉爲退却。此后，他們加强了隱蔽活動，包括多做争取人、拉攏人的工作。艾玲，就成了他們重點争取的一個對象。

林彪的心腹王維國當時是上海空四軍的政委，他向文匯報社派駐了一支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廬山開會回來，王維國就通過文匯報軍宣隊負責人，重點加强了對艾玲的争取工作。從一九七○年底到一九七一年初，他們連續把艾玲請到空四軍軍部去。特别是在中國共産黨上海市第四届黨代會期間，林彪一伙想把王維國擠進上海市委書記的名單中去，便加緊了活動。

艾玲是上海市第四届黨代會的代表，有好幾次散會以后，她就被接到巨鹿路的空四軍招待所去，和王維國等一起吃飯，并作較長時間的談話。這些情況，很快被上海警備區的副政委徐海濤察覺了，徐海濤當時

被調到上海市革委會任文教組一把手,黨代會期間艾玲就編在他的小組裏。廬山會議以後,徐海濤也敏感到林彪一伙與江青一伙的對立,所以,他把王維國拉攏艾玲的消息,迅速向張春橋、王洪文和我作了報告(當時姚文元不在上海)。

張春橋聽說艾玲的這一動向,吃了一驚。他馬上下令要徐海濤副政委核實消息是否確鑿。結果徐海濤又一次報告:就在上海市四屆黨代會選舉市委領導人之前的那個中午,艾玲又被請到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去"吃飯"了。張春橋感到十分惱火,因爲在幾個月前的廬山會議上,他受到了林彪集團幾員大將的圍攻,要不是毛澤東出來扭轉局面,他早就被拉下馬了;如今,艾玲又向林彪一伙靠攏,她可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她一肚子的機密,了解從《海瑞罷官》批判到爲"中央文革"收集各種材料的全過程。如果艾玲被林彪、王維國等人拉了過去,他們將從這個知情人那裏得到大量的"炮彈"。這正是使張春橋覺得情勢緊迫、問題嚴重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個傍晚,上海市四屆黨代會剛剛結束,張春橋登上了市委第一書記的重要位置,王洪文和我也都當上了市委書記,王維國只落得個市委常委的職務。張春橋認爲時機已到,那天薄暮時分,他突然把王洪文和我兩人緊急召到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在昏暗的客廳裏,張春橋開門見山地說:

"找你們兩個來要辦一件事: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對艾玲進行隔離審查!"

張春橋沒有說毛澤東什麼時候作的指示,也沒有說要對艾玲的哪些問題進行審查。王洪文坐在沙發上抽着烟,我在一旁屏息靜氣地傾聽,誰都不敢提問。

張春橋一反往常慢悠悠的神態,斷然地說:

"今天晚上就采取措施。可以把她放在少教所。"

在玳瑁鏡片後面,張春橋的眼光森森,他進一步布置說:

"注意不要出事……還可以派幾個可靠的人,到文匯報她的住處去,把一些重要的材料,包括《海瑞罷官》批判的有關資料,連同她的筆記本等等,統統集中起來,不要散失!"

張春橋最後又部署了具體的行動方案。

從興國路招待所出來，王洪文和我回到康平路市委小禮堂貴賓室，緊急召來兩個信得過的人，委任爲艾玲專案組的負責人，并布置他們先審查艾玲卷入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的問題。接着，我要秘書小張通知艾玲和軍宣隊負責人老佘一起到市委來開緊急會議，爲了穩妥起見，還特意派小張乘着市委汽車隊的轎車去文匯報社接人。

大約晚上十點多鐘，王洪文和我在康平路貴賓室的沙發上坐等，外面傳來汽車的停車聲，貴賓室的玻璃門打開了，穿着短呢大衣、脚登軟底女鞋的艾玲走了進來，滿臉狐疑的神色；軍宣隊負責人老佘穿着空軍制服，跟在她的後面。

艾玲進門，見王洪文和我兩個人端坐在中間的大沙發上，并没有像往常那樣站起來和她熱情握手，先是一愣。王洪文示意她在側面靠墻的小沙發上坐下。軍宣隊老佘坐在她旁邊。室内的空氣顯得緊張而凝重。艾玲見室内别無他人，不像開緊急會議的樣子，便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她下意識地打開手裏的拎包，取出鋼筆和筆記本，然后戴上那副常戴的黑邊老花眼鏡，准備隨時做記録。

王洪文咳了一聲，緩緩地説：

“找你們來，是要宣布一件事：根據領導的指示，從現在起，對艾玲進行隔離審查！”

艾玲的筆頓時停住了。她蹙緊眉頭，臉色發灰，慢慢地取下老花眼鏡，看着王洪文，木然不動。

“艾玲要很好地思考和交代問題。交代材料直接交給專案組的負責人。”我接着作了補充關照。

艾玲聽了默不作聲，她朝我看了一眼，眼神裏充滿着困惑、抱怨和絶望的神情。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説。她緩緩站起身來，仍然蹙着眉頭，默默地隨着來帶她的人走了。當天深夜，她就被送進了位於上海西南郊漕河涇“少教所”的冰凉的隔離室。“少教所”，全稱是少年犯罪教養所，一九六八年，張春橋下令解散原“少教所”，把這裏變成了關押、審查上海市黨政領導幹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場所

緊接着，艾玲專案組的人奉命抄了她的辦公室和宿舍，把有關《海

瑞能官》批判的資料和筆記本等，抄出后貼上封條，直送興國路張春橋辦公室。隨后，專案組又借口文匯報“北辦”和“炮打”事件有牽連，把正在上海學習的“北辦”全體編輯、記者等工作人員統統隔離起來，關到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的密室裏進行審查。

艾玲的最后命運

艾玲本人，長期被單獨關在少教所隔離室的鐵窗裏。她一被隔離，就生起病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覺。她不寫任何交代材料。她清楚地知道：寫不寫材料對她來說都一樣，也許寫了材料反倒要惹出更大的麻煩，所以她一直稱病。有一點她是可以覺察到的：從一九七〇年秋天的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王維國等人和江青、張春橋一伙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鋭。所以，在關了一個時期以後，艾玲發現看守她的警衛人員是空四軍派出的，她的心思就活動起來了。當時的上海市公安局、專案辦公室、市監獄乃至少教所等，都是由空四軍進駐的。通過他們豈不是可以和王維國建立聯系？于是，艾玲就背着專案組的人做了一個大膽的動作：她偷偷地給空四軍的政委王維國寫了一封信，從門底下的縫隙裏塞給看守人員，要求他們轉送上去。這封信果然通過王維國直接控制的警衛處，直送到王維國的手裏。而當時張春橋、王洪文和我，則對這一件事全然不知。

王維國收到艾玲的密信，十分重視，他派了專人到少教所去秘密看望艾玲。這個“特使”神秘地帶着大口罩，悄悄地來到隔離室，熱情地和艾玲握手，并且轉達了“王政委”的口信：希望艾玲養好身體，耐心等待，“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

誰曾料想，過了不久，林彪機毀人亡，王維國自己被抓，艾玲左等右等，不但“勝利”全然無望，而且連她給王維國寫信、“特使”前來密談等情況，統統都被看守人員揭發出來了。這下艾玲更加大倒其霉，專案組抓住這件事，清查她和林彪集團的關係，把她狠狠地整了好一陣子，整得她啞口無言，低頭認罪。這一來，艾玲的花白頭髮增加了好多，她的身體和精神也徹底垮掉了。她和遠在北京的丈夫和家庭都聯

係不上，她只能給領導上寫信，請求放她回家治病。

林彪一伙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以后，張春橋大大地舒了一口氣，覺得對他的直接政治威脅大爲減弱。此時此刻，張春橋似乎覺得：艾玲即使"倒戈"也已經對他不再構成任何危險了，所以，他終於發了"善心"，同意艾玲本人的請求，對她解除隔離，讓她回北京和家人團聚，長期休息養病，再也不擔任任何工作。

一個叱咤一時的新聞界"紅人"，從此永遠銷聲匿迹。

文革結束以後，有關方面對艾玲的案件予以關注，推倒了"四人幫"加在她頭上的誣陷不實之詞。此時的艾玲，已經垂垂老矣，終于能享受到離休干部的待遇，和她的家人住在廣東安度晚年。

文化部長于會泳的升遷榮辱

一九七三年第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會中有一名新的中央委員，就是于會泳，他是“革命文藝戰士的代表”、“革命樣板戲的有功之臣”，經江青提名而成爲中央委員的。

于會泳原來是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系的教師，身材矮小，四方臉盤，眯着一對小眼睛，嘴巴很闊。我曾經對他開玩笑説：“假如給你畫漫畫的話，特征非常明顯。”他説話的時候喉嚨沙啞，身爲作曲家却最怕人家叫他唱一曲，王洪文和王秀珍碰見他：“老于，給我們唱一曲。”他説：“不行，不行。”他説話快的時候，會結巴，但作曲很流暢。他是山東省乳山縣人，農民家庭出身，從小喜歡吹拉彈唱，各種樂器都能露一手。一九四六年，他參加膠東文工團，演過幾個小歌劇。他對民間音樂和戲曲音樂很感興趣，特别對京劇的曲牌、唱腔很熟悉，在文工團工作的時候，就爲新編歷史京劇譜唱腔。上海解放后，經過文工團的保送，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成績非常優秀，賀緑汀院長很看重他，留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做教師，后來又被提拔爲民族音樂理論系副主任。他的妻子也是搞音樂的，姓任，是上海合唱團女聲部的歌唱演員。

于會泳在音樂學院重點搞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和教育，寫過幾本著作，如《山東大鼓》，與人合編《膠東民間歌曲》專集，另外發表過論文《民間曲調研究》。他下鄉采風時也譜寫改編過幾首民歌，其中比較流行的有《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兒遍地香》、《人民公社邪邪好》。于會泳的文字功夫也行，筆頭勤快，教學之餘經常寫些評論文章，投給報刊發表，在民族音樂和戲曲音樂方面經常有新的見解。

江青發現了于會泳

一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抓京劇革命，把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獲得好評的《紅燈記》調來演出，爲此上海的報紙上發表了各種評

論文章。有一天，江青在《文匯報》上看到署名于會泳的評論文章《從〈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爲塑造英雄形象服務》，大爲贊賞。于會泳認爲，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他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爲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這成套的唱腔可以大大地流傳。

于會泳的建議與江青的一貫主張非常合拍，江青一看，馬上對張春橋說："去了解了解，這是什么人？"張春橋雖然長期在上海主持文藝工作，但也不知道于會泳這個人。江青突然發現了人才，張春橋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又是文工團出身，就馬上在錦江小禮堂接見了于會泳，并當場稱贊他，說他的文章寫到點子上。同時對張春橋說，今后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他。根據江青的旨意，張春橋安排于會泳擔任上海京劇院重點劇目《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劇組的音樂設計組組長。從此以後，于會泳成爲江青和張春橋的智囊。

于會泳先在《海港》劇組擔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賞四大名旦中程硯秋的唱腔，所以在爲《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設計唱腔的時候，充分發揮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點。戲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黨"這一段時，抑揚頓挫，發揮得淋灕盡致，特別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滲透了這碼頭的土壤"這一句，回腸蕩氣。于會泳把録音送給江青，江青屏住氣息地聽，覺得唱腔設計非常好，擊節贊賞。

于會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碼一點點加重。後來，江青認爲《海港》的音樂可以過關了，但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的音樂還不行，又把于會泳調到那裏，要他對全劇音樂進行藝術加工。于會泳到《智取威虎山》劇組，在進行唱腔設計的過程中，逐步摸透了江青的愛好，做得更賣力、更到位。他曾對我說："我從小受母親的影響，熱愛京劇。"他母親是農村婦女，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歡唱京戲，他耳濡目染，對各種流派、唱腔很熟悉。經過音樂學院的學習，他能够一面哼，一面把譜子全部記下，把民族和西洋的音樂元素相結合，使他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從前的京劇只是京胡、二胡、板鼓的伴奏，他把整個交響樂隊搬來伴奏中，氣勢很壯，把傳統京劇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來，比如

“打虎上山”這段，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渾厚的圓號交織在一起，把楊子榮上山揚鞭策馬、風雪怒吼的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段的前奏和唱腔在音樂界是有定評的，很精彩。當然，當時是不具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的傑作。

于會泳在兩個劇組的表現，越來越受到江青的重用。一九六六年國慶節，《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還提名于會泳乘飛機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書用轎車接他到劇場，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讓于會泳陪同一起上臺接見演員，于會泳受寵若驚。

不久，上海音樂學院學生造反了，紅衛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會泳的心思，認爲學院裏校、系一級的領導都要審查打倒，勒令于會泳回上海音樂學院接受群衆審查。當時市委還没有垮臺，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找市委宣傳部，宣傳部要我給姚文元打電話匯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找于會泳談話：“這樣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將站在一起。”

于會泳在一九六六年底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是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要緊跟，他在學院裏貼了一張《十四點質問》的大字報，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紅衛兵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領導上海造反派奪權。他們到上海后，找幾個人談話，其中一個就是于會泳。我感到他們對于會泳非常重視。一月奪權以后，張春橋在上海公開的場合幾次宣布，在上海只保兩個人：于會泳和艾玲。

于會泳在上海重新負責樣板戲劇組，并擔任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統革命委員會籌備會主任，主要的力量放在抓幾個樣板劇組。江青在抓戲的過程中，三天兩頭有指示下達，她一遍遍看戲，把戲的録音帶回去，她喜歡一面吃飯，一面聽録音，琢磨戲裏的臺詞、音樂、唱腔。

一九六五年，江青來上海拍戲時，住在徐匯區太原路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是一幢很漂亮的法國式建築，原來的主人是法國公爵狄爾達，抗戰勝利后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曾住在這裏，老上海也稱這裏是馬歇爾

公館。解放以后一度給林彪住過，林彪還把妻子葉群安排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隨着林彪地位的上升，這地方就讓給江青住。整幢房子像小型的凡爾賽宮，前面一片大草坪。從大鐵門進去，一條柏油路繞着樹叢，沿臺階而上，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汽車可以停到臺階前。當時爲了保證"客人"的安全，不讓外面的人窺視"客人"的動向，警衛部門把花園四周的居民遷走，把太原路上對着正屋的一排居民房子的窗户砌掉，讓警衛處的家屬搬進去住。這樣，江青可以在院子裏自由地散步，曬太陽，不受任何干擾。江青很難弄，有一次到上海，房間裏有只蚊子，她就説"我一夜没有睡好。"于是動員很多人給她抓蚊子，因爲她不准給房間裏噴藥水、點蚊香，只好趁她外出時派人到房間裏抓蚊子。

太原路招待所有個很大的會客室，大吊燈，地毯，一個壁爐架是柚木雕花的，紋飾都是歐洲的古典圖案，很考究。會客室裏長沙發周圍一圈小沙發，江青習慣用橘黄色圓罩子的立式臺燈，不刺眼。環境雖然好，但是江青從不在這裏接見編劇、導演，她在這裏琢磨對戲的修改意見，一面吃飯，一面研究，然后拿出一臺録音機，對着録音話筒講她對戲的修改的意見。然后把録音帶交給張春橋。張春橋拿到録音帶，自己先聽，然後找于會泳少數創作人員聽，討論怎樣貫徹執行。劇組全體人員是聽不到江青的録音的，由主創人員將她的修改意見傳達。張春橋接到江青的録音意見後，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最後聽江青同志的。搞革命樣板戲，只能搞一言堂。最後由江青同志做主。"後來我們説："百家争鳴，一家做主。"

藝術創作實際上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難要求意見一致。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的意見固然也有一些不乏高明之處，因爲她畢竟是懂戲懂藝術的，應當承認她在戲劇藝術方面是行家，也會唱京劇，又搞過戲，演過電影，能够發表一些比較中肯的意見。但她也有考慮不成熟的地方，朝令夕改，靈感式的東西蠻多，也會出幾個餿主意。劇組創作人員和演出人員討論她的意見時，往往會有不同意的地方，本來藝術創作上的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常的，領導地位高的，學術意見不一定正確，任何一個創作集體中都應該有充分的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但是在當時的氣候下，對江青的任何指示有任何的議論、不滿意的話，都要上綱作爲

政治問題，這就嚴重了。再加上藝術圈裹文人相輕、藝人相輕，互相争名奪利、相互傾軋，彼此之間搞檢舉、揭發的情况就出來了。

于會泳調到劇組擔任領導後，收集了劇組内很多對江青不滿意的材料，向張春橋當面告狀。張春橋在這方面也很有算計的，他説："你寫書面報告來。"于會泳領受了張春橋的意圖，就以樣板戲領導小組的名義連續寫了幾篇書面報告，報告説："上海京劇院有幾個人、技導李仲林、演員王正屏、支部書記李俐，有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言行，請求領導批准，予以逮捕審查。"

究竟有什么樣惡毒攻擊的言行呢？有一份專門交給公安局的防擴散材料，于會泳爲了表示對我的尊重，先把書面報告送給我，我一看不好表態，交由張春橋决定，張春橋曾經對我説過："樣板劇組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試驗田。江青同志不在的時候，直接由我負責。"既然他的意圖很明確，我就在報告上寫："報請春橋同志批示。"過了一天，張春橋批文下來了："可以由群衆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轉于會泳同志。"這個批示很有心計，把責任推到群衆身上。技導李仲林在京劇《智取威虎山》中出過大力，他原是武生演員，早期扮演過楊子榮，張春橋曾説："有些場面和舞臺調度都是李仲林設計的。"后來李仲林對江青有意見，張春橋馬上過河拆橋，把他抓起來。王正屏是京劇中正字輩的接班人角色，唱花臉，曾在新編京劇《黑旋風李逵》中演李逵，獲獎。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勇奇，對角色唱腔設計也花了很多心血。支部書記李俐從小參加部隊文工團，轉業后到上海京劇團擔任黨的工作。這些人都熱愛京劇事業，在搞《智取威虎山》的過程中有貢獻，他們因不滿江青和于會泳，就被加上惡毒攻擊中央領導的罪名，不審不判被關了好幾年。

張春橋保護了于會泳

于會泳靠着江青對他的信任，以及張春橋和我對他的全力支持，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龍江頌》，不斷地出新戲，不斷地走紅，有了更多的政治資本，就不斷地得到提升。一九六八年，

于會泳帶《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演出，張春橋説于會泳貢獻很大，提名于會泳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常委的候選名單要經過審查后再報中央批准。一九六九年初，名單審查完，准備報中央時，張春橋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二O三室召開領導成員碰頭會，聽取組織組的政治審查情況。那天，我比張春橋先到會議室，組織組負責人把我請到會議室旁邊，輕聲告訴我："在于會泳的檔案裏，發現了一張紙條，這是當年他在山東參加革命部隊以后親筆寫的，內容有問題。"我很吃驚，我對于會泳過去的歷史情況不了解，就追問究竟是怎么回事。

解放戰爭時期，于會泳參加了膠東文工團，隨部隊到山東烟臺演出，當時正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向膠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實行戰略轉移，于會泳的文工團跟着大部隊一起撤退。撤退以前，每個文工團員發到一批物資，是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留在山東烟臺的救濟物資，有軍毯、衣料、罐頭、食品、奶粉等，戰略轉移不可能隨身帶很多東西，文工團領導決定由個人把這些東西打包埋在地下。于會泳在打包時，寫了張紙條，同時附了張照片："蔣軍兄弟，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家裏只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性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裏，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后寫有我家的地址）。"他寫完紙條以后，立刻被文工團指導員發現，紙條没有放進包裹，却放進于會泳的檔案袋。所以審查于會泳材料的時候，發現了這張紙條。

組織組負責人向我匯報完畢，不作結論，看着我。我覺得事情有點棘手，文革期間的思潮很左，按照當時上綱上綫的做法，即使不定你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至少也定你在關鍵時刻政治動摇的帽子。我説："等一下再説，春橋同志要來參加會議的，這件事我向他匯報以后再定。"

組織組負責人在會上把常委的名單講了，没有問題的就過去了，念到于會泳時，我説："你把情況匯報一下。"他剛提到這張紙條，張春橋馬上接口，一點兒不吃驚，輕描淡寫地説："這事我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到北京去揪于會泳，這也是一個由頭。這封信後來没有成爲事實嘛。"他這么一説，我就明白了，他提名于會泳當常委的時

候，早就知道于會泳歷史上的問題。

我在會上發表了意見："我看，問題不大。主要看于會泳現在的表現。"我是負責文化文教這條綫的，張春橋和我這么一表態，其他市革會領導成員誰也不反對。市革會組織組就把于會泳列入名單。我還告訴他們："上報中央審查的時候，不必寫上紙條的事情。"在張春橋和我的保護下，于會泳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以後，張春橋和我又提名他當"九大"代表。

于會泳當時在北京抓《智取威虎山》，准備拍電影。我寫信通知他，經過中央領導批准，上海廣大黨員選你做"九大"代表。他很感動，寫了封回信："我自己決不辜負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我的信任，决心爲文藝革命奮鬥終身。"他也知道，没有我們的力保，他是絶不可能當上市革會常委和"九大"代表的。從此，我和于會泳的交往也越來越密切。

江青在北京給于會泳下了很多任務，要把所有的樣板戲拍成彩色影片，他在北京抓《海港》、《智取威虎山》的拍攝。影片拍得很苦，拍出來江青不滿意，像《海港》拍了三遍，我說："你要什么，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特意把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謝晋解放出來，和北京的謝鐵驪合作，到《海港》攝制組共同擔任導演，最后完成任務。

《龍江頌》主角江水英，原來由張南雲主演，她是演大家閨秀的旦角，現在要演農村大隊的支部書記，怎么看也不像，我决心把年輕的李炳淑推上去演主角，張南雲是《智取威虎山》主角童祥苓的妻子，我覺得更换張南雲是不是會影響童祥苓的情緒，就跟于會泳商量，于會泳從戲的角色需要出發，全力支持我的意見，這樣對雙方都做了工作，把《龍江頌》的主角作了更换，讓李炳淑當了主角。我在上海抓《龍江頌》有一定基礎後，于會泳就把它接過去，從脚本、音樂、舞臺美術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加工，後來又把劇組調到北京演出和拍電影，使這出戲在舞臺上和銀幕上都站住了，并得到很多人的贊賞，毛澤東、周恩來都很欣賞這個戲，特别是欣賞李炳淑的演技。周恩來在北京觀看了演出，還接見了全體演出人員。一九七二年七月的一天，毛澤東看了影片《龍江頌》後，特地把李炳淑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那天，毛很愉快，請李炳淑給他清唱幾段，李唱了《龍江頌》中的"手捧寶書暖心懷"，這是當

時歌頌毛主席著作的，還唱了幾段傳統戲。毛問了她一些文藝界的情況，還給她講了魯迅著作《故事新編》中的一篇《奔月》，說到后羿、嫦娥吃炸醬面，毛就說："今天請嫦娥在這裏吃炸醬面。"李炳淑回來後，告訴我們說毛接見了她，我和于會泳都很高興。

幾個樣板戲先是演出，再拍電影，又搞劇種移植，如《沙家浜》是從滬劇改爲京劇的，後來又移植爲滬劇，越劇、淮劇等劇種也紛紛移植樣板戲。幾年后，江青覺得老是八個樣板戲不行，應該搞一些新戲了，她讓于會泳再搞新的節目。首先，要求演過《沙家浜》的北京京劇團改編演出《杜鵑山》，文革前，江青曾在上海看過這出話劇，是上海歌劇院編劇王樹元編的，要把話劇改編成京劇，就要重新在劇本上作很大的改動，當時，北京京劇團的編劇力量比較薄弱，于會泳與我商量，我馬上同意把原上海歌劇院王樹元調到北京，重新改寫京劇劇本。劇本寫完後，主角柯湘的演員非常難找，江青點名要上海京劇團的楊春霞來演，于會泳打電話給我，說江青有這個意思，於是我趕緊批准楊春霞和她的丈夫"借調"到北京，實際是長期調去，由她主演《杜鵑山》，這樣就一炮打響。

另外，上海也要搞新的現代京劇，上海有個劇本叫《螺號長鳴》，由《智取威虎山》劇組主攻，他們的劇本搞好後，于會泳把它送給張春橋和我來看。一九七二年，張春橋回上海時，特地在丁香花園接見于會泳，商量劇本，由我作陪。我認爲《螺號長鳴》的名字不太像京劇，建議改名《磐石灣》，張春橋表示同意，于會泳也接受了。《磐石灣》由童祥苓擔任主角，主要反映沿海民兵與美蔣特務的鬥爭，也很快通過，并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放映。在搞戲的過程中，我與于會泳的接觸密切，我感到在抓戲方面，他確實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堅定不移地貫徹江青的意圖，没有見到過像他那樣忠誠於江青意志的人，而且，他搞起來廢寢忘食，從修改文學劇本、設計唱腔，到舞臺美術、舞臺監督等，什么都要親自上陣，還要當導演。江青對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話，他都要不遺余力地貫徹、落實，結果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樣板團聽江青的，搞創作聽于會泳的。江青的意圖下來後，落實時要聽于會泳的。

在現代京劇《海港》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收到一封觀衆來信，說戲

中有個反面角色叫錢守維，在糧倉的糧食包裹放玻璃纖維的情節不合理，他説，錢守維是階級敵人，但在糧包裏放玻璃纖維不會毒死人，没有危險。江青也不懂，她一看觀衆提出意見，就下命令修改，要把玻璃纖維改成别的東西，比如放毒。于會泳得到江青的旨意後，急急忙忙地從北京趕到上海修改劇本，我把他安排在東湖招待所主樓最好的套房裏，還關照在伙食等方面都要給他特别的照顧，所有費用由我們市委招待處負擔。

于會泳在這個套房裏，幾天幾夜查資料，打電話，請教專家，想出各種"毒藥"來替代玻璃纖維，可是那些"毒藥"不是有顔色，就是有氣味，或是很容易揮發，毒氣太嚴重，不可能混在糧包裏出國的。于會泳搞了幾天後走投無路，就向在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匯報，姚文元對江青的意圖也是跟得緊的，他也派人到上海玻璃纖維廠專門召開工人座談會，聽取工人的意見。我到東湖招待所去看于會泳，看他真是急得團團轉，茶不思，飯不香，談話的内容都是有關戲裏究竟放什么"毒藥"的問題。

《海港》原來的情節，錢守維在糧包裏放玻璃纖維的目的不是爲了毒死人，目的是爲了損壞我國出口貨物的聲譽，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如果改成投毒的話，與原來的意圖不相符。情節的處理過頭的話，反而起副作用。我和姚文元討論後，意見比較一致。但是，要改情節的指示是江青下達的，爲了慎重起見，我們把討論的意見單獨向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也被于會泳三天兩頭的請示搞得頭腦發脹，他看我和姚文元有一個共同意見後，明確表示，于會泳設想的幾種投毒的方案都不可取，還是維持原來的情節爲宜。張春橋説，江青那裏由他負責去商量，于會泳這邊要我與他談，提出一個復原的方案。

我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指令後，又趕到東湖招待所，只見于會泳蜷縮在沙發裏，臉色灰暗，嘴唇没有血色，眼睛裏充滿血絲，精神萎靡。小書桌上放滿了稿紙，嘴裏念念有詞地説什么什么毒藥，看他這樣下去，真要發毛病的。我把與張春橋、姚文元討論的意見向他作了詳細的傳達，看得出他内心也是讚成我們的看法的，但他嘴裏説"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啊"，放不下來，説明他山窮水盡的時候，還不肯松口。那

天，我離開以後，他居然心力交瘁昏倒在房間門外的地板上，幸虧服務員及時發現，找醫生急救，才把他救過來。從這件事可看出于會泳對江青的指示到了何等忠誠的程度。最後，經張春橋向江青說明，江青也同意維持原狀，決定不改了。于會泳苦苦折騰了一陣子後，終于放下了一個很重的精神包袱。

由於于會泳在搞樣板戲的過程中忠誠執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對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會泳身體不太好，經常開夜車，多次地把自己吃的補藥、進口藥給他吃，讓他補養身體。于會泳當然很感動，他還捨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專門從北京送給"南京路上好八連"，說這是江青關愛革命樣板戲文藝戰士的象征，"好八連"把它放在展覽會上展出。

"三位一體"

于會泳和另外兩個助手劉慶棠、浩亮三人，經常直接到江青在釣魚臺的住處去，江青對他們越來越重用。"九大"前後，國務院成立了一個文化組，組長是吳德，副組長是當時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叫劉賢權，原是青海省軍區司令，江青提名于會泳當文化組副組長，劉慶棠、浩亮當文化組成員，把藝術創作大權交給這三個人。劉慶棠主演過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黨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錢浩梁，毛澤東說他的名字念起來很拗口，就將他改名浩亮，他演過京劇《紅燈記》的主角李玉和。他們三個人基本上圍着江青轉，他們稱江青的專用名字是"首長"。他們三天兩頭到江青那裏，有時是江青找他們，有時是他們主動去匯報，江青的指示由他們直接傳達給文藝界，他們實際上是江青的代言人，連當時文化組負責人吳德也要倒過來從他們那裏聽取江青的指示。

江青不僅找他們談戲，還時時把他們找到釣魚臺打撲克，作牌友。有時江青到外地，也叫他們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廣州，趙紫陽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令叫于會泳、劉慶棠、浩亮到廣州來，江青一邊與他們談創作，一邊要他們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們三人的關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後就有議論。有一次江青請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吃飯，還請了文物局局長王冶秋，那天吃螃蟹，同

時請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對喬冠華、章含之夫婦和王冶秋說："現在人家造謠說我有'面首'，你們看，假如有'面首'的話，就是他們三個。"當然，江青當時說的是氣話。后來，于會泳把這話告訴了我，我還查了一下《資治通鑒》，在《宋紀·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寫道："〔山陰公主〕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查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來是"男妾"，或是"男寵"。江青敢于對喬冠華等人講外面傳的事，也說明她與這三人的關係密切的程度。

他們三人是絕對抱成一團的，我給他們起的外號是"三劍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們是"三駕馬車"，他們自稱是"三位一體"。他們憑借江青當時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權。有一年夏天，江青批准他們三人以深入生活的名義，到山東避暑，他們從濟南一路逛到青島，國務院文化組還給各地打招呼，說他們是江青派出來深入生活的。他們所到之處，都待之爲上賓，住最高級的招待所，還參觀了北海艦隊的秘密軍事設施。于會泳是山東乳山縣人，又順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們在青島的海濱療養院住了幾天，洗了海水澡，曬了日光浴。那個夏天，他們回北京時路過上海，我看到他們容光煥發，皮膚曬得又黑又亮，身體非常好，他們口口聲聲感謝"首長"的關懷。于會泳對我說："我現在什么病都沒有了。"他還拿出一路上寫的打油詩給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還記得："海水真比藥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沒有了。

又有一次，于會泳向江青提出，他從來沒有去過海南島，想去看看紅色娘子軍的根據地，江青就批准了。這樣，又是于會泳領隊，跟劉慶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亞等地，游遍了天涯海角。他們打着江青的旗號，又不顧影響，人家就寫信到中央告他們的狀，說他們幾個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義壓人，拿出大首長的派頭，要這要那。江青看到後將信壓下來，保護了他們。

由於于會泳身份特殊，他調到北京後，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對他也刮目相看。我們每次到北京參加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時，總要到于會泳那裏去，他當時在前門飯店隔壁的國務院文化組。我們去的時候，

他總是在文化組小放映室裏招待我們看内部電影，當時的内部電影，我們在上海也很少有機會看。他有幾方面的電影來源：一是中國電影資料館，那裏的片庫很大，有各種各樣的電影；一是釣魚臺江青保留的電影，江青把比較好的電影都保留在她自己的片庫裏。有一次江青在那裏招待我們看電影，居然還拿出一本目録，上面有很多國内外著名電影，還有科教片。于會泳除了上述來源外，還可以調看資料片、過路片，當時中央各口都有一些過路片，如外交部、中聯部。于會泳有權調看這些片。

于會泳等幾個人也經常來上海，每次都是我到機場接他們，安排他們住在賓館最好的套間，還陪他們參觀，如金山石油化工總廠、松江黄浦江大橋、高橋熱電廠等。當時，我們一般不宴請内賓，但對他們破格，在錦江飯店設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們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與于會泳見面，倆人總要作長時間的談話，于會泳把最近時期以來江青對各種問題的議論、江青自己的活動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説葉劍英壞話的内容都告訴我，説明我們關係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動向告訴于會泳。比如，一九七〇年我到廬山去參加九届二中全會，即林彪要炸平廬山的那次會議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會議、"批陳整風"，實際上是批"黄、吴、葉、李、邱"五員大將等。當時，于會泳不是中央委員，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機密，我就把廬山會議上，葉群和"黄、吴、李、邱"那幾根槍桿子如何發難、怎樣搞突然襲擊的情况以及毛澤東對他們這幾個人的嚴厲批評等，都告訴了于會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問題。于會泳聽了非常吃驚，他感到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回北京後，很快將情况告訴了劉慶棠和浩亮。

于會泳對我在政治上也是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領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朝鮮，這是周恩來總理批准的。回國後，有人編造了一些流言，説毛澤東對徐景賢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國。又説我在朝鮮搞大國沙文主義，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當時，我聽了很惱火，就把這些情况告訴于會泳，意思是有些人對我們這些新上去的幹部總是不順眼，于會泳聽了后對我表示同情，要爲我闢謠，他就和劉慶棠商量，劉慶棠當時在國務院文化組裏分工管電影，由他命令中央新聞電影

制片廠把朝鮮拍攝的彩色紀錄片《讓友誼花朵代代相傳》抓緊翻譯，讓這部影片很快在全國放映。這部影片詳細紀錄了上海芭蕾舞團在朝鮮演出的盛況，有金日成首相接見我和主要演員的場面等。影片在全國放映後，爲我闢了謠，維護了名譽。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一九七三年，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江青提名，于會泳當選爲中央委員，這樣，他就進入了中國最高的政治領導層。他在北京與我一起參加了十屆一中全會。會議一結束，我陪于會泳到北京友誼賓館，當時上海交響樂團和上海合唱團正在那裏排練交響樂《智取威虎山》，我把全體演奏人員召集起來開大會，鄭重地向大家介紹 于會泳是作爲優秀文藝戰士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在江青的直接領導下，他對文藝革命作出重大貢獻，他當選中央委員也是我們全體革命文藝戰士的光榮。我講完后，于會泳也談了他當選中央委員的感想，他那天非常激動。

一九七四年十月，當時阿爾及利亞國務委員會主席布邁丁邀請北京京劇團《杜鵑山》劇組訪問該國。本來，這樣訪問的規格不是很高的，但江青指定于會泳爲團長，這個團的級別就上升了。江青還在對外友協給國務院的有關北京京劇團出訪的報告上批了一段話："過去，球隊、雜技出國，中央都接見，以示鼓勵，這樣的藝術團出國，中央不接見，組長不親自送行，這種安排說明對意識領域的鬥争不够重視，建議中央負責同志接見，吳德同志送行。"王洪文當時是中央副主席，他也批了意見。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九點鐘，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接見于會泳和出訪的《杜鵑山》劇組。于會泳離開北京的時候，吳德到機場送行。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阿爾及利亞，江青委托于會泳以她的個人名義向布邁丁贈送了書籍、圖畫等禮品，還送了一部《杜鵑山》的彩色影片，説明江青對于會泳的出訪重視到了何種程度。

終於當上了文化部長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參加十屆二中全會的預備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議程和政府工作報告，醖釀本屆政府的組成名單。在預備會議

上，周恩來總理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准備讓鄧小平出來擔任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擔任副總理等，在軍隊方面，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毛對鄧、張有兩個指示，對鄧的評介更高："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强。"本來，毛講得更簡略，是"人材難，政治强"。周恩來把它演繹成"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强。"毛對張春橋的評介是："有能力。"比較簡略。醞釀的結果，周恩來還是當總理，鄧小平第一副總理，接下來的副總理是張春橋等人。全會還沒有結束，一天，張春橋春風滿面地到京西賓館上海代表團住的房間來，與馬天水、我、王秀珍談下屆政府組成的問題，他説在政治局討論過國務院各部部長的名單，准備在四届人大的一次會議上確定。討論到文化部長的名單時，周恩來總理説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擔任，張春橋和江青不贊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給張管的，他要管得起來。周總理在會上説："那么我不調徐景賢來，調朱永嘉來，還不行嗎？"當時，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寫作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紅旗》雜志組稿小組主要成員，是張、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筆桿子，張、姚都不舍得把朱永嘉調到北京去。最後，江青提名由于會泳當文化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這樣就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一位副總理領導，當然最后是要請示總理的，但是，大家心裏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這樣，于會泳由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師，因爲在搞樣板戲中緊跟江青，終於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部長。

于會泳當了部長後，表示要與文藝黑綫統治下的文化部決裂，不到文化部大樓辦公，他找了北京一個原東南亞國家駐華大使館的房子作爲辦公地點。他定好後，請我去參觀、吃飯。那天我去的時候，看到那個胡同很寬，走到底是紅漆大門的一個大四合院，門裏是一條石板道，房屋都整修一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裏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裝修，現代化的衛生設備一應俱全，還有暖氣。院子后面，走過月洞門是一個大花園，裏面有石桌、石亭、綠樹、假山，風景很優美。于會泳陪我兜了園林後，就進入一個很精緻的餐廳，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劇演員楊春霞、齊淑芳一起來吃飯。于會泳很得意地告訴我："這個大使館原

來有一個特級厨師，最擅長做北京烤鴨，我接收大使館的時候，把這個厨師也一起接、接收下來了。”于會泳一興奮起來，就有點口吃。吃烤鴨的時候，我故意問他：“你這個部長是屬于國務院的，你今後請示工作，是找周總理呢，還是找張副總理？”于會泳不加思索，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見，我再轉告他們。”以後，文化部長果然不找總理，連副總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願管的時候，她就對于會泳說：“你去找你們的副總理春橋同志，他是分管你們的工作的嘛。”這時，于會泳才會去找張春橋，但轉過頭來又會找江青。張春橋也知道這裏面的錯綜復雜，樂得不管。

于會泳當部長不久，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創業》，描寫大慶工人戰天鬥地的事迹，當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戰綫上的領導。電影拍好後，送北京審查，文化部部長、副部長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間裏審片，在座的還有《創業》的原創人員，如編劇張天民等。影片一結束，于會泳拍腿叫好，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後，很快打電話給我，他說：“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幾部好影片，當時，我正在上海抓電影《春苗》。

過了幾天，江青看片子了，她看了后大發雷霆，指責影片爲劉少奇評功擺好、把原石油部的領導也作爲劉少奇的幹將一股腦兒地批進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嚴重問題。于會泳頓時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長”的十點意見記下來，命令長春電影制片廠修改，否則不准放映。影片的編劇張天民不服氣，寫信給毛澤東。毛看了影片後，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于調整黨内的文藝政策。”這個批示下達的同時，也下達了毛針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江青等人連續遭到毛的批評，馬上就縮回去了，只好由于會泳出面擔當否定《創業》的責任。

我與文化部的關係十分密切，對于會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樣板戲拍成電視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國放映。江青一開始說要把樣板戲拍電視片，要原汁原味地在電視熒幕上拍

攝實況演出的片子，連演員額頭上流汗的鏡頭也要拍下來，我們完全忠實地執行了她的指示。電視片畢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青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于是，在北京、上海將樣板戲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樣板戲以後的《龍江頌》、《杜鵑山》、《磐石灣》等也拍成彩色電影。

第二，幫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創作，或是一齊搞劇本，或是支援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劇《杜鵑山》、《磐石灣》，芭蕾舞劇《草原小姐妹》、《紅嫂》，鋼琴協奏曲《黄河》、《戰臺風》，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樂部，召集一些老藝人和水平比較高的老票友，演傳統京劇、老戲。當時，毛澤東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傳統京劇曲藝節目，我們在上海組織班子，專門給他拍成彩色紀録片，對外不説是爲毛澤東拍片，而是説爲了搶救傳統遺產。這樣，拍了一系列的京劇、曲藝的彩色紀録片。

第四，根據毛澤東和江青下達的任務，我恢復了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翻譯了《簡愛》、《巴黎聖母院》、《鴿子號》、《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萊塢演員嘉寶主演的，毛澤東對嘉寶的演技很欣賞，這部影片是特地爲毛譯制的。還有什么《鐵道兒童》，兒童片，江青看了后，主張中國也要拍兒童片，後來就拍了《閃閃的紅星》。

第五，張春橋到上海來，我陪他參觀了上海電影制片廠，那天張春橋傳達了江青的指示，原話是："給我拉出一個廠子來。"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後，重組了上海電影制片廠，先是練兵，拍了兩個小故事片：《一副保險帶》、《無影燈下送銀針》。接下來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國打得響的先是《火紅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後來又拍了《第二個春天》、《戰船臺》、《難忘的戰鬥》、《歡騰的小涼河》等，重拍了《渡江偵察記》、《年青的一代》，這兩部過去都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還拍了一些兒童片，如《阿夏河的秘密》、《小將》，反映當時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圖書。當時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主編出版了《朝霞》雜志和《朝霞》叢書，還搞了《外國文藝摘譯》等。

第七，在上海恢復了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比較早的招收

學生。另外，還按照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上海辦了"'五·七'京劇訓練班"、"'五·七'舞蹈訓練班"、"'五·七'音樂訓練班"等，培養了一批京劇演員、芭蕾舞演員、音樂演奏員，當時的意圖是培養樣板戲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于會泳兩次向我傳達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寫批判"走資派"的作品，要寫更高級別的"走資派"，更能體現出黨内的兩條路綫鬥爭。上海抓緊把影片《春苗》推上去，《春苗》搞了好幾年，原來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決定在裏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編劇改了幾次還不行，我就叫寫作組下面的電影小組專門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後送到我這裏，我還是不滿意，最後，我不顧自已正在發偏頭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這個基層衛生院的院長説成是從上到下都有一條黑綫串起來的"走資派"，上到衛生部，下到衛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資派"鬥争的内容。我指定謝晋當導演。《春苗》在全國公映后，"反擊右傾翻案風"更猛烈了。于會泳指示文化部的寫作班以"初瀾"的筆名在《紅旗》雜志發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鄧小平。上海的另一部電影《歡騰的小凉河》，也是我決定在影片中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的，于會泳在文化部審片時説，配合得緊、配合得及時。

《春苗》公映后，于會泳從毛遠新那裏得到重要情報，説鄧小平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没看完就大叫"極左！極左！"離席而去。當時，中央已開過打招呼會議，毛澤東已發動批鄧，我們感到這個材料好極了。在初瀾的文章裏第一次把這件事拋出來，以後把它作爲批鄧的重要材料，與"走資派還在走"聯係起來，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們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在一次飯桌上，毛遠新要于會泳積極支持遲群、謝静宜拍一部反映清華、北大教育革命、反擊"走資派"的電影，後來，毛遠新和于會泳一起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馬天水住的套間裏又强調了這一點。于會泳極力支持他們，從討論劇本一直到拍攝，最后完成電影《反擊》。這樣，我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過程中，連續作戰，打了好幾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會泳有一天打電話告訴我，他要作爲中國文

化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十月六日，"四人幫"已被捕，但我們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況，但我們都估計不出來。那天深夜十二時左右，我打電話給于會泳，問他北京有些什么動向，他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通知他，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訪了，是華總理決定的，于會泳覺得很奇怪。我說，中央突然把馬天水找去開會，但內容没有告訴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們在電話裹約好要多聯係，我說："于部長，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時告訴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們不斷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兩天裹面，于會泳和劉慶棠連續向上海打電話，我也要秘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說，"首長"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緊張。我告訴他們，上海與王、張、姚也聯絡不上。于會泳他們最後一次給我們的電話用了暗語："我們幾個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離職反省、隔離審查的時候，看到《人民日報》刊登一篇批判于會泳的文章，說他"罪有應得，死有余辜"。我看後就估計他已經死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會泳在接受批鬥期間，在文化部的隔離審查地點，偷服了厠所裹的消毒藥水，自殺身亡。他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長的生涯。

鄧小平“策反”馬天水

一九七五年，在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他曾經利用陪同外賓到上海訪問的機會，單獨找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作過一次深談，想要把這個三十年代就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幹部，從“四人幫”一伙的圈子中拉出來。可是，没想到馬天水不但不領鄧小平的情，反而馬上把談話内容密報“四人幫”。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開的批鄧打招呼會議上，馬天水還進一步站出來作了揭發，對鄧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擊，把鄧小平搞得狼狽不堪。

識途老“馬”的經歷

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生，河北唐縣人，早年當過小學教員，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抗日游擊戰爭，一九三一年參加中國共産黨，以後在晋察冀解放區從事地方工作。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産和經濟工作；五十年代以後，又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

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圓圓的禿頭使他的年紀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歲就被毛澤東稱爲“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馬老”。馬天水的穿着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脚上穿着長統紗襪和圓口布鞋，不嗜烟酒，是個“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個工廠。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企業他去過的少説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和干部、工人談話，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前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衆中聲望很高。

由于馬天水對計劃經濟下的上海工業生産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離不開他，無論柯慶施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或是陳丕顯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都得倚重他。到了張春橋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以后，還是想到了馬天水。

張春橋的資格没有馬天水老，原來在黨内的地位也没有馬天水高。張春橋是行政八級，馬天水是行政七級 文革前他們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時候，張春橋先當市委常委，再當市委候補書記，但馬天水早已是書記處書記了。文革開始，張春橋憑借江青的推薦和毛澤東的提携，當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馬天水一度對運動影響生産有所不滿，在一九六六年全國工交會議上發過牢騷，當場受到主持會議的林彪的批評。事后，當時已經去了北京的張春橋找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馬老"，唯獨張春橋叫他"老馬"；希望這匹"識途老馬"及早轉彎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寫作班擔任黨支部書記。在和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聯係以后，我在市委機關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幟。當時，姚文元就從北京打保密電話給我，轉達張春橋和他的意見：要我在實施市委"心臟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馬天水從市委的營壘中争取、分化出來。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奪權以后，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衆組織頭頭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馬天水，以輔佐張、姚這兩個"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經濟工作和工業生産。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張春橋在上海全市大會上公開説："馬天水在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方面，没有什么發明創造，人家説什么，他説什么……解放馬天水還有點用處，他打電話（指和各地聯係經濟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張春橋的策動下，馬天水終於站了出來，在全市電視鬥争大會上，義憤填膺地發言，"反戈一擊"，賣力地揭發、批判了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馬天水此舉獲得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贊賞和"造反派"的諒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業生産和經濟工作的重任。

向張春橋、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當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要把張春橋趕下臺時，馬天水挺身而出爲張春橋説話

了。當天晚上，在上海外灘市革命委員會的大廳裏，由我主持召開了一次各群衆組織負責人的會議，馬天水在會上鄭重宣布：春橋同志的歷史我是了解的。春橋同志没有被捕過，没有坐過牢，一天也没有！誰“炮打”張春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無産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馬天水最初連九大代表都不是，會議中途，張春橋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這匹識途“老馬”，便臨時提名馬天水爲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馬天水萬萬没有想到自己還會進入中央委員會，當選以後，馬天水連夜被召到北京參加九屆一中全會。喜從天降，他激動萬分，剛下飛機住進京西賓館，就急忙寫了一封充滿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當面遞交到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手裏。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從上海調至中央，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轎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預備會議期間，在醞釀王洪文進入中央常委領導班子時，馬天水在京西賓館舉行的華東大組會議上，向華東六省一市、南京軍區的負責人介紹說“我和洪文同志相處工作多年，他看問題、處理問題很全面，不是一個衝衝殺殺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覺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後，王洪文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檢查工作，當時擔任市委書記的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在錦江飯店設宴爲王洪文接風。在宴席上，馬天水面對王洪文說：

“我覺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後，進步很大，看問題、講話，都很深刻，很全面，對我教育很大。”這一番話說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來，連連摇頭，表示不敢當。

“他是摇鵝毛扇的人物”

馬天水的種種表現，都足以證明：自從他重新站出來工作以後，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和“四人幫”緊緊地維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來看待鄧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三月，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復出的工作指示，黨中央爲此專門發了文件，决定恢復鄧

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并附發了鄧小平向中央寫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決定向中央發一份電報表示擁護。在討論中央文件時，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馬天水說："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可沒有想到，他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裏搖鵝毛扇的人物，是黨内第二號走資派……這個人我可了解啦，他過去到外地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匯報工作……"

痛罵歸痛罵，擁護中央決定的電報還是要發。市委辦公室起草的電報稿，由馬天水最後修改，把自己的語言曲折地塞了進去，電報寫道：

> 鄧小平同志原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裏搖鵝毛扇的人物，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錯誤并作了自我檢查，現在毛主席　黨中央對他十分寬大，决定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我們表示堅决擁護。

電報經馬天水之手簽發了。過了兩個多月，上海的幾個領導人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遇到了張春橋。張春橋在對馬天水和我們作小範圍談話時，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態電報。張春橋責怪說：

"你們怎么搞的？在電報裏還要提什么資產階級司令部裏搖鵝毛扇的人物。"

馬天水坐在沙發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頭皮，向張春橋老實交代：

"這是我們討論的時候説的……我們對他不大放心……"

"你們真蠢！"張春橋繼續埋怨，"寫一份簡單明了表示擁護的電報不就得了？！你們不想想，電報送到中央要印發政治局以及有關同志，鄧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會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們考慮欠周。"馬天水恍然大悟。

不過，這次張春橋雖然作了批評，但是没有發火，於是馬天水心裏明白：張春橋的想法其實和我們這幾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過那份電報，白紙黑字，寫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罷了。

以後，鄧小平多次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陪同外國貴賓來上海訪問，馬天水和我們便接受那份表態電報的教訓，表面上對鄧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賓以後，鄧小平曾有幾次在上海逗留，順便參觀視察一下上海的工廠企業和重大工程項目。有一次，馬天水陪鄧小平去參觀了金山石油化工總廠，又視察了幾個重點企業，回來以後，馬天水對身邊的人嘟嚷說："鄧小平在工廠裏一股勁地問干部和工人：實行不實行計件工資？他這個人哪，就是老一套。"

馬天水要給毛澤東寫信

周總理病倒以後，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開始着手抓多條戰綫的整頓，工交戰綫首當其衝。鄧小平主張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提到綱上來。這一下馬天水激動起來了，他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任何國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義口號"，"我們上海的鋼鐵生產，就是靠批'唯生產力論'搞上去的"。

鄧小平在全國部分省市工業書記會議上講了關于整頓的講話，傳到上海，馬天水更是睡不着覺了，他嚷道：

"我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不對頭呀！他說工業要整頓，'積重難返'，他把當前形勢說成什么樣子了！還說'矯枉必須過正'，這是要'矯'到哪裏去呀？不是要糾偏嗎？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爲了這件事，馬天水有好幾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說是打算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反映鄧小平講話中存在的"問題"。正在這個時候，新華社上海分社從北京傳來了毛澤東的一個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審的關于新華總社反對經驗主義的宣傳請示報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接着，毛澤東把筆鋒一轉，寫道：

"我看真懂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爲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

爲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我趕緊把這個批示轉給馬天水。馬天水看到了毛澤東的批示，心中一驚，因爲這個批示，分明是針對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次報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關于反對經驗主義的論斷而發的；至于批評"動不動就訓人"的那段話，不就是指的江青嗎？毛澤東爲什么做出這樣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發生過一些什么事呢？……馬天水和我都吃不准，也不便問。于是，馬天水想起了那個"搖鵝毛扇"的電報的教訓，决定看一看形勢再説，終于把給毛澤東寫信告鄧小平狀的事，暫時擱了下來。

王洪文親自打來電話

當然，馬天水的這些背后表現和心理活動，鄧小平并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實際上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鄧小平對馬天水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是估計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對這個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幹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種"挖墻脚"，想要把馬天水從"四人幫"的營壘裏分化出來，争取過去。但是，鄧小平萬萬没有想到，這次行動給他帶來了十分麻煩的后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鄧小平陪同菲律賓貴賓從北京抵達上海訪問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馬天水辦公室内紅色保密電話機的鈴聲響了。電話是王洪文從北京親自打來的。

"馬老嗎？明天鄧要陪外賓到上海，他可能會找你談話，你要有所准備……"

"他要找我談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備……"馬天水有些着慌，因爲他對鄧小平此行的目的確實不了解，中央政治局發生過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從王洪文那兒摸到一些底細，以便確定自己的態度。

"反正你准備一下學習毛主席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的材料，着重介紹上海的經驗，向他作口頭匯報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談……"王洪文避開馬天水所要打聽的敏感問題，只給他出了這么一個主意。

"好的……那我准備一下……"馬天水遲疑地挂斷了電話。王洪文

的事先警告，使這四"識途老馬"更加忐忑不安起來。

鄧小平找馬天水密談

六月十二日，鄧小平果然到達上海。傍晚時分，剛把陪同了一天的外賓送走，鄧小平就叫秘書打電話通知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園鄧的住處去一次。

在客廳裏，燈火通明，賓主就座，服務員端來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發上只剩下鄧和馬兩個人。馬天水先寒暄了幾句，問候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接着，鄧小平開了腔：

"馬老哪，你們最近在抓什么？……"

"我們，重點在抓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把它提到綱上來，樹了幾個典型……"馬天水把事先准備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匯報起來。

可是，鄧小平對此没有多少興趣，聽了片刻，就不耐煩地打斷馬天水的話：

"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應該跟你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有人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一個批示，你知道嗎？"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訴你的？"

"這個……"馬天水猝不及防，來不及編造，只好如實奉告，"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開會傳回來的。"

"你想過没有？他們要批的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誰？"鄧小平兩眼盯住馬天水的臉，拖長了聲音慢悠悠地説，"再發展下去他們就要揪人囉"鄧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説得很重，馬天水嚇了一跳。

"這……我倒不知道……"馬天水聽鄧小平越講越露骨，只好故意裝傻。

"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因爲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對這種大事要注意。"鄧小平側身看看馬天水，向他進一步交底"他們搞批林批孔，'三

箭齊發'。有的人還講：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綫鬥争的開始。這是什么意思呀？你聽説過沒有？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這又是講的江青呀！因爲他清楚地記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説過關于十一次路綫鬥争的話。現在情况越來越復雜了，鄧小平不但直指張、姚，而且把江青也牽出來了。馬天水下定决心，緊閉嘴巴，絶不表態。

"現在報紙上老是批'唯生産力論'，誰還敢抓生産呀？還有，把什么都説成是資産階級法權，真是荒唐，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産階級法權，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站得住脚嗎？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什么好處？你有沒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陳伯達的'唯生産力論'，生産還是上去了……"馬天水不便正面反對，只是在喉嚨裏咕噥了一句。

鄧小平朝旁邊茶幾上的烟缸裏彈了彈烟灰，轉了一個話題，故意問馬天水：

"你在北京有沒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馬天水一時摸不着頭腦。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鄧小平繼續問。

"我跟他們可熟了……"馬天水還是猜不透鄧小平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么藥。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鄧小平終于把最關鍵的話説了出來。

"嚇，原來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橋、文元和洪文。我能這樣做嗎？"馬天水畢竟是有着長期鬥争經歷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裏想的口裏就是不表態。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過去在經濟工作方面有事也經常找他的"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把最核心的問題回避了過去。

鄧小平和馬天水的個别談話，到此結束。

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

馬天水告辭主人出來，天色已經昏黑。他臉色蒼白，出了一身冷汗，連頭上帽子的邊沿，都是濕漉漉的。他乘上轎車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獨自一人在小禮堂的地毯上來回轉圈子，連晚飯都顧不上吃。他不斷捉摸着這次談話的含意，又不斷思量着自己的態度和對策。

思忖了許久，他終於找了我和王秀珍兩個人，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情況和盤托出。他把過程詳細地談了談，情緒顯得非常激動，聲音都有些發抖：

"鄧的講話可成問題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劉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還攻擊江青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綫鬥争的開始'，我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馬天水越說越氣憤，連唾沫星子都飛了出來：

"我没有順着他的意思講，他就對我不滿意，這么晚了，連晚飯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餓着肚子回來……"

"唷，馬老，當心你的糖尿病發作。"王秀珍關切地說。

"他這次來，是有目的的，就是想來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們，就找我這樣的老幹部。他說他知道王秀珍，過去當過勞動模範，現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說對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機關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們，只找我，誰曉得我的立場很堅定，他拉不過去的，'挖墻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這樣的老幹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馬天水說到這裏，又得意起來，用他的習慣動作摇起了經常帶着的黑折扇。

"馬老，鄧小平對你估計錯誤……"我當面替他鼓勁。

"上次文元同志講，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我一直在想究竟會有什么事，"馬天水想起了幾個月前姚文元的預言，"現在看來，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鄧小平身上。他還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報告中央！"馬天水急着想寫報告，"告他拉攏人，搞非組織活動，要挖上海的墻脚……"

過了幾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馬天水馬上趕去，密報了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詳細情況。

姚文元聽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說：

"我早就講過今年下半年要出點事情……馬老，你頂得對！對錯誤

的東西就得頂！"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馬上把情況捅給了張春橋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來到了上海，住在東湖路七號招待所，馬天水又趕了去。王洪文已經知道了全部情況，但仍要馬天水詳細復述一遍。聽完以後，王洪文贊揚說：

"馬老頂住了，頂得好！……有人說什么毛主席批評了我們幾個，全是造謠。這些謠言，是衝著文化大革命來的！"

馬天水向王洪文請示下一步怎么辦。王洪文叮囑說不要急，看看再說。

批鄧的"重磅炮彈"

過了一段時期，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把鄧小平"右傾翻案"的問題提出來了。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內容，作了詳細的回憶。他花了幾天幾夜的時間，和秘書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記錄，然后一字一句地讀給我和王秀珍聽，讓我們補充、修訂。最後，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鄧小平與馬天水談話記錄，直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這份紀録，立即報送毛澤東，同時作了批語："印發政治局各同志"，作爲批鄧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興奮地告訴馬天水：

"馬老，你及時送來了'重磅炮彈'！我批給政治局了，在會上當着鄧的面讀了一下，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和我連續向他開火，批得鄧沒話可說……"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找到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批判黨內資產階級"的十二條指示。上海去參加會議的是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會議剛開始的第二天晚上，張春橋就專程來到京西賓館馬天水住的套間裏，給馬天水等人鼓勵打氣。張春橋說：

"你們在上海時，氣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沒有氣了？我看了會議簡報上你們的發言，對鄧似乎都恨不起來。……這是路綫鬥爭，爲什么

想不起來呢？鄧的社會基礎很大，要恨得起來。你老馬也没有氣了，鄧不是對你‘策反’嗎？爲什么在會上不講呢？”

經過張春橋的鼓勵，馬天水就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在當天晚上的會議上就跳起來發言，義憤填膺，連揭帶批，端出了鄧小平對他進行“策反”的全過程，痛罵鄧小平搞非組織活動，“挖墻脚”，分裂黨。

會議秘書處有專人做了記録，第二天把馬天水發言登上了會議簡報。馬天水的發言確實氣兒大，火力猛，上綱上綫，而且現身説法，有根有據，給了鄧小平致命的一擊。

馬天水的這次發言，使張春橋感到很滿意。

批鄧打招呼會議結束以前的一個下午，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臺，在他住處的二樓會客室裏作了一次密談。張春橋那天的情緒很好，一反平時嚴肅的樣子，輕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説：

“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經給你們吹過風了，中央考慮把老馬調到北京，負責國家計委的工作。老馬走后，由誰主持上海的工作，請你們考慮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過去的幾屆國務院部委負責人中，凡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一職，都是由國務院副總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總理，都兼過國家計委主任。所以，這次馬天水要是當上國家計委主任，以后在國務院領導人選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

馬天水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話，急忙表態：

“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張春橋在烟灰缸裏用力掐滅了烟頭，干脆地説：

“這件事中央已經定了！”

馬天水瘋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門事件中，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内外一切職務，而馬天水，因爲揭發鄧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澤東病重，九月毛澤東逝世，十月“四人幫”被隔離

審查，馬天水的“榮升”之夢破滅了。

揭批“四人幫”揭到了馬天水頭上，可是他還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上海的一次批鬥大會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經驗教訓勸慰和告誡我和王秀珍說：

“這是路綫鬥爭，檢查時態度要好，帽子要大，內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經驗，不久就會站出來的。”

但是，這一次馬天水徹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來了：

一九七七年初，馬天水被停職審查。

在中國共産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馬天水被宣布爲“四人幫”死黨。

一九七八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這一下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瘋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于一九七八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醫院。在治病期間，他叨念着上海閔行的電機廠、汽輪機廠、重型機器廠，牽挂着吴涇的熱電廠、金山的石化總廠……在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業戰綫，他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馬天水死于上海顚橋精神病醫院，時年七十六歲。

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在所有的"革命樣板戲"中，江青過問得最少的就是芭蕾舞劇《白毛女》。可是，她不"問"則已，一"問"驚人，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

漠不關心　江青對舞劇《白毛女》無興趣

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會上，上海市舞蹈學校獻演了新作芭蕾舞劇《白毛女》，引起轟動。以後，他們又傾聽了領導和觀衆的意見，反覆加工，精益求精，使這部舞劇日臻完美。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松山芭蕾舞團也在日本演出了芭蕾舞劇《白毛女》，并由主演者松山樹子女士率團到中國來作訪問演出，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中日兩國文藝工作者同時演出兩臺芭蕾舞劇《白毛女》，在海内外舞臺上交相輝映，一時傳爲美談。

在芭蕾舞劇《白毛女》的創作和演出過程中，江青不僅没有做任何貢獻，而且也没有表示過一點興趣，以致文革初期，在上海市舞蹈學校内還發生過芭蕾舞劇《白毛女》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的争論。這也足以證明舞劇《白毛女》的創作和演出與江青無干，不然，誰敢在當時直接把争論的矛頭指向"文藝革命的旗手"呢？

見風使舵　貪天之功據爲己有

不久，這場關於《白毛女》是香花還是毒草的争論反映到黨中央。一九六七年夏，毛澤東同意觀看芭蕾舞劇《白毛女》。這可是一件大事，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成員陪同毛澤東觀看了上海市舞蹈學校的演出，江青自然也在場。毛澤東不但肯定和贊揚了芭蕾舞劇《白毛女》，還親自上臺和演員們握手、合影。于是，《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聞紀録電影製片廠還拍

攝了紀録片《紅太陽照亮了芭蕾舞臺》，在全國放映。

江青一看芭蕾舞劇《白毛女》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就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公開宣布芭蕾舞劇《白毛女》是全國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之一，把它歸入了自己領導“文藝革命”的功勞簿。此後，芭蕾舞劇《白毛女》的唱片公開出版了，全劇的録音在全國播放，舞劇先是拍攝成黑白的電視紀録片，接着又攝制成彩色的舞臺藝術片，在國内外放映。每當有重要的外賓來訪，到上海幾乎必看《白毛女》。舞劇中的喜兒和大春等，也成了全國家喻户曉的人物。

突發奇想　强令改成兩人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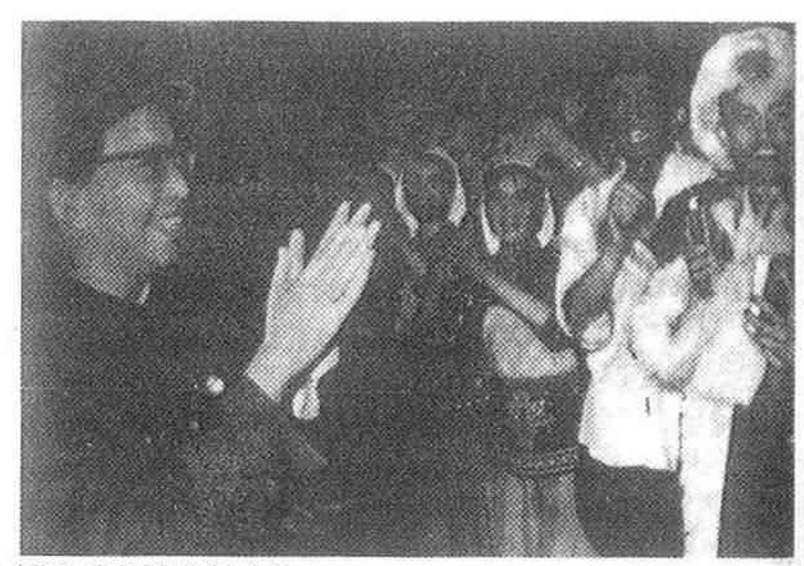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四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團携帶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訪問朝鮮、日本。周恩來總理指定由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我任訪朝團團長。

我率團到了北京，適值秘魯共和國的總統夫人來訪，周恩來决定請總統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劇《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橋劇場舉行了專場演出，周總理坐在總統夫人的左側，江青坐在總統夫人的右側，我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記録。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裏還拎着一只白皮包，顯得容光焕發，非常突出。她不顧坐在一旁的周恩來，逕自和總統夫人侃侃而談。

江青說：“毛主席提出文藝要‘洋爲中用’、‘古爲今用’，我們搞了一場文藝革命。像芭蕾本來是歐洲的宫廷藝術，我們却把它拿來表現工農兵的鬥争生活，同時提倡芭蕾藝術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今天的這個革命現代舞劇《白毛女》是我抓的，請您看後多提意見。”

劇場裏的燈熄了，音樂響起了，大幕拉開了。可是，從來不過問舞劇《白毛女》的江青，今天却喋喋不休地作起“指示”來。她一會兒說，楊白勞家小屋后面的那棵大樹布景，畫得太簡陋，要重新畫過；一會兒又批評說，整個樂隊的聲音太響，在舞臺和觀衆之間築起了一堵“音墻”。她當着總統夫人的面，指揮我立即趕到樂池裏去，叫整個樂隊壓



江青接見"樣板戲"的演出人員。

低音響。

看到下半場，江青見"白毛女"在風雪交加中掙扎、在奶奶廟與黃世仁等搏鬥，她忽然對我說："我在想，喜兒不應該一個人上山，可以讓兩個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這樣戲裏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鬥了，她可以通過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聯係，山下的鄉親也可以更多地關心和支援她……這樣吧，你們要劇組搞一個兩人上山或幾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訪回來以后就進行修改，改了以後我再看。"

矛盾百出　越改越糟難以收場

我當場記下了江青的"指示"，沒有馬上向劇組傳達，而是去找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浩亮、劉慶棠商量。誰知道江青在看完戲回去以后，也已經向國務院文化組下達了"兩人上山"的修改"指示"。他們幾個人一謀面，議論了幾句，都感到爲難。因爲，原歌劇《白毛女》是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誕生的經典作品，以後曾拍攝成電影在全國放映，現在又改編成芭蕾舞劇在海内外廣泛流

傳。不管是哪一種文藝樣式的《白毛女》，都是以喜兒受迫害後孤身一人出逃、在荒山野嶺歷經艱險、最後獲得八路軍的解救作爲故事的主要發展綫索的，它體現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深刻主題。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兒和女伴兩人或多人上山，不但廣大觀衆接受不了，而且把《白毛女》的那種傳奇色彩、詩意氛圍以及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應和地主漢奸展開游擊鬥争的老套戲劇。凡是懂得一點文藝的，都會知道江青的主意實在是一個損害原作、傷筋動骨的餿主意，毫不可取。

我和于會泳等人不敢違抗江青的旨意，便去向張春橋匯報，想讓張春橋出面轉圜。可是張春橋説："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告訴劇組，讓他們先拿出一個修改方案來！"過去，張春橋多次强調過："在文藝革命方面，我只能搞'一言堂'，聽江青同志的。"這回，他把"皮球"直接踢給了《白毛女》劇組。

我拉著于會泳、劉慶棠等人，把江青的"指示"給劇組的編創人員作了傳達。於是，上海舞劇團從朝鮮、日本出訪回來，就被留在北京，按"兩人上山"的意見搞修改方案。

劇組的編創人員在設計修改方案時，遇到了許多困難。我回上海去了，他們只好去找于會泳和劉慶棠，請示江青。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體：

關於"兩人上山"，喜兒究竟和誰上山的問題。江青説，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設一個丫環，留下服侍黄母的那個叫小紅，和喜兒一起出逃的就叫小蘭，她們共同商量逃出魔掌（這樣一來，舞劇中蘆葦叢裏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驚險情節無法保留了）。

關於逃上山后兩個人的頭髮是否都要變白的問題。江青煞有介事地説，這個很簡單嘛，一個可以變白，一個可以變灰，人和人是不一樣的，她們在山上還可以互相照應（這樣一來，舞劇中喜兒只身與風雪搏鬥、頭發漸漸變白的精彩獨舞都得删掉）。

那么，兩個人上山以后奶奶廟的戲怎么演？八路軍怎么會在山洞裏找到喜兒的？江青又"指示"説：奶奶廟裏兩個人遇到黄世仁和穆仁智，可以開打嘛；讓小蘭下山向八路軍通風報信，大春可以寫信給喜

兒，最后大春到山洞裏去找到喜兒（這樣一來，奶奶廟中喜兒的刻骨銘心的仇根、黄世仁等見到“幽靈”後的驚顫和恐懼，以及大春和喜兒在山洞中相遇相認等精彩場面還能留下嗎）。

劇組的編創人員實在是勉爲其難，他們拿出了修改方案，可是江青却不審查修改本，説是要看演出。於是，整個劇組二百來人，在北京西苑賓館留了半年左右，排練修改本；夏去秋來，秋去冬來，不准演員回上海，夾衣棉衣都是派專人送去的，一切都爲了修改好“兩人上山”。可是，等到臨了，忽然傳來江青的一句話，説是“没有空看了”，叫劇組回上海去，等以後江青到上海時再看。

折騰數年　《白毛女》才重見天日

《白毛女》劇組回上海以後，繼續修改這個永遠也改不好的舞劇，嚴重影響了其他舞劇的創作和排練。我怕江青真的來上海審查，一連看了多次“兩人上山”的内部演出，作好匯報准備。但江青終於没有來，張春橋倒來了。我趕緊請張春橋審查。張春橋看了戲，明知改得不像樣子，可是他不表態，只是説：“等江青同志看後再定。”

這時，又有外國元首要訪問上海，接待計劃中有在上海看舞劇《白毛女》的内容。我着慌了，趕緊請示張春橋：演老版本還是演新版本？張春橋回答：演老的。於是，全劇組手忙脚亂，重新返回去排演老版本，招待外賓。過了不久，于會泳和劉慶棠等來上海，檢查江青“指示”的落實情況，劇組又調頭排演新版本。

如此改來改去，折騰了數年之久，把編創人員和演員們都折騰苦了。可是，江青終於没有再來上海，“兩人上山”也終於没有上成。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被捕以後，《白毛女》才從“兩人上山”的桎梏中獲得了解放！

王洪文怒砸“萬體館”

上海作爲全國最大的城市，經常要舉行一些國際性的體育比賽。可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上海的體育場館設施太落後，特别缺乏一個舉行室内比賽的體育館：江灣體育場遠離市中心，交通不便；位于陝西南路的原上海市體育館，是解放前留下來的建築物，場地狹窄。因此，建造一座具有現代水平的規模宏大的新體育館，就成了廣大上海人民的一個心願。

周恩來批准　建造“萬體館”

周恩來總理體察上海人民的心意，在他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雖然國家財政比較困難，但他還是批准了撥款數千萬元人民幣，給上海建一座新的體育館。這個喜訊鼓舞了上海的建築設計師和建築工人。他們吸取了北京體育館的長處，決心建造一座設計更爲合理、造型更爲漂亮的體育館，來顯示上海建築藝術的水平。北京體育館是長方形的，縱横的視野距離不均等，上海的設計改爲圓形的，四周座位上觀衆的視綫，可以用同樣的距離投向比賽場地。

設計、征地、拆遷、施工……一切都有條不紊地以高速度進行着。在上海徐匯區漕溪北路旁邊的開闊地上，一座壯觀的圓頂龐然大物，很快地高高矗立起來。這座體育館造好以後，足足可以容納一萬八千名觀衆。上海人喜歡把這座體育館叫作“萬體館”。

王洪文插手　夜闖“萬體館”

王洪文得悉周總理批准建造這座體育館，馬上表示十分“關切”。自從他到北京工作以後，每次有機會來上海，總要到體育館建築工地去張望一番。一九七四年，他從北京到杭州去，路過上海，已經夜深了，他突然提出要去看看“萬體館”。王洪文要“親自視察”，上海市委書記

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當然唯命唯謹，全體出動，全程奉陪。

工地上連夜在趕工，各種各樣的照明燈具射出耀眼的光芒，建築機械的轟鳴聲、冷泵槍的錘擊聲、運輸車輛的喇叭聲……交織成一首喧鬧的樂曲。王洪文一行下了車，看到工交口的負責人、市委常委黄濤，帶了建工局的一批領導迎上前來。黄濤那油光光的禿頂，在白熾燈的映照下，顯得分外的亮。自從這項工程開工以來，黄濤一直不敢怠慢，他知道這是周總理批准的重要項目，王洪文又直接過問，所以他自已親自掛帥，三天兩頭到工地來，從設計圖紙到建築材料，從施工進度到內部裝修，事無巨細，他都專題向王洪文和市委報告。王洪文一有批示，他立即"照辦"。

這天晚上，懸吊鋼梁網架成功的"萬體館"剛剛封頂，內部施工正在緊張地進行，無法入內進行參觀。王洪文一行就沿着體育館的高聳的外墻繞了半圈，站定下來，聽取一位工地指揮高聲匯報施工進度。最後，輪到王洪文作"指示"了，他噴了一口烟，拿腔拿調地説：

"萬體館工程進展很快，搞得不錯，我很高興……這個工程，是我向總理爭得來的，不容易呀！你們一定要保證質量，提前完成任務。等到內外裝修都基本完成的時候，我要來驗收的！"

"副主席"驗收　倪志欽陪審

果然，一九七五年萬體館的建設進入收尾階段的時刻，王洪文借着陪外賓訪問上海的機會，正式對這項工程進行"驗收"了。他不但自己要去檢查工程的質量，而且叫秘書連夜打電話到北京，要國家體委馬上派出專家小組趕來上海，和他一起全面驗收。

國家體委接到王洪文的通知，當即派了當時在體委擔任局長的前我國跳高冠軍、曾經打破跳高世界紀録的倪志欽，帶了幾個體育場館專家，趕乘飛機前來上海，聽從王洪文的指令。

一天下午，王洪文帶了馬天水、我、王秀珍以及一大批隨從，直奔萬體館工地。倪志欽率領的體育場館專家工作組，早已在現場等候。驗收照例由市委常委黄濤陪同進行。王洪文從體育館的南大門進門下車，

開宗明義第一句話，還是老話："這個工程是我向總理爭得來的，不容易啊！非搞好不可……"

接着，他帶着一群人逐個臺階、逐個廊柱、逐廳逐室地進行"驗收"。對整個體育館的外觀和整體結構，王洪文總算點頭"嘉許"。在當時的條件下，像這樣雄偉而又現代化的體育館，在國內是僅有的；而且，體育館的圓形結構，照顧到了大多數觀衆的視綫，較之長方形的體育館設計更爲合理。倪志欽與專家工作組，對這一點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黑色不吉利　大方柱遭殃

王洪文一行向左側拐彎，步入體育館外圈的環式長廊。長廊的外部是大型有色玻璃鑲成的體育館外墻，長廊的内部有許多通向賽場入口處的門洞。整個長廊采光明亮，穹頂高爽，用三十六根巨型方柱支撑着，形成一個氣宇軒昂的圓環形的甬道，把整個賽場環抱起來。

這條長廊的地坪是碎花水磨石子做的，而三十六根頂天立地的柱子四周，從上到下飾以黑色的大理石。立柱、穹頂和地坪的色調對比十分諧和，特别是光可鑒人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立在那裏顯得凝重和端莊。這條環式走廊的結構和色調設計，建造前經過市委常委會的認真討論，黄濤曾經把各種色彩和紋理的大理石樣品，帶到常委會會場上請大家過目，最后確定用黑色大理石，并報經王洪文批准。

可是，當此刻王洪文走過這些大理石立柱的時候，他突然停住脚步，皺起眉頭，仰首斜睨着黑色的柱子，用很不滿意的神情，咂着嘴巴説："嘖！這種黑顔色的大理石不好看！"

"上次……拿了好多種顔色的大……大理石，給常委們挑選，最……最后還是决定采用純……純……純黑的，比較莊重！"黄濤一緊張，答話就開始結巴。

"莊重什么？看上去黑不溜秋的！"王洪文不耐煩了。

"選用黑色的，主要考慮到與周圍的環境和色彩比較協調。"工程總設計在一旁插話，他想用美學原則説服王洪文。

"黑的才不協調呢！我看用淺灰色的大理石好！"王洪文才不理什

麼勞什子美學呢! 仍固執己見。

"對……黑顏色看上去是不大吉利。"跟在後邊的王秀珍出來爲王洪文幫腔了。

"洪文同志啊, 三十六根柱……柱子, 現在已……已經差不多全部鑲……鑲好了! "黄濤發急了, 光禿禿的腦門上沁出了顆顆汗珠, 他用手指指前方的柱子。

大家抬頭望去, 只見在最後一根方柱的高高的脚手架上, 有三、四個工人正在緊張地操作, 他們把剩下的不多幾塊黑色大理石片, 小心翼翼地鑲嵌黏合到柱子的頂部, 整個裝修工作已經接近尾聲了。

王洪文把嘴一撇, 把烟頭丟在地下, 用脚狠狠地踩滅, 惱怒地狂叫起來: "我早講過了, 要保證質量! 鑲好了又怎么樣? 通通敲掉! "

好家伙, 好大的口氣。三十六根大柱子, 這么多人工, 這么多大理石、這么多錢, 他全不放在眼裏, 説敲就敲。

黄濤無計可施了。這個搞了幾十年工業的老頭, 實在是有苦説不出: 柱子上鑲嵌黑色大理石, 是事先報告王洪文并經他親自同意的, 現在他却出爾反爾。辦事一向謹慎小心的黄濤, 如今却只好打落門牙往自己的肚子裏咽。他擦擦額上的汗珠, 抬了抬黑邊眼鏡, 兩只鼓鼓的眼睛巴巴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馬天水, 求助地説道: "馬老……你看……這個? "

"嗯……嗯……" 馬天水却王顧左右, 晃動着他那終年戴着鴨舌帽的巨大腦袋。他明明知道黄濤呼喚他的原因, 也只有他馬天水此刻站出來説幾句婉轉的話, 才有可能保全這三十六根大柱子。可是, 他竟然隨聲附和王洪文 "我看——洪文同志已經説了, 就照洪文同志的意見辦, 全部敲掉重來算了! "

三十六根柱子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 由于王洪文的淺薄和專横, 由于馬天水的恭順和諂媚, 三十六根柱子上鑲嵌着的黑色大理石, 眼看就要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設秘密看臺　圖幾人方便

王洪文一行從環式長廊穿過一個特設的暗門, 走上一座螺旋形的梯

子，攀登到約兩、三層樓的高度，便到達特意爲首長們建造的秘密看臺。秘密看臺連着共有三間，造在賽場高處的後牆外邊，在牆上開鑿出一排視野開闊的窗洞，鑲上茶色玻璃。

首長們坐在玻璃後邊的看臺上，十分隱蔽。因爲賽場和觀衆席上的光綫明亮，而秘密看臺裏的燈光幽暗，觀衆們根本看不清在墻上的深色玻璃後面，究竟是些什么人。在首長們就座的每間看臺裏，可以放五、六把舒適的軟椅，前面安着的小桌子上，放着烟缸和服務員端上來的茶水、毛巾等。坐在椅子上，一邊抽着烟、呷着茶，一邊居高臨下地觀着比賽，整個賽場盡收眼底，實在是很愜意的事。

建造這座秘密看臺，也是王洪文的主意，當然得到了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的熱烈讚同。因爲在上海舉行的國際比賽和演出活動越來越多，可是什么樣的國外代表團來訪、表演，由什么樣身份的人出面觀看，都是由外事部門按規格排定的。領導人不能憑自己的愛好隨心所欲地到場，更不能隨意登上場内的主席臺，這都有外事紀律管着，胡來不得。

最令王洪文扼腕的一次，是中日兩國建交以後，日本大相撲隊訪問上海作表演賽的那個晚上，王洪文和市委其他領導人幾乎都想到現場去，親眼看一看這種聞名已久、新鮮刺激的表演。可是，外事部門規定的接待規格，只需要一位分管體育的副市長級領導人出面觀看。王洪文等人心裏癢癢的，只能留在康平路看電視實況轉播。等別人回來談起許多趣聞，如相撲手食量驚人等等花絮新聞時，王洪文瞪大了眼睛備感遺憾……

這些，就是促使王洪文主張在建造新體育館時設計一座秘密看臺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視察和"驗收"體育館工程的過程中，秘密看臺就成了最令王洪文感到舒心和滿意的項目。他到秘密看臺的裏裏外外，看了又看，贊不絕口；馬天水、黄濤等人也爲自己得力地實現了王洪文的意圖，一個個臉上綻開了笑容。後來，當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到上海小住期間，他果然充分利用了這座秘密看臺，不僅自己來看，而且還請了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一起到這裏觀看國際排球比賽、體操表演等，而絲毫沒有被場内的外賓和一般觀衆所發現。

巍巍主席臺　下令全砸掉

視察完了秘密看臺以后，王洪文率領着一行人來到賽場的中心。上海體育館的設計構思，是要把這座建築物形成一個多功能的場館，既能在這裏召開全市性的大型集會，又能舉行正規的國際比賽，還能在場地上搭臺作多種精彩的文藝演出。在賽場的南側，建起了一座寬敞高峻、氣勢恢宏的主席臺。中心臺上是幾排梯形的特設座位，兩側是兩個副臺，共同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看臺，可以安得下一個龐大的主席團。主席臺上鋪着華貴的地毯，前排座位前放着長條桌子；中心臺左右有兩個單獨的通道，既可以通向外面的貴賓休息室，也可以直接進入賽場。主席臺的後部和兩側，都築起了環抱形的高高的護墻，和一般觀衆席隔離開來，便于做好首長和外賓的保衛工作。

對於這樣一座主要是供領導人"亮相"的主席臺，王洪文當然倍加注意。早在設計和建造的過程中，他就一再叮囑要把主席臺造好，造得有氣派。如今，初具規模的主席臺確實氣勢非凡。據設計人員介紹，整個主席臺的臺基，就比中央場地高出一米三十；從臺基逐級上升的一排排主席臺座位，顯得寬敞而高峻。在場地中央必須抬頭仰望，才能看到主席臺頂部的水泥護墻。整個主席臺呈扇面成樓狀，它的橫寬和縱深，都超過了北京體育館的主席臺。當初在設計和建造的時候，王洪文就授意要處處超過北京體育館，理由是："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體育館當然要造得大！"

正當大家在觀賞這座不平凡的主席臺的時候，王洪文却又蹙起眉頭，他瓮聲瓮氣地拖長了聲音，叫住了國家體委派來的倪志欽："倪志欽同志呀，你看……這座主席臺怎么樣呀？"

"我看……挺不錯……挺好的……"倪志欽吃不准王洪文的意圖，如實回答。

"好在哪裏呀！？"

"這個主席臺……比北京體育館的……要大……"

"大是大了些，可是，造得太低了，沒有氣派！"王洪文明確表態了。

"這個……"倪志欽一時爲之語塞，他掉過頭去問黄濤："主席臺離

地面多高？"

"臺基離地面一米三十，后邊的座位再逐步升高，整個主席臺比對面教練員、新聞記者坐的工作臺，要高出好幾公尺……"黄濤預感到新的麻煩又要降臨了。

"怎么能跟對面的工作臺比較呢？"王洪文一聽火氣就上來了，他用手朝主席臺一指，"這么低的主席臺，將來叫中央首長怎么上臺？連一點氣派也沒有！我早就告訴過你們 要特別注意造好主席臺，要造得有氣派，可你們就是聽不進去，現在造得這樣糟！……倪志欽同志啊，你看怎么辦？"

身材高大的"跳高冠軍"看見王洪文發火了，只得附和："是呀，是呀，中央首長要登臺，主席臺是要造高一些！"

其實，北京體育館的主席臺，造得比上海的低，周總理等中央首長還不是經常登臺的嗎？可是，在場的人誰也不敢在王洪文面前道出真相。

"洪文同志，關于主席臺的高度我們還是重視不够，這一點我要負主要責任……"黄濤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他竭力想挽回局面，"不過，現在主席臺的地坪已經全部澆好了，安放座位的幾排水泥臺階也做好了，主席臺和觀衆席隔開的左、中、右三堵護墻，是用鋼筋水泥築起來的，現在已經基本竣工。你看，是不是可以大體定局，將來我們在布置主席臺的時候，再想辦法把桌子、椅子都墊高，這樣可以彌補高度的不足……"

"小家敗氣幹什么？萬體館工程是百年大計，要搞就搞得好一些。"王洪文根本聽不進去，他把手一揮，對大家説："走，我們上臺去看看。"

大家隨王洪文從賽場中心登上主席臺，觀看了澆好的地坪，跨上了水泥臺階，再用手摸摸圍在主席臺後面的護墻。爲了保衛首長的安全，三面護墻就像長城一般，造得特別牢固，全部用鋼筋水泥澆鑄而成，厚度足足有幾十公分。

王洪文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了。他掉過頭來，站到主席臺中央，俯瞰着全場，大有君臨天下的氣勢。他向四周掃視了一圈，皺了皺眉頭，最後下了決心："我看——主席臺還是太低。我們要從政治上着眼，這裏將來是供中央首長到上海時派用場的，因此不能和普通的主席臺相

比，還應該加高，我看至少要加到一米七十或者一米八十……"

黄濤的禿腦門急得幾乎要冒烟了：要是整個主席臺的地坪、座基和臺階都要加高五十公分，這等于重造一座新臺。

"這個……洪文同志，前面地坪加高的話，后面的護墻不好辦呀，它是用鋼筋混凝土澆死的哩！"

"那就返工，通通砸掉，重新做！"王洪文又斬釘截鐵地叫了起來。大家面面相覷。旁邊正好有幾個工人，正在做護墻的掃尾工作，聽到這個話，都驚呆了！

黄濤急得連忙和馬天水咬耳朵，馬天水頻頻點頭，看得出他也是不讚成砸主席臺的。這時，久不開腔的馬天水，終于出來説話了："洪文同志……主席臺升高是必要的，我們再另想辦法吧！不過……後面的護墻是不是就維持現狀，暫時不敲了？因爲……護墻再要升高的話，還得擋掉緊挨着主席臺的一大片觀衆座位。你過去有過指示，這裏的觀衆席要超過北京，現在正好是一萬八千個座位，再升高護墻，座位數就要減少。所以，我看……護墻還是保留着吧……"

"那不好看嘛！主席臺要墊高，護墻如果不升高，就顯得更矮，更加没有氣派了！"王洪文固執己見，連馬天水的面子都不給，"你們怕什么？搞建築就是要從整體上考慮嘛，我説了就由我負責，主席臺全部砸掉重建！倪志欽同志，你們國家體委小組拿一個意見出來嘛！"

"我們……我們讚成王副主席的意見。"倪志欽囁嚅着，"主席臺整體可以……可以升高到一米七十左右……"

"還是你們體委的專家有眼力。"王洪文大爲高興，立即下達命令，"我看這樣吧，請你們馬上給我寫一個書面報告，把升高主席臺和重鑲大理石柱子的理由都寫上，作爲你們的建議提出來，我再批給有關同志圈閲一下……"

王洪文門檻很精，他知道基本建設重大工程的施工和返工都要下達書面文件，現在他把球輕輕一踢，又把責任轉嫁到國家體委的專家小組身上……

新館落成後"過癮"只一次

一場視察、“驗收”活動就這樣結束了，王洪文臨去北京前還特地關照：“萬體館”的改建工程要抓緊進行，争取近期内完成，到時候他還要來上海……

在場的人都清楚：什么“中央首長到上海時要使用”，説穿了就是王洪文自己來上海的時候登上主席臺逞威風。因爲毛主席有病，周總理卧床，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而張春橋、姚文元本來對建造體育館的事情就不熱心，剩下的就只有王洪文一個人登臺表演了。爲了他自己出風頭，不惜浪費多少工人的勞動，不惜糟蹋多少國家的財産!

就在王洪文即將砸毁萬體館的設施之際，張春橋接到一封來信，他生怕這件事鬧到中央去，特别是鬧到周總理那裏去，就不好辦了。他就在國家體委倪志欽他們的書面報告上批道：“報告所提改建意見似不妥。”暗中把這件事壓下來了。

上海萬體館建成以後，王洪文真正登臺表演只有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五年國慶節，他在上海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登上主席臺，觀看了國慶聯歡晚會。

一年以餘，萬體館成了聲討“四人幫”的批鬥大會會場。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余黨，終于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

毛澤東發動“批鄧”始末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我們上海的幾個市委書記感到政治空氣很沉悶，張春橋、姚文元很久没有與上海聯絡了。毛澤東關于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到上海，我是從新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徐壽鑒那裏看到全文的，他是從新華總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并直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馬上將情况告訴馬天水、王秀珍。毛澤東在批示中講到“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只提一項”指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指教條主義，我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張春橋、姚文元有關講話、文章而發的。因爲張春橋在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講話的時候專門講到過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現在毛來批評了，“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是很有針對性的。毛在批示裏又批評一些人，説：“自以爲是，動不動就訓人。”還説：“不懂馬列。”這是明顯地批評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經常發脾氣、訓人。接着，毛澤東有關電影《創業》的批示也下達了，這又是批評江青和文化部的。這一連串的批評都是針對我們陣營的，我們覺得日子比較難過。

與江青、張春橋他們的沉寂相對照，鄧小平的日子過得風風火火。周恩來病重后，他主持國務院工作，不斷有重要講話傳達，主要是談整頓的。他召開各省市工業書記會議，强調整頓，大反派性，而且在鐵路系統抓了幾個大鬧派性、衝擊鐵路交通的壞頭頭，整頓了鐵路秩序。接着，國務院召開計劃工作務虚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講話，也强調各條戰綫的整頓。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葉劍英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强調軍隊也要整頓，而且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各軍區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充實到各大軍區、各兵種當領導。

王洪文上海“蹲點”

就在這個時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從北京來到上海，我們感到很奇怪，他住在東湖路七號招待所裏。他對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説：“我這次到上海是作調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時期。”但他并没有具體的調查研

究的打算，我問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項目和日程，他說不要，有什么事我會告訴你們的。當時，我們覺得在黨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鄧小平的前面，現在鄧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來了。

過了幾天，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找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談話，他從公文包裏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軍委任命幹部的名單給我們看，這是經過毛澤東批准的各軍種、各兵種，還有各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單。他把這些名單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說："鄧小平這個人真厲害，他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當總參謀長，很快就把各總部、各兵種、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名單的時候，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通過。"

王洪文又說"你們知道春橋同志最近說什么呢？他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主任不過是枚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向上報告，報告上蓋的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這天，王洪文又問我們，鄧小平和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你們覺得怎么樣？我說："鄧的講話裏提到整頓，還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本不作階級分析，什么'軟'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資產階級路綫，領導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王洪文一聽，很贊賞我的說法，他說"老徐說的對！反對'軟、懶、散'，一點階級分析都沒有。實際上，軍隊裏對提拔新生力量，最保守了，全國只有沈陽軍區毛遠新當了政委，讓孫玉國當了副司令。武漢軍區算是有一個參加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年輕副司令。其他軍區進領導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家伙。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駡娘。前一時期，社會上的一些政治謠言，都是從軍委擴大會議後傳出來的。"

王洪文發泄了一通後，馬天水插進來說："這個鄧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個'鋼鐵公司'，他抓起權來很厲害，過去他當總書記的時候，主持中央會議，連毛主席在場，都不放在眼裏。開會開到最後，也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見，就宣布散會。"王洪文嘆了口氣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這次，我把單文忠調到中央讀書班。"單文忠原是上海警備師幹部，那時已調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關係密切。王洪

文説"我把他調到中央讀書班，就想派他的用場。他在上海警備區真是個造反派，可是調到安徽省軍區後，只擔任個副參謀長，級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談到這時，已是深夜了，服務員請我們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錦江小禮堂開會或看電影，吃飯就在二樓一個僻靜的小房間裏。這裏一個圓臺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書記來吃宵夜。錦江的人見王洪文來，知道他的老規矩，一瓶茅臺，還有他最喜歡的下酒菜：一碟銀蚶，一碟醉蟹，一碟幹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點紅辣椒絲，他喝了酒后，再來點面條、餃子等。馬天水有嚴重的糖尿病，平時很少喝酒，他見王洪文到上海來，就破例端起酒杯向他敬酒。我因爲患血管型偏頭痛，不喝酒，王秀珍有皮膚過敏症，也不喝酒，我們倆人只能象征性地作陪。

王洪文是個酒葫蘆，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貪杯，有了幾分醉意後，話就多了。馬天水問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説"我給主席的報告没有講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這時，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爲我們曾議論過，總理生病以後，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現在他跑到上海來，不是把大權讓給鄧小平了嗎？我們埋怨過他。今天聽他這麽一説，我也試探着問："老王，你本來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現在你到上海來，中央的工作由誰主持啊？"王洪文此時已有幾分醉意，説話就比較敞開了，他説："什么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裏跳。"我們一聽，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説："現在我有什么權啊？黨中央和國務院都是鄧在抓，軍隊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嘞。"説到這裏，他一臉很生氣的樣子，因爲我一問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説"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辦法？"説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氣裏對毛主席也不太滿意，我們三人就更不敢出聲了。

毛遠新、李先念告鄧小平的狀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幾個月，"八·一"建軍節，他没有回北京，"十·一"也在上海過。"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他也没有去。後來，傳達了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説工業要整頓，

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科技隊伍也要整頓。我們看來，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鄧小平的連續講話，使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起來的人都不滿意。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看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後，大有意見，在一九七五年國慶前後，他從遼寧到全國幾個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面匯報，他說："今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到有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還要兇些，我擔心中央出反覆。"毛澤東很同意毛遠新的看法，他說"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還說："鄧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過的老干部說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態度的。"毛澤東要毛遠新當面找鄧小平談一談，同時要汪東興和陳錫聯一起參加。

關於毛遠新當面找鄧談話的情況，后來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他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裏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敘述：毛遠新找鄧談話，把鄧的講話中的問題都指出來，但鄧不服貼，鄧說："遠新同志啊，照你這么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綫囉！說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綫，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毛遠新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毛遠新在向我們敘述這次交鋒時，很激動，又顯得很神氣，講着講着站起來，左手插在腰裏，右手朝前伸，一個指頭做着指向鄧小平的樣子："你就是修正主義！"樣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時也很傲氣，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鄧小平的談話是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

過了兩天，毛澤東提議政治局討論如何統一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書面決議，肯定文革的成績，當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據張春橋告訴我說，鄧小平拒絕作這個決議。鄧小平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晋'。由我寫這個決議是不合適的。"當時，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每一次政治局討論的情況，都由他轉達。鄧小平的態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后來毛遠新傳達了毛的十二條指示，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毛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

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對鄧的批評越來越尖銳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裏資格很老的李先念，當時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員之一，向毛作了匯報，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到現在爲止，我看了很多文章，從來没有人提到過李先念也向毛匯報過鄧的問題，而這是王洪文親口告訴我的。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五年國慶節前後，有幾批重要的外賓由李先念陪同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南海紫雲軒的書房裏接見外賓，會見結束，外賓離開後，李先念有單獨與毛澤東談話的機會，他非常了解毛澤東是極其看重他本人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雖然毛澤東幾次談到文革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戰"，但這部分只占"三七"開的"三"，實際上，講"二八"開，或"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可能更符合毛的意願。因爲他始終把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作爲千秋大業來看的，從他臨終前與政治局成員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爲畢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足見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這一點，李先念是應該充分體會到的，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教訓。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發過牢騷，作爲"二月逆流"參與者，受過嚴厲的批判。但當時，李先念轉得快，檢討得早，因而被毛澤東保了下來。我參加過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不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員，還當場提名他當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李先念非常感動，他當着全體中央委員的面，向毛主席作了公開的檢討。我聽了他的發言以後，感到他言辭很懇切，對參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屆一中全會以後，我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閑談的時候，都認爲他的態度不錯，爭取了主動，在卷進"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當中，他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中的位置。現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國慶節，李先念聽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他根據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貫看法，覺得應該表明自已的態度，接待外賓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裏，他對毛説："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

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對鄧小平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一個毛遠新，一個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謀而合，共同對鄧小平提出質疑，焦點問題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毛澤東絶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鄧小平不願做文革的書面决議後，毛被激怒了，他想通過一個什么突破口，把鄧小平的問題揭示出來，機會終於給毛抓住了，他借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發難。劉冰一連給毛寫了兩封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擔任領導後在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遲群原是中央警衛局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長，派去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靜宜更是毛的人，她參軍後，長期擔任毛的機要員，后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劉冰的信由鄧小平轉送給毛，應該說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認爲不尋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而且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他寫下六個字："小平偏袒劉冰。"

這個批件下達后，政治局都很震動，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吴德、紀登奎趕到清華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達毛的批示，遲群和謝靜宜看到毛對他們的支持，就來勁了，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明爲批劉冰，實際上矛頭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鄧小平。毛的批示下達後，清華大學有個政治部副主任叫吴偉煜，寫了一篇大字報，叫《論走資派還在走》，一語道破了這場批判的底蘊。遲群看了吴偉煜的大字報非常高興，要他連續寫它十篇。

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説"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綫上是比較積極的。"毛澤東聽後説："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説"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遲群和謝靜宜每天把開會和寫大字報的情況直送政治局，上報毛澤東。

這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華大學給政治局的簡報后，非常興奮，在北京曾有人問鄧小平，王洪文到哪裏去了？鄧小平鼻子裏哼了一聲"蹲點去了。"這話傳到王洪文那裏，他很惱火。現在聽到這些情況，感到機會來了，他趕快把我們找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的會客室，拿出清華大學的簡

報給我們看，説毛已有批示了。我們鼓動他回去參加戰鬥，他説再等幾天，現在是清華大學在開常委擴大會，但是政治局是否開會，我還要看一看。又過了兩天，他説政治局要開會幫助鄧小平了，才正式離開上海。

在與上海小兄弟們的告别會上，酒過三巡，王洪文説"你們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幾派，中央的鬥争是復雜、激烈的。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看出問題來了。"王秀珍怕他説漏嘴，趕快扯扯他的衣角，説："喝酒，喝酒！干杯，干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裏的東西都倒出來："今年七、八、九月，他們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謡，可兇啦！這次我回北京就是參加鬥争去的。"那些小兄弟聽他這么一説，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動作。

第二天，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專機，當天晚上，他就參加了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會後，王洪文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趕快給他收集鄧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材料。這樣，上海市委的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政治局批鄧上挂下聯、内外夾攻

當時的批鄧，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了以教育戰綫爲突破口，上挂下聯、内外夾攻的打法。在清華、北大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批示爲契機，一層一層地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織重點發言、寫大字報，先是批判劉冰，再挂上支持劉冰觀點的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鄧小平。姚文元授意清華、北大的寫作班子先后給《紅旗》雜誌寫重點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否定文藝革命是爲了復闢資本主義》，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拉開後，最後遲群指令在文章中點明風源就在"黨内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把矛頭直指鄧小平，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層領導開會幫助鄧小平的時候，開始并不直接批鄧，而是强調劉冰敢于把矛頭對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叫到政治局挨批，這就是"下聯"。張春橋在講到教育戰綫要搞整頓的時候，有一句名言："一個是培養有資産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没有文化的勞動者，我寧要一個没有文化的勞

勳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張春橋批判周榮鑫的時候，上綱上綫很厲害，實際上，周榮鑫當教育部長一年還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傾翻案風？所以、批判他的人心裏都很清楚，周榮鑫自已也很明白，他坐在那裏，只不過是一個箭靶子，"下聯"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鄧小平"。

"内外夾攻"是形成多層次的攻勢，首先是政治局批、幫鄧小平需要炮彈，我們趕快把鄧的言論整理出來，交給上海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給王洪文。馬天水急忙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也交給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轉印發給政治局參加會議的人。我在收集鄧小平的材料時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這是批判的重要依據。當時、鄧小平在各種場合講了一些話，有的是在很小的範圍内講的，我千方百計要搜集到他的講話材料。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聽說有一個鄧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一書記的談話，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趙紫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以後、把三代領導人找在一起談話，鄧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長期在西南地區擔任領導工作。我認爲、這次談話一定是說了許多心腹話，苦于打聽不到談話的内容。後來我聽說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楊廣立，在江蘇的一次發言中，提到過這次談話。我想、這是機會、因爲楊廣立帶領南京小紅花藝術團訪問上海的時候，我曾經熱情接待過他，覺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賓館楊廣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楊廣立告訴我，他是在江蘇省委召開省委常委會的時候，從省委第一書記彭冲那裏看到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記録，我打聽到來龍去脈以後，經過多方努力，最後終於拿到了這份談話。

又有一次，鄧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開會，作了專門講話。這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上海，所以我們對這次會議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辦法，也没有打聽到，正在着急地四處尋找這份講話的時候、江西省造反派頭頭涂烈、和我們在中央開會的時候認識了，他派專人到上海送給我一份绝密件、我打開一看，是一封用毛筆抄寫的有十幾頁紙張的密件。原來是他參加江西省委常委會的時候，聽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記録。涂烈知道我急需這份材料、連夜派人送過來，我看了以後，非常興奮，馬上叫市委辦公室打

印出來，一面上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趕緊讓市委的機要交通員把這材料直送清華、北大的遲群、謝静宜，供兩校编輯《鄧小平言論摘编》使用。

還有一次，北京有一個科研單位的工作人員到上海出差，去同濟大學聯系工作，當時談起鄧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談會上有個講話，這個工作人員聽過傳達，所以在他隨身携帶的筆記本裏有講話的記録。這時候，同濟大學黨委馬上把這情况向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反映，當時我們布置給下面的任務很緊，到處搜羅材料，所以文教組姓孫的干部立刻趕來，當面給我匯報，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員的筆記本直接取來，我親自翻閲了筆記本，記得十分潦草，但是經過辨認，覺得鄧小平講話中有不少可以供我們批判的觀點。所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連夜把這份講話打印出來，由我報送給北京的有關方面，這樣，就爲科技戰綫方面批鄧提供了彈藥。

内外夾攻的戰術還運用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的時候，遲群、謝静宜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我們的房間裏談悄悄話。他們説，在政治局剛開始"幫助"鄧小平的時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員的態度很不積極，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在會上打瞌睡，所以整個批幫會的火力不强。根據這個情况，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决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外面調進一些年輕人列席政治局會議，讓他們發言，加强火力。這些年輕人是：從清華、北大兩校調去的遲群和謝静宜；從外交部調去的王海容和唐聞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表兄王季範的孫女，唐聞生是外交部副司長，我國駐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的女兒，長期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英文翻譯；同時，毛澤東又委派他的侄子毛遠新擔任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批判發言，而且隨時把政治局會議的情况向毛澤東當面匯報，然后再把毛的指示帶回政治局傳達。當時參加擴大會議的年輕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員，其中絶大多數還不是中央委員，只有謝静宜是中央委員，唐聞生是候補中央委員，他們都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列席會議就有特殊含義。這種内外結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開法，我覺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取代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經過充實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會"，會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遲群和謝靜宜在我們房間談話的時候，我見遲群的眼睛因爲熬夜布滿血絲，通紅通紅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別興奮，他操着山東話，眉飛色舞地對我說："政治局開會，開得可有勁了，我們幾個列席會議的輪着發言，小謝和我提供事實，王海容和小唐開炮，最后由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論上來拎一拎，這樣，鄧小平連話都説不出來。"

後來，張春橋也到京西賓館來，在馬天水的套間裏，對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開會的情況，特别介紹了鄧小平當時的神態，他繪聲繪色地説："我們批了鄧小平那么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一言不發，就是坐在椅子裏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穩坐釣魚臺。他的這種情况，我早就見過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開會批他，他也是悶聲不響，自始至終没有説過一句話。這個人可頑固了！現在，他説他耳朵聾了，聽不清楚别人的發言，實際上，他的聽覺可好呢！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邊主持會議，輕輕地説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哧啦一下站起來就走。你説他耳朵聾嘛，他是裝聾！"后來新華總社在内參上發了一篇文章，介紹政治局批鄧的情況，談到清華、北大派人到政治局會議上作批判發言，説鄧小平裝聾作啞，一言不發。内參引用清華、北大一些人咒罵鄧小平的刻毒用語："死猪不怕開水燙。"

政治局開了幾次批幫鄧小平的會議後，決定把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逐步推向全國。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文件《打招呼會議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審批後，發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件引用毛澤東對于清華大學問題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認爲，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絶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央文件發下來之前，我們就得風氣之先，王洪文幾乎每隔一兩天就和上海通熱綫電話，把消息捅過來，要我們把材料趕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總共搜集了四十三種講話記錄，送給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白頭内部文件，每種印二十份，送給王洪文，作爲中央政治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選擇其中比較重要的，直接發給政治

局會議。江青還布置清華、北大兩校整理鄧小平的材料，由兩校編成《鄧小平言論摘録》上、下兩本，印成小册子散發。

《鄧小平言論摘録》剛剛印出，遲群他們立刻就給我送來。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轉送給江西、福建、浙江、陝西等跟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負責人。我看到清華、北大的動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選擇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兩校作爲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兩校南北呼應。當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用頭條發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點出右傾翻案風問題的時候，當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學、中學貼大字報響應。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的大字報貼得最多。

但是我覺得上海有質量的大字報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時候，張春橋幫了我的大忙。當時清華、北大把學校裏的大字報印成《大字報選》，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每收到清華、北大的《大字報選》，都在封面上批下幾個字：送景賢同志參閲。然后通過他留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轉給我。當我收到這些十六開、用道林紙印的大字本《大字報選》，看到裏面有清華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吴偉煜寫的《十論走資派還在走》，還有兩校著名教授，像哲學家馮友蘭、固體物理學家黄昆等人寫的批判文章，這正是我在上海發動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張春橋爲人一貫小心謹慎，過去他從没有把政治局委員收閲的文件直接轉給我過，這次却一反常態，説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樣急切，他在封面上寫"送景賢同志参閲"，哪裏是參閲參閲而已，分明是要我擴散，而且他轉來的《大字報選》擴散后，可以不露痕迹，誰都可以説是從清華、北大傳抄來的。當然最關鍵的是搶時間、争分奪秒，把批鄧的風及早吹到全國去。我充分領會張春橋的意圖，馬上把印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大字報選》的封面撕下來，把裏面的重要文章拆開變成散頁，然后我帶着這些散頁的大字報，專門坐車趕到華東師大，找到黨委書記楊希康，把這些單頁的鉛印大字報當面交給他。他根據我的布置，馬上找人用毛筆重新抄寫張貼到華東師大的大字報專欄上。

這一下，果然引起轟動效應。那天，細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們剛剛抄出來的大字報。大字報欄前人頭攢動，年輕的，年老的，本校的，外來的，大家都争着看清華、北大的最新動態，還有些人在雨中認真地抄

錄，當時我心中很得意，因爲這是張春橋和我聯合操作的。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從華東師大回來，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過幾所大學張貼大字報、相互大串聯把劉少奇、鄧小平給揪出來的，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這段歷史。雖然目前大字報上還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論點"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么人了。因此，我與馬天水商量，決定由市委辦公廳下達通知：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各區縣局都可以組織群衆到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去看大字報。還通知復旦和華師大兩校編印各自的《大字報選》，裝訂成册，凡是有組織來參觀的單位，或者外地來取經的學校，要主動贈送給他們，擴大影響。甚至連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到上海高等學校訪問的時候，我也告訴復旦大學，可以把《大字報選》贈送給他。這樣，不但把批鄧的信息吹向全國，而且傳播到海外去。

當然，像我們這樣内外夾攻、煽風點火，只能制造輿論，形成批鄧的氣候，還不足以把鄧小平拉下馬。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鄧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辦到。

把鄧小平拉下馬

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后，鄧小平不吭聲，不表態，會后要求毛主席單獨接見，他要面陳一切。但是毛澤東對他的請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聯絡員毛遠新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毛澤東，這樣，毛遠新把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進展情況，各人發言的内容，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等等，一一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對鄧的問題不斷地做出口頭指示，由毛遠新當場記録下來，再交給毛澤東過目，然后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傳達。毛的指示在當時確實有雷霆萬鈞之力，他從"資産階級就在共産黨内"一直到"翻案不得人心"，連續有十二條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鄧小平打入冷宫。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后决心一下，鄧小平墜入了"三上、三下"的

深淵。

二月二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的一號文件下達，一號文件有兩點重要內容：一是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實際上解除了鄧小平的職務；另一點就是宣布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實際上剝奪了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權力。

一號文件到達上海的那天，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興奮，兩個月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終於有了成果，從組織上把鄧小平拉下了馬。在康平路小禮堂學習室，我們一面看文件，一面議論開了。

我說："鄧小平這下徹底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誰也想不到，主席會選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這樣新的、老的都沒有話說，雙方都能接受。"

馬天水讚成我的分析，說："對，非常理想。華國鋒這個人我熟悉，他在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强，選這樣的人，大家都能够接受。反正今后中央都是集體領導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后面一段，她擊掌道："關鍵是軍權，葉劍英體面下臺，陳司令掌權，太好了。"王秀珍是東北人，陳錫聯是沈陽軍區司令員，跟毛遠新關係密切，我們與毛遠新、陳錫聯觀點一致，每次我們到中央去開會，都要看望陳錫聯和毛遠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遼陽老家探親的時候，專門拜會過陳錫聯，所以她對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特別高興。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屆人大决定的政府人選，當時第一副總理是鄧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張春橋，按照名單，鄧小平下臺，替補上去的應該是張春橋，但是我們看了毛主席的决策后，覺得十分明智，因爲我知道，張春橋在中央擺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讚成。

一號文件下達不久，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我們特別注意會議開幕那天鄧小平會不會來，因爲文件没有宣布撤銷鄧的工作。會議開幕那天，走進京西賓館禮堂，氣氛很肅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外，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也全來了。我看到廖承志一個人走進來，坐在后排，默不作聲。與他相對照，馬天水情緒特別好，馬上坐到錢正英旁邊，大談電力供應的事情。我對王秀珍說："今天我們要看看，鄧小平出來不出來，出來的話，肯定是一副尷尬相。"

等到會場的燈亮起來，華國鋒帶頭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領導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臺。后面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李先念、吳德、紀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鄧小平。我與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覺得鄧小平可能要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華國鋒主持會議，正當他要講話的時候，我看到毛遠新、遲群與謝靜宜三人從會場的邊門走進來，他們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級一級升起來的座位上，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全場的情況，我主動地走到他們身邊，跟他們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們是毛主席身邊舉足輕重的人，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關於批鄧的談話，都是毛遠新傳達的。今天也是這樣，華國鋒在臺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讀毛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十二條指示，毛遠新手裹也有一份文本，他當場打開，華國鋒念的時候，毛遠新逐條對照，邊聽邊笑，有時候還笑出聲音來。有一條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産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産黨内。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説到"走"的時候，毛遠新和謝靜宜高興地大笑。我也很聽得進，毛的這一條批示非常尖鋭地指出資産階級就在共産黨内，而且又一次地提到"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文革開始時我們起來造反一樣。那天我們這些人與會場裹其他人的沉悶相對照，有點得意忘形。

京西賓館的大會一結束，就轉入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到上海小組來的人非常多，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當時參加上海小組討論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濤。馬天水住的套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我印象中，歷次中央開會毛遠新是不來上海小組的，這次破例，他連續幾次來看望我們，與我們聊天，有時聊到半夜一兩點鐘，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毛遠新外，遲群、謝靜宜、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他們也來。各省與我們接近的人來串連的也很頻繁。

有一次，毛遠新來的時候，于會泳、劉慶棠也來了。我們重點談了電影的事情。毛遠新稱贊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賢，你是懂電影的，所以抓得出這樣的影片來。"毛遠新提出，上海和北京都有電影制片廠，但是遼寧没有，他想在遼寧建一個電影制片廠，希望我能够從上海支援他們

一些骨幹，我馬上答應。事後，毛遠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體地討論籌建工作，還把遼寧拍的樣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遼寧拍的紀録片在上海公開放映，表示對他們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還談了鄧小平是怎樣評價《春苗》的，于會泳聽到毛遠新提供的一個材料，説鄧小平審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時候，批評《春苗》極左，就離場了。我當時認爲這是極好的材料，于是對于會泳説，一定要把這材料寫進文章裏去。

文革結束後，在批判我的時候，發言人説鄧小平看《春苗》有這回事，但鄧小平并没有説極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賓，有人來叫鄧小平走，鄧小平説："就走，就走。"他説的四川話，有人把"就走、就走"聽成"極左、極左"了。爲這事我們把鄧小平狠批了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也破例到我們這裏，簡直讓我們感到榮幸之至。她來了一次，又來一次，談天説地，因爲從組織上解決了鄧小平的問題，她興高采烈。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來到馬天水的套間，她説"你們是上海幫啊？你們知道嗎？他們把我也説成'上海幫'了。"我們第一次聽説"上海幫"，是從江青嘴裏説出來的。

江青對馬天水説："他（鄧小平）不是對你進行策反嗎？"

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單獨找我談話，我已經都做了揭發。"

江青説："説十一次路綫鬥争，是我闖了一個禍。"

馬天水立刻説："他當時一講這個問題，我就知道矛頭是對着你的。"

江青説："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覬覦。"這兩個字，馬天水和王秀珍他們聽不懂，我想了想，聽懂了，趕快拿了張紙，把"覬覦"兩個字寫下來給江青看，江青説："對，對。"這時候，王秀珍給江青送了幾包從上海帶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邊。江青對王秀珍説"你這個人，大咧咧的，應該把你調到政治局來。"

王秀珍聽不懂此話的意思，以爲要提拔她，非常喜歡，但又裝得非常謙虚地拉着江青的手，連聲説："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經很多了。"

我一聽，唉，你根本没有聽懂這個意思，就在旁邊插嘴説："江青同志是説要把你調到政治局來挨挨整。這樣，你這個人説話大咧咧的缺點就會

改掉了。"

江青說："是啊。"如此一來，王秀珍的臉就紅了，顯得很尷尬。

江青來了兩次，在我們房間裏把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也找來談話，那時候，馬天水的套間變成一個串連點。

會後，江青又讓我們幾個到釣魚臺去。她住在九號樓，還有一個十五號樓專門放電影的。她先與我們談話，接着給我們送禮物。禮物是毛澤東看過的全國地圖影印本，毛澤東用紅筆、黑筆在上面畫了很多圈，留有毛澤東的手迹；又送我們毛澤東親自看過的《詞綜》，也是一本影印本。我們都說這是很珍貴的禮物。

江青還讓我們參觀她的玻璃暖房，她給我們推薦東北帶來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說："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油，又能釀酒，以后我再送你們幾瓶酒。"後來又帶我們到她放映室裏看内部電影。

會議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釣魚臺面談。張春橋說："鄧的問題總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讓他分管外事。"我們插嘴說："他已不在中央擔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張春橋笑笑，接着說"今後你們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敵戒》，裏面有兩句話：'敵存滅禍，敵去招過'。"張春橋解釋道："大敵當前的時候，團結問題往往比較好，而敵人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發生問題。"張春橋說："中央已經决定，要把老馬調中央來抓經濟工作。"他征求我們三人的意見："今后上海還是要有一位老干部來主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見傾向讓馮國柱來當，不贊成黄濤。

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還要我們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和任務及現階段的階級關係。張春橋說："真正會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産階級，而是黨内的走資派。假如榮毅仁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没有多少人會聽的；假如鄧小平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會一呼百應的。所以真正要重視的還是黨内的走資派。"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們回上海後於二月底三月初，召開了一個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黨内走資派的問題。四月初，召開萬人大會，馬天水和我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我的講話《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經張春橋審閱同意，從這個角度狠狠批判了鄧小平。

也是在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講了魯迅小說的故事：阿Q和小D打

架，相互抓辮子，忘記了背后有個趙七爺的大辮子。啓發我們要抓就要抓人家的大辮子。我回來后把張春橋的談話傳達給朱永嘉、王知常，他們馬上寫出一篇文章，發表在《學習與批判》雜誌上。文章由王知常修改定稿，標題也是他定的，長達三十三個字：《從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做了兩項決定：一是宣布天安門事件爲反革命事件；二是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全國聯播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當時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賓，外事組工作人員遞條子進來說中央有重要廣播，我讓外事組的人當場記録下來，然後送進來給我看，我看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就盡早結束宴請外賓的飯局，趕到康平路。到那裏時，市委常委們正在重新收聽中央文件的廣播録音，馬天水興高采烈地説："我們今天在一起，大家擁護中央的決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寫一份表態的電報稿。王秀珍説，她已經布置上海民兵在外灘和人民廣場舉行武裝游行，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借機顯示我們的實力。我説："我剛才經過人民大道的時候已經看到了游行的隊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説："讓我們以茶代酒，幹杯慶祝！"在她的提醒下，市委辦公室負責人張敬標説"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給我們送來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員聽到張敬標的話，馬上搬來一箱箱江青送來的酒。陳阿大嚷道："下酒菜沒有，弄點花生米來！"

當天晚上，我們向中央發了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上海市委常委們在康平路小禮堂頻頻舉杯，痛飲幾杯油莎豆酒，慶祝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艱苦的奮戰，終於把鄧小平拉下馬。

我替張春橋“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爲張春橋找了個老婆。”

聽說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不是叫文靜嗎？怎么又給張春橋找了個老婆呢？

在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爲，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向他們作了詳細匯報。他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說，這件事情就到此爲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關在監獄裏，看到有一個作家爲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他當然不肯放弃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是他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了進去。他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是“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群爲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是，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東西帶進墳墓裏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决定說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心病

張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

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是天津人，説一口相當標准的普通話。她的父親，是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后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產主義青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晋察冀解放區，進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發，常戴一副淺黄色的玳瑁眼鏡，一直是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晋察冀日報》投稿，筆名是李岩、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在北岳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入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二十六歲，李淑芳二十七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晋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裏；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却在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裏。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爲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爲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搞“心戰”。她的上級是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反共宣傳品，又上日軍廣播電臺播音，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弃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蔑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節節勝利，八路軍在華北大舉反攻，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弃了。正在阜平縣任《晋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係的李淑芳，終于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爲“文静”，并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題。

抗日戰争勝利之后，張春橋和文静在張家口結爲夫妻。

文静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在後來的審干、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静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復的審查，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是節節上升，特别是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在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在石家莊時期，柯就是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内部，做做調研工作，编编簡報。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拋頭露面，就是在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爲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准。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静爲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是，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歷史，覺得這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静又是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静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静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成爲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静自恃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説，像文静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在文革當中早就被宣布爲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是因爲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没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裏没有任何領導職務，可是她却大搖大擺地

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静請示商量。

文静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脚，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無非是我的秘書小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裏放映這場電影，事先没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常情况，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群衆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裏，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静是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文静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静（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大爲震驚，盛怒之下，他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裏去，當場取出文静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扎，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他緊鎖在自己辦公室的鐵箱裏。

可是，隨着“抓叛徒”運動的深入，文静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説是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别人議論，擴散了文静的歷史問題。我把這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他十分惱火，恨恨地説：“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査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説她供出了當年和李淑芳（文静）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找文静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他看了。張春橋面對這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他悻悻地説了一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回去，拒絶讓文静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静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他招致極大的麻煩。他開始對文静采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裏的領導層會議，不要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不許她拋頭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静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静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張春橋終于下决心與文静離婚

自從有人在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静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關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展覽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在他的旁邊。爲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群衆組織的代表在會上廣泛提名，由誰、誰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并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群衆組織的頭頭，爲了巴結張春橋，可是又不知道“文静”這個名字，就在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脚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痛駡起來：

“你這種人算什么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駡，把那個溜鬚拍馬的人駡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内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揚鑣了。

一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静開始從上海的公衆場合消失。市裏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静也從不在會場裏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廣場后臺的化裝室裏，通過廣播喇叭聽臺上的報告。我知道這是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〇年夏天，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

向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襲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在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搜集他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是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裏，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他開始下决心要脱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是他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自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他再也没有回過上海。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别，然后後手。張春橋此后長期住在北京釣魚臺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裏。

從夫妻感情來説，應該説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是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裏原來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别墅的底層是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是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裏間便是張春橋夫婦的卧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床，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别墅的三樓還有兩間卧室，是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蕩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在那裏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時候，文靜就守候到什么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吃宵夜，文靜就通知厨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吃。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文靜既會抽烟，又能喝酒，烟癮很大，酒量也不小，這兩方面都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合家團聚，説説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間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后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説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産，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

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秘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升爲政治局常委，這預示着張春橋今後在黨內、政府内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是，隨着張春橋在政壇上的重大升遷，文静的那一塊歷史污迹，却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大姐隨同周總理來到上海，重游這片他們曾經戰鬥過的熟悉的土地。鄧大姐的爲人非常熱情而又細致周到，她善於團結人、關心人，這是衆所周知的。周總理在上海期間，整天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大姐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户，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户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對我們的家屬和小孩問長問短，特别親切。

鄧大姐不但關心年輕的幹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幹部，從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幹部王少庸的家屬。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裏，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説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裏等候，但是，鄧大姐就是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徑自登上停在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静的歷史和爲人，她不見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裏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户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爲什么偏偏不去張春橋的家？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誰都在背后竊竊私議：鄧大姐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静。這就等于把文静的歷史問題在康平路大院裏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我的兩個女兒就盯住我問：“爸爸，鄧媽媽到了小紅（姚文元的女兒）家，到了我們家，爲什么不去毛弟（張春橋的兒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鄧媽

媽沒有時間了。小孩子別多問！”

鄧大姐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裏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挎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新聞，一邊在林蔭小道上悠閑地散步；現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說文靜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裏，這對他不啻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爲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小平爲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于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于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銳的鬥爭，要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給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他下決心采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裏閉門密談。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發上，點上一支烟，向我們通報了關于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他開門見山地說：

“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爲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裏，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囔囔地說：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爲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

我沉默了片刻，說了一句話：

“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說：

"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裏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布，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同志今后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們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佈，因爲保密，外界誰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回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爲她不再是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在市委大院裏見了面，我對她還是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裏搬走了。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是，這些年來，文靜却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他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爲他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張春橋向馬、徐、王提出要找一個秘書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五十九歲。

他最後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隨後是和文靜離婚，此後，他再也没有回過上海。我們也吃不准：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曾經一再向張春橋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說："從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後，有好幾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陣子。"王秀珍也說"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過上海了，春橋同志您什么時候去上海哪？"

聽了這些話，張春橋總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說：

"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没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裏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

我想想也確實是那麼一回事。特別是"批鄧"的那一陣子，張春橋真可謂無分晝夜、殫精竭慮，在把鄧小平"拉下馬"的戰役中，他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覺察到：在他的内心深處，對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侶問題，已有所考慮，而且正萌動着一種充滿希冀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在會上宣布：鄧小平執行的是"修正主義錯誤路綫"，對鄧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這樣，張春橋和我們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以后，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臺九號樓二樓他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

那次談話，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痛駡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我們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張春橋似乎很不經意地對我們說：

"我這裏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適的人……"

這個問題提得有些突然。我們都知道，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長期在他身邊工作，北京是嚴秘書，上海是何秘書。我想，大概是他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外找一個。我根本没有朝女秘書這方面去想。

說到這個問題，有必要介紹一下上海的有關歷史情況和規定：長期以來，特别是從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禁止領導幹部身邊用女秘書。因爲，女秘書日日夜夜追隨在首長身邊，相處的時間久了，關係密切，有的人便難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聽到過柯慶施針對某個女秘書大發雷霆。那個女秘書曾和某領導幹部有染，可是柯慶施不責備男性領導，却全部諉過於女秘書，他親自下達指示："這個人是個腐蝕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機關工作！"那個女秘書從此被調離市委。

接着，根據柯慶施的指令，今後上海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部長，一律不准用女秘書。柯慶施說，這是爲了保護領導幹部。他自己身體力行，身邊没有一個女秘書；張春橋是緊跟柯慶施的，當然也從來不用女秘書。文革期間，根據張春橋的規定，在我們身邊全是清一色的男秘書。

由于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張春橋在釣魚臺住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找一個秘書的時候，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就是指男秘書，根本沒有朝女性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張春橋是在和我們談話快臨近結束的時候，突然提出這件事的，我們幾個都沒有精神准備。馬天水哼哼了兩聲，朝我看看，輕聲說："老徐看，有什么合適的人嗎？"

王秀珍是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她當然很想往張春橋身邊派人，可是，她清楚地知道：中央領導對身邊的秘書要求很高，條件很嚴格，而且必須是善摇"筆桿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這樣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氣。

我沉思了一下，一時倒也想不起比較合適的人。前一段時期，王洪文調去北京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書，替他起草文件、撰寫講稿、翻閱資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調市委寫作組的領導核心蕭木。蕭木是鐵路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曾經擔任過《上海鐵道報》的編輯、《支部生活》的編委，他不但會寫理論文章，而且會寫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和小說……有較深厚的理論修養，爲人比較謹慎、隨和。像這樣的人到張春橋身邊工作倒是非常合適的，可是王洪文硬是點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個像蕭木這樣的人給張春橋當秘書，難了……

張春橋看我們幾個都沒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說了。這時，我提議說："這件事讓我回去和寫作組朱永嘉他們商量一下，提出幾個名單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送給您看看再定吧！"張春橋表示同意，我們就告辭了。

那天，張春橋的心思只是露了一個頭，我們都沒有真正領會，而且，因爲馬天水、王秀珍都在場，他不便再說下去；要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場，也許他就直截了當向我交底了，免得後來爲這件事又繞一個大彎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會的常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因爲我和他都屬于張春橋的"嫡系"，我們一本正經地商量起給張春橋找秘書的事。

朱永嘉同樣想當然地認爲張春橋在北京要調換秘書或增加秘書，他起勁地排出一批名單：從市委寫作組下屬的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自然辯證法組……中間，物色了條件比較相當的人員，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論修養和活動能力，都能拿得起"筆桿子"，而且都比較年輕，沒有家庭牽累。當然，清一色的全是男性共產黨員。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選定了其中的三個人。朱永嘉考慮得很周全，他特別向我推薦一名青年骨干，既會寫文章，又會開汽車。朱永嘉不愧是研究歷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文章的“羅思鼎”小組的組長，他比我多一個心眼，他說：“當了秘書跟着春橋同志出去，萬一有什麼事，馬上可以頂上去當汽車駕駛員！”我笑着采納了他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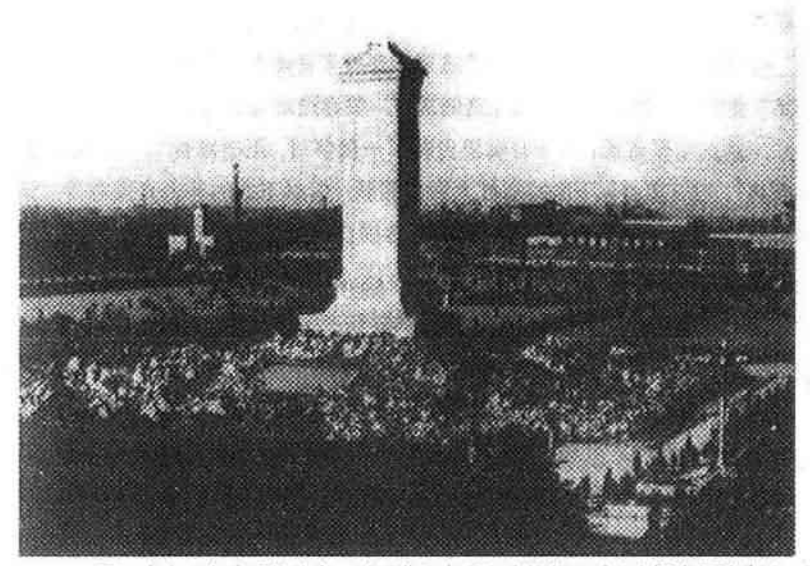
我要市委寫作組把那三個人的檔案材料做了簡要的摘錄，打印出來，由我寫了一封短信，附上摘錄材料，通過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信中請張春橋圈定選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認爲全然不合適，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選。

信和摘錄材料送去以後，許久沒有回音。朱永嘉也問過我，我說這件事由領導决定吧，我們不要催。接着，“批鄧”越來越熱鬧，張春橋在那個階段特別忙，找“秘書”的事情也被延擱了下來。

張春橋寫來密信要我“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當時張春橋正站在人民大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把群衆性抗議運動定性爲“反革命事件”。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的群衆遭到鎮壓，群衆手挽手、肩並肩，高唱《國際歌》，衝向指揮鎮壓群衆的“指揮部小樓”。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夕，近百萬北京群衆連續數日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誦詩詞，通過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天安門廣場成爲全國性抗議運動的中心。

會堂朝向天安門廣場一側的房間裏，他透過長玻璃窗看到勢如怒潮的人群向大會堂涌來，而持槍的人民解放軍則排成人墻，把洶涌的人流死命擋住。張春橋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事後，他親口對蕭木說：“當時我曾經想，假如部隊都把槍口掉過來，那可怎么辦？！”

處在深深的恐懼中的張春橋，當然不會想到找老婆。

自從毛澤東給“天安門事件”定了性質，宣布爲“反革命暴亂”以後，張春橋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天安門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鄧小平比作策動鬧事的前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納吉，他說：“鄧小平就是今天的納吉、中國的納吉。”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使張春橋大大地出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張春橋從北京給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的兒子毛弟寫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從恐懼到舒暢的轉換：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丑惡末日，出了一點氣。”

張春橋的氣舒了，心順了，認爲最大的政敵被掃除了，才又重新考慮起自己的生活安排來。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們隆重地慶祝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批鄧”也進入了新的高潮。就在這個當口，張春橋單獨給我寄來了一封密信。

這封信很奇怪。由張春橋親自開了一個信封，正中寫着：“徐景賢同志親啓”，在“親啓”下面特意打上兩個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寫着“張春橋”，接着是發信日期。這封信由張春橋自己封了口，背后再貼上“密封”的簽條。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愣了一下，因爲我和張春橋接觸這么多年，從來没有收到過他自己寫的“親啓”信封。

過去張春橋給我寫信，往往只寫在信紙上或寫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書代開的，然后再由秘書密封，貼上簽條，蓋上機密圖章，進行編號登記，再轉送給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對自己的機要秘書，也是從來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事以後，張春橋立即寫了一紙絶密信給我，要我把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像這樣的絶密信件，張春橋也是把信紙交給秘書，由秘書開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裏，張春橋自己親筆書寫“親啓”件給我，這是頭一遭。可見，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識到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連機要秘書們也都清楚這一點。這封信經過了三個機要秘書之手，由張春橋在北京的嚴秘書登記後，送給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小何，再由小何轉送給我的秘書小張簽收。當這封信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文件夾裏的時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他信件和文件，都由秘書剪開拆封、登記編號，獨獨只有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張春橋寫的加圈的“親啓”兩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誰也不敢動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開封口，展開一頁白色的海道林信紙，紙上赫然跳出張春橋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鉛筆字行書：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料收到了。

老實説，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

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説不定什

么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説話的人都没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適的人呢？

祝好！

春橋

在這頁信紙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請閲后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這封信，恍然大悟：原來張春橋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書"，而是要爲自己找個伴侶。關於他和文静離婚的事，自從王洪文到上海向我們傳達以後，回到北京當然已經把我們幾個的反應告訴了他。他以爲我們既然知道離婚的事，就想用找"秘書"來暗示我們，誰知道我們竟一本正經地當了真，還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書候選人。看了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給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説穿，我爲自己能得到張春橋的高度信賴而深感慶幸。

然而，要爲張春橋"找個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裏對於找什么樣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條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個可以"説話"的人。光憑這一條，就難。

張春橋本來就是一名"大雜家"，談起話來，國際國内、政治經濟、文壇逸事、人事變遷……可以説，古往今來，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這和他過去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後來又進入中央領導層有關，他的話題之廣，談話内容之豐富，談話層次之高，往往使我們都跟不上趟。現在，要找一個能够經常和他"談話"的"伴"，勢必要求她有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較豐富的知識積累，能够作出機敏的反應，我再加上一條：還要有駕馭文字的能力。因爲我想：在張春橋身邊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筆桿子，那就顯得很不般配了。

至於那位女性的模樣長得如何，是否年輕、漂亮，我認爲不是主要的，關鍵在於内在的素質和教養，外貌只要過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勝一籌，我覺得張春橋是會同意的。何况張春橋和我，都憎惡林彪、葉群"選妃"的那一套做法，我們决不會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樣，"派人到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貼身

護士"，"要年輕、漂亮"，挑出來給張春橋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始了尋訪。我考慮我所要物色的人選，最好是四十歲左右的獨身女性，有較豐富的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大體在黨政機關以及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方面，這樣的女性具備和張春橋共同生活和"對話"的基礎。不但這種女性對張春橋要有所接觸和了解，而且最好張春橋也見過她們的面，那末"牽綫搭橋"的工作就會方便得多。

方針確定以後，我先不和有關的人直接接觸，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變明查爲暗訪。如有符合條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單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關情况向張春橋匯報；等到張春橋認可以後，我再找某個"對象"談話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充當"介紹人"。因爲，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這類事情，還得雙方自願才能臻於美滿。

這項絶密"任務"，關係到張春橋的終身大事，我始終小心翼翼，親自去辦，從不交給其他人經手，連我的機要秘書小張也被蒙在鼓裏。這真是一項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我足足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聲色，可是結果却頗爲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條件的那些"對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獨身女性，則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等不够條件。我選來選去，覺得要從四十歲左右層次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獨身并適宜成爲張春橋的妻子的人，實在是難上加難。

終於找到了比較理想的"對象"

正當我傷透腦筋的時候，一個意外的機會讓我"捕捉"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統某機關去參加一個會議，聽取向基層單位派出的專題調研組的工作匯報。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的發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辭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樣咋咋呼呼。我插話問了她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還能列舉出一些人員的具體情况作爲佐證，這説明她在調查研究時，對基層單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風很深入、很細致。我特别欣賞的是，她在發言中敢於對我的某些看法表示異議，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無誤地説出

她爲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認爲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爲社會上阿諛奉承的人不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順從或是附和領導的意見，往往是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用沉默來表示異議已經算不錯了，至於能當面說出不同意見來的，簡直是鳳毛麟角。

我對這位女性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散會以後，我用隨意交談的方式，向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又是這個機關的領導了解她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說，這位女性是S女士，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多年的機關工作，又在一個重要刊物的編輯部當過編輯，有相當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回答我聽說過這位S女士，但是沒有見過面。會議主持人說，她調來我們單位不久，前一時期，她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向領導寫了書面匯報，受到領導上的重視，轉給報紙公開發表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聽了更爲高興，因爲就是我看到了這份書面匯報，認爲寫得不錯，提出的問題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給北京的張春橋過目，由張春橋批示同意後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只知道這是下級某部門送來的專題簡報，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個會議的主持人看出我頗爲賞識S女士的才幹，就進一步補充說：她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負責，下去調查研究的時候，往往全心全意、沒日沒夜地幹，因爲她現在是獨身一人，別無牽纍；她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婚姻，因爲她不育，對方就和她分手離婚了。這樣，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我聽了心裏感到很滿意，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和給張春橋找對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當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個普通的四十來歲的女幹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較高的內在素質，也就足以彌補外貌上的不足了。

拿定主意以後，我絲毫不露聲色，請會議主持人把S女士找來，由我單獨和她談話，討論如何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信奉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要想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和他談一次話。"此言不謬。由于我們之間是工作談話，所以S女士顯得毫不拘束，她比較敞開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傾訴了工作中的甘苦。通過這樣的交談，我對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風、興趣愛好乃至于生活經歷、家庭情況等，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談話結束，我和她握手道別，她在明處，我在暗處，她對我的意圖毫無察覺。我想：下一步，該輪到我向張春橋推薦了，只有

得到張春橋的認可以後，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見哩!

此後幾個月，由于毛澤東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發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絶密電報，接着，唐山又發生大地震，黨中央的領導忙于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張春橋無暇他顧；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澤東治喪。我雖然到過北京，但一直没有機會和張春橋作較長時間的詳細談話，這樣，爲張春橋“找伴”的事情，就暫時被耽擱了下來。

當面向張春橋匯報、介紹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的喪事辦完以後，我接獲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要我隨帶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幾位專家、教授，搭乘一架專機趕往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我終于得到了向張春橋面陳一切的機會。

我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給張春橋通了電話，他約我下午到釣魚臺去，由他派車來接我。下午二時，張春橋的駕駛員開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把我接到了釣魚臺九號樓。

張春橋住的九號樓，樓下是大客廳和工作人員用房，二樓外間是他的辦公室兼小會客室，裏間就是他的卧室。張春橋的住所布置得簡單、樸素，外間的辦公室兼會客室裏，中央放着一張小圓桌，四周是四張軟椅；臨窗的一邊安着一張辦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文件夾。我趁上衛生間的機會，順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裏幾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張普通的雙人床，兩只小沙發；床上既没有席夢思，也没有絲綢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簡樸的。

張春橋讓我在小會客室背窗的一只軟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門口。服務員端來了茶水，我喝茶，張春橋點起了一支烟，側臉看着我，談話就這樣隨意地開始了。

我那天有幾個重要的話題要和他交談，當然我有意把給他找伴侶的事放在最后談。在談話的過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閑聊，他給我説了地震的那幾天自己是怎么過的。我問張春橋：

“最近身體怎么樣？我們在電視裏看到你爲毛主席守靈的時候，幾次用

手撫摸心臟部位，是不是胸口發悶，有没有去檢查過心臟？"

"當時我自己没有意識到，"張春橋笑笑說，"后來電視放出來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幾天實在太累了。"

"還是要注意身體。現在有没有機會出去活動活動？"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出去一下。"張春橋吸了一口烟，繼續說，"不過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釣魚臺院子裏走上一個小時，繞幾個大圈子，堅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談話的人就少了……"我知道姚文元和他過從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則很少。前一時期，姚文元的家屬（妻子和孩子）從上海遷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釣魚臺，全家遷到了西單附近過去薄一波住的四合院，釣魚臺裏找張春橋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時候我坐在這裏看文件，一整天只說六個字：早晨服務員送早餐來，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三句話、六個字就過去了。没有什么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張春橋說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像歎息，又像自嘲。

聽到這裏，我深深地感覺到了張春橋的寂寞和孤獨：妻子離了婚，孩子不在身邊，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愛打牌，又不打網球，當了中央首長更不能隨意外出。他是個愛聊天的人，目前的這種一人獨處的日子實在難挨，怪不得他在給我的信裏寫着："現在整天連個說話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對他的處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確實盡快需要"找個伴"，他已經五十九歲了。

談話談到這裏，火候也到了，我當即把話轉入了正題：

"春橋同志，上次你寫信要我辦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覺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當面把情況向你介紹一下……"

他馬上就意識到我要談的就是"找伴"的事，輕輕地"嗯"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他也不正眼看我，一雙眼睛在鏡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簾，仿佛在凝視着遠處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貫注很仔細地在諦聽。

我把我找"對象"的過程作了概要的介紹，然后着重談了S女士的基本情況，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觸的印象。當我談到S女士寫的那份調查研究的專題匯報，就是經張春橋作了批示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時候，他頗

感興趣地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嗎?”我如實地介紹了S女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當然我也不加隱瞞地談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過去離异的原因……最後,我説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細透露給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聽聽張春橋的意見,如果可以考慮的話,我再和她接觸,當然還要看她自己是否願意。

張春橋從頭至尾聽完了我的介紹,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緩緩地説:“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

我説:“那好,如果需要的話,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張春橋微微頷首。這次當面介紹的談話就算結束。

過了十來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張春橋把我寄給他的關于電影《反擊》問題的一封信,圈閲后退還給我,同時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鉛筆字:

“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閲?”

這封信没有寫“绝密”“親啓”,是經過幾個秘書的手,隨文件一起送來的。當然,誰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話有什么含意,只有張春橋和我兩個人心照不宣。

我覺得張春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刻抓緊辦理:通過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部門,我把S女士的人事檔案材料全部調來。爲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時調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個人的檔案材料,要有關部門一起給我送來。

當天晚上,在燈下我一個人打開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紙檔案袋,裏面有S女士的履歷表、自傳、入黨志願書、中國共産黨黨員登記表、歷次政治運動小結以及組織上對她的鑒定等等。我從頭至尾翻閲了一遍,總的印象不錯,我認爲比較符合張春橋的要求。特别使我滿意的是,在其中的幾張表格上,貼着S女士不同時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這下子張春橋可以“如見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　中央辦公廳　張春橋同志親啓”,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

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裏。

誰知道，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他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爲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這么多年以來，我始終遵守我對蘇振華、倪志福、彭衝等幾個政治局委員的諾言：要保護S女士，姑隱其名。我雖然要求他們幫助我把S女士的檔案轉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爲S女士確確實實自始至終是被蒙在鼓裏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應該説是侵犯了她的人權。

我也暗自替S女士慶幸，因爲我給張春橋"找伴"這件事，虧得没有成功……

題外的話：

文革結束以後，張春橋的離婚及"找伴"也隨之而結束。一九八一年，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二年后，改爲無期徒刑。張春橋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二十多年，獲釋以後，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張春橋的婚姻關係又延續了下去，但這已經是後話了。

毛澤東遺體保存親歷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因病逝世。雖然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自己曾帶頭簽名，聲明自己去世之后要實行火葬；到了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接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又說："人總是要死的，我也不會例外。……我死了身體火化，骨灰丟到海裏喂魚。"但是，在他告別人世之日的第二天，以華國鋒爲首的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要對毛澤東遺體實行永久性的保護，并建立安放遺體的毛澤東紀念堂。

保存遺體的初步措施

當時，我被宣布爲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委員，并從上海趕到北京去參加守靈活動。毛澤東的遺體被安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大廳裏，他仰卧在一具敞開的水晶棺裏，身上覆蓋着黨旗，四周被鮮花簇擁着。這具水晶棺，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水晶工廠趕制出來供臨時使用的，由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下令制作。我看到毛遠新在水晶棺周圍忙碌地張羅着，水晶棺裏没有制冷設備，棺蓋只能打開着，同時把人民大會堂靈堂裏的溫度，降得很低，以保護毛澤東的遺體。

據當時的中央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告訴我：毛主席去世當天，中央還没有作出永久保護遺體的决定，因爲天氣很熱，爲了吊唁、治喪活動的需要，由衛生部派去曾留學蘇聯的女博士徐静，在有限的時間裏征求了一下老專家們的意見，于九月九日上午十時左右，就和兩位助手一起，果斷地往毛主席遺體血管裏注射了福爾馬林、醋酸鉀、甘油和酒精等藥物，作了基礎性的防腐處理，爲今后的永久性保存作了准備。

同時，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他國家學習如何保存領袖遺體的方法，當時，蘇聯有着保存列寧、斯大林等人遺體的豐富經驗，但是鑒于中蘇關係十分緊張，無法派團前去，接着就想到了越南也建立了胡志明陵墓，在蘇聯的技術幫助下長期保存了胡志明的遺體，因此馬上和越方聯系，很快就得到了越方的答復，于是在毛澤東逝世后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醫學院院長

林均才帶領的六人代表團，飛赴越南學習胡志明遺體的保存方法。

我們在北京守靈的時候，治喪委員們分成兩列，站在毛澤東水晶棺的兩邊，看着吊唁的人群從面前經過，有的悲痛欲絶，有的沉默鞠躬，有的號啕大哭。我時不時地對毛澤東的遺容看上一眼，只見他好像安詳地睡着了一樣，寬闊的額頭上泛着光，但是，忽然有一兩只蒼蠅飛來，停在他的前額上爬動着，我於心不忍，真想上前趕走那幾只討厭的蒼蠅……我當時想：要是能够永久保存毛主席的遺體那真太好了，我們上海能不能爲這件傳諸千秋的事業盡一點力呢？

上海接受的絶密任務

回到上海以後不久，絶密任務就來了，中央有關部門先是要上調處理遺體有經驗的技師，我和馬天水商量後，馬上就把龍華殯儀館資格最老的技師調往北京；接着又要上海和遼寧一起，制作永久性的水晶棺，這項任務也抓緊落實了。最後，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電話給我，説是目前各項工作中最爲關鍵的是遺體保存工作，中央已經成立了遺體保護組，由劉湘屏具體負責，要調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的科學家去集思廣益；同時，劉湘屏又建議，在上海也成立一個遺體保存的研究小組，利用上海的强大的科研和醫務力量，作出各種實驗，和北京相對照，防止失誤。

兹事甚大，我不敢作主，當即向在北京的張春橋作了電話匯報，張春橋説可以，一切和劉湘屏具體聯系，上海由我負責。我就把這項任務擔當起來了。和劉湘屏合作，我們一直是比較默契的，劉湘屏是原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上將的妻子，她當上了衛生部部長以後，在防治血吸蟲病、培養赤脚醫生、替周恩來總理治病等工作上，和我有着頻繁的聯係，這一次，我當然也會全力以赴。

我直接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去，找了好幾位專家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專攻遺體的長期保存。他們帶我去看了專門存放屍體的藥水池。這不同于普通的停屍房，而是一間像游泳池一樣的大房間，地下構築了一方方水池，每個約三、四公尺見方，都蓋有木蓋。揭開木蓋，迎面撲來的就是刺鼻的福爾馬林等消毒藥水氣味，只見每方池子裏都浸泡着十來具屍體，每具都

有編號，男女分池浸放。這些屍體都是供醫學院的教學、科研使用的。據負責人告訴我，因爲教學解剖課的需要，屍體供應奇缺，所以每次上海槍斃死刑犯後，各個醫科大學都會派人去爭要屍體；至於治療需要的新鮮身體器官包括眼睛、腎臟、肝臟、心臟等，那就更爲稀有了。

在藥水池旁邊另有一排房屋，裏面擺放着長桌子，是專供科研教學作解剖時使用的。上海醫學院的幾位專家，就根據北京下達的任務，開始研究遺體的長期保存。因爲這項任務是絶密的，所以他們的研究成果，必須密封起來送給我，由我安排市委的機要交通員，乘飛機直接飛往北京送給衛生部劉湘屏。

有一天，劉湘屏通知我，説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鮮的屍體，在死亡以後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個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爲遺體保存需要一個可供對比的"標准體"，以便觀察今後的變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臉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試驗，更不能對面容有絲毫損傷，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鮮屍體上先走一步，取得實驗結果。

執行"注射"處死獲得新鮮尸體

這可是一個難題， 而且時間限得很緊迫， 哪裏去找無主的新鮮屍體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禮堂找到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們三個市委書記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執行一個，用死囚的新鮮屍體做試驗。於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負責人老薛和成虎兩人找來，布置了這項絶密任務。他們提出：如果執行槍决的話，流血以后面容會有改變，所以准備和法醫等商量一下，改爲注射針劑致死較妥。我表示同意。他們做了充分准備以後，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監獄裏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場，而是在押送車上就由醫生用注射方法對死囚執行死刑，據説注射以後時間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押送車直接把屍體送到龍華火葬場，辦完死亡手續，再通知上海第一醫學院派人去火葬場按正常途徑領取屍體，這一難題總算解决。這恐怕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用藥物注射執行死刑，但在當時是絶對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報紙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對兩名罪犯執行死刑的報道，報道中説："這是一九四九年以

來首次依法使用非槍决的方法處决罪犯，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藥物的方法執行死刑。”我當時想，這個紀録恐怕要歸之於上海，因爲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經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了。

屍體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作人員很奇怪，説是這具屍體的身體怎么是熱的，他們不知道就在幾分鐘之前才執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醫學院取走的這具新鮮屍體非常管用，他們當即用了各種方法拓下了屍體的面容，翻成了標准的石膏面模。過了一天，第一醫學院的研究小組給我送來一個像餅乾筒那樣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鎖，同時附來一個裝着鑰匙的信封，要我轉送北京。我在辦公室裏獨自用鑰匙開了鎖，打開木箱，只見裏面塞滿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嚇了一跳：原來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年約五十來歲，瘦瘦的，閉着眼睛，上唇和下巴上還粘着幾莖他的鬍鬚。這個臉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細致、逼真，連皮膚的紋理和額上的皺紋都翻出來了。據説上海向北京通報了在新鮮屍體上翻模的方法和經驗，北京趕緊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這樣，我把這個木箱鎖好后交給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衛生部劉湘屏，并且叮囑交通員：“路上小心。”

確定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劉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動已經結束，遺體准備轉移，中央的遺體保存領導小組决定召集各地科學家開一次會，對遺體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報中央政治局决定。她要我帶領上海的專家前去參加會議，以便協商一致。我覺得這個會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帶隊，難以决定；我打電話請示張春橋，張春橋同意我前去。因時間緊迫，我從上海民航局調了一架“三叉戟”專機，帶了一批上海的專家直飛北京，到達時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廳舉行，由劉湘屏主持，黄樹則、吴階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綏等北京的專家都在場，大家各抒己見，會上除了對液態保存、氣態保存的利弊得失展開討論以外，上海的專家還提出了固相保護的設想，即運用蟲子掉在松脂裏形成琥珀的原理，把遺體固相保護起來，可以傳之永恒，但很多人認爲這種設想在技術上不能過關，難以成爲現實。

我在會上向劉湘屏個別詢問了一下中國代表團去越南學習的情況，她把蘇聯和越南保存領袖遺體的經驗向我作了介紹。她還告訴我：采用氣態保存的話，氦氣要比氮氣更好，但是這種惰性氣體制造困難，價格昂貴，前幾天曾經用許多氣球充了保護性氣體，運到安置毛澤東遺體的房間裏，還指揮一批醫護人員和警衛人員，集體拍打、擊碎氣球，放出氣體，作爲保護遺體的臨時措施。

會議開了一個通宵，直到天色微明，劉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見，我說主席遺體要長期保護供群衆瞻仰，所以對他的面容、神態以至面部顏色的保護要求非常高，還要能接受光綫的照射，經受濕度、溫度的影響而不變形，必須采取最安全、穩妥的措施，根據國外的經驗和國内各方專家的意見，還是采用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方法爲好，將來供群衆瞻仰時，遺體的頭部和手部在氣態中，而身體在液態中；平時在氣態中，每年一次的大保護時在液態中，遺容要保持自然狀態，不能化妝。我發言完后，劉湘屏征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保存原則，向中央請示，會議就結束了。會後，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趕到釣魚臺去，把這件重要事情向張春橋、王洪文分別作了匯報。

關於遺體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門廣場建造了"毛主席紀念堂"，代號叫做"一號工程"，國家投入了鉅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形成了一個遺體保存的規範化系統工程，并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經歷的遺體保存工作，只是極其短暫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這段短暫的經歷，使我知道了過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過去不敢思考的問題，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遺體長期保存以外，世界上還有這樣一些黨和國家的領袖，做過遺體的長期保存，他們是：

季米特洛夫　曾任保加利亞共産黨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第三國際執委會總書記；

哥特瓦爾德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中央主席、總統；

蘇赫巴托爾　曾任蒙古人民黨領導人、人民軍總司令；

胡志明　曾任越南勞動黨主席、共和國主席；

金日成　曾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共和國主席；

福布斯・伯納姆　曾任圭亞那共產黨領導人；

阿戈斯韋諾・內圖　曾任安哥拉共產黨領導人。

當然，也許還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以上這些人的遺體處理情況，不禁引起我的深思：爲什么這些被長期保存遺體的領袖，都是共產黨人？共產黨是最講唯物主義的，長期保存遺體，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嗎？緬懷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杰出領袖，是人類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學技術和醫學研究方面都要先進和發達得多的國家，爲什么不搞領袖遺體的長期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當時的想法，而是后來的思考。所以，現在如果問我對領袖遺體長期保存的態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讚成；二、已經保存的，由各國人民自己去決定。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所作的證詞

我在上海擔任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綫，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准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回到上海以後的第二天，我把向張春橋匯報的情況以及張春橋的指示向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傳達。後來又告訴了朱永嘉等人。

過了幾天，就是九月二十八號的中午，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挂帥。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在這裏，張春橋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當中央通知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的司令員周純麟同志到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我們按照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馬天水走了以後，我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么動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于會泳打了電話。接着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後住在京西賓館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們没有打聽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當中度過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静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裏打電話，想要問問情况，結果就是打不通。

我們商量以後，决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裏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

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况，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没有講了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

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收到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强戰備的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又向我們匯報說，原來總政决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

這種種迹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學習室分析形勢。我説，毛主席逝世以後，一號戰備剛剛通知撤銷，怎么現在中央軍委又通知加强戰備了呢？而且這個通知裏特別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來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也想去聽電話了。房佐庭告訴他們説，會議不准往外打電話，又説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穿軍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説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這樣我就在常委學習室跟他們幾個人議論 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説“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這個時候說：幾個老帥，像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裏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裏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

我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准了張春橋他們了。

我們幾個人覺得形勢非常嚴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

我就說下午我要找廣播電臺和報社的新聞負責人吹吹風。

這樣，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們分成兩個地方進行打招呼和吹風。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還給浙江省委的副書記羅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陳佳忠分別打了電話摸情況，王秀珍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了電話，還要魏秉奎給當時正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裏打電話摸情況。後來都沒有摸到進一步的情況。

八日下午的五點鐘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會議。我說，這種種迹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們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備。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誼電影院一個公開審查文藝節目的場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後我又在八點多鐘，馬上趕到了康平路常委學習室，看見滿滿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訴我說：她和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約好了，下午要繆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如果摸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我聽了心裏一驚，我想，果真出事了，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預言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這個時候，我自己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幾個電話的來回以後，證實了文化部的于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

話聯系也中斷了。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說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來了電話。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准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在電話當中傳來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從公安部那裏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

過了一會，劉慶棠又打電話來了，是我的秘書張家龍接的電話。劉慶棠在電話裏面說："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個時候，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蕭木這么一說，大家就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

我就宣布我們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學習室，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參與策劃的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幾個常委，王秀珍這個書記，還有朱永嘉，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

我在會上征求大家的意見，我說下一步看怎么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了華國鋒同志，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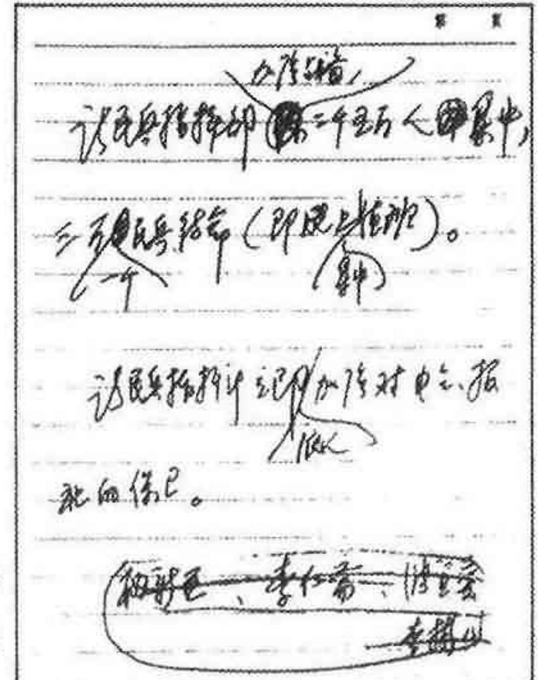
我聽了朱永嘉的發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們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是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后，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后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當時我認爲姚文元講的很精闢，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因此，我



□上圖：行進在南京路上的上海民兵。

□右圖：徐景賢給王秀珍調動民兵，准備暴動的手令。

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就遵循了姚文元這個顛倒黑白的暴力論。

就在八日晚上這個策劃武裝叛亂的會上，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兩千五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三萬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說，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說，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才能形成一個拳頭。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身邊，因爲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廖祖康具體提名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張宜愛、警備師師長李仁齋帶在我們身邊。

市委常委馮國柱在策劃會議建議說，可以把楊新亞副司令也叫來，他熟悉作戰。

這樣，我們就背着上海警備區黨委，由市委辦公室直接通知這幾個人來跟我們匯合，一起搞武裝叛亂。我們就是分裂軍隊的罪人。

在策劃會上，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的隊伍。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辦了。

在策劃會議上面，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帶領負責抓總和准備輿論，最后行動的命令由我這裏發佈，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后來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聽王秀珍說，她那個二號指揮點裏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等，以後又轉移到了東湖路招待所。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

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

“請民兵指揮部加强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强對電臺、報社的保衛。”

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我當時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我們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准備，我們的確也作了准備。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給民兵增發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閱過的。光是這一次就發了半自動步槍三萬五千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后，休息了一會兒，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從二號指揮點打了紅色的保密電話到一號指揮點要我接聽電話。廖祖康說，王秀珍跟馮國柱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臺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臺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我答應了，而且掛了電話以後，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

“電臺由李仁齋同志告電臺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

“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寫好以後，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面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後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布置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只要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用來開導我們，啓發我們。他又多次說過“准備殺頭”這樣的話，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准備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豁出一條命去幹了。我替“四人幫”賣命，與人民爲敵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及時地挽救了我。

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主要是我。我對黨對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完全願意認罪服法。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場叛亂是"四人幫"和我們這些人在上海苦心經營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結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後，張春橋連續從北京向上海發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動和導致了這一場武裝叛亂的發生。

附錄一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賢給張春橋、姚文元的信

春橋、文元同志：

聽馮國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說，四屆人大期間，洪文同志在釣魚臺請了兩次客。第一次請客，吃的是中國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小仇（現兼做秀珍、敬標的秘書）等人。做菜的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的廚師，席間喝了很多酒，吃完飯又留全體看美國電影《巴頓將軍》，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請客，吃的是法國菜，是特意把錦江飯店的花師傅（四屆人大代表）接到釣魚臺去專門做的，那天吃的法國名菜"焗蛤蜊"等。至于焗蛤蜊用的盆子（盆內有一個個半圓的孔，把蛤蜊放在上邊）和新鮮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張羅，專門從上海運去的。那天的宴會，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規格（馮國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人面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臺、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國菜又放映了西德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等沒有被邀，可是這幾個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師傅接去，又要請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結果宣布名單時沒有他們，"阿大氣得把京西賓館的房門砰地踢了一脚，馬振龍他們還算識相，乖乖地去睏覺了。"（金祖敏的原話）

第二次請客時，人大會議已經結束，會務組通知上海代表集體乘專列火車回上海，少數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買客機票。本來，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隨團回來，或是提前乘民航機回滬（當時大會消息已發表）。可是，洪文同志卻叫小廖打電話給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專機調北京給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純局長以爲是給上海代表團集體使用的，在三叉戟專機裝備好以后，即打電話給京西賓館找陳阿大（上海民航平時歸工交組領導），問在專機上要預備些什么吃的東西。陳阿大接到電話，一聽派了專機，而自己却坐火車回滬，馬上火了，在

電話裏說："沒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備！"氣得把電話掛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抱苦說："你們要的專機我已經替你們准備好了！"他還對其他幾個人大代表發牢騷，鼓動了好些人都爭着要坐專機。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況不妙，就扯謊說領導同志還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馮國柱、李彬山談話，讓這幾個人留下，叫代表團其他人乘火車先走。其實，代表團剛走了一小時，他們幾個就登上三叉戟專機飛回上海了。(他們還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飛機，金英同志怎么會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團的火車抵達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車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拼命要我也扯謊，向代表們說秀珍他們剛到，其實他們早已在上海過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調一架專機，簡直像調一輛汽車那樣容易。

人大期間發生的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訴我，而是金祖敏同志這次調北京前，因對陳阿大有意見，才對我說了一些；馮國柱所談的情況，則是我個別向他問起花師傅的表現時無意中說出來的。

其實，人大期間發生的事，無獨有偶，就在十屆二中全會短短的三天會議期間，洪文同志就請了兩次客，這是我親自經歷的。一月八日全會閉幕的那天晚上，小廖電告秀珍，要我們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后補中委們一直等到半夜十二點多，沒有動靜，就陸續睡了。凌晨一點半，忽然來了"緊急集合"的通知。我們從睡夢中爬起，到京西樓下一看，小廖開了三部汽車來接我們了。於是，天水、純麟、秀珍、祖敏、周麗琴、楊富珍、汪湘君、張國權、馮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車直驅釣魚臺。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設了一桌酒席招待我們，還請大家喝湖南長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間，大家還爭着搶朝鮮送來的大梨、大蘋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問蕭木到哪裏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後，大家還一起看美國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十一點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樓的套間中，又一次設宴請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純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豐盛的酒席，冷盤熱炒，十分精緻，再加上陳年茅臺（女服務員小張誇口說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釀的茅臺少好幾杯）。席間，秀珍和祖敏爲了長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爭

着索要。小廖說：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這種追求享受、講究排場的資産階級生活作風，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長，在十大以後又進一步發展了。僅去年一年，黄濤去京開會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請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飯后看英國片《女間諜》，第二次請黄濤和敬標（當時剛從日本回來）一起吃飯，飯後看美國彩色片《十誡》，第三次飯後看《跳不完的舞》。在釣魚臺住所請他們吃還嫌不够，洪文同志又專門到新建的北京飯店設了一席，招待黄濤和敬標。他們吃了回來，還嘖嘖贊美：説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這要揮霍掉國家多少錢啊！（張敬標對我説：洪文同志請客有特別費用可以報銷。）此外，聽説洪文同志還在釣魚臺分别接見、宴請了馬振龍、廖清純、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張振亞從北京開全國體工會議回來，還説洪文同志請他吃飯、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寫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鏡頭"（張振亞語）。當然，我所知道的這類請客吃飯的事僅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同志提倡這類作風，下邊就跟着學。就拿小廖來説，去年、前年來上海辦事四次，幾乎每次都有人大請其客。秀珍、敬標、黄濤和警衛處的康寧一政委等都單獨請他吃飯，原工總司的人也紛紛請他吃飯，吃遍了各大飯店。有一次連馬老也自告奮勇，特意在錦江請了兩桌。我雖然没有請他，但他們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於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請在内），因爲他們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訴我，我是從警衛員等處聽説的。

有一次吃飯時，天水同志當着洪文同志和我們的面説："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進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則馬上回話："不是吹捧，老幹部像馬老這樣的精神面貌，在全國都是少見的！"這一類話，出自兩個黨的高級干部之口，難道是正常的嗎？再説，像小廖這樣的秘書到上海時，不但有人争着請客吃飯，而且以秀珍同志爲首，帶領黄濤和原工總司的同志，大隊人馬到機場迎送，不止一次，這種曲意奉承、阿諛拍馬之風，不正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孿生兄弟嗎？

有的人除了大肆揮霍、請客吃飯之外，還搞封官許願、送禮送錢之類的活動。十大期間，洪文同志當面對黄濤説（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場）：

"這次中委因爲老幹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當市委書記。"黄濤同志在工作上是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對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關系上，表現了一種資産階級的庸俗作風。這次萬人體育館的改建，黄濤明明是有意見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過，但他在會議上討論時却積極表示要改建，甚至還提議在體育館主席臺后面裝電梯，以方便首長。等到春橋同志對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後，洪文同志連夜兩次打電話來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橋同志在和馬老通電話時又指示不要爲了好看而改建主席臺。這些馬老都告訴了黄濤，而在這以後黄濤却又和小廖通電話，建議還是要按洪文同志原來意見，敲掉主席臺下的七根柱子進行大改。小廖請示後没有答覆。——以上情况都是馬老親口告訴我的，他對黄濤此舉也隱隱表示不滿。黄濤這樣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過去在上海時，對坐什麼汽車，穿什麼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到北京以後，通過某種合法、非法的途徑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裏有可以拍連續動作的外國照相機，有晚上充電以後白天可以持續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機，有能够奏音樂的打火機，有可以遠距離操縱的彩色電視機，有工交組送去的國産盒式録音機，有輕工局馬振龍送去的手表、照相機、酒芯糖、彩色膠卷等，有到上海定做的料子服和皮鞋，有從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獵槍，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臨上飛機以前，黄濤還偷偷地托他帶了一支特制的獵槍給洪文同志，這支槍是拆開後偶裝在一個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裝過衝鋒槍，我們的同志爲什么學他們的樣呢？）

他們除了拿用的，還有吃的，還有貨幣。我們的張敬標同志除了給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還經常給洪文同志送錢去（去年春、秋，小佻就秘密去京兩次）。據敬標自己説，洪文同志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并説是經馬老同意的。我曾問他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説有幾百元，始終未説明具體數目，并説是洪文同志那裏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説："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娱樂和消遣。在上海時我發現他對香港片特別有興趣，對《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喜劇片津津樂

道、對某些有嚴重錯誤的影片不能鑒別、反而認爲是好影片。在他來說，當然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後，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濫，聽秀珍同志說："有個時期洪文同志幾乎每天晚上看電影。"聽小廖誇耀說："釣魚臺的影片、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影片，外交部、中聯部和文化組的過路片，我們都能調。"聽于會泳同志個別對我說："洪文同志那裏調過路片最積極，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們都不敢報給首長，小廖也調去看了。"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洪文同志親自對天水、秀珍和我說："我什么電影都看，無非是黄色的、反動的。"這話説得多輕松。有些電影他還要一看再看，例如《戰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過很多遍，這種影片裏那麼多下流鏡頭，多看有什麼好處呢？何况小廖這樣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爲會泳同志告訴過我拍攝樂隊時用光有特點，可是這次在洪文同志那裏觀看時，只看到許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鏡頭，小廖在一旁説："這部影片我們看過好幾遍了，第二本已經放壞了，不能再放，今天把它跳過去。"我不禁在想：他們看過好幾遍的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麼？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時，小廖到上海來爲首長搞寬銀幕，他隨身帶來兩部寬銀幕影片，在上海小範圍内試片，一部是美國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殘》，一部是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後后代》，他説也已看過多次，看來這些影片已經使某些同志上癮了。

洪文同志變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内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却占據了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後來過上海幾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幾個晚上的時間來打撲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撲克時，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幾個通宵。

十大以後，特别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志的擔心增加了。……

景賢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附録二

父親徐宗駿的教育生涯

我的父親徐宗駿，抗日戰爭時期就來到上海南洋模範中學，任高中化學教師，以後經歷解放戰爭時期，直至解放以後，長期在南模任教。由於他爲人正直，教學認真，深得學生的愛戴。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歷届高中畢業生投票評選“我最敬愛的老師”時，他多次名列榜首。對於他的生平和他的教育生涯，知道的人不多，在這裏作一介紹，以表示對他的緬懷。

徐宗駿，字雅平，一九零〇年出生於奉賢縣奉城鎮，是鎮上東街東天成百貨店業主徐九成的第三個兒子。他小的時候在奉賢和松江讀書，以后到南京念大學，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化學系，同年年底回到家鄉。在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下，他結識了早期的中共黨員李主一（在國共合作時期，李主一又兼任國民黨奉賢縣黨部執行委員）。李主一想通過教育事業來擴大革命影響，就跟我父親商量，決定於一九二七年秋在奉城潘公祠創辦曙光中學，由李主一任校董，負責籌集經費和聘請教師；由徐宗駿任校長，負責教學工作和校內事務。

父親生前，曾多次和我談起曙光中學的情況。當時這所學校，設立三個班級，面向奉賢、南匯等浦東地區招生，共有一百幾十名學生；聘請的教職員大多是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劉曉（后任我國駐蘇大使）就在校內任政治教師。父親也經李主一和劉曉介紹，於一九二七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曙光中學成立後，不但教學成績卓著，而且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成爲浦東的一個革命基地，成立了中共曙光中學支部，又稱浦東縣委，后叫奉賢縣委，直屬江蘇省委領導，由劉曉任書記。李主一任組織部長，我父親列席縣委會議。以后又在南橋地區發展黨員，建立了中共南橋支部。江蘇省委派林鈞負責和縣委聯係。

當時，南匯縣周浦中學的進步學生們，因鬧學潮而被開除，有一批學生集體轉到曙光中學來就讀，曙光中學的學生人數大增。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學校組織學生上街游行，搞演出，作宣傳，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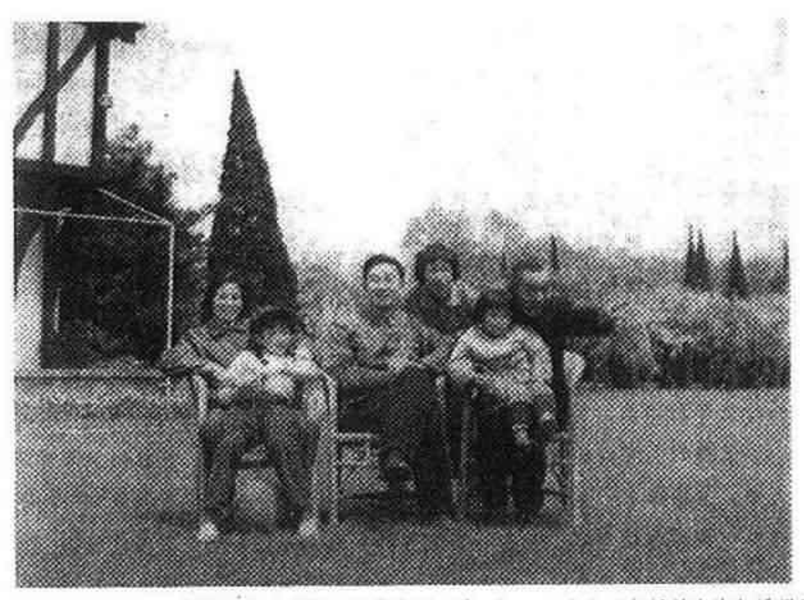
號，震動全城。平時教師在課堂上公開宣傳共產主義，出版有革命內容的墻報，学校裏的政治空氣十分濃厚。師生們唱着曙光中学的校歌，熱血沸騰。記得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天，有一位當年曙光中学的女学生朱某，到上海廣元路我們家裏來看望我的父親，回憶往事，當場唱起了曙光中学的校歌：

望東方曙光、曙光，
一輪鮮紅的太陽，
照着工房，照着農場，
照着紅旗飄揚。
衝破黑暗，
我們建設曙光的天國在地上……

當時上海正處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時期，她輕聲唱着唱着，臉上出現了興奮的紅暈，我的父母親低聲和着，激動不已，此情此景，至今讓我回憶起來仍恍在眼前。

父親告訴我，當時劉曉一面做政治教員，一面主持革命工作，經常在校內召開秘密會議。有一天晚上，還組織過學校裏的男性共產黨員，化裝以后前往東新市打土豪劣紳。劉曉還利用假期到南門外沿海的鹽民、漁民中間去宣傳革命真理，組織群衆，發動群衆。他自己身穿粗布衣服，腳蹬草鞋，曬得黑黑的，甚至和鹽民同吃同住，完全和貧苦群衆打成一片。李主一當時的任務是開展上層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掩護革命事業。一九二七年黨中央"八七會議"以後，江蘇省委還派林鈞到奉城，在曙光中學向奉賢、南匯、川沙的黨團員骨干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曙光中学成爲浦東名副其實的"紅色堡壘"。

父親自己是大學化学系畢業的，在當校長期間，對曙光中学的教学工作是重視、認真和負責的。當時學校的經費十分困難，除李主一募集部分款項以外，我的祖父徐九成就從百貨店的盈餘和家庭積蓄中拿出一部分錢來充作經費，給学校添置上課用具，儀器設備和圖書標本。父親崇尚科學，在教學中重視理論與實践相結合，我親眼看到他做過許多化学、物理的實



门徐景賢全家及徐父徐宗駿（右一），一九七五年攝於上海虹橋俱樂部

验，啓發學生。學校教學需要人體骨骼標本，我父親從城外亂墳崗裏找來死者的頭蓋骨等，清潔消毒后作爲教學標本。有一次，他把一個骷髏頭顱裝在火油箱裏帶到奉城東街自己家裏，放在廂房裏的寫字臺上，把我的祖父、祖母嚇了一大跳。曙光中學還重視學生的課外閲讀，買了全套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學生文庫，供大家借閲。我和我的堂兄們小的時候也從這些書籍裏得益不少。

曙光中學以其進步的影響和嚴肅的辦學，引起了奉賢地主豪紳集團的嫉恨，更促使國民黨縣黨部急欲除之而後快。一九二八年，奉城的大地主廖味容向國民黨縣政府告密，說曙光中學“名爲學校，實爲共産黨機關”。奉城的西部豪紳阮芙士當時當上了縣教育局局長，決心對曙光中學開刀。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趁着學校放春假的機會，國民黨縣政府派警察查封了曙光中學。學校裏的進步教師，因爲事先得到了風聲，大多避往上海，幸免於難。我的父親和劉曉等也迅即轉移，父親到上海任中學教師，以後又到交通大學任教。劉曉和李主一到上海以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一九二八年六月，李主一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後殺害于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劉

晚后來也被法帝國主義巡捕房逮捕，因他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被關押數年後脫險。我的父親這時已無黨的組織關係，成爲黨外同情分子。一九三一年有一天，父親接到劉曉寄到交通大學的一封信，說是自己剛出獄，衣服破爛，急需一些衣物和錢，約父親於某天到南京路先施公司（現在的上海市服裝公司）門口見面。父親應約前往，劉曉出現了，父親把錢、物當面交給了他。據劉曉說，前一時期他一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遇到過多次危險，有一次他到郵局去寄發共產黨的宣傳品，給櫃臺內郵局的人員發現了，大聲呼叫着從櫃臺內翻越出來捉他，虧得劉曉機智逃脫，才又一次躲過了危險。此後，聽說劉曉去了江西中央蘇區，解放後任我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父親就再也沒有會見過他。

父親到上海以後曾在君毅中學、南洋模範中學任教，并曾任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專、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等校的化學系講師、副教授和化學教研組主任。他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一生沒有做過壞事，具有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上海期間，汪精衛政府在上海成立僞交通大學，動員原有的教師到校上課；父親堅不擔任僞職，憤而辭去了交大化學系講師的職務，從此陷入了失業的困境，有一度全家以碎米、麥麩度日也難以爲繼，甚至靠典賣一些家具雜物維持生計，但父親不爲所動，堅決不回僞交大。當時，南洋模範中學的沈同一校長聽說了這些情況，又知道父親富有教學經驗，在交大教化學具有相當的水平，就聘請父親到南模高中部任教。從此，父親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和教學工作崗位。

在南模教書期間，父親徐宗駿在教學上始終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而且他能結合新的形勢來充實自己的教學內容。記得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向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以後，他立即收集了和原子彈有關的鈾235和鈾238的資料，在課堂上講解，使同學們增加了許多新的知識。他爲人正派，身教重于言教，我的姐姐和我都在南模讀書，我們同樣聽他的課，參加他的出題考試，但他從來不向我們泄漏考試題目，甚至連復習的重點也不透露，一切要我們憑自己的努力去爭取。

解放以後，父親擔任高三女班班主任，他滿腔熱情地和學生一起投入了對新的革命理論的學習，重新煥發了青春。他每次上課，從不缺課，從不請假，從不遲到早退。一九五三年，我的母親不幸病故，那天正值父親

在南模有課，當時母親的遺體還在太平間裏，父親忍着悲痛，戴上一塊黑紗，照常不動聲色地認真上完他該上的一課，全班的學生都不知道老師的親人剛剛去世。之後，學生們知道了實情，都非常感動，自動列隊去參加母親的葬禮，并勸父親節哀。有一位學生把這個平凡而動人的故事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做《一塊黑紗》，登在《文匯報》上，父親看了很是感動，更加忠誠於教育事業，而且他十分珍惜學生對他的敬愛之情，把這篇文章剪下來珍藏着，直到他一九八七年去世之後，我翻閱他的筆記本，才發現裏面貼着這份紙質已經發黄的剪報。

父親徐宗駿畢生從事教育事業，他以他的平凡勞動爲教書育人做出了貢獻，像他這樣的教師是值得學生們永遠懷念的。